

自改革以来当代启蒙知识界于三次大裂变中分娩

# 思潮

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

在中国社会

“民主”、“民族”、“民生”

三大问题的轮番挑战下的有力回应

一份当代中国思想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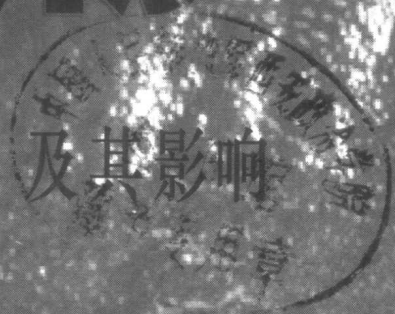
两大阵营激烈交锋的档案文存

公羊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思潮

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公羊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

ISBN 7-5004-3971-7

I.思… II.公… III.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IV.D09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9775 号

责任编辑 树琦

责任校对 海岩

封面设计 曼玲

责任印制 戴宽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64030272

网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版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13.875 印张

字数 38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编者的话

在中国当代知识界，“新左派”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的新现象。围绕“新左派”，知识界见仁见智，发表了许多评论，因观点不同以致势同水火。有鉴于此，本书将“新左派”的主要文本以及针对“新左派”的批评合编为一集，用意是让读者能够通过此书集中了解当代思想史的这段经历。

“新左派”并不是统一的学派，也缺乏公认的定义，在此旗下的学者彼此的观点立场未见得一致，被称为“新左派”的人物也未必认同、接受这一称号。因此，本书的编选或有遗漏。另一方面，对“新左派”批评部分所选取的文章不但能够使读者认识对立学派的理论主张，也有助于读者了解“新左派”出现的背景。它们与“新左派”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同样是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思想现象。

2003年3月

## 知识界的分裂与整合(代前言)

语 冰

我们这个时代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 年 1 月中美两国建交——以这两个前后相继的事件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其实质则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被迫承认了中国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接纳中国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由此,近代以来的“救亡”阶段遂告一段落,中国放弃了此前持续 20 多年的准战争体制,开始了另一个阶段,即“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就是这一阶段的新的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这个历史时期,迄今已有 25 年。

在这 25 年“发展”的背景下,意味深长的是,知识界的历史却是由一系列“分裂”构成的。20 世纪 70 年代末围绕朦胧诗、人性和异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问题,文学界和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分歧已尖锐地呈现,到 1981 年批判电影《苦恋》和 1983 年清除“精神污染”,新旧知识界营垒分明,裂痕已无法弥合。阵营的一方,是忠诚于国家体制、以正统的马列毛为理论资源的知识分子,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老左派”;另一方,是以自由、民主等为诉求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所谓的启蒙知识界。两个阵营此消彼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者迅速边缘化,失去对整个知识界的良性影响力;后者则稳

步取得话语权,在整个 80 年代执掌知识界之牛耳。应当指出,启蒙知识界源源不断地从西方获取精神支持,以一种泛自由主义的立场批评国家体制,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细致观察,可以说,启蒙知识分子所持有的理想主义和反体制倾向,又仍然是“文革”造反精神在新时代曲折而强劲的延伸。其相同和相异处在于:“文革”造反依托的是毛泽东晚期思想,启蒙主义则背靠西方现代理论,而绝非偶然的是,两者所针对的是同一个国家体制。

新老知识界二元对立,这一格局维持了不到 10 年,更耐人寻味的是启蒙知识界内部的三次分裂。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动摇,国内改革也步入动荡期。权力下放造成的诸侯经济和城市改革引发的经济波动,催生了新权威主义的出笼。新权威主义者认为,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经济的自由化只能在政治集权和政治垄断的框架内实现,政治民主化则应当缓行。新权威主义重新回归于国家体制,以新的国家主义为诉求。一方面,他们完全剥离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市场资本主义的改革为目标,由此区别于先前的“老左派”。另一方面,他们又断然放弃了民主诉求,以强化国家体制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从而与原教旨的启蒙主义分道扬镳。围绕“民主”问题,泛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首次发生危机,持新权威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从启蒙阵营出走,形成了启蒙知识界的第一次分裂。

冷战结束,两极结构塌陷,全球格局分化重组,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大国,转而又成为美国围堵遏制的首要对象。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东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气势对世界范围的市场、资源和权力架构形成了潜在的压力。20 世纪 90 年代,从持续的经济制裁到“银河号”事件、北京申奥失败和多次台海危机,中国战略环境的恶化甚至使民间社会也感同

身受。由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在体制外的崛起,绝非偶然。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这本带有商业写作性质的书能够热销,揭示了体制外的中国民族主义在民间社会有着深厚的土壤。中国民族主义者忧虑中国在“发展”阶段的国际环境,退一步,他们力主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进一步则申张国权,关注中国在海外的市场、资源甚至生存空间的获取。同新权威主义一样,中国民族主义也脱离了原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再保有国际主义的价值视野,而仅局限于自身民族利益的诉求。由此,他们也迥异于20世纪80年代在启蒙知识界盛行的世界主义和新西方倾向。围绕“民族”问题,原启蒙知识界的第二次分裂发生了。

如果说,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提前登场,即始于上述20世纪70年代末的两个标志性事件,那么,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则滞后展开——只是到了1992年以后,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真正性格,如市场经济和高速增长、全球化和社会分化、官场腐败和消费主义等等,才真正呈现出来。在20世纪90年代的这一系列特征中,最引人瞩目的大概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刻的社会分化。一方面是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是广大农村的凋敝和城市贫民的涌现。而这一切又同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贸秩序息息相关。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野不可避免地投射到意识形态领域,使“民生”成为各方面广泛关注的紧迫问题,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发了启蒙知识界的第三次分裂: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对知识界舆论的主导;另一方面是“新左派”的异军突起。

改革的实质内涵之一是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由此激化的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确需要市场之外的国家力量予以抑制和平衡。20世纪80年代末出笼的新权威主义实际上相当准确地预言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即“威权政治+市场经济”,这也是东亚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长期采取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并非巧合的是,恰好是在1992年以后,即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真正性格全面呈现之后,在原启蒙知识界内部回响起了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呼喊。其实质在于,启蒙知识界原来单纯以国家体制为抨击对象,20世纪90年代则突然面临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两面夹击,由此陷于深刻的困境。

民族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分歧在另一个维度上展开。自1500年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现代文明的成长便依赖于对东方民族的征服,其中,美洲的资源、非洲的人力和亚洲的产品及市场为欧洲的商业革命、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提供了前提条件。古希腊时代所实行的二元社会结构,即民主奴隶制——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公民社会与一个庞大的奴隶阶层彼此依赖、互为因果,这种二元社会结构自近代以来便在全球范围内稳步展开了。一方面,西方社会拥有先进的物质技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教育文化体系;另一方面,其先进性的取得和维系又离不开对东方国家和民族的全面侵夺和压迫。启蒙知识界曾经盛行的世界主义和亲西方倾向完全无视西方现代文明的这种双重性质,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形势迅速向19世纪的格局倒退的时代,显得尤其不合时宜。其世界主义和新西方倾向不再被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成熟于20世纪90年代的较为年轻的一代所延续,实在是时势



使然。

同新权威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样,“新左派”也曾是原启蒙知识界的成员,或者曾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的思想环境中求学和成长。细致观察,“新左派”立场观念的形成尽管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国内环境的剧变,但在文化心理的渊源上却可以远溯于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秦汉以降,“抑商”就成为中国古代制度、伦理和心理的稳定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是古代版本的对资本主义的利用和限制。正像伊曼纽尔·沃伦斯坦所说:“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现代中国,这种文化心理依次体现为20世纪初叶孙中山的“节制资本”观念、20世纪中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20世纪末的“新左派”思潮。因此,一方面,“新左派”的确较多地从现代欧美知识左翼的文本中获取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在其思想的底层仍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力。实际上,就“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歧来说,也并不限于眼前急迫的国际国内问题,而广泛地涉及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代,以及对中西方历史的基本评价。

“民主”、“民族”和“民生”,堪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围绕这三个基本问题,启蒙知识界经历了三次大的分裂。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初期,在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以正统马列毛为理论资源的“老左派”围绕一系列问题与启蒙知识分子发生激烈论战,不久便失去影响力,而迅速边缘化。到20世纪末,“新左派”以新的理论资源和论述策略出人意料地亮相于知识界,并对近20年的历史过程持一种反思和批评的立场。从“老左派”的淡出到“新左派”的凸显,历史似乎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中间所经历的则是一个近于完整的时代周期。“新

左派”的出现也许是一个征兆，它似乎意味着一个时代行将终结，另一个时代行将开始。

### 三

知识界的分歧和争论尽管常被贬称为“茶杯中的风暴”，但它们仍是现实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即现实的电闪雷鸣在学理层面的投射。中国进入“发展”阶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财富汹涌般地增长，成绩有目共睹。但近代以来的三个基本问题，即“民主”、“民族”和“民生”问题仍远未解决。对此，20世纪80年代延续下来的“老左派”、启蒙主义者和新权威主义者，或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民族主义者和“新左派”，都不会有太大分歧。

中国以占人类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步入“发展”阶段，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也截然异于西方国家。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西方国家自地理大发现以来，通过武力扩张和征服，曾获得在人口和版图上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的海外殖民地，以此作为人力和原料的供应基地以及制成品的倾销市场。时至今日，西方仍以其金融、科技和军事优势维持着不平等的国际经贸秩序，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源源汲取巨额剩余或利润。这种全球范围的二元社会结构，对于中国来说是无法复制的。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架构中，中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外围地带，即处于全球经贸分工体系的中低端。由于现实的国际关系架构，更由于中国当今的人口规模，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在自身国土之外汲取到较大规模的剩余或利润。这就是说，中国在“发展”阶段面临的矛盾不可能被转移到自身之外，而只能在本社会内部予以消化和解决。这一境况从根本上约束着中国对自身发展路径的选择。

因此,中国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这是关系到中国能否继续发展的最大瓶颈,因而必须化解。随着问题和矛盾的继续演化,中国知识界的各家各派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分化组合。但是,如果以上述中国截然区别于西方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为总的参照坐标,那么,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知识界的整合就仍然是可以期待的。

# 目 录

编者的话 ..... (1)  
知识界的分裂与整合(代前言) ..... 语 冰(1)

## 上 篇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 汪 晖(3)

历史已经终结? /3 三种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8

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启蒙主义及其当代形态/15 面对21世纪:

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37

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 ..... 陈燕谷(51)

依附性与欠发达:另类资本主义/53 没有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

70

读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兼论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问题 ..... 李民骐(89)

长周期:无产阶级化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极限/89 世界历史

的转折: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问题和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

过渡/98

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 ..... 甘 阳(110)

革命及相关词语 ..... 黄纪苏(121)

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 ..... 旷新年(129)

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 ..... 韩德强(142)

中外对比五十年/143 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 /148 后二十年:势

能转化为动能/153

**“漫长的革命”**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韩毓海(157)

**毛泽东难题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历史宿命…………… 田力为(173)**

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突出毛病/174 毛泽东时代知识精英和官员  
在中国社会的独特地位/175 毛泽东难题与其烛照人类未来的理  
性光辉/176

**“文革”所处的世界和历史时刻**

——“文革”群众运动发展与结束的原因另探…………… 萧喜东(179)

反帝反殖、反修防修与西方反体制运动：“文革”与世界革命/181  
战争与革命：“文革”所处的世界和历史时刻/186 战争与革命的  
抉择：“文革”群众运动的命运/192

**江山如画宏图展**

——从京剧革命看新中国的文化抱负…………… 张广天(199)

拨开迷雾见庐山/200 真实的价值/203 成功的证明/205 深远  
的影响/212

**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崔之元(214)****“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王绍光(227)**

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228 政治学是否可能本土化？/235  
政治学如何本土化？/246

**下 篇****“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朱学勤(261)****一评 90 年代“新左派”：制度创新与国情…………… 徐友渔(264)**

“新左派”思潮的出现背景/264 所谓“制度创新”与国情/266

**二评 90 年代“新左派”：中国的现代性与批判…………… 徐友渔(271)**

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271 现代性与批判精神/274

- 三评 90 年代“新左派”：“新左派”的学风…………… 徐友渔(278)  
    先说崔之元/279 再说甘阳/282 最后说一说汪晖/285
- 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 王思睿(288)  
    左派阵营的三个分支/288 老左：斯大林主义/290 中左：毛泽东  
    主义/292 新左：新马克思主义/296 牵线人与游走者/301 非神  
    圣同盟/304 左中右全光谱/306
- 中国的“新左派”是“自由左派”吗？…………… 任 贻(312)  
    源 起/312 本 论/314 辍 语/326
- 对“新左派”的印象与分析…………… 陈 明(329)
- 解读“新左派”…………… 任剑涛(337)  
    “新左派”概观/337 西方根柢/341 中国关怀/346 观念支撑/351  
    常识问题/354 自由根基/357
- 中国部分“新左派”人士选择与恐怖主义站在一起…………… 笑 蜀(364)  
    羞羞答答的恐怖主义辩护士/364 献给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的深  
    情的颂歌/367 我为你们祈祷！/369 “用革命的恐怖主义抗击反  
    革命的恐怖主义”/370 中国部分“新左派”人士的单相思/373
-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之评论…………… 毛寿龙(376)
- 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 秦 晖(382)
- “新左派”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萧功秦(401)  
    “新左派”产生的背景与基本思想理念/402 “新左派”知识分子的  
    基本状况/405 温和与激进：“新左派”的两种类型/406 从话剧  
    《切·格瓦拉》看“新左派”的社会影响/414 对“新左派”思想的评  
    论/417 “新左派”的思想谬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418 “新左  
    派”的未来政治影响/422 “新左派”与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425
- 编者说明…………… (428)

# 上篇

---

-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 ◇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
- ◇读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 ◇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
- ◇革命及相关词语
- ◇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
- ◇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
- ◇“漫长的革命”
- ◇毛泽东难题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历史宿命
- ◇“文革”所处的世界和历史时刻
- ◇江山如画宏图展
- ◇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 ◇“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汪 晖

### 历史已经终结？

1989年，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告一段落。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没有如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瓦解，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并未妨碍下述结论：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如果我们试图理解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思想和文化状况，就必须理解上述变迁及其伴随的社会变化。<sup>[1]</sup>

在进入对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分析之前，有必要提及几个与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考密切相关的前提：

首先，1989年的事件没有改变中国自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改革路线，相反，在国家的推动下，改革（主要是为适应市场化而进行的经济体制和立法方面的改革）的步伐较之80年代最为开放的时期更为激进：通过生产、贸易和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中国日益深入地加入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之中，从而内部的生产和社会机制的改造是在当代市场制度的规约之下进行的；另一方面，商业化及其与之相伴的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表明

国家和企业对市场的精心创制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相反,这一社会过程最终要求用市场法则规划整个的社会生活。在这一历史情境中,不仅知识分子原有的社会角色和职业方式经历了深刻变化,而且国家、特别是各级政府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角色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们与经济资本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了。

其次,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声音并不都来自国内,而且也来自国外。一方面,1989年事件造成了当代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主流知识分子的西迁,许多学者、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的原因出国访问、滞留海外或选择流亡生涯;另一方面,70年代末期国家执行的留学生政策在90年代产生了影响,因为自那时起赴欧美和日本留学的许多学生陆续获得学位,其中相当一部分在这些国家获得职位,另一部分回到中国。从知识主体方面说,这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的经验,得到了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和西方学术的机会,并把他们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带入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之中,从而也形成了与国内知识分子看待问题的差异。从知识制度方面说,现代教育和学术制度逐渐地成为一种跨越国界的体制,知识的生产和学术性的活动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部分。

第三,1989年以后,国内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所经历的历史事变,出于环境的压力和自愿的选择,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由于“文化:中国与世界”等以介绍西方学术为主的知识群体的解体,以及《学人》等以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为中心的刊物的出现,有人把90年代的知识转向看成是“国学”的复兴。但这一概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确切的。首先,1989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促使知识界重新思考80年代的思想运动的含义,

反思自身从事的文化运动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因此,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中国历史包含了内在的现实需要,而不是某种单纯的学术复兴;其次,尽管学术史研究一度成为知识圈内的话题,但新一代人的学术研究难以被放在“国学”的范畴内加以概括。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知识转向虽然直接地表现在知识兴趣从“西方”向“中国”的某种转变,但这种自我调整的努力在当时是以韦伯有关“作为职业的学术”的理论为依据的。在各种知识取向的变化之中,学术的职业化似乎是更为明显的趋势。在1992年以后,市场化进程加速了社会科层化的趋势,这一趋势似乎与学术职业化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职业化的进程和学院化的取向逐渐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从基本的方面看,80年代的那个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地蜕变为专家、学者和职业工作者。

我们当然还能举出一些重要的现象。但概括地说,上述三个方面共同创造了一种不同于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空间,不仅深刻改变了原有的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而且知识界自身的同一性也不复存在。从寻求传统的价值,到人文精神的呼吁,从职业责任的自觉承担,到重新呼唤社会使命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各不相同又相互交叉的努力一方面是对当代社会变迁所做的一种批判性的道德化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是以这些姿态来进行自我重新确认的社会行为。80年代的知识界把自己看做是文化英雄和先知,90年代的知识界则在努力地寻求新的适应方式,面对无孔不入的商业文化,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当代的文化英雄和价值的塑造者。

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进入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而知识群体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变得含混起来。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

功地实现现代化。在整个 80 年代,问题则集中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社会主义的方式也经常被视为反现代化的方式。思想状态的明朗化实际上来自社会问题的明确化。现代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是寻求富强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另一方面则是以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和价值为规范批判自己的社会和传统的过程。因此,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为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诉诸“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语式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

然而,对于那些身处西方(特别是美国)、又受到西方批判思想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而言,所谓“西方道路”能否作为中国的楷模变得可疑了;对于那些身处中国特色的市场之中的知识分子而言,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也同时变得含混起来。80 年代中国的启蒙思想所许诺的“好社会”不仅没有伴随经济市场化而到来,市场社会本身呈现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sup>[2]</sup>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在经济、文化甚至政治领域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而且也同时意味着人们对自己在全球经济关系和内部经济关系中的利益所在更为清楚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的经济进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其政治保障的,因此,尽管民族国家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但它作为一个全球经济进程中的利益单位的含义反而更加凸显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关系的清晰化反而有助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整合。对于中国而言,1989 年事件所产生的那种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获得了缓解。

从思想层面来看,9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问题也已经大大复杂化了。首先是当代社会的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已经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传统的腐败(因而有人反过来说这些问题是传统

的失落的结果),因为许多问题恰恰产生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其次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国有企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再次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之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最为重要的世界性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纳入到全球市场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包括政府行为本身,都已经不能在单一的中国语境中加以分析。换句话说,在反思中国社会的问题时,那些通常被作为批判对象的方面已经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的困境:在亚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语境中,传统不可能再是自明的贬义词;在生产过程和贸易过程跨国化或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民族国家也已经不是自明的分析单位(这决不意味着当代世界已经成功地建立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相反,生产和贸易的跨国化是由旧有的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它的政治保障的。问题是民族国家体系越来越不能适应全球化的生产和文化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体系和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功能面临深刻的变化);在资本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语境中,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器的行为和权力运作也已经与市场 and 资本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也不能简单地从政治角度来分析(这也不是说政治分析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那么,中国的问题是怎样的问题,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以至语言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呢?在多元作义文化、相对主义理念和现代虚无主义的各种理论姿态瓦解了任何重建统一的价值和规范的时候,以批判性为其特征的各种理论开始意识到在它们所进行的激烈的批判过程中,批判性本身正在悄悄地丧失活力。因此,需要重新确认批判的前提。然而,迄今为止,改革/保守、西方/中国、资

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计划的二元论仍然是具有支配性的思想方式,在这种思想方式中,上述问题几乎是无法得到揭示的。

当代中国思想界放弃对资本活动过程(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放弃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的研究,而仅仅将自己的视野束缚在道德的层面或者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问题涉及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许多复杂方面,我的问题仅仅是: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正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形态,那么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借助于韦伯或其他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什么没有同时成为对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在当代世界性的变化之中,中国社会的改革实践一方面深刻地重组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知识分子被迫进行的自我确认的行为本身表明,社会文化的主体已经从中心地位向边缘转化。社会特定阶层的社会地位变动无疑是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表征之一),另一方面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提供了至今不能确定的因素。(关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的讨论最终回答的是如下问题: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我认为,所有上述问题是隐藏在当代知识分子的道德姿态背后的更为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揭示了当代思想的暧昧状态的历史原因。

### 三种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讨论当代中国思想的批判性的丧失,需要首先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的历史联系。那些依据现代化理论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简单地把中国的现代化理解为科学和技术

的发展、传统的农业社会向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巨大转变。<sup>[3]</sup>由于现代化理论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理解现代化的基本规范,因此,现代化的过程也经常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中国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不仅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而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当代中国流行的现代化概念主要指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的从落后状态向先进状态的过渡和发展,但这一概念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指标,不仅仅是中国民族国家及现代官僚体制的形成,而且还意味着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一种把自己的社会实践理解为通达这一终极目标的途径的思维方式,一种将自己存在的意义与自己所属的特定时代相关联的态度。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不仅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形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差别,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的价值观。

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与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有所区别,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概念包含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内容的价值取向。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历史的不可逆转的进步,并力图用革命的或“大跃进”的方式促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他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是以消灭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这一平等目标为主要目的的。通过公有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毛泽东使自己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实现了社会动员,把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中。对内,这是要解决晚清和民国政府都未能解决的国家税收的问题,通过对农村的生产和消费的剥削为城市工业化

积累资源,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理组织农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公有制是以更为深刻的城乡不平等为前提的。<sup>[4]</sup>对外,通过有效地将社会组织到国家目标中,使落后的中国社会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来完成民族主义任务。毛泽东本人多次谈到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是将这个革命理解为对上个世纪以来的整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解决,并为这个现代化运动制定未来的方向。<sup>[5]</sup>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从政治后果方面来看,毛泽东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实践消灭了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范畴存在的可能性,不仅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笼罩一切的庞大的国家体制,而且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组织到先锋政党的周围。

“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并不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特征,而且也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反现代”的取向不仅导因于人们所说的传统因素,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的历史展现,构成了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语境。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中的有识之士,都不能不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如何才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康有为的大同空想、章太炎的平等观念、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及中国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和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构筑的各种现代性方案(包括现代性的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和文化价值)相伴随的。



甚至可以说,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因此,中国现代思想及其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是以悖论式的方式展开他们寻求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努力和社会实践的。中国现代思想包含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然而,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特定语境中产生的深刻思想却在另一方面产生出反现代的社会实践和乌托邦主义:对于官僚制国家的恐惧、对于形式化的法律的轻视、对于绝对平等的推重,等等。在中国的历史情境中,现代化的努力与对“理性化”过程的拒绝相并行,构成了深刻的历史矛盾。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一方面以集权的方式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又对这个制度本身进行“文化大革命”式的破坏;他一方面用公社制和集体经济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在分配制度方面试图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他一方面以公有方式将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之中,从而剥夺了个人的政治自主权,另一方面他对国家机器对人民主权的压抑深恶痛绝。总之,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包含着反现代性的历史内容。这种悖论式的方式有其文化根源,但更需要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双重历史语境(寻求现代化与对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历史后果的反思)中解释。

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界标,以不断革命和批判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宣告终结。1978年开始了延续至今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从思想方面说,对先前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

- (1)理想主义的公有制及其平均分配制度导致了效率的低下;
- (2)专制作风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迫害。因此,在对历史进行清算和总结的同时,以寻求效率为轴心,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从农村公社制的解体和土地承包制的实行开始,逐步地发展为城

市工业的承包制和股份制的实行,并在开放的改革实践中把中国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之中。<sup>6</sup>改革的进程明显地推进了经济的发展,改造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但是,它放弃的仅仅是毛的理想主义的现代化方式,继承的则是现代化的目标本身;当代改革的社会主义同样是一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前的现代化不同,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特征就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它通过中国经济以及社会文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接轨,把中国社会纳入全球性的市场社会。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相比,当代社会主义虽然是一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它已经基本不具有前者的那种反现代性倾向。

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所创造的惊人成就并不仅仅是经济性的,而且也蕴含了深刻的政治内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通过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完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同时深信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形态向资本主义市场的过渡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者认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种权宜性的策略,而不涉及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人们通常用“竞争机制”的形成或“效率的提高”解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却忽略了土地再分配过程所蕴含的平等原则,以及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相对平等的城乡关系。事实证明,公正和平等正是促使生产效率提高的基本因素。根据农业经济专家的研究,1978—1985年城乡收入的差距是缩小的,从1985年起扩大。1989年到1991年农民收入增长基本停滞,城乡收入差距又恢复到1978年以前的情况。1993年以后,由于国家提高粮食价格、乡镇企业增长快、外出务工人员收入增长等原因,农村收入增

长较快,但在城市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情况下,这一势头正在改变。<sup>[7]</sup>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与相应的社会平等(特别是城乡经济关系的平等)直接相关。与农村改革相比,在城市进行的市场改革和私有化的过程中,社会财富(特别是国有资产)的再分配甚至没有遵循在起点平等状态下找到“最初所有者”,在规则平等的状态下找到“最终所有者”的市场规则。<sup>[8]</sup>人们常常忽略的是,这种将效率置于一切之首的实用主义,为新的社会不平等创造了条件,也为政治民主化制造了障碍。如果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是在充分公开化或者民主监督的程序下进行,以瓜分国有资产为特点的社会再分配就不可能如此严重地进行。现在人们寄希望于用私有产权的合法化来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然而,如果私有化过程不是在民主和公正的条件下进行,这个合法化过程保护的就只能是不合法的分配过程。自1978年以来,围绕改革问题发生过一系列的论争,这些论争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现代化,而是用什么方式现代化。我把它们概括为这样的冲突: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今天,这样的争论已经不能说明当代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基本特点。

第三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刻的空想社会主义特点,我指的是1978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出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其主要的特征是用人道主义来改造马克思主义,并以这种改造了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革前的主导意识形态,从而为当代社会主义改革运动提供理论上的依据。这个思潮是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批判国家社会主义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关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思想,从而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名义”下产生了残酷的社会专制;另一方面也与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发

生了矛盾,我把这种矛盾理解为空想社会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冲突。中国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讨论的“异化”问题。早期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等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并把它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特别是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的分析,他所指的异化首先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劳动的异化。中国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抽离开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语境,转而把这一概念用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就主要的方面说,这一思潮是把毛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其专制主义当作传统的和封建主义的历史遗存来批判的,也涉及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异化问题,但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并没有引向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正像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文主义对宗教的批判一样,中国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催生了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运动——资本主义的市场化的发展。在特定的语境中,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被转换为一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并成为当代中国“新启蒙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和批判毛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及其历史实践,在中国向资本主义开放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它的抽象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念最终转化为一系列现代性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它本身就是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几乎不可能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市场本身所产生的社会危机作出相应的分析和批判。在市场社会及其规则日益成为主导形态的中国语境中,以批判传统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为主要目标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已经衰亡。<sup>[9]</sup>中国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要重新焕发它的批判活力,就必须从它的人本主义取向中走出来,把它对人的关注重新置

于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 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启蒙主义及其当代形态

在整个 80 年代,中国思想界最富活力的是中国的“新启蒙主义”思潮;最初,“新启蒙主义”思潮是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下活动的,但是,在 80 年代初期发生的针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之后,“新启蒙主义”思想运动逐步地转变为一种知识分子要求激进的社会改革的运动,也越来越具有民间的、反正统的和西方化的倾向。“新启蒙主义”思潮并不是统一的运动,这个思潮中的文学和哲学方面与当时的政治问题没有直接关系。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如果简单地认为中国当代“启蒙思想”是一种与国家目标相对立的思潮,中国当代“启蒙知识分子”是一种与国家对抗的政治力量,那就无法理解新时期以来中国思想的基本脉络。尽管“新启蒙”思潮本身错综复杂,并在 80 年代后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但历史地看,中国“新启蒙”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的。中国“新启蒙知识分子”与国家目标的分歧是在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中逐渐展现出来的。当代启蒙思想从西方的(主要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其他知识领域获得思想的灵感,并以之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对抗,是因为由国家推动的社会变革正在经由市场化过程向全球化的历史迈进。在这个意义上,“新启蒙知识分子”与正统派的对抗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民间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对抗,恰恰相反,从总的方面看,他们的思想努力与国家目标大体一致。80 年代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活跃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在 1989 年之后流亡国外),大多是深受重用的

国家研究机构或大学的领导者,其中的一部分在90年代成为中国国家立法机构的重要的高级官员。<sup>[10]</sup>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变革的过程不仅改造了社会,也改造了国家,并在国家内部形成了结构性的裂痕,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集团。某些知识分子集团与国家的对抗实际上反应了国家意志内部的冲突。所有这些复杂的状况,都为1989年后中国的政治状况以及流亡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化所遮盖。事实上,对于国家的内部分歧与“新启蒙”知识分子思想活动的复杂关系的自觉和不自觉的遮盖,已经造成了认识80年代中国思想状况的重要障碍。

中国的“新启蒙主义”不再诉诸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直接地从早期的法国启蒙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中汲取思想的灵感,它把对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理解为对于传统和封建主义的批判。不管“新启蒙思想者”自觉与否,“新启蒙”思想所吁求的恰恰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换句话说,“新启蒙主义”的政治批判(国家批判)采用了一种隐喻的方式,即把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比喻为封建主义传统,从而回避了这个历史实践的现代内容。这种隐喻方式的结果就是:把对中国现代性(其特征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反思置于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中,再一次完成了对现代性的价值重申。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是在“反封建”的口号下进行的,从而回避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困境也是整个“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新启蒙”在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中进行自我理解,从而忽略了现代国家体制、政党政治、工业化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专制和不平等主要是一种“现代”现象。从许多方面看,在寻求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的现实目标方面,中国的“新启蒙主义”与改革的社会主义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把传统社会主义理解成封建

主义的历史传统,这不仅是“新启蒙主义”的斗争策略,而且也使它获得一种自我的认同,即把自己理解成与反对宗教专制和封建贵族的欧洲资产阶级相似的社会运动。在这种自我理解中被遮盖了的,是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启蒙主义”与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理解方式: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特别是将自身的奋斗和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的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等等。指出这种联系并不是为了抹杀二者逐渐呈现的历史矛盾,也不是否认新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与“国家”的区别,更不是否定作为一种价值的知识分子独立精神。我在此所谈论的是实际的历史关系。如果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认同建立在一种虚幻的关系之上,那么,无论他(她)如何强调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都将是可疑的。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一个不能确切地认识自己的人,能够确切地把握现实。

中国“新启蒙主义”思想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就思想的体系性而言,它远不如中国马克思主义那样完整。事实上,中国“新启蒙主义”是一种广泛而庞杂的社会思潮,是由众多的各不相同的思想因素构成的。这些各不相同的思想因素只是在批判传统的社会主义和寻求作为目标的“改革”过程中才结为同盟。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冒险对这一社会思潮的基本方面作出不完整的归纳,这是因为这些相互歧异又相互关联的思想实践都以寻求和建立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为基本的要务。这个现代性方案的主要标志就是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建立“自主性”或主体的自由。在经济学方面,通过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重新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当地位以及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价值规律,进而把市场

和私有制理解为现代经济的普遍形态,并最终实现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市场的目标(它被理解为经济自由);<sup>[11]</sup>经济改革的思想最初是从价值规律等古典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中汲取灵感的,但是,隐藏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学说中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却逐渐地消失了,价值规律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日渐地等同于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从而丧失了这一概念可能具有的对于一切垄断形式的深刻揭露。在政治方面,要求重建形式化的法律和现代文官制度,通过扩大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逐步建立保障人权、限制统治者权力的议会制度(它被理解为政治自由);<sup>[12]</sup>但是,由于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的恐惧,许多人对于政治民主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形式民主”,特别是法制建设方面,从而把“民主”这一广泛的社会问题局限于上层社会改革方案的设置和专家对于法律的修订和建议方面,不仅忽略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乃是民主的必要内容,而且完全无视这种政治参与与立法过程的积极的互动关系正是现代民主变革的基本特征。令人惊异的是,有些学者无视现代宪政民主中包含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内涵(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完全排斥直接民主在民主实践中的意义,甚至把民众的普遍参与看成是专制主义的温床。这种“民主观”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和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在文化方面,一些学者用科学的精神或科学主义的价值观,重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新图景,从而将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建立在对整个中国封建历史的社会结构的系统研究和批判之上;<sup>[13]</sup>而另一些学者则通过在哲学和文学等领域中的主体性概念的讨论,一方面吁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则试图建立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它被理解为个人的自由)。主体性概念包含了对现代过程及其意识形态的某种程度的疑虑,但在当时的语境中主要是指个人



主体性和人类主体性,前者的对立面是专制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后者的对立面是整个自然界,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为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的基本政治权利提供了哲学的基础。这样的主体性概念建立在主体—客体的二元论之上,洋溢着18—19世纪欧洲启蒙主义的乐观主义气息。<sup>[14]</sup>值得注意的是,在寻求个人的自主性的过程中,启蒙思想既从西方的宗教改革和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学说)中汲取思想资源,也从尼采、萨特等思想家那里得到灵感。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尼采、萨特等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却被省略了,他们仅仅是个人主义的和反权威的象征。<sup>[15]</sup>中国启蒙主义思想内部的冲突经常表现为古典的自由主义伦理与激进的极端个人主义伦理的二元对立。主体性概念即使在今天也是包含着内在的可能性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一概念从上述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置于新的历史条件之中,这一概念就可能僵化为一种没有批判潜能的概念。总的说来,新启蒙思想蕴含的批判潜能,在80年代曾经焕发过青春活力,但在被组织到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的过程中,这些批判潜能正在逐渐地丧失了活力,以至我们可以说:无论中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内部存在多大的冲突,也无论中国启蒙主义者对启蒙主义的社会功能的自觉程度如何,中国启蒙主义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它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内由一种富于激情的批判思想转化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文化先声。

在80年代后期,由于社会控制的事实上的削弱,中国“新启蒙主义”的内部分化逐渐表面化。在1989年的世界性变化之后,中国“新启蒙”运动的内在同一性不复存在。由于中国“新启蒙运动”与社会主义改革存在着目标上的部分一致性,这个运动的保守的方面成为体制内的改革派、技术官僚或者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

的新保守主义的官方理论家；这个运动的激进方面逐步的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其主要的特点是按照自由主义的价值推进中国的人权运动，促使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在政治领域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化改革。在文化上，“新启蒙主义”的激进方面（激进在这里指的是文化上的对传统的态度）开始意识到作为社会目标的“现代化”有可能导致（也可能已经导致）价值的危机，其中一些敏感的年轻学人以基督教伦理为依据，提出中国现代社会思想中的价值问题和信仰问题。<sup>[16]</sup> 这一问题的提出也明显地配合着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其中最为简明的逻辑是：如果资本主义的发生与新教伦理相关，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就必须在文化上作出更彻底的变革。一般来说，80年代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普遍地信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而其预设就是建立在抽象的个人或主体性概念和普遍主义的立场之上的。

只是在启蒙主义发生分化的过程中，对这种普遍主义的质疑才成为可能。其最初的表征是相对主义的文化理念的出现。我指的是在90年代初期，一些早先的启蒙主义者转而吁求传统的价值，特别是儒教的价值，他们开始怀疑西方社会的各种发展模式是否适合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这一思想倾向特别地受到日本以及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鼓励，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的成功被视为“儒教资本主义”的胜利。“儒教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掩盖了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它掩盖了东亚各国的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儒教文化圈内部的社会差异和历史差异，例如日本、韩国、越南和中国都属于儒教文化圈，但为什么所走的道路却如此不同？第二，它实际上把资本主义看做是惟一的现代性模式，通过把儒教与资本主义挂钩，它暗示儒教传统不再是阻碍现代化的历史负担，而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动力。换句话说，

对儒教价值的怀念并不是传统主义,也不是扼制资本主义的文化力量;在这些学者的眼里,儒教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就如同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对于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作用一样。第三,它掩盖了整个现代过程与殖民主义历史的无法分割的联系。如果把儒教资本主义上升到某种规范的高度,就掩盖了现代历史形成的基本动力:全球市场及其规则对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关系的制约和规范较之任何其他力量都更为基本。“儒教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通过对西方价值的拒斥,“儒教资本主义”所达到的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一导源于西方的历史形态的彻底肯定,只是多了一层文化民族主义的标记。在中国的语境中,“儒教资本主义”与当代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只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述罢了。

与这种“儒教资本主义”相似,另一些学者则致力于论证中国原有的宗族和地缘力量在中国当代经济生活中的意义,他们相信以“社群”或“集体”为特征的中国的乡镇企业将引导中国走一条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sup>[17]</sup>“乡镇企业的现代化论”有重要的现实依据,这种以地缘和血缘为核心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在许多地区创造了经济的奇迹。中国的修正的启蒙主义者试图将乡镇企业当作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模式,为的是在理论上回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中找到一种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在1993—1995年间,中国一些从事社会研究的学者通过深入的调查,终于获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学者的基本问题是: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民是否已成为无组织的完全自由的社会个体?依靠集体致富,是不是等同于再度集体化?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是否意味着私有化的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三级合作组织是否依然存在?它们发生了哪些变

化?乡村社会各类组织要素之间,是处于无序的发展状态,还是处于有序的整合状态?乡村社会的组织整合具有什么特点?根据深入的调查,研究者详细分析描述了公社解体以后,集体与个体关系的演变,个体农民与社会化农业生产的关系,乡村组织与乡村组织网络的变革,勾勒了乡村社会发展的社区化趋势,提出了“新集体主义”的概念。根据作者的看法,新集体主义组织方式,既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又符合现行的社会制度,以及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而且承继了传统家族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国“群社会”的本质,是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之路。<sup>[18]</sup>乡镇企业的现代化理论和新集体主义观念都没有忘记公社制时代的历史教训,它们对“集体”所有制的研究也严格地区别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的集体主义,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别显然是对“个人利益”的强调,即“新集体”的基础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自愿合作的产物。集体与个体以共同利益与地缘乡情为纽带,“合作”本身目的是“为适应市场经济形势”、更有效地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

乡镇企业的现代化理论和新集体主义理论的提出都意味着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努力。“集体”、“合作”、“地缘”、“乡情”等概念的重新使用,明显地强调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或“平等”问题。在“新集体主义”的理论视野中,中国农民在貌似对传统的复归中,走出了农村多少世纪以来封闭的领地和领域,第一次以乡村工业的高速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迅速推开为主要方式,发展市场,促进都市化(非国家投入的就地造城),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持续深入进行的重要推动力和开展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稳固的后方基地。这是中国农民第一次以经济改革领先,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sup>[19]</sup>然而,乡镇企业的现代化论和“新集体主义”的案例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把个别案例普遍

化和理想化的倾向。由于这种理论努力过于急切地试图提出“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最终却像现代化理论一样把现代化理解为一种中性的技术化的指标；它真正回避掉的恰好是乡镇企业的生产方式与整个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是乡镇企业与致力于市场化的国家目标的关系。从技术上看，乡镇企业的现代化论和“新集体主义”理论试图把乡镇企业描述成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的生产和社会组织模式，对乡镇企业和村社组织在中国内地的不同地区的极为不同的发展方式注意不够，<sup>[20]</sup>并严重忽略了以追求“效率”为主要目的的乡镇企业在破坏资源和环境、忽略劳动保护等方面的“现代性后果”。

“乡镇企业的现代化论”通过对乡镇企业的理想化描述和对其生产关系中的内在矛盾的忽略，扬弃了启蒙主义对传统社会关系的批判，又不把私有化的资本主义视为替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惟一方式，似乎开掘了一条现代化的第三条道路。从乡镇企业的实践出发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是重要的依据的。但由于它完全不考虑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活跃的部分，同时又把现代性作为中性的技术指标，因此，它不能对现代性或现代化本身的问题作出相应的诊断。我们不妨问一句：作为一种独特社会模式的乡镇企业在进入市场之后的活动也是独特的吗？用乡镇企业的内部特征来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预言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智力活动，这种智力活动用文化的和数据的方式揭示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但它的创造者忘记了它所说的独特性（我并不否认这种独特性的存在，正如我不否认中国和日本或者美国和英国之间存在差别一样）如今只能建立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之上。这只能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它的整个论证建立在现代化的目的论框架内。在最近几年的社会发展中，

许多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地,乡镇企业的结构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集体企业的私有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合资化,即与跨国资本结成新的经济体制。因此,乡镇企业究竟是一种现代化的途径,还是一种现代化的模式,仍然需要深入持续地观察。进一步地说,我的看法是,乡镇企业的形式的确构成了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道路与西方及其他国家的重要的区别,以此为根据而提出的“乡镇企业的现代化理论”在批判的意义上主要针对的是将西方资本主义当作惟一模式的看法,这一看法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这一理论仍然是以效率为标准的,它没有涉及的是这种乡镇企业的生产与分配制度是否能够扩大经济民主,乡镇企业的文化能否有利于建立保障经济民主的政治民主及其制度形式,乡镇企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是否具有保护作用,乡镇企业的组织方式是否有利于社会的政治参与能力,乡镇企业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情境中能否为经济平等(国内的和国际的)创造制度的和伦理的基础。因而,这一理论的批判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换言之,乡镇企业的现代化理论并没有从乡镇企业的经济结构和运行规则中发掘对于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过程的批判源泉。

80年代的启蒙思潮曾经为中国社会的改革提供过巨大的解放力量,它曾经是、而且仍然是支配中国知识界的主要思想倾向。但在迅速变迁的历史语境中,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这并不是说中国新启蒙主义的那些思想命题已经完全没有意义,我也不是说80年代的思想运动已经达到了目的。我的意思仅仅是,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社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国家及其功能也相应地发生了虽然不是彻底的、但却是极为重要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启蒙知识分子一方面致力于商业化社会的金钱至上、道德腐败和社会无序,另一方面却不能不承认自己已经处于曾经作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的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的市场化是以启蒙主义作为它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文化先锋的。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毛的社会主义尝试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一些坚持启蒙主义姿态的人文学者把现实的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归结为抽象的“人文精神的失落”。<sup>[21]</sup>他们重新回向西方和中国的古典哲学,寻找终极关怀和伦理规范,最终把问题落实于以安身立命为目的的个人的道德实践。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启蒙主义似乎只是一种神圣的道德姿态(而它曾经是以反道德为特征的),它的那些抽象而含混的范畴无力对无处不在的资本活动和极为真实的经济关系作出分析,从而丧失了诊断和批判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一部分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什么是所谓的“人文精神”,如果它真的失落了,那么是什么力量导致它的失落?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们曾经奢望“理性化”的过程不仅导致对自然的控制,而且也能促成人的主体的自由、道德和公义的进步以及人类的幸福。但是,这样的信念正在遭到深刻的质疑。因此,如果我们要讨论“人文精神的失落”,就必须先澄清这一失落与中国“新启蒙主义”所致力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联系。这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从1994年初开始,持续了一年

多的时间,参与者众多,但却没有触及这样的问题:如果所谓“人文精神”是和8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直接相关的话,那么,1989年以后的急剧社会变迁如何瓦解了作为一个独特群体的“知识分子”?这些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社会变迁包括:现代社会日趋分工严密的职业化过程,现代企业和公司内部的科层制的发展,国家体制内部的技术官僚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价值取向的转移。原有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分化为专家、学者、经理人员、技术官僚,并被组织到中国社会日益发展的科层制度之中。把当代“知识分子”的变化归结为某种“精神”的失落,而回避导致“知识分子”阶层发生变化的社会条件,其根源之一就是“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这个社会过程本身持有极为暧昧的矛盾态度。

中国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者”正是利用了这种含混,把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直接作为批判中国“新启蒙主义”的武器,尽管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比中国的“启蒙主义”更加含混。我在这里不能对中国的“后学”做全面的分析,因为其中也包含了各种因素和复杂性。我在此所做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后学”的一些代表人物的代表性文章。“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影响之下形成的,但它们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内涵都极为不同。我仍然把这种“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补充形式来看待。“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解构主义、第三世界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然而,“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从未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作出历史分析,也从未见到一位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信徒对中国的现代文化与西方的现代文化的关系作细致的历史分析。在文学的领域里,他们所解构的历史对象与启蒙主义曾经作过的历史批判是一样的,都是中国现代的革命及其历史理由;稍有不同的是,他们对启蒙主义的主体性概念加以嘲笑,却从



未将中国启蒙主义的主体性概念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当“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嘲笑“启蒙主义”历史姿态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在说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和社会运动的“启蒙主义”是如何地不合时宜，因为他们已经置身于受商业化的大众传媒支配的、消费主义的“后现代”社会。后殖民主义可以被视为西方（主要是美国）文化制度内部的自我批判，它从边缘文化立场对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所作的批判（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的讨论不是本文的任务），揭示了殖民主义在文化和知识领域的表现形式，其中也包括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被殖民地人民用以抵抗殖民者的复杂过程。在“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却经常被等同于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并加强了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那种特有的“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例如没有一位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采取边缘立场对中国的汉族中心主义进行分析，而按照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逻辑这倒是题中应有之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利用后现代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论证的却是中国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他们所谓“中华性”的建立。在这种典型的现代性宏伟叙事中（虽然打着后现代的旗号），中国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对中华性的未来性预见不仅没有触及作为资本主义中心的新中国与自己的文化、与西方现代历史的关系，而且与传统主义者有关 21 世纪的预言和期待完全一致。<sup>[2]</sup>这倒并不使人惊讶。

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特点是以大众文化的名义将欲望的生产和再生产虚构为人民的需要，将市场化过程中受资本制约的社会形态解释为中性的、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新状态”。<sup>[23]</sup>在这种理论分析中，既缺少对大众文化内部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调查和分析，又没有对商业化的或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作出相应的阐

释和批判。当他们以中性化的欲望、状态、人民、大众文化的名义对他们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攻击的时候,以消费主义为其主要内容的市场意识形态却经由他们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而合法化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否定掉的是“新启蒙主义”的严肃的社会政治批判,他们对一切价值进行解构的同时,却没有对构成现代生活主要特征的资本的活动作出分析,也没有对这种资本的活动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关系作出评价。在他们经常指称的“官方或主流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之中,看不到这两者通过资本的活动而形成的复杂关系,而这恰恰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事实上,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正是把希望寄托于“市场化”：“‘市场化’意味着‘他者化’焦虑的弱化和民族文化自我定位的新可能”,“市场化的结果,必然使旧的‘伟大叙事’产生的失衡状态被超越,而这种失衡所造成的社会震撼和文化失落也有了被整合的可能”,“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选择、一条民族的自我认证和自我发现的新道路。”<sup>[24]</sup>所谓“市场化”不是一般地对市场的赞同,而是要把整个社会的运行法则纳入到市场的轨道,从而市场化不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而是一个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范畴。在 90 年代的历史情境中,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在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所采用的学院政治式的批评方式中,隐含的是他们的文化政治策略:用拥抱大众文化(虚构的人民欲望和文化的市场化形态)、拒斥精英文化的姿态重返中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

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内地的独特的市场意识形态建构的有效部分。

在当代中国的情境中,思想界和知识界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是极为无力的。一些来自大陆中国、留学欧美的年轻中国学者与他们在中国的合作者们试图借助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理论提出问题。尽管他们对现代中国历史的把握使许多学者感到不满,但我仍然认为,他们的问题意识具有现实尖锐性。在思想的方式上,这些年轻学者也一定程度地超越了那种在中国/西方的二元论述中讨论中国问题的启蒙主义的思想方式。他们考虑的问题与冷战的结束有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出发点是:冷战时代的旧的概念范畴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和世界的需要,时代呼唤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他们中的代表者认为可以从“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发;然后以中国深厚的土壤为基础,将中国已经出现的一些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萌芽培育、壮大起来。所谓“新进化论”倡导的是超越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二分法,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一些遗传因素如乡镇企业及某些农村组织形式进行制度创新,从而获得发展。将 John Roemer、Adam Przeworski 等美国学者提出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目的在于对马克思的学说严格解说,以在当代条件下推动人类全面解放、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的实现。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历来是以广大人民的“经济民主”来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实际上,这一理论的提出直接针对的是俄国已经实行、中国正在实行的国有资产的股份化或私有化运动。因此,他们的观点恰好是:政治民主是保证公有资产不被少数人“自发私有化”的必要条件,如果说“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妥协,而社会主义则是经济、政治民

主的同义词。“批判法学”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是揭示出西方 18 世纪以来民法的最核心内容——绝对财产权,即财产“最终所有者”对财产的排他性处置权——已经解体。这一理论在中国的语境中的意义仍是与如何扩大经济民主、扼制大规模私有化运动相关的。用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说就是,在概念层次上,超越“私有制/国有制”的两分法,从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通过“财产权力束的分离与重组”来扩大经济民主,并将生命与自由的权利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宪法地位。总之,以“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学者试图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为指导思想,超越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sup>[25]</sup>

是否继续使用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概念并不重要。当代中国社会面对的问题也显然无法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概念来简单地加以解释。问题仅仅在于能否真正触及当代中国社会面对的社会问题,能否在具体的情境中作出审慎有度的分析。中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与美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法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深刻联系,这也可以看做是所谓全球化条件下的“理论旅行”。除了由于忽略历史的具体过程而产生的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搬用外,这些研究的一个欠缺是,作者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经济领域,<sup>[26]</sup>而很少涉及文化领域。如果说中国新马克思主义已经提出了经济民主的问题,但却没有提出和讨论文化民主的问题。在市场条件下,文化资本的运作是整个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对文化资本的控制和媒体的掌握,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文化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取向。例如当代最重要的媒体是电视系统,除了国家对媒体的控制之外,中国的电视剧生产正在市场化,那么在大众文化与国家之间建立的这种联系能否提供文化民主的

内在机制呢？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乐观地认为“市场化”能够自然地解决中国社会的民主问题，实在是天真的幻想。在媒体和大众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中国当代情境中，特别是中国的文化生产与国际的和国内的经济资本的活动密切联系的时代，放弃对文化生产、文化资本的分析，也同样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经济民主的分析，但文化民主问题似乎基本上没有涉及，这也多少显示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现代化理论对他们的潜在的影响。在中国的语境中，国家机器与市场的关系错综复杂，而文化的生产一方面受制于国家机器的运作，另一方面则受制于经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但是，经济和市场本身从来就不是脱离国家的领域。在当代的条件下，文化生产就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部分。因此，对文化问题的分析需要超越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而将文化理解为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有机的部分。换句话说，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化批判一方面需要与对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的分析相联系，另一方面也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寻找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的结合点。在这方面还很少有学者提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因为真正的理论创造需要大量的经验分析和历史研究，而后一方面的工作仍然是相当不够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一个最为基本的结论，即争取经济民主、争取政治民主和争取文化民主事实上只能是同一场斗争。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对经济民主的讨论涉及的是整个社会分配制度和生产方式，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民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讨论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问题为讨论政治民主提供了实质内容。90年代以来，有关政治民主的讨论明显减少，这显然是因为这一话题仍然充满禁忌。除此之外，如何在冷战结束以后

的情境中界定民主和规划切合实际的历史目标的确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政治民主不仅是社会实践的目标,而且也是文化反思和历史反思的课题。对政治民主的诠释一方面受制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另一方面则与国际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密切相关。在中国的独特的市场社会形式中,不存在脱离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的政治民主问题,也不存在脱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经济民主问题。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民主问题在 90 年代显然增加了新的社会内容,另一方面,讨论经济民主却无法回避政治民主问题。

有关中国民主的讨论集中于如何保障个人的自主性和政治参与能力。中国知识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从两个不同而相关的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述。由于私有化运动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跨国资本在中国的实际存在,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经相当复杂。但许多经济学者仍然相信,市场及其活动作为一种“自然过程”能够自发地导向民主的实现。他们认为,由于“市场逻辑,就是个人权利的自由交易”,而“国家观念,就是公共权力的强制实施”,“前者以个人自由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基础,后者以公共选择的结果为前提”,因此,市场本身的发展将保证个人的充分的自由权利。<sup>[27]</sup>在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述中,个人权利通过市场逻辑获得保障,而市场虽然与国家存在复杂的关系,但在功能上能够限制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我们能够理解这种理想主义叙述针对的是国家对于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但是,如果国家不仅是完全外在于市场的存在,而且也是个人的直接对立面,那么,我们用什么范畴来叙述市场内部的支配力量呢?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述掩盖了中国的市场形成与国家改革计划的关系,创造了作为一种自然范畴的“市场”概念,却丧失了分析市场关系内部的那些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是社会腐败的主要根

源,而且也是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的基本前提。在计划/市场的二元论中,“市场”概念被设想成为“自由”的源泉。但是,这一概念模糊了市场与市场社会的区别:如果说市场是透明的、按照价值规律运行的交换场所,那么,市场社会则要求用市场的法则支配政治、文化和我们的一切生活领域,市场社会的运作是和垄断的上层结构无法分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概念掩盖了现代社会的的不平等关系及其权力结构。正如沃勒斯坦在总结布罗代尔的贡献时指出的,“如果没有一种政治保障你就永远不能支配经济,……认为没有国家的支持、甚至在反对国家的情况下也能成为一个(布罗代尔定义下的)资本家,那简直是一个荒诞的想法。”<sup>28</sup>如果国家是资本主义运作的一个组成因素,那么,支配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政治想像的经济自由,是否应该重新加以界定呢?试图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来解释经济和政治民主问题,是不是在重新论证究竟谁应该是国家行为的受益者呢?

第二个方面是有关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讨论。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市场并不是国家之外的一切,在市场/国家的关系中也需要“社会”的中介力量,才能保持力量的均衡。在哈贝马斯等人的影响下,许多人将注意力转向了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范畴。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正在出现一个市民社会,或者说,他们吁求在中国形成一种西方式的市民社会,其功能是保障个人权利的自由和抵制国家力量的过度干预。如果把这一讨论看做是用规范式的方式吁求政治民主的话,那么,我们能够理解、同情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讨论。但是,如果把这种规范式研究看做是一种具体的、现实的途径或经验,则这一理论势必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始终是和国家的强大存在相关的,在国家推动下形成的所谓“市民社会”是否像许多人期待的那样处于社会/国家的

两极结构之中,是令人生疑的。<sup>[29]</sup>例如许多政治精英及他们的子弟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并成为大公司和企业的代理人。我们能说他们是“市民社会”的代表吗?这表明在中国已经出现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合二而一的社会结构,而他们也直接参与国际性的经济活动。在中国已经揭露出的一些重大的腐败丑闻,都涉及高级政治官僚或其子弟在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不法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讨论更加注重于“社会”的功能,却很少分析作为社会范畴对立面的“国家”范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铁板一块地处于“社会”之外或之上,还是与“社会”相互渗透?“国家”内部是否包含了特定的空间?这些空间有无可能在特定条件下称为某种批判性的空间?

这一问题也牵涉如何形成社会和政治的批判空间问题。在这方面,一些学者将注意力转向文化生产领域,例如媒体和印刷文化,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当代中国正在出现“民间的”刊物、“独立的”制片人及其文化产品。1989年后,由《学人》(主编陈平原、王守常、汪晖)丛刊<sup>[30]</sup>开始,逐渐出现了一系列“非官方的”学术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主编邓正来)<sup>[31]</sup>、《原道》(主编陈明)<sup>[32]</sup>、《公共论丛》(编辑刘军宁、王焱、贺卫方)<sup>[33]</sup>。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介于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刊物,如《战略与管理》(主编秦朝英、执行主编杨平、李书磊)<sup>[34]</sup>、《东方》(主编钟沛璋、副主编朱正琳)<sup>[35]</sup>,等等。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东方时空》也是由一些受聘于电视台的民间制片人参与创作。这一切的确带来了新的文化景观。但是,就“民间刊物”而言,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即使是“非官方”刊物也由官方出版社出版,因为中国的体制中不存在民间的出版社;第二,这些“民间刊物”都没有正式的刊号(所谓以书代刊),因而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更重要的是,由于受



到体制内部空间的保护,正式刊物(或者说是官方刊物)反而能够发出较民间刊物更为大胆的批评意见。以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刊物《读书》为例,它被公认为中国思想解放的象征。但是,这个受到知识分子广泛好评的刊物并不是“民间刊物”,而是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直属新闻出版署的刊物。这些文化产品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空间的拓展具有广泛的意义,但是,它们既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空间,也是国家内部的空间,也必然没有真正的力量抗拒国家的政治干预。像《东方时空》这样的电视专题节目,就是独立制片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和巨额广告收入共同促成的电视制作。由于民间力量的参与,它的影像语言、主持人风格与传统的官方新闻节目的呆板风格大为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原有节目没有触及的社会内容,但同时,它也担负着宣传和制造官方意识形态的任务,并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中国的“公共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节力量,而是由国家的内部空间和社会相互渗透的结果。

90年代以降,美国、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许多学者都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入对中国问题的探讨。就哈贝马斯的理论而言,早期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具有密切联系,它介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并对二者实行监督与批评。哈贝马斯构筑的是一种规范式的理想形态,他特别注重的是这一理想形态在现代历史中的变形和转化。这就是他所说的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即媒体和其他公共领域被国家、政党和市场所左右的状况。按照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我们可以推论说,首先,大陆的公共空间则是在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前提下形成的,在许多情况下,它甚至存在于国家体制内部。但它所以能够存在于国家体制内部,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经济资助,另一方面则

是由于国家的利益需要和国家内部空间的形成。因此这一公共空间的形成从未呈现过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种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特征,媒体在整个社会体制中所处的地位不仅深刻说明了中国的公共空间与哈贝马斯所描述的欧洲公共领域的差别,而且也表明媒体在这一语境中从来不是一个自由讨论和形成公共意见的领域,相反,媒体是各种支配性力量角逐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需要重新研究社会/国家在当代中国的复杂关系。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无论是市场,还是“社会”,都并不是自然抵御国家过度干预的力量。这表明,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问题是与政治民主问题直接相关、无可分割的问题。这也同时表明,经由市场而自然达致国内和国际领域中的公平、正义和民主不过是另一种乌托邦而已。<sup>[36]</sup>

中国当代思想的这个最近阶段的结束是以“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历史性衰落为标志的。不过,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说,这是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历史性胜利。正是这些相互冲突的思想共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证明,为中国社会朝向全球市场和全球体系的改革开辟了道路。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新启蒙主义”的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对内,它没有及时地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在资本主义市场形成过程中国家—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从而不能深入剖析市场条件下国家行为的变化;对外,它未能深刻理解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而不能一如既往地援引西方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批判的资源。中国启蒙主义的话语方式建立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这一基本目标之上,而这个目标却是由起源于欧洲、

而今已遍及世界的资本主义过程所制定的。中国新启蒙主义面对的新的问题是如何超越它的原有目标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诊断和批判。在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性衰落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思想的废墟,在这个废墟之上,是超越国界的巨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甚至作为启蒙思想的批判对象的国家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受制于这个巨大的市场。在 20 世纪即将告终的时候,已经有人宣告:历史终结了。

### 面对 21 世纪: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

20 世纪末期的最为重要的事件是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和中国朝向全球市场的“社会主义改革”,这一切正在结束和已经结束了以意识形态的对立为标记的冷战时代。站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许多学者对 21 世纪作出或悲观或乐观的预言:21 世纪是新的产业革命的时代;是解决人口和生态问题的时代;是文艺或宗教复兴的时代;是经济中心转向太平洋圈的时代……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论文中断言:新世纪中占首位的冲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性的,人类中的重大分界以及主要的冲突根源将是文化性的。民族国家在世界事务中仍将是强有力的行动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国家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

我不准备在此对亨廷顿和其他学者的预测作出理论的分析 and 质疑,(已经有学者提及了这样的问题,如在国际政治行为中,民族国家将把文化价值置于经济和政治利益之上吗?)我要指出的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世界

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也许是最富活力的地区；东亚地区也的确可能改变在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成为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中心之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化的历史情境中，这个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在 21 世纪居于何种地位？例如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国家资本、民间资本、外来资本之间的关系怎样？新阶级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关系怎样？农民与城市人口的关系怎样？发达的沿海地区与落后的内地的关系怎样？所有这些社会关系都需要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市场关系中来观察，而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关系的变化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具有怎样的影响？在跨国资本主义的时代，这些“国内关系”是否已经无足轻重？我至今还记得自由主义的理论大师马克斯·韦伯的不祥预感，他认为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导致人对人的统治制度，甚至断言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消除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社会主义的希望。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失败的历史情境中，韦伯的问题是否还成立？

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或者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形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样导致了社会组织、特别是国家对人的专制，甚至较之于资本主义更为严重。韦伯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都建立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观察之上，而在今天，我们有必要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反思同时视为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这个现代性问题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所引发的。市场社会的扩展及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必然伴随着自发的、未经计划的社会保护运动，这两个方面的冲突构成了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动因，也成为现代社会制度自我改革的基本动力。现代社会主义的兴起

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理解和克服这种矛盾的历史愿望，但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但未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而且最终将自己汇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之中。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运动和各种社会保护运动中获得了进行自我批判和改革的机会，以至于在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在原来的意义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界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用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当代世界的变化时，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垄断结构及其运行规则代表了当代世界的所有方面，因为在欧美的社会体制和公共政策中已经包含了各种社会主义的或其他的社会机制。除了制度实践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保护因素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布罗代尔称之为“物质文明”的那些方面：那些在生活的底层所进行的、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交往关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才不仅是对过去的检讨，而且也是对现在与未来的预言，因为我们仍然置身于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传统形式的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启蒙主义”也几乎无力对当代世界的发展作出恰当解释和回应。正是在这里，隐藏着“重新思考中国问题”的必要性。

中国思想界正在讨论所谓的“全球化”问题，而与此相对照的是，西方媒体却在谈论中国的民族主义。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全球化”抱持着儒家大同式的理想主义，这种有关“大同”的天下主义不过是一个世纪以来不断重复的“走向世界”的现代性梦想罢了，我们从中还能辨识出一些“儒教化的世界图景”的依稀面目。而另一些年轻人却利用商业炒作的方式炮制了《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畅销书，以至在已经非常不安的西方社会引起了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疑虑和明显过于夸张的“中国威胁论”。在一定意义上，

后者成功的商业炒作使得许多海外媒体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具有极端排外的性质,而忘却了这本书的出版和发行过程与商业的关系。只要民族国家体系没有彻底瓦解和重组,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国家同一性的基础就不会消失。更为重要的是,当代的民族主义政治与传统民族主义存在重要的差别,与其把它看做是全球化的对立面,毋宁把它看做是全球化的副产品。对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必须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关联起来,而不能作孤立地说明。中国在21世纪可能成为一个发达的市场社会,但却没有可能成为新的全球霸权。美国和前苏联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是在冷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苏联垮台后,北约已经成为全球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发展起这样的军事霸权。如果不能从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结构思考当代民族主义问题,那么,无论他们是积极地支持民族主义运动,还是极力反对民族主义,都有可能放过了问题的根本症结。

那些将全球化看做是当代世界的最新发展的学者似乎忘却了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的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它已经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或时期。正如依附理论的重要阐释者阿明指出的,在工业革命前的商业主义时期(1500—1800),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商业资本形成了它的支配地位,并创造了它的边缘区域(美洲);在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古典时期(1800—1945),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亚洲(日本是一个例外)、非洲和拉丁美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它们通过农业和矿业的生产和加入到全球劳动分工之中;与此同时,伴随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系为其形式的工业体系的形成,民族解放运动也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其意识形态上的特征就是将工业化当做解放、进步的同义词和“赶超”的手段,并在资本主义中心启发之下

以建立富强的民族国家为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是边缘地区在不平等条件下进行工业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和拉美国家重新获得国家的政治主权。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自足的民族工业体系逐渐瓦解，最终被重组为一体化的世界生产和贸易体系的构成要素。<sup>[37]</sup>全球化过程并不能自明地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从现代世界的发展来看，生产和贸易过程的全球化并没有自发产生与之适应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组织的新形式，也没有发展出能够适应亚洲和拉美等边缘地区兴起的政治、经济关系，更没有解决所谓的南北差异和不平等。同样明显的是，民族国家地位受到削弱，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垄断却没有改变。因此，如果需要消除民族主义所产生的某些负面效应，就必须在广泛的全球关系中探讨建立更为公正与和平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可能性。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由于日益深入地加入到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过程之中，国际资本与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控制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资本控制者也是政治权力的控制者）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一方面使得国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体制性的腐败。这种腐败渗透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产生了深刻的社会不公。即使从纯粹效率的观点看，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创新发展出遏止这一过程的社会机制的话，这种体制性的腐败对经济的发展必将产生重大障碍；而与这种腐败相伴随的盲目的消费主义也将迅速地耗竭自然和社会资源。

这一切表明：自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思想界普遍流行的现代化的目的论世界观正在受到挑战，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习惯的那些思想前提。尽管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我们面对的这些如此

复杂而又相互矛盾的问题,但是,超越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习惯的那种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实践中的那些制度创新的因素,关注民间社会的再生能力,进而重新检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方式,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中考虑,却是迫切的理论课题。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已经成为过去,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图景也并未消除韦伯所说的那种现代性危机。作为一个历史段落的现代时期仍在延续。这就是社会批判思想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知识界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历史机遇。

### 注释

[1] 本文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个人的思想札记。此文初稿写于1994年,此后做过若干修订,但限于原稿的状况,以及我自己的精力主要在晚清至现代时期的思想史研究,1994年以后发生的一些讨论没有能够成为讨论的对象。当时写作的动机主要是清理我自己的思想。我非常清楚这篇文章的框架以及所涉及的材料都有待进一步的修改、论证和补充。在朋友的一再鼓励下,现将此文发表出来,主要是为了引起讨论。

[2] 所谓“市场社会”不等同于市场,也不等同于市场经济,而是指社会的基本构造和运作方式是一种市场运作方式。根据卡尔·波兰尼的解释,市场社会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参见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3] 参见 Gilbert Rozman 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版。

[4] 有关50年代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问题,也涉及中国共产党放弃新民主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原因问题。金观涛、刘青峰所著《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3)一书第九章《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对此有深入清晰的研究,第



411—460页。此处不辍。

[5] 请参见《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0—650页。

[6] 对于1979年以后农村改革的意义需要在50年代以后的历史中加以理解。从动机上看,集体化模式似乎一方面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弊病,又可以通过对小农经济的改造走向现代化。然而,由于缺乏激励机制,集体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参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6—43页)。更重要的是,“阻碍了农业外就业机会的扩展。政府虽然把工业化作为目标,但在农村,却极力限制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由于政府……对乡村控制空前严密,这种限制非常有效。这样与以前相比,集体化时期个人选择的自由度不仅未增加,反而缩减,严重束缚了农村经济发展。”1979年以后的农村改革,“提供了一个较自由的‘机会结构’,给地方共同体和个体农民提供了自主性和实验自由,这样他们便可以灵活地寻找多种多样的经济发展途径和就业机会。”(参见高寿仙:《制度创新与明清以来的农村经济发展》,《读书》1996年5期,第123—129页。)黄宗智则指出:改革以来的变化“不是由于一些人想像中的自由市场化了的家庭农业的高度刺激力导致农业生产的戏剧性突破,而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多种经营,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村外就业的转移。”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80年代的改革中,具有长期的最大意义的农村变化是随着农村经济多样化而来的农业生产的反过密化,而不是广泛设想的市场化农业生产。……随着80年代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引进,农业产量停止了增长,而极少有农民沿着静电模式和官方宣传机器预言的道路致富。直率地说,80年代的市场化农业在作物生产上并不比在1350至1950年的600年间或集体化农业的30年间干得好。”“长江三角洲乡村的真正重要的问题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在于市场化家庭农业或计划下的集体农业,不是在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在于过密化还是发展。”(《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17页。)

[7] 罗峪平:《始终不能忘记农村的发展——访国务院研究中心农业问

题专家卢迈》，《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7月31日第14期，总第68期，第26页。

[8] 参见苏文：《山重水复应有路——前苏东国家转轨进程再评述》，《东方》1996年第1期，第37—41页。该文讨论前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问题，这里提到的基本原则是指捷克的经验。

[9] 有关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讨论并不是周扬首创，但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的报告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他的报告的删改稿发表于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原文在发给与会代表后，很快收回。他的报告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最为有力的批判来自当时的党内理论家胡乔木，他于1984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不指名地对周扬和其他理论家的观点进行理论批判。他的讲话先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月刊》，而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实际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早在1978年后就引起了一些理论工作者的注意，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1月出版了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论文集，内中收录了王若水、李鹏程、高尔太等人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中，人道主义的抽象的人和人性概念是论证的基础。而作为人道主义的对立面的是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前者指的是宗教专制，在中国的语境中隐喻“文革”中的“现代迷信”；后者指的是封建专制和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语境中隐喻“文革”中的“全面专政”。也许是受到苏联、东欧国家相关讨论的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重视人的问题的，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此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此外，他们还指出，列宁根本不知道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发表）。王若水在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中还提到，1964年毛泽东曾经表示赞同“异化”概念，认为异化是普遍现象。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进行批判，一方面采用了一种隐喻式的方式，即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问题解释为

封建主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利用了人道主义和异化概念的普遍主义特征。这两个方面都暗示了对现代价值观、特别是启蒙运动的价值观的肯定。在这种解释模式中,社会主义从未作为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形式进行检讨。相反,对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批判是对欧洲现代性的价值观的充分肯定。

[10] 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构成是极为复杂的。大约是在1979年曾经召开过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多为党内理论家。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稿,王强华、马沛文、孙长江等人修订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刊出,实际上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尽管参与者关于文章的产生过程的回忆有所出入和差别(胡复明认为该文是在他的文章基础上修订而成,孙长江则说这篇文章是两篇文章捏合而成),但他们都承认文章的修订和刊出是当时特定的政治情境的产物,也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孙长江明确地说:“这场讨论绝不是由于某个‘秀才’或某几个‘秀才’的灵机一动或苦思冥想而引发起来的。这场讨论是历史的产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也是历史的产物。”“直接参加讨论的,不仅是理论家,而且有政治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国家意志”不能被理解为统一的国家意志,因为当时的国家或党内部存在着重要的分歧,这篇文章正是这一分歧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或“党”都不能被看作是铁板一块的存在。(关于这篇文章刊出前后的情况,请参见胡福明的回忆文章《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谈实践标准一文的写作、修改和发表过程》,载广州《开放时代》杂志1996年1、2月号,以及孙长江的文章《我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篇文章》,载《百年潮》1998年第3期,第25—29页)。从后来刊出的李春光等人的回忆来看,那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上层官员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走向未来》这样的较为年轻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例,虽然其中部分人在1989年后因各种原因滞留海外或一度身陷囹圄,但另一部分却是高级官员。《走向未来》丛书的情形是有代表性的。在1989年以后,“新启蒙”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流亡国外,但他们的一些当年的同道者仍在国内,并身任要职。例如,在80年代因为介绍西方经济学思想名噪一时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厉以宁现在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与这些群体

不同的是一些文学群体和人文知识分子群体。例如早期的《今天》派群体和80年代中期成立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些群体基本上不是政治性的群体，而是文学或知识的社团或群体。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派的代表人物北岛虽然在当时以政治性的朦胧诗著名，但却是文学的独立价值的热情赞颂者。“文化：中国与世界”也是以“文化”为标帜，不直接地卷入政治问题。这种一定程度的非政治主张当然有其政治性的后果，即为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创造了空间。

[11] 关于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的讨论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中提出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孙冶芳。但根据最近披露的材料，在孙之前，顾准已经思考过同一问题，并曾经与孙讨论过。有关价值规律的讨论典型地揭示了80年代中国思想的特征，即通过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畴，为现实的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的依据。

[12] 法制问题的提出与重新审理“文革”中的错案相关，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提出的“法制面前人人平等”是“文革”结束后流行的口号。但在理论上提出建设性意见的还是于浩成、严家其等学者。

[13] 金观涛、刘青峰1984年在一家地方出版社发表的《兴盛与危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用系统论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关于“超稳定结构”的基本观点一直延伸到他们于1993年在香港写作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

[14] 主体性问题首先源自李泽厚对康德哲学的解说，而后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论纲。（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但是，将李泽厚有关主体性的讨论推向整个思想界的是深受其影响的刘再复。他在《论文学的主体性》等文章中将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变成了一个文学和思想运动的旗帜。（《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第11—26页；1986年第1期，第3—15页。）

[15] 当代中国知识界对尼采学说的理解甚至还不及大半个世纪前的鲁迅。当代知识分子眼中的尼采、萨特不过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代表，而鲁迅

早在1907年就已经注意到尼采等人的反现代内容。

[16] 刘小枫出版于1988年的《拯救与逍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是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引起知识界的重要反响的著作。他本人也逐渐从德国哲学的研究转向基督教神学的研究。

[17] 甘阳:《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二十一世纪》(香港)1993年4月号,第4—7页。对于甘阳论点的批评,参见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东方》(北京)1994年第1期,第6—10页。关于乡镇企业的讨论请参见杨沐:《中国乡镇企业的奇迹——三十个乡镇企业调查的综合分析》、王汉生:《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孙炳耀:《乡镇社团与中国基层社会》(均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9期,第5—17、18—24、25—36页)。

[18] 王颖的《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以及她和折晓叶、孙炳耀合著的《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对改革以后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的组织和工业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是研究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文献。文中所涉及的内容引自《新集体主义》一书的内容提要。

[19] 同上书,第204页。

[20] 乡镇企业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区的发展可以说是极为成功的,但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黄平等人的调查,1992年以后,这些地区的乡镇企业的形态也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许多乡镇企业,包括很多成功的乡镇企业纷纷开始与外资合资,转化为新的合资企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地区间的差异,乡镇企业在各地的情况也有极大的差异。即使在乡镇企业获得巨大成功的许多地区,也没有采取相应的保护环境的措施,结果是对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1992年,我曾有机会到天津大邱庄考查,该地是全国闻名的乡镇企业和集体化发展的典型。但是,在巨大的产值和富裕的生活掩盖之下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生产环境的恶化和严重的不法行为。所有这些都表明,对乡镇企业的状况需要具体地进行分析。关于当代中国乡村的变化,请参见《读书》1996年第10期上

的一组笔谈,总题是“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

[21] 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首先是在《读书》杂志(北京)上展开的,而后波及到许多其他刊物。问题的首先出现,请参见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杂志1994年第3期,第3—13页。自那以后,《读书》杂志在1994年第3—7期陆续发表了来自上海的年轻学者的多次谈话录。

[22] 请参见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第10—20页。

[23] “新状态”这个概念被一些当代文学评论家用于描述当代中国文学的主要特征。其意思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新状态”是一种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原生态。

[24]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第15页。

[25]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8月号,第5—16页。对于这篇文章的批评,请参见季卫东:《第二次思想解放还是乌托邦?》,《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10月号,第4—10页。

[26] 崔之元对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问题的诊断也是引起争论的问题。苏文发表于《东方》1996年第1期上的论文《山重水复应有路》虽然是讨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问题的文章,但基本的思想却是针对崔之元关于中国私有化进程的观点的。这是因为崔之元对中国改革道路的分析是在与前苏联和东欧改革的比较关系中进行的。由此可见,关于中国当代改革道路的讨论不只受到中国改革本身状况的影响,还受到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改革状况的影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的成败对中国学者思考中国问题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27] 张曙光:《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公共论丛》No. 1, 1995, 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6页。

[28] 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5页。

[29] 黄宗智在讨论美国中国学中有关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范畴的应

用时也曾指出：“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这两个概念用于中国时，经常预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我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是从西方近代历史中高度抽象出的一种理想，但它并不适用于中国。”Philip C. C. Huang: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number 2. April 1993, pp. 216 - 240. 黄宗智的讨论主要针对近代中国的情形而言，但我以为即使就当代中国的情况来说，也是适用的。

[30] 由日本国际学术友谊基金会资助、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31] 在香港注册出版。

[32] 起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而后又因经济问题转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33] 福特基金会资助、三联书店出版。

[34] 由官方的“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办。

[35] 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主办。

[36] 由于受到东欧知识分子和欧美学术界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在 90 年代也开始讨论市民社会问题。在“社会—国家”的二元论述模式中，西方学者以波兰团结工会为例，认为东欧集权制度的瓦解与“市民社会”的成熟程度有关。美国中国学界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受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换》的影响，用公共领域的概念重新阐释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大量重要的学术著作。但是，在当代中国有关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明显地存在着经由“市场化”而自发民主化的幻想。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确已经产生出了新的社会阶层，但是，这些阶层是否能够成为政治民主化的动力却是极为不清楚的。我已经提及在中国社会改革过程中，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合二而一的情况，以及中国的政治腐败与市场化的复杂关系，这些都表明无论是市场化，还是新社会阶层的出现，都不能保障政治民主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民主问题已经与经济问题无法分割，特别是和社会分配问题无法分割。与这种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相关的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开放”本身最终将导致中国社会向西方靠拢，从而在政治上解

决民主问题。问题是,中国当代的政治腐败的动力之一,即是和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活动的活动相关的。这同样证明,简单说“开放”能够解决中国的社会民主问题也是不切实际的。我在此提及这两点既不是简单地否定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更不是中国应当走向封闭,我的意思仅仅是:我们需要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论述模式来检讨中国社会的问题。中国内地有关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份民办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主要的文章有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创刊号)、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总第5期,第176—182页)、萧功秦:《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三重障碍》(总第5期,第183—188页)、德里克:《现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总第4期,第10—22页)、蒋庆:《儒家文化:建构中国式市民社会的深厚资源》(总第3期)、朱英:《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几点商榷意见》(总第7期,第108—114页)、施雪华:《现代化与中国市民社会》(总第7期,第115—120页)、鲁品越:《中国历史进程与市民社会之建构》(总第8期,第173—178页)等等。此外,《天津社会科学》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如俞可平:《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1993.4)、戚衍:《关于市民社会若干问题的思考》(1993.5)、徐勇:《现代政治文化的原生点》(1994.4)。

[37] 有关“全球化”问题的讨论,请参见汪晖:《秩序还是失序?》,《读书》杂志,1985年7月号,第106—112页。



## 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

陈燕谷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制度,它的诞生、扩张直至成为一个囊括整个世界的全球体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现实,是任何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学者、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并不随着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而烟消云散,更何况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野蛮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时代。马克思的思想,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理论体系,尽管它本身应当甚至必须接受批判性的考察。这些可以说是我把握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社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19世纪产生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一种同质化想像,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上同质性的社会制度将以不同的速度逐步从欧洲扩散到整个世界。这种想像中的不平衡运动曾经使马克思担心,欧洲在建立社会主义时会遭到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亚洲的包围。但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使马克思的预言落空,而且促使人们把眼光从欧洲扩展到世界的各个地区,研究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复杂矛盾的历史过程。我笼统地称之为“世界体系理论”的那些思想家及其理论的和历史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考在20世纪下半叶的表现。从实践的角度讲,它们与19世纪殖民体系的解体,特别是与中国、越南、古巴等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理论上讲,它们

既是对作为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直接的回应,也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同质性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和修正。从60年代起,弗兰克发表了一系列后来被命名为“依附理论”的著作,就是上述努力的重要成果之一。依附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垄断结构和全球扩张,尤其是它在制造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即后来所谓第三世界)欠发达状态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与宗主国中心“典型”和“纯粹”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在很多方面甚至恰好相反的殖民地依附性资本主义,作出鞭辟入里的历史分析和理论阐述,成为战后批判的社会理论和发展理论最有价值的遗产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弗兰克在其90年代末出版的著作《白银资本》里断言,资本主义不过是马克思等人虚构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神话”时,我们自然就会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剧变”,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剧变”。在80年代(实际上要早得多),一方面“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陷入持久而深刻的危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里根—撒切尔革命,许多左派知识分子相继发生政治的和理论的转向。派瑞·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经济批判向文化批判的转移至此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弗兰克批判的锋芒也是在这个时候从资本主义转向欧洲中心主义的。我本人对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没有任何异议。相反,我认为这样的批判必须深入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不能仅限于作出某种象征性的姿态。在我看来值得考虑的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不是一件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事情?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把这两者分割甚至对立起来,对于理解、批判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都是有害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全面颠覆建

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理论,在他所开列的必须对欧洲中心主义社会理论负责的名单里,包括从马克思、桑巴特、韦伯到帕森斯、汤因比、波拉尼、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在内的许多思想家和重要学者,而且为了表示与“昨日之我”的彻底决裂,60—70年代的弗兰克自己也榜上有名。本文的分析,为了便于把握起见,仅限于和“世界体系理论”有关的那些作者。

### 依附性与欠发达:另类资本主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里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实际上,马克思这样做还有着更深层的理论考虑,那就是像物理学家那样,“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纯粹”形态。<sup>[1]</sup>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有其利,亦有其弊。其利自然是用规范的理论语言阐述典型而又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说明在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关系中,与以往主要依靠超经济手段剥削经济剩余的社会形态不同,新型的权力关系怎样产生新型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其弊则在于历史资本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不纯粹的。这种不纯粹性在很长时间里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而在边缘地区它甚至可以说是那里的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例如,与中心国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雇佣劳动或自由劳动不同,边缘地区主要依赖于非自由劳动,但后者与前者一样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为同一个世界市场生产并提供经济剩余。换言之,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必

须能够说明：同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同形态资本主义的共存、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后果。因为，资本主义不仅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导致阶级分化，而且导致世界规模的结构性的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殖民统治使得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种族关系彼此缠绕、彼此渗透，进一步增加了分析的困难。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早期著作中的欧洲中心主义错误。其实，这样的错误，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仅仅是现成地使用了“资本主义是在16世纪产生于欧洲”这样一个公认的理论前提。弗兰克早期著作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欧洲，而是第三世界的欠发达状态：何谓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它是怎样产生的？如何才能消除这种让绝大多数人陷于可悲的依附性的状态？等等。弗兰克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也正是美国主流学术界致力于生产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时候。对于所有这些理论来说，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都是安身立命的真正的基石，所谓欠发达状态不过是罗斯托夫（Walt W. Rostow）所说的现代化起飞之前的“传统”状态。弗兰克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的序言里说过，1959年，当他第一次来到拉丁美洲的时候（临时性地参加学术会议），正处于一种思想上的分裂状态，即政治上的左派立场与学术上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之间的分裂状态。尽管他在大学里就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格格不入，但在考虑拉丁美洲的发展问题时，仍然离不开他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资本匮乏、妨碍储蓄和投资的封建制度和其他传统制度、政治权力集中在农村的地主寡头手里等，一句话，正是拉丁美洲本身的“传统”阻碍了它的现代化。这种分裂状态使他意识到，要想从事符合欠发达国家人民利益的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一名具有社会和

政治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不仅要放弃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生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且要放弃宗主国的生活环境,进入到欠发达国家内部,成为那里的人民的一员并在那里学习真正的政治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带着这个想法,弗兰克在1960年先后到古巴、恩克鲁玛领导下的加纳和塞科·图列领导下的几内亚,考察这些刚刚获得解放的前殖民地进行的政治经济变革。然后,他作出自己一生中恐怕是最重大的决定:辞去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教职,来到拉丁美洲。<sup>[2]</sup>如果不是撒切尔夫所说的“为智利带来民主”的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他现在可能还在那里。

当然,弗兰克并不是刚到拉丁美洲就成为依附理论家的。他最早发表的几篇有关拉丁美洲的文章,包括讨论墨西哥革命的二重性和土地改革问题的文章,仍然把个别的民族国家作为自明的前提和分析单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封建主义”一词。在当时的拉丁美洲学术界和思想界(包括自由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意味着以下几方面的含义:一、从15世纪末以来,伊比利亚殖民统治者把拉丁美洲建设成一个顽固的封建堡垒;二、发达资本主义地区是在与世界其他地区毫无关系的条件下完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而拉丁美洲则始终闭关自守,从而停留在封建状态;三、类似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同样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所以不同学术背景和政治立场的人都承认拉丁美洲是一个二元社会:一部分是传统的落后的农业的封建社会,另一部分是现代的都市的(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其中每一个社会都基本上不依赖于另一个社会而存在;四、帝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外国的经济剥削,而不是在拉丁美洲建构了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上述这些“传统”特征决定了拉丁美洲的欠发达,主要表现为普遍而持久的贫困。所谓的“封建主

义”在这里是指,拉丁美洲是一个封闭的拒绝变革的传统社会,尚未纳入到世界市场经济之中,即按照进化论历史观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弗兰克很快就发现这样的解释与拉丁美洲数百年的历史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并形成了他自己对拉丁美洲社会性质的独特见解,正是这些见解构成依附理论的基础。其主要观点可以表述如下:拉丁美洲本身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产物,这样的扩张在其所到之处同时表现为中心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边缘地区的经济欠发达的辩证过程,二者始终互为因果,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国际领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表现为宗主国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差别和对立,在国家或地区内部表现为“现代”与“传统”、“发达”与“落后”、城市与乡村、工商业与农业的差别和对立。如果不是把这个过程视为同一个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那么就会认为存在着二元社会,即存在着两个体系:一边是富裕的“资本主义世界”,另一边是贫穷的“封建”世界。问题在于,将近五个世纪以来,美洲大陆始终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作出特殊贡献的组成部分。拉丁美洲的“落后”和“欠发达”绝不是什么封建秩序的产物,而是它以特殊的方式参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这就是说,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体系怎么会有兴趣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封建的即封闭的社会体系呢?它能从这样的体系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实际上,资本主义做的事情恰好相反。<sup>[3]</sup>在来到拉丁美洲之初,弗兰克还写了《援助还是剥削?》(1963年)、《帝国主义的机制》(1964年)、《军政府的经济学》(1965年)等文章,在拉美各国引起激烈的论战。通过这些论战他对拉丁美洲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不是没有付出个人的代价。<sup>[4]</sup>但在建构依附理

论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智利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巴西欠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与巴西农业中的封建主义神话》,以及理论色彩较强的《欠发达的发展》和《发展社会学与社会学的欠发达》。

所谓依附性绝不是通常所说的互相依存的关系,而是从属或屈从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依附理论是关于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理论。从资本主义体系的空间结构的角度讲,这样的“发展”形式只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而这种所谓的“发展”的结果是通过价值的转移,促进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发展或发达,同时导致了边缘地区的欠发达。和广为流传的看法(例如,罗斯托夫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相反,欠发达不是一种原始的和传统的状态,也不是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经历过的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欠发达国家的过去和现在与发达国家的过去没有任何重大的相似之处。“目前的发达国家的过去虽然可能经历过未发展状态(undevelopment),但是决没有经历过欠发达状态(underdevelopment)。”<sup>[5]</sup>所谓未发展状态并非指一个社会的经济停滞不动,或不存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换关系,而是说这样的经济关系不是利用对暴力和资本的垄断有意识地规划和建构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征服与以往的帝国征服活动的本质区别在于,这种新的帝国征服方式就其性质而言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前资本主义征服者的典型做法是,把原来的统治者消灭掉并取而代之,但他们一般并不改变被征服者原有的生产体系,只是强迫他们向自己交贡纳税。现代欧洲人所做的则不同,他们系统地彻底地摧毁了殖民地原有的生产体系以及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并且按照宗主国中心资本积累的需要强迫殖民地人民接受一种异己的人为建构的经济体系。在奴

隶贸易时代,非洲人并没有站在岸边等着跳上船去漂洋过海,美洲的黄金、白银、糖和咖啡也不是“自然”的恩赐,生产这些产品必须在当地建立特殊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弗兰克指出:“经济的发展(或发达)与欠发达并不是一种相对的量的(*relative and quantitative*)关系,即人们通常所说的 A 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 B 国;相反,它们是一种关系性的质的(*relational and qualitative*)关系,即 A 国与 B 国的经济有着结构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正是在 A 国与 B 国的关系中形成的。发展(或发达)与欠发达是同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充满矛盾的经济结构和过程的产物。我们不能把它们视为不同经济结构或体系的产物,也不能视为同一个体系之内不同经济增长阶段之间的差异。”<sup>[6]</sup>自从 16 世纪被征服以来,拉丁美洲形成了一种与欧洲相比,首先不在于发展水平高低,而在于性质迥然不同的外向型依附性经济,正是欧洲殖民统治者强加的这种卫星国地位决定了拉丁美洲始终摆脱不掉的欠发达状态。

这就意味着如果要研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某一特定地区的发展与欠发达,就必须把它放置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的结构之中来确定它在其中的位置。弗兰克指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种全球理论来思考和解释我们所面对的整体现实,即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如果我们要理解拉丁美洲,就必须从创造它的世界体系开始,并且摆脱画地为牢的民族国家的框架。”<sup>[7]</sup>从方法论角度讲,对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社会关系的理解将不再是孤立地一个接一个地分析每一个大陆、地区和国家,而是着眼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同时又要考察各个地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世界各个地区特殊的资本积累方式和过程与这个全球过程的关系。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基础上建构的各种社会理论,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无法完成这



样的任务。另一方面,欠发达与资本主义之前的“未发展”状态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欠发达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如果说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先后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等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话,弗兰克认为在欠发达地区,中心—边缘关系的基本性质却始终是面向世界市场的商业性的,而不管这些关系看上去是多么的“封建”,这是因为宗主国中心地区的发展是阿明所谓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主性发展(*autocentric development*),而欠发达地区的依附性发展却始终是以中心地区的需要和利益为转移的出口经济。在《智利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弗兰克指出:“智利主要的出口产品改变过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因为这个出口部门成为潜在的可投资的经济剩余的主要来源,但每一次这个出口部门都被宗主国中心所控制。”<sup>[8]</sup>目前拉丁美洲最贫困的地区恰恰是历史上与宗主国联系最密切的地区。

但这并不是说,欠发达仅仅是一种从外部强加的“外部”状态。一旦一个地区或国家沦为外部资本主义中心的边缘地区,中心—边缘的资本主义矛盾和剥削结构就会在其内部复制出来,按照这样的原则来重新组织这个地区或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形成本地区或国家内部的中心的发展和边缘地区的欠发达,从而成为本地区根深蒂固的“内在”结构。这种链条式连环状态的控制与剥削关系使资本主义关系从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向外延伸到欠发达地区的民族中心,再从那里延伸到更低一级的地方中心。比如说,整个拉丁美洲都是欧洲(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是英国和美国)的边缘,但在拉丁美洲内部,智利同时又是利马的边缘。智利的民族中心是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它们把智利其他地区的农业、矿业和商业都纳入到日益扩张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来。

通过这个互相联结逐级“下降”的中心—边缘链条,即使是最与世隔绝的农业生产者也与资本主义世界中心联系起来,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边缘地区的经济剩余就是通过这样的链条逐级转移到各个层次的中心。拉丁美洲最“封建”的大地主庄园实际上是典型的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资本主义企业,只是在宗主国中心不再需要它们生产的产品之后,它们才陷入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状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心与殖民地的民族中心和地方中心之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即由于后者本身处于依附性的边缘地位,它的发展必然会遇到世界资本主义中心所不知道的各种限制,因而根本不可能重复发达的世界中心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依附性资本主义造就了边缘地区特有的流氓资产阶级(lumpenbourgeoisie),除了来自宗主国中心的限制,使边缘地区无法走上自主性发展道路的,就是这个其利益主要与宗主国中心而不是国内市场相联系的依附性资产阶级。美国和拉丁美洲的“主流社会”都是由欧洲人的后裔构成的,他们的截然相反的命运原因不止一端,但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不同性质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弗兰克在好几部著作中都对19世纪美国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流氓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进行比较分析,美国南方的流氓资产阶级的失败和拉丁美洲同一个阶级(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自由贸易”虔诚的信奉者和坚定的维护者)的胜利,最终决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命运。<sup>[9]</sup>

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很有争议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阿根廷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在《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文里提出的批评。拉克劳承认弗兰克对二元社会的批判,以及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观点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和正确的,但他认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本身即

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分歧的关键在于弗兰克是在商品交换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使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术语的,因此把是否与市场,尤其是世界市场相联系视为区分两种社会形态的决定性标准。拉克劳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一方面把资本和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不仅剥削直接生产者创造的经济剩余,而且其中商品化的那部分也可以转化为相当规模的资本积累。<sup>[10]</sup>另一方面,拉克劳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积累时,是在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和商业利润的来源时,则是在描述一个“经济体系”,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可以包括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的”。<sup>[11]</sup>这样,说拉丁美洲是封建社会,就无需像二元论者那样硬说它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同时,说拉丁美洲自始至终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也并不像弗兰克所说的那样,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拉克劳坚持按照生产方式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像弗兰克那样从流通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能描述拉丁美洲怎样成为欧洲宗主国的依附性边缘地区,恰恰无法解释他的基本命题:宗主国中心的发展导致了殖民地的欠发达。拉克劳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资本积累过程取决于利润率,而利润率又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的有机构成。但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如果不能导致相应的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就必然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就迫使资本从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和地区向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和地区转移,而主要使用超经济剥削手段(形形色色的非自由劳动)的边缘地区就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宗主国中心的工业资本主义扩张必然要维持边缘地区的前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sup>[12]</sup>在这里我不想过多触及资本主义研究中的“生产范式”与“流通范式”之间的争论,这至今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与世界体系理论关系密切的学者比较倾向于后者,或至少是模糊二者之间的严格区分。<sup>[13]</sup>我只想说明这个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而且与马克思的理论中的一些模糊之处有关。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他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sup>[14]</sup>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只能说勉强完成了前三项的研究,它成为各个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赖以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我们无法猜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的完成形态是什么样子,无法猜测对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研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资本论》的内容和结构,尤其无法猜测马克思会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马克思去世不久就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以及以列宁为代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这两方面的“需要”都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正在或即将发生的结构转换有关,同时也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不无关系,因为“帝国主义”的出现不仅要求社会主义者制定相应的行动战略和策略,而且要求做出理论上的阐述。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被公认为填补了这个理论的空缺。他们的特点是采用一种阶段论的时间性叙事,即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这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同义词或不同表述),以及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的发展,从而避免了从理论上触动《资本论》的风险。而

且在当时的语境里，“帝国主义”是指欧洲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之间的冲突，殖民地问题是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角度提出的，因此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来说仍然只有一种补充的意义。但是，当时敢于冒这种风险的确有其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同样是在帝国主义论战的语境里写作的（出版于1912年），但它不仅仅是策略层面的思考，而主要是在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层面上对《资本论》提出质疑，从而开启了从整体上重新考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卢森堡是在扩大再生产这个问题上发现结构严谨的《资本论》的缝隙的。她在分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论述，特别是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论述后指出，“这种立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足性和孤立性上的见解，我们认为不能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sup>[15]</sup>因为在封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无法解决一个对于资本积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础的那部分不断增长的需求从何而来？所谓积累就是不能把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否则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了），而是必须让其中的一部分重新资本化，投入扩大再生产，从而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这里的悖论是，在剩余价值能够重新资本化之前，又必须解决它的实现问题，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必须被某些人消费掉。但是在一个典型的封闭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论资本家阶级怎样置新教伦理于不顾，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他们作为一个阶级也只能消费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从社会总产品中取得一个确定的部分，其数量相当于社会总资本的可变资本，因此不论他们的生活水平较高或较低，他们所消费的那部分也不可能是剩余价值中重新资本化，即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那部分。看起来这里存在着一个

矛盾：重新资本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资本家不会消费它，而工人无力消费它，所以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就其本质来说，只能是扩大再生产；而且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每一天都在以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进行着，那就意味着剩余价值中重新资本化的那部分肯定已经实现了，只不过它们被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外的什么人消费了。卢森堡的结论是：“马克思似乎一直是从一个错误的方向着手研究这一问题”，<sup>[16]</sup>这样就无法说明这个至关重要的需求从何而来，也就是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的。

那么，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为什么不能说明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如何进行以及在历史上是如何完成的呢？卢森堡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整个图式的前提本身，即试图在把资本家和工人作为社会消费的惟一主体的前提下，来说明资本积累的过程。从这个缝隙里卢森堡看到整个《资本论》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惟一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图式中当然看不到资本家及工人以外的阶级存在。……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惟一支配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sup>[17]</sup>为了补救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缺陷，卢森堡认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必须假定一个“第三者”，即资本家和工人之外的消费者的存在。

剩余价值实现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一个购买者阶层。我们说购买者，而不说消费者，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最初就不是指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点是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结构来实

现的。这里,可以设想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资本主义生产供给超过自身需要(工人与资本家)以上的消费资料,其购买者是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19世纪英国的棉织品供给欧洲大陆的农民和都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印度、美洲和非洲等的农民)。……其次,从相反方面看,资本主义生产提供超过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从非资本主义国家中找到购买者(例如英国工业在19世纪前半期供给美洲澳洲诸国建设铁路的材料)。

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实现并不是扩大再生产的惟一关键问题。很简单,剩余价值的实现表明物质形态的产品已经售出,并以货币的形式回到资本家的手里。但是,积累的第二个前提是资本家必须获得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要素。他们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物质形态的东西呢?在这里,非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原材料的输出地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总生产中仍然只占一小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仅仅依赖在这样狭隘的空间里所能获得的生产要素,是决不可能达到它实际达到的高度的,甚至它的一般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资本积累的物质要素同样严重依赖非资本主义社会。卢森堡认为马克思封闭的资本积累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遇到障碍:“为什么必要的生产资料及消费资料,都必须是资本主义生产呢?这个假定,正是马克思资本积累命题的基础。但它与资本的日常实践和历史,以及这个生产方式的特质,并不符合。19世纪前半期英国的剩余价值,大部分是以棉织物形态从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可是这些剩余价值用来资本化的物质要素,乃是表现为美国蓄奴各州所生产的原棉,或者表现为农奴制俄国田地生产出来的谷物(这是英国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这些东西确实是剩余产品,但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sup>[18]</sup> 卢森堡

认为,为了使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上得到使用起见,资本有必要越来越向全世界扩张,以便攫取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可供无限制选择的生产资料。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态和规律从最初就致力于囊括全世界,为了剥削的目的而占有各种生产力,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搜索生产资料,“必要时从一切文化阶段和一切社会形态那里用武力来夺取这些生产资料”。<sup>[19]</sup>所以,无论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还是获得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要素,资本主义社会都离不开与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一方面可以称之为国际贸易(它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的首要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军事扩张,从15世纪末以来它和国际贸易始终形影相随。资本的扩张所遵循的不是黑格尔辩证法那种正反合式的内在扩张的逻辑,而是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空间扩张的逻辑,表现为资本扩张、国际贸易和军事征服的神圣三位一体。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讨论“所谓原始积累”问题。这一章在整个《资本论》中处于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位置,目的在于跳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分析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在涉及这个问题之前,马克思已经论述了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sup>[20]</sup>这就是说,“原始积累”是构成资本主义积累起点的,但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资本积累。马克思主要以英国农民为例说明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同时也强调了欧洲资本对殖



民地的掠夺。卢森堡认为成问题的是,这些都是从所谓“原始积累”的角度来分析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过程是附带发生的,只是说明资本的发生史,即资本在世界上最初出现时发生的情况,似乎“原始积累”在某个时间点上完成之后,就可以回到普遍而又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分析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积累了。就我所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卢森堡是第一个指出资本主义积累始终是与“原始积累”同呼吸共命运的:“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在它十分成熟时期,依然在一切方面依存于与它并存的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一个广大的非资本主义世界构成“资本积累的历史环境”,而且这个非资本主义世界既然不会心甘情愿地充当这样的“历史环境”,对它们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也就是资本积累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卢森堡和列宁、希法亭的阶段论不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资本的积累不仅在它诞生时,而且直至今日,都使用暴力作为一个永久的武器。”<sup>[21]</sup>卢森堡第一个指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哪怕是最高阶段),而是在任何时候都与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连体怪胎。

在一定程度上,弗兰克的依附理论、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理论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都受到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的影响,尽管他们都对她有所批评。就连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布罗代尔也认为,“资本主义只是在其他生产方式的簇拥下,并牺牲其他生产方式,才能生存。罗莎·卢森堡在这方面的看法是正确的。”<sup>[22]</sup>尽管在与拉克劳的争论中得到沃勒斯坦的有力支持,<sup>[23]</sup>弗兰克仍然觉得有必要就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作出进一步的澄清。早在1968—69年,弗兰克就与印度学者赛义德·沙阿合作编纂一部研究包括亚洲、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整个第三

世界的欠发达问题的文选,名为《欠发达读本:理论、历史和政策》,旨在全面说明不同的边缘地区是如何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以其特定的方式为资本积累的事业作出贡献的,但没有一家出版社肯接受这部仅第一卷就长达 1000 页的文选。后来弗兰克把他为文选写的导论扩展成两部专著《世界性积累:1492—1789 年》和《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书还没有写完就发生了军事政变以及随之而来的驱逐出境,<sup>[24]</sup>它们实际上成为弗兰克在拉丁美洲的事业的句号。这两本书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都出版于 70 年代,标志着战后以中国革命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为背景对全球历史资本主义的思考进入一个新阶段。

和卢森堡一样,弗兰克感到疑惑的是,假设原始积累作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积累的起点,是否能够跳出马克思所说的恶性循环?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从 16 世纪开始的,那么一方面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的事业却在世界范围内脚踏实地地展开和扩张,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概念是无法说明从那时以来整个世界实际历史过程的多样性的,因此有必要对原始积累这个概念作进一步的区分和界定。弗兰克认为,所谓的原始积累不仅是指在时间上先于或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资本主义积累,如工业革命之前长达几个世纪的资本积累,而且意味着这样的积累是建立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如美洲的矿山和种植园。然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并不一定必须在时间上先于或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它可以而且确实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同时存在。这就是说,原始积累,就其为建立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积累而言,并不是一个时间性范畴,而是一种性质不同的初级积累(primary accumulation)。<sup>[25]</sup>在历史资本主义的各个

发展阶段,这种初级积累不仅为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做出了重大地贡献,而且在雇佣劳动和相对剩余价值占据主导地位的“纯粹”资本主义阶段,它也始终在积累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故有人称之为永久性的原始积累。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拉克劳、布伦纳等人来自“生产范式”的批评,弗兰克认为应该适当地修正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以便正确说明不同性质的积累和不同的生产方式在同一个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上文的分析表明,和卢森堡一样,弗兰克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剥削拉丁美洲的外国公司,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整体结构。和卢森堡不同的是,弗兰克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并不是必须依赖于广大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阶层的存在,而是同一个世界过程在不同地区制造出不同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在于,雇佣劳动本身并不是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惟一标准,因为雇佣劳动完全可以在与资本积累无关的情况下存在。“生产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凡是被纳入资本积累过程的生产关系、流通和实现的过程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化或改造;换言之,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流通实现过程被纳入资本积累过程才是资本主义是否存在的真正标准。……但在历史实践中,纳入资本积累的世界过程和生产关系的改造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尽管现存生产关系的转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在所有的地方都采用雇佣劳动制度。相反,纳入世界规模的积累过程往往是从一种‘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为另一种‘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sup>[26]</sup>这种似乎是“非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就是边缘地区的依附性资本主义。

## 没有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

阿明曾经批评弗兰克用拉丁美洲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其他地区(looking 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Latin American eyes)。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世界规模的扩张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拉丁美洲,正如弗兰克所说的,殖民征服者摧毁了当地人的社会组织,然后按照重商主义的逻辑重新建立殖民地社会。但资本主义扩张在其他地方,如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以及非洲,并没有采用同样的方式。这些地方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 and 生产方式没有像拉丁美洲那样彻底改变,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下来了。<sup>[27]</sup> 弗兰克在《世界性积累》的序言里的确说过,他的目的是要在亚非拉三大洲的范围内(on a tricontinental scale)阐述依附理论。然而,他的理论在后来被称为亚洲的地方,尤其是印度和中国,遇到一点小小的麻烦。在这里,至少就现代早期而言,除了先是被葡萄牙、然后是荷兰控制的所谓的东印度群岛之外,欧洲人既没有彻底改造当地的社会结构,也没有迫使它们成为依附于欧洲宗主国的边缘地区。实际发生的情况似乎恰好相反,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英国人刚到印度的时候表现得非常谦恭:“东印度公司最早的一名经理是以什么姿态对大莫卧儿作自我介绍的?‘草芥贱民约翰·罗素,忝为该公司的经理’竟毫不犹豫地‘伏地跪拜’。”与拉丁美洲和非洲建立在暴力(也就是非等价交换)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不同,在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如果中国人不愿意卖(比如说)瓷器给欧洲人,欧洲人丝毫没办法强迫中国人卖;同样,如果欧洲人不愿意买中国的瓷器,中国人也一样没辙。这看起来的确很像是李嘉图所说的那种各有比较优势且双方都愿打愿挨的

“自由贸易”。还有一个情况让弗兰克感到更难处理,这就是欧洲人长期以来在这里做的是赔本生意。还是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从罗马帝国到19世纪,惟有一种贸易的盈亏状况似乎一成不变,那就是欧洲对“东方”的贸易始终处于逆差地位。<sup>[28]</sup>这与拉丁美洲几乎是无代价地向欧洲提供贵金属的情况可谓判若云泥,适用于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在“东方”似乎没有用武之地。弗兰克在《世界性积累》一书里并没有对此作出什么与众不同的解释,而且没有因此影响他的整体性的依附理论。不过,如果我们说这里种下了后来长成为《白银资本》的根苗,恐怕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猜测。但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很难想像这个难题居然成为弗兰克后期理论的突破口。

就一个学者一生中可能发生的变化而言,弗兰克晚年的著作《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尤其是《白银资本》可谓当之无愧的“剧变”。《白银资本》的原文名称是 ReORIENT,表示在现实层面上的重新面向东方,以及理论层面上的重新调整方向;原文副标题是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意在强调上述两个方面的调整旨在论证一个反传统的观点:必须以亚洲而不是欧洲为中心再现从1400—1800年的现代早期世界经济,并且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五千年一以贯之的全球体系。这当然意味着彻底改写或者是企图改写现代早期世界历史,他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或者是否可以是一个成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我关心的是,为什么在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弗兰克新的全球体系里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而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布罗代尔却在不久之前声明:“就我个人而言,经过长期的尝试,我已决定不再驱逐(资本主义)这个讨厌的词。不用资本主义一词,从而逃避进行有关的讨论,我以为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讨论这个问题

具有一定的现实性。”<sup>[29]</sup>我相信在弗兰克的“剧变”中,政治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还是愿意把我的分析限制在所谓的学理层面。

弗兰克在谈到他的这部著作的抱负时曾经指出,《白银资本》并不是一部经济史著作,他的目的与其说是撰写一部现代早期的“世界史或经济史”,不如说是企图提供一个关于“现代早期经济史的全球视野”。在另一个地方,他又提到建立一个在立论基础方面与欧洲中心主义范式迥然不同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这样的尝试当然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但问题在于,弗兰克使用这些语汇的方式给人的感觉是,“经济史的全球视野”和“全球政治经济学”似乎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组。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弗兰克再一次提出他曾经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里使用过的三条腿的凳子的比喻:“这个全球整体同时依赖于生态/经济/技术一条腿,政治/军事力量一条腿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一条腿。”这似乎表明拟议中的“全球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多维度结构。但是,他紧接着就谦虚地表示:“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分,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sup>[30]</sup>这看起来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因为知识上不可逾越的限制使得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论述这样一个大题目时面面俱到。然而,这样的解释仅仅是“看起来合情合理”。很简单,缺少了后面两条腿,不仅无从设想所谓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而且根本不可能对现代世界(哪怕仅仅是经济方面)作出正确的解释。正如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不等于经济(不管是市场经济)一样,全球政治经济学既不可能是一种规范经济学,也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即不存在或排除非经济因素的)经济史。<sup>[31]</sup>弗兰克在年轻时确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其整个历史中

始终是高度垄断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和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暴力是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曾经断言:“社会科学必然是政治科学”。<sup>[32]</sup>几十年后,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思想道路时,弗兰克说:“就确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优先地位而言,我本人经历了从经济因素到社会因素,到政治因素,再回到经济因素。”<sup>[33]</sup>这里所谓的“经济因素”是指资本积累的竞争压力。晚年的弗兰克认为资本积累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而是贯穿五千年全球体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白银资本》用康德拉捷夫周期为分析工具描绘了一幅祥和的自我调节的全球市场经济的图景,亚洲的香料、拉丁美洲的贵金属和热带经济作物、非洲的黑奴都是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提供的商品,体系周期的A阶段和B阶段自动地决定着不同地区在体系中的临时性位置,这与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难道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布罗代尔是公认的当代杰出的经济史家,他对“经济”却持有—种不同的看法。在堪称“历史资本论”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布罗代尔指出,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其实等于承认,不听任何人指挥的市场是整个经济的动力装置。欧洲的发展,甚至世界的发展,无非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把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远近贸易纳入理性秩序,而所有这些贸易加在一起就趋向于创造一个有整体性的世界。交换通常同时促进供给和需求的产生,从而指导生产,带动广大经济区的专业化,使这些经济区从此休戚与共,为自己的生存进行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交换。”他认为,这种不存在“外来成分”,只有需求、成本和价格三者互相协调作用的市场经济纯粹是一种带有神学味道的精神虚构。相反,经济问题不能

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去提出,还应该从力量对比方面去提出,只要是存在着力量对比的地方,“供给”和“需求”就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因此,布罗代尔强调“我们必须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三者的结合部从事研究。”<sup>[34]</sup>其实,和年轻时的弗兰克相比较,布罗代尔对经济中的“非经济因素”的描述是相当温和的,因为他尽量避免作出道义谴责,也不直接介入政治斗争。那么,弗兰克之所以否认资本主义的存在,会不会和他把军事征服、政治统治、殖民扩张都排除在全球体系之外有关?看来是的。在1996年他还承认“霸权竞争”与资本积累、中心—边缘结构、周期性的起伏兴衰都是全球体系持久的特征,但在《白银资本》里,弗兰克却多次提到在现代早期的世界体系中寻找“霸权”乃是缘木求鱼。在结论性的最后一章里,再一次否认资本主义之后(在理论性的导论一章里已经否认过一次了),弗兰克紧接着在第六节《霸权?》里断言,欧洲的任何一部分都谈不上在世界上行使什么霸权,“16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或只有100万人口的小小葡萄牙,17世纪的小小的荷兰,甚至18世纪的‘大’不列颠,肯定都谈不上有什么霸权”,关于欧洲在现代世界的霸权的种种议论都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论”。<sup>[35]</sup>即使撇开政治因素不谈,考虑到弗兰克曾经是研究拉丁美洲(在那里就连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也不好意思否认欧洲的霸权)社会的专家,我们的确有点弄不明白他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惟一可能的线索大概就是所谓的亚洲。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这部论述全球体系的著作里,真正的轴心始终是欧洲与亚洲的关系:它们之间不均衡的商品贸易和贵金属流向,等等。弗兰克否认资本主义和霸权的存在,主要就是依据18或19世纪之前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关系。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弗兰克的依附理论把16世纪诞



生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作为不证自明的出发点,但他们(尤其是弗兰克)并没有着重考察它是怎样从欧洲的母亲腹中孕育和脱胎而出。布罗代尔虽然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向前推了几个世纪,也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他曾经说过,“理想的观察范围理应扩展到迄今以来世界上所有的市场”,但同时又觉得像波拉尼那样把古代巴比伦的所谓市场、今天特罗布里恩群岛原始人的交换渠道、中世纪和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市场笼统地放在一起说明,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故而仍然坚持“首先描绘欧洲,然后再描绘欧洲以外的地区”。<sup>[36]</sup>但是,布罗代尔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虑“亚洲”的资本主义。即使把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源一直推进到11世纪以后中世纪盛期欧洲经济的复苏,也无法让人相信欧洲人是白手起家单枪匹马地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相反,在他们之前,伊斯兰世界的鼎盛时期就已经存在“一种活跃和有效的资本主义”。从十字军东征以来,欧洲内部建立起南北方向的商业网络,同时在地中海地区与阿拉伯商人保持着既对抗又交易的关系,地中海以西的海上贸易属于基督教商人,而在地中海的另一边(丝绸之路和印度洋)则是穆斯林的天地。当时是穆斯林商人经营着一个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乃至中国的商业网络。在这个意义上,“伊斯兰的这一形象预示着欧洲未来商业演变的形象”。此外,布罗代尔承认,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是从伊斯兰世界学来汇票、合约(commenda)等现代商业生活的工具的:“总之,在西方资本主义中可能是从外部输入的东西,肯定来自伊斯兰。”<sup>[37]</sup>然而,我们能够想像穆斯林商人无中生有地发明了这些“现代商业生活的工具”吗?季羨林先生的《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证明,即使像蔗糖这样普通的食物也无法确定是哪一个国家的专利。<sup>[38]</sup>这样的认识本应使布罗代尔大大扩展自己的空间视野,更多地从不同文明的互动而不仅仅是

从更长的时间视野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可惜他没有这样做。除了难以克服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障碍,对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国语言、历史和社会知识的不足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但他至少应当在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时加以适当的限定,因为中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与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一样,是一种局部的地方性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一种类似于曾经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东西。在某些最基本的方面,它们与16世纪以后的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是阿布—卢格霍德,她显然受到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后殖民批评的影响,并且把它带进社会历史研究当中,只是她为了回避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讨论,宁可使用世界体系的语言。我们知道,在学术上,她的这部著作成为弗兰克转向的直接诱因。仔细阅读《在欧洲霸权之前:公元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可以发现,她所建构的中世纪世界体系直接得益于布罗代尔对非欧洲地区商业网络的描述,这个涵盖欧亚非大陆的体系分别以欧洲、阿拉伯世界、印度和中国为区域中心,由八个互相重叠的商业网络构成。伊斯兰世界从7世纪起统一了位于欧洲和中国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再加上活跃的海上和陆路贸易,为这个中世纪的世界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阿布—卢格霍德并没有特别偏重体系中的某一个地区,她认为参与中世纪体系的各方都从中得到好处,尽管这些好处的受益者很可能主要是各个地区的统治者。到14世纪下半叶,由于经济危机和蔓延于整个大陆的黑死病,使这个世界体系陷于解体,直到16世纪才重新建立起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阿布—卢格霍德想要说明的是,现代世界体系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恢复中世纪原有的体系。不同的是,在新

的世界体系中欧洲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霸权地位。我们注意到弗兰克在发展阿布—卢格霍德的世界体系的同时,改造(也可以说曲解)了她的一些重要观点。例如,阿布—卢格霍德本来认为中世纪的世界体系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衰落了,然后才有现代世界体系取而代之;弗兰克却把它改造成在现代早期的历史上,亚洲的衰落在先,欧洲的(暂时)胜出在后,这样就事实上为欧洲解除了殖民主义的责任。另一方面,阿布—卢格霍德认为,在中世纪的世界体系中不存在一个惟一的霸权,而且认为这同16世纪以后的现代世界体系形成鲜明对照。构成中世纪世界体系的纽带主要是对各方都有好处的商品交换,现代世界体系则是欧洲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重新建立的,欧洲的霸权保证了它对世界体系的统治并使之以损害其他地区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中世纪的世界体系和现代世界体系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体系,阿布—卢格霍德指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说明世界体系的特征并非一成不变,也没有一种把体系的各个部分组织在一起的惟一和固定的方式。”<sup>[39]</sup>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差别吗?事实上,即使是中世纪的世界体系也并非不存在霸权,阿布—卢格霍德只是说,同现代世界体系相比较,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惟我独尊的世界霸权,但当时确实存在着若干地区性霸权。为什么欧洲人不能进入印度洋,因为阿拉伯人控制着波斯湾和红海;为什么阿拉伯人不能控制欧洲大陆内部的贸易?因为意大利城市国家控制着地中海;为什么穿越内陆的丝绸之路不通了?因为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霸权崩溃了,等等。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不仅存在着一个惟一的霸权,而且这种霸权对于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纪世界体系里,很多地区都产生了局部的资本主义,不仅形

成相当规模的商业资本,也有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佛罗伦萨和佛兰德的纺织工业。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现代世界,“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sup>[40]</sup>但在任何时代,作为一种权力的货币、财富和资本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这里的问题还不是波拉尼所说的经济总是嵌入在某种社会文化体制之内,而是说资本只有同政治、法律、军事权力相结合才能行使其作为权力的作用。阿布—卢格霍德对佛兰德纺织工业衰落的分析很能说明问题。佛兰德的纺织品是中世纪西北欧与控制着北方非常需要的“东方”商品的南欧进行交换的拳头产品,它的原材料是来自英国产的优质羊毛。从纯粹经济关系来看,佛兰德与英国的关系是一种中心—边缘式的依附性关系,后者提供原材料,前者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但是,佛兰德非但不能在政治和军事上支配英国,英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地位反而使它能够“随意中止羊毛供应,并用来发展本国的毛纺织业,从而消灭以前由自己供养的竞争对手。”<sup>[41]</sup>这个事例表明,强大而独立的封建权力能够致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于死地,并将两者的依附关系颠倒过来。威尼斯凭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国家资本主义击败其竞争对手热那亚,终于在14到15世纪重新垄断了利凡特贸易(这在当时意味着欧洲与亚洲的所有贸易),成为地中海惟一的霸主。然而,威尼斯的霸权仍然不过是一种与地区性资本主义相匹配的地区性霸权。这是为什么?亚当·斯密不仅说过“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记载上最伟大的两个事件”;他还说过一句我以为也许是同样重要的话:“威尼斯虽与欧洲各地通商,但其舰队却几乎不曾出地中海一步。”<sup>[42]</sup>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迈出这决定命运的一步的是对威尼斯的财富垂涎三尺的伊比利亚领土国家。这究竟是如斯密和马克思所说的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断裂还是欧洲中心主义

的虚构？弗兰克引证的布劳特的话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那就是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既没有什么体现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新教伦理，更没有比其他地区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的确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我们不能忘记，热那亚不仅为西班牙提供了海军上将哥伦布，而且还有被威尼斯挤出地中海东部从而与利凡特贸易无缘的热那亚跨国资本。伊比利亚的专制君主和热那亚以及上德意志的跨国资本都不可能单独成就这样的世界性霸权，但它们之间的“野合”，即阿瑞吉所谓“保护成本的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of protection cost），却歪打正着地占据了世界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的制高点。<sup>[43]</sup>一旦跃上这个高度，就可以排他性地攫取、改造和规划世界市场，在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里组织原材料生产、制造品销售、转口贸易和社会成本的转移。如果没有同政治军事力量相结合，像这种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是可以想象的吗？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就是指资本权力与枪炮权力的某种组合形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了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建立、改造或消灭包括生产、贸易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垄断地位，以及从这个地位出发自上而下地建构全球等级制的能力。<sup>[44]</sup>当一种权力组合开始在世界范围建立起这种霸权的时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制度登上了历史舞台。15世纪末的事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划时代的。

资本的事业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它在美洲差点将本土居民一扫而光的时候，或者在非洲西海岸用甜酒、火枪和贝壳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购买奴隶的时候，在印度它却必须对王公贵族点头哈腰，而在中国连皇帝的面都见不着。但是，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如果说资本主义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始终具有某种基本品质的话，那就是久经考验的可塑性以及因地制宜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

力。关于现代早期中国长期对欧洲保持贸易顺差一事,我以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与欧洲在生产、贸易等方面谁较为先进谁较为落后;也不在于流入中国的白银是促进了生产,养活了更多的人口,还是进了贪官污吏的私囊。我不赞成弗兰克关于资本积累是五千年世界体系历史的基本动力的观点,但是在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事业已经启动的条件下,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谁在全球舞台上具有多种选择的余地,在多条战线上展开攻击的机动能力;其次,参与贸易的有关各方究竟是谁完成了资本的积累或扩大再生产。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就不难看出,尽管长期存在着贸易的不均衡,是欧洲而不是亚洲完成了资本积累。布罗代尔指出,在不能从政治和军事上征服亚洲的时候,欧洲利用了当地发达的生产能力和贸易网络,并且用白银撞开亚洲的大门,直到具备了足够的力量之后才进行最后的征服,彻底打破原有的平衡。这种解释只是部分是正确的。在这里布罗代尔犯了一个和弗兰克同样的错误(但弗兰克要严重得多),那就是笼统地使用“欧洲”一词。因为自从达·伽马以来能够直接与亚洲发生贸易关系的欧洲国家屈指可数。撇开参与亚洲内部的区域贸易不谈,即使是那些表面上亏损的远程贸易也仍然是特权国家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工业革命之前,霸权国家(至少就荷兰和英国而言)不仅是金融中心,而且是世界的货物集散中心。在资本积累的事业中,转口贸易功不可没。英国作家笛福在1728年写道:“必须了解荷兰人的真实面目,他们是贸易方面的中间人,欧洲的代理商和经纪人……他们买进是为了卖出,拿进来是为了送出去。在他们规模巨大的贸易中,最大的部分取于世界各地,再销往世界各地。”<sup>[45]</sup>笛福可以感到欣慰的是,英国没过多久就取代了荷兰的地位。不管在亚洲采购香料、丝绸、瓷器和棉布的是荷兰人还是英国人,他们肯定不

是为了自己消费,主要地也不是供本国人消费。由于距离遥远,供求双方互不见面,亚洲的商品运到欧洲后价格便翻数十倍、乃至上百倍。那些拥有巨额资本或巨额融资能力且从本国政府得到特许状和炮舰支持的商人和企业,就是利用巨大的差价大发横财的。有时候政府甚至规定,从亚洲进口的商品必须全部销往其他国家,不准本国人消费。英国政府就曾禁止英国人穿印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本国)生产的印花棉布。当然,这种生意毕竟不是十全十美,因此才有在条件具备之后摧毁印度棉纺织工业和向中国输出鸦片之举。此外,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世界体系理论家一样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性变革的意义。

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霍布森、卢森堡、列宁、熊彼得的帝国主义理论只涉及经济和政治。我在本书提出的理论是,文化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角色。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经济及政治机器相辅相成,把殖民地纳入世界市场的全球性资本积累是得到了文化的支持的,欧洲中心主义文化是给帝国主义颁发的意识形态许可证。欧洲宗主国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先锋艺术运动都渗透着欧洲中心主义。”<sup>[46]</sup> 19世纪是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主义急剧膨胀的时代,犹如空气中的灰尘,渗透了所有欧洲人的思想、感觉和语言。马克思本人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也不例外,我们只要想一想第二国际甚至曾经把所谓的“社会殖民主义”列为国际大会讨论的议题,就可以对那个时代文化氛围中的帝国主义气息有所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清算还远远没有完成。弗兰克对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绝不是无中生有的空穴来风。问题在于,这样的批评必须紧紧抓住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全球性帝国主义征服和殖民扩张以及作为文化

现代性的欧洲中心主义之间错综复杂而又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把欧洲中心主义视为惟一的问题,让其他问题都化为乌有,甚至连资本主义本身也成了文化的虚构。正确的关系应当反过来:离开资本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本之木。70年代以来的后殖民批评在清算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殖民话语和文化帝国主义方面作出了无可否认的重要贡献。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批判,它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与政治经济批判相脱节甚至背道而驰的倾向。在清算了教条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之后,文化研究有待于重新找到与政治经济批判的接合部。在肯定弗兰克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的同时,我不能同意他把政治经济批判本身变成一种文化批判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可能说明现代世界不公正的症结所在,而弗兰克在几十年前开始他的学术生涯时要做的正是这件事。

和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给人的锋芒毕露气势磅礴的印象相反,我认为他在晚年陷入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早期的弗兰克和阿明一样主张第三世界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从宗主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加的依附性资本主义的欠发达状态中解放出来,走一条独立的公正的发展道路。从80年代以后,伴随着对社会主义的幻灭感,他认为“脱钩”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方面,他清楚地意识到,“一种现实的前景是,许多国家、地区和人民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被边缘化的威胁;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非自愿地身不由己地与世界发展进程相脱钩。然而他们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脱钩的。这正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大部分非洲地区的命运。世界市场上的国际劳动分工已经越来越不需要非洲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了。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像柠檬一样被榨干之后,绝大多数非洲人的死活只能听天由命了。”<sup>[47]</sup>那么,这些地区的人民该怎么办呢?弗兰克以前的朋友批评他的新理论



是“披着红色外衣的自由主义”，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白银资本》预言东方将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即使这个预言能够成为现实（该书出版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正如火如荼），还有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呢，他们是不是理应被榨干之后再被扔掉呢？从上面的引文可以明显感受到弗兰克的悲愤，但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承认，平等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而不平等才是全球体系赖以发展的动力。因为全球发展从来不是齐头并进的，总是有一些人和地区处于中心的支配地位，另一些人和地区处于依附性的边缘地位。一个特定的国家、地区、部门、群体或个人的发展“政策”必须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他能够向被边缘化的人们提供的发展政策方面的建议无非是，在国际劳动分工中找到一个或几个适当的领域，争取占据一个至少暂时能够享有比较优势的位置，这样就能在一定时间内从国际劳动分工中得到相应的好处。那些坐以待毙的非洲人听了这个建议会不会啼笑皆非呢？

我在上文说过本文不打算深入讨论“生产范式”和“流通范式”之间的争论，但我确实认为“流通范式”严重低估了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构造现代世界历史方面的作用。弗兰克将资本积累视为五千年世界体系的基本动力，不过是把这种非历史化倾向推到了极端，在很大程度上沃勒斯坦、布罗代尔、阿瑞吉等世界体系理论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只能留待另一篇文章来专门讨论了。

###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2] 在他的思想自传《发展的欠发达》里，弗兰克说，他之所以选择拉丁

美洲,主要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非洲人”。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就不想作一个人类学家那样的外国观察者,而是要成为第三世界的“本地人”。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中是非常少见的。参见 Sing C. Chew & Robert A. Denmark, eds.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r of Andre Gunder Frank*, Sage Publications, 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 1996, pp. 22 - 3。

[3] 弗兰克是在 1963 年底发表的“Destroy Capitalism, not Feudalism”一文里第一次提出他的基本观点的。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弗兰克的第二本论文集里: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pp. 350 - 361。

[4] 这些论文以及他给美国的一些朋友写的一封 12 页的长信,成为美国政府在长达 15 年的时间里禁止弗兰克入境的意识形态理由和法律依据。1968 年他从巴黎返回智利时在圣地亚哥机场被拘捕。一个把“社会学”和“社会主义”视为一回事的警察头目,向弗兰克显示了足有一英尺厚的他从事颠覆活动的材料,然后把他押送到机场,等待下一班飞机驱逐出境。只是由于当时的参院议长阿连德出面干预,才使他能够继续留在智利。参见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pp. 27 - 8. 30。

[5] A. G. Frank,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p. 4.

[6] A. G.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p. 9.

[7] S. C. Chew and R. Denmark, eds.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p. 29.

[8] A. G.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pp. 17 - 8.

[9] 参见弗兰克的《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的第五章,《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译林出版社 1999 年版。 *Critique and Anti-Critique: Essays on Dependence and Reformism*, The Macmillan Press, 1984, pp. 91 - 94.

[10] 马克思不仅承认商业资本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更早,而且认为商业资本能够适应各种生产方式进行积累,而不管商品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4页。

[11] E.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77, p. 40. 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后,拉克劳流亡英国,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这是与本文无关的另一个问题。

[12]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p. 39.

[13] 拉克劳与弗兰克的争论是50年代多布和斯威齐就资本主义的起源展开的争论的继续。

在这两次争论中,前者代表“生产范式”,后者代表“流通范式”。布伦纳在70年代末发表长文,从“生产范式”出发批判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的“新斯密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布罗代尔可以说是当代“流通范式”的代表人物。关于东欧的二期农奴制,布罗代尔认为它不过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一种变态”,是为“一个国际系统服务的垄断性经济,而这个国际系统毫无疑问带有强烈的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同东欧二期农奴制下的庄园相比,美洲种植园更不折不扣是资本主义的直接产物”。参见《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78—82页。近年来追随布罗代尔的阿瑞吉曾经坚持“生产范式”的优先性,现在则认为两种范式“是互相补充的课题,而不是互相替代的课题”。参见《漫长的20世纪》,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萨米尔·阿明虽然与世界体系理论关系密切,但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更为接近马克思。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

[15]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79页。

[16]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118页。

[17]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73页。

[18]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76—277页。

[19]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 281--282 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81 页。

[21]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 288、293 页。

[22] 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书店 1993 年版,第 54 页。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独特的理解。

[23] 沃勒斯坦认为“按马克思论点的字面理解,拉克劳是对的,但他不是按其精神来理解”,至于说拉丁美洲参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起到“突出和巩固封建主义”的作用,更是把问题搞混了,因为正如东欧的二期农奴制一样,参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产生的拉丁美洲封建主义是一种“新变种”的封建主义。参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5—126 页。

[24] 大概是由于美国政府仍然禁止弗兰克入境,所以皮诺切特把他软禁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伦不类地将弗兰克流放到自己的出生地德国去了。他在德国待了五年,企图在大学里谋个教职。直到 1978 年,当时的德国文化部长对一位打算聘请弗兰克的大学校长说,“这个弗兰克决不可能在这里得到教授职位”,他才死了心,到欧洲其他国家流浪去了,几年后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任发展经济学教授。

[25] A. G. Frank, *World Accumulation: 1492 - 1789*, The Macmillan Press, London, 1978, p. 241.

[26] Frank, *World Accumulation: 1492 - 1789*, pp. 250 - 251.

[27] 参见 S. Amin, “On Development”, in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p. 63.

[28] 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2 卷,第 223、208 页。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看法,欧洲一向就认为中国和印度是白银的终极秘窖,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也有所反映。

[29] 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2 卷,第 234 页。在这里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是第二位的问题,因为弗兰克建议“我

们应当大胆地抛弃作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参见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p. 44.

[30] 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7、451—452页。在弗兰克访问北京期间,我曾问他是否打算把其他几条腿补上,他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表示他很怀疑政治、军事、文化等因素是否具有可以同经济相比较的作用。

[31] 关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的区别以及波拉尼和布罗代尔这样的学者是经济史家还是政治经济学家,参见汪晖在《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一文所做的分析。我感谢汪晖让我使用他的手稿。这篇文章已经发表在《天涯》2000年第5期。

[32]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p. xviii.

[33]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p. 46. 这似乎解释了弗兰克在北京期间说的一句奇怪的话: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弗兰克说他觉得自己成了惟一的唯物主义者。

[34]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227—30、171、2页。

[35] 弗兰克:《白银资本》,第441—442页。

[36]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2—4页。

[37]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614—619页。

[38] 季羨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39] Janet L. Abu - 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 - 1350*,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6.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6页。

[41] Janet L. Abu - 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 - 1350*, p. 96. 当然,影响佛兰德纺织工业的并不仅仅是英国的羊

毛禁运,还包括黑死病以及意大利资本的介入。

[4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41页。

[43] 阿瑞吉认为“保护成本的外部化”只是第一个体系性资本积累周期(热那亚周期)的特点,从第二周期(荷兰周期)才开始“保护成本的内部化”,但仍然保留了“生产成本外部化”的特点,从第三周期(英国周期)开始实现“生产成本的内部化”。参见《漫长的20世纪》。从历史上看,除了西班牙与热那亚资本的“野合”形式外,主要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式的集公司、军队和政府为一身的形式、英国所代表的以民族国家为基地的殖民帝国的形式、德国和日本等后起国家的军国主义形式以及美国统帅的超帝国主义形式。

[44] 当然,仅仅是资本权力和枪炮权力的结合还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内在的统一性。比这种结合更为重要的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开始遵循同一种逻辑。按照资本的逻辑使用政治军事权力是资本成为“主义,即成为世界性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这种内在的统一性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离开一方而想像另一方的存在,尽管,它们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不过,我在这里没有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出严格的区分。但有些学者认为这样的区分是必要的。参见 H. Magdoff, *Imperialism: From the Colonial Ag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pp. 117 - 48。

[45] 引自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第132页。

[46]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p. 221 - 2. 还可参见赛义德的《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赛义德自选集》以及罗钢和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后两本书都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47]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pp. 45 - 61.

## 读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兼论 21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问题

李民骐

今年冬季(1 月份)给本科生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们这里是经济学 305。给学生安排的教材有罗伯特·塔克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读本》、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和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沃勒斯坦的学说,以前并没有研读过。这次借给学生上课的机会,略微有了一些了解。受沃氏的启发,联系世纪之交世界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大势,兴之所至,将有些原来思索过的问题,略作整理,权充读后感一篇。

### 长周期:无产阶级化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极限

在黑格尔看来,拿破仑在耶拿战役的胜利,既象征着法国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绝对理性的实现。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只是人类社会的“前史”结束之前所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它是一定历史条件(“生产力”)的产物,因而也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存在,并且必将为变化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所超越、所摒弃。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怎样为自己的灭亡准备了条件呢?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资产阶级又是怎样度过这些危机呢?一方面是被迫摧毁大批的生产

力；另一方面是通过征服新的市场和更彻底地剥削旧的市场，也就是说，通过为更全面的、更有毁灭性的危机扫清道路，和通过减少防止危机的手段。”

另一条线索是现代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存在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长；而资本的前提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以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是其不自觉的促进者），消灭了由于竞争而形成的劳动者的孤立状态，而代之以集中起来的劳动者的革命结合。所以现代工业的发展从资产阶级的脚下破坏了它的生产和占有的基础。因而资产阶级所产生的，归根结底，是它自己的掘墓人。”

从今天的观点看，一个经验事实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灭亡，也就是说，它通过在其自身范围内的调整度过了到目前为止发生过的所有的危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过是与一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是否有证据可以说明，危机不仅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断自我调节的手段，而且在每一次危机一调节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某种长期趋势，指向“更全面的、更有毁灭性的危机”和日益减少的“防止危机的手段”？这个问题，显然只有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才能回答。

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分析的最小时间单元是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世界经济长波的形成机制是世界供给和世界需求的矛盾运动。世界供给是无数个经济个体在市场规律的驱动下分散决策的结果。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市场交换和为交换价值生产占统治地位，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追求无限制的资本积累是个体资本的一个基本趋势。因此，只



要扩大生产与不扩大生产相比仍然有利可图(或者损失较小),生产就有无限扩大的趋势。

另一方面,世界需求是由一定社会过程所决定的收入分配的“函数”。世界供给是由价值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所决定的,而世界需求却取决于在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反映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阶级斗争的进程在一定时期告一段落时,对立的阶级之间暂时达成一定的“妥协”。这个“妥协”往往通过制度、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在未来的一个时期(一般为几十年)保持相对的稳定。

比如,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斗争的高涨以后,在战后出现了所谓“资本—劳动谅解”的局面。在大公司和主要工会之间达成了如下的妥协:大公司保留在管理和投资决策方面的特权,工会努力维护劳动场所的纪律和促进生产率提高。作为回报,公司方面保证工人工资与生产率同步增长,并给予工人一定的就业保障。另外,也是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开始为失业工人提供救济,“福利国家”开始形成。1946年国会通过了《就业法》,规定政府有义务运用公共开支等手段提高就业水平,维持宏观经济稳定。

由资本—劳动之间的暂时妥协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格局,决定着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进而决定着社会消费的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它有相对“固定”的特点。然而,世界供给却有无限扩张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协调世界供给与世界需求。其结果,就是世界供给的增长不断地有超过世界需求的生长的趋势(参见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第十章,可以证明,如果积累占剩余价值的比重和资本有机构成都趋于上升,则资本主义经济消费品部门的生产能力的增长有不断

超过消费品需求的增长的趋势)。随着需求增长越来越落后于供给增长,利润率趋于下降,世界经济进入下降或相对停滞的阶段。在下降阶段中,世界范围的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进一步萎缩,萎缩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世界范围的价格总水平发生“崩溃”,以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式强制解决现有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矛盾。

需要说明的是,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从来是不承认市场经济的内在运动会导致经济危机的。惟一的例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二三十年时间,“凯恩斯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主流经济学承认市场经济是“不稳定”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其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次繁荣。无论就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结构,一般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等方面来说,其纪录都是空前绝后(“空前”是一个经验事实,为什么是“绝后”下面再说明),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时期”。如果说,19世纪的主流经济学无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反映了上升中的世界资产阶级的自信。那么,20世纪晚期对自由市场迷信的全面回潮毋宁说是世界资产阶级在步入老年之后的讳疾忌医。

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原有的阶级力量对比,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要求对世界经济的剩余进行再分配,将其中一部分分配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这样一种再分配,使世界范围的收入分配得到“改善”(在政治的和经济的双重意义上),提高了绝大多数人口的消费水平,使世界总需求再次超过世界总供给,从而启动新一轮的长波。

在沃勒斯坦看来,在启动新一轮长波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化——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按照雇佣劳动的方式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生产过程——起着—一个特殊的和关键的作用。这里首先要

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从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观点来看是最优的?从世界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通过使绝大多数劳动人口支配和使用数量庞大的货币购买力,有利于形成一个广大的“国内市场”,进而有利于使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得到“实现”(即使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

但是,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不仅有利于剩余价值的实现,同时又使劳动者能够有实力迫使资本让出一部分、乃至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下,劳动者一方的“谈判实力”大大超过了其在其他组织形式下(如在半无产阶级的、“准封建”的,奴隶制的或其他强制性劳动的组织形式下)所能达到的水平。因此,从个别资本家的观点看,或者说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观点看,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不仅不是最有利的,反而是最昂贵的、“成本”最高的。

这种“成本”是两方面的:一是直接的、“静态”的“成本”,二是长远的、“动态”的“成本”。半无产阶级或“准封建”的组织形式通常比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更便宜,因为在半无产阶级或“准封建”的组织形式下,劳动者的相当一部分必需品是由劳动者及其家庭自己生产的。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是在商品、货币循环之外进行的,对于资本家来说,就不发生货币成本,资本家支付的“劳动力价值”因而只需要偿付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一小部分。这是外围、半外围国家大多数劳动者货币工资惊人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在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下,货币工资或“劳动力价值”必须能够偿付工人生活必需品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这一差别,是在将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与半无产阶级的、“准封建”的组织形式做“静态”比较时总是存在的,

并且是在两种组织形式相转换时直接发生的,因而是直接的、“静态”的“成本”。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还有长远的、“动态”的含义。这个含义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命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就与《共产党宣言》在论证“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相对的性质时的第二条线索——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联系起来。《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完全是以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只有工人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大于维持工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才能够有剩余价值,这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事实。或者用比较接近主流经济学的语言说,给定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一定的产品价格,工资必须低到一定点以下,利润率才能大于零。可以想像,如果劳动者之间不存在竞争,而资本家之间存在竞争,利润率必然被压低至零。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刚刚代替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时,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原子式”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工资普遍压低到一定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存”水平上。

但是,《共产党宣言》又指出,恰恰是“工业的发展”消灭了“由于竞争而形成的劳动者的孤立状态,而代之以集中起来的劳动者的革命结合”。《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雄辩地论证了在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下,现代无产阶级为什么必然具有以前一切劳动者阶级都不敢望其项背的强大的向统治阶级挑战的力量。这种力量最终会成长到颠覆整个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的地步,从而使现代无产阶级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共产党宣言》的论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本身要求对劳动者集中使用,从而为无产阶级的组织

创造了便利的条件。第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进步,包括通信、交通手段的飞跃进步,因而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第三,资产阶级自身在上升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的过程中不得不把广大的下层劳动者群众,包括无产阶级,投入到政治运动中,使他们受到“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熏陶,因而使广大无产阶级有了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能力。

现代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有工会和政党,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社会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在社会的“正常”条件下,群众性的“反体制”运动大规模地、有组织地存在的情况。被剥削阶级在社会的“正常”条件下,即能够迫使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其利益,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工会的存在消灭了劳动者在局部(在工作场所)范围内的竞争。工人阶级政党(在20世纪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利用代议制民主政治(本身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产物)将国家(至少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从“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物的委员会”变成了一定时期阶级斗争的暂时妥协在政治上、法律上的体现。在代议制民主政治条件下,即使在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范围内,国家的政治行为也很难不与资本利益发生冲突。通过发展福利国家,为失业工人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和迫使国家以管理总需求的形式维持高就业水平,工人阶级参与国家政治逐步消除了劳动者在社会范围内的竞争。劳动者之间竞争消除的结果,是资产阶级被迫让出剩余价值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利润率因而向下运动趋近于零。战后初期(1945—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规律(下面再加以说明)。

所以,从个别资本家的观点看,从剩余价值生产最大化的观点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劳动

力采取半无产阶级的、“准封建”的或其他非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但是,从整个世界资产阶级的观点看,从剩余价值实现的观点看,在半无产阶级的或“准封建”的组织形式下,相当一部分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在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循环之外进行的,劳动者所需要的必需品的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为交换价值的生产来满足的,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国内市场”。如前所述,在世界经济长波下降波的最后阶段,世界供给与世界需求之间的矛盾被迫以危机形式强制解决。重新启动新一轮长波,要求世界需求的增长再次超过世界供给的增长,因而要求对原有的收入分配和阶级结构做重大调整。而要突破原来的狭隘的“国内市场”,就必须使大批的劳动力无产阶级化,即以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代替半无产阶级的、“准封建”的组织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变化,从长远来说,将彻底破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础。因为,第一,在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下,劳动者的组织能力和向统治阶级挑战的能力都大大加强了,并且在长远有能力迫使资本让出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使利润率向下运动趋近于零。第二,每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在迫使各个民族国家实行收入再分配和剩余价值再分配的同时,也产生了进行再分配所必需的制度和法律结构。这些制度和法律结构,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不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的结果,而越来越取决于各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收入分配,因而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为了再分配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和法律结构因而成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要求更大的剩余份额的斗争武器。

如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个在地理上有固定范围的体系,那么世界资本积累的极限很可能很早就达到了。但是,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自产生以来一直是不断扩张的。在每次世界经济长波由下降阶段到上升阶段过渡时,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无产阶级化和剩余价值再分配扩大了“国内市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地理上的扩张将外围地区大批新的劳动力纳入世界市场体系。这些外围地区的劳动力,由于是按半无产阶级的、“准封建”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能够生产大量的剩余价值。只要扩张的规模足够大,如此增加的剩余价值就足以弥补在中心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化和剩余价值再分配而失去的剩余价值,因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范围内,剩余价值总量没有减少,利润率恢复到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外围地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通过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分工体系转移到中心地区,使中心地区得以同时维持高工资和强劲的资金积累。

这就是第二国际中修正主义派(伯恩斯坦)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的宏观历史背景。在19世纪末至1913年这一轮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波中,一方面是中心地区各主要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工人贵族化”——即剩余价值再分配,从而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需求方面的动力;另一方面,是资本输出的高潮(即“全球化”)和“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完全殖民化,中国完全半殖民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地理上达到了其可能达到的最大边界——全球。

1914—194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遭遇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世界供给和世界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最终只有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大萧条而得到强制解决。危机改变了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阶级力量对比,要求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形成新的妥协格局。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

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发生了如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中心地区国家无产阶级的进一步“工人贵族化”（福利国家的发展）；中心地区国家的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完成（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完成了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转移）；外围、半外围地区国家的劳动力的相当一部分实现了无产阶级化（主要是在半外围地区，如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在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在数量上大大增加了的和在政治上、经济上有效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有能力逐步地缩小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在世界资产阶级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地理上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在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所丧失的剩余价值不能够通过世界体系的扩张得到补偿，其结果，是整个世界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剩余价值总量的减少和世界范围的利润率下降（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体现便是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60年代危机”）。

## 世界历史的转折：21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问题 和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在人类步入 21 世纪之际，我们很可能处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扩张到历史性衰落的转折点上。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刻，毛泽东曾经豪迈的宣布：“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那时，距中国革命的胜利仅两年之遥。现在，我们或许已



经处于这样一个时刻——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终结已经为时不远了。这不是黑格尔、福山等人所说的“历史的终结”，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前史”的终结。

1945年开始的世界经济长波，具有与以前历次世界经济长波根本不同的特点。在1945—1966年的长波上升期，世界范围的和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是趋于“恶化”，而是趋于“改善”。1966年以后开始的世界范围的利润率下降，不是如以往那样，由于世界供给的增长大大超过世界需求的增长，而是由于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地理扩张达到尽头 的情况下，迫使世界资产阶级让出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标志着，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虽然还没有达到它在技术上的极限（全世界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但是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它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极限。就是说，世界范围的“产业后备军”——尚未无产阶级化的半无产阶级和“准封建”的劳动力，其规模已经不足以束缚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占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的能 力。

自1966—1973年开始的世界经济长波的下降波中，世界范围的和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是趋于“改善”，而是趋于“恶化”。要恢复利润率，从而恢复资本积累的基础，就必须打破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重新建立劳动者在世界范围和在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原子式”的竞争。为了重建劳动者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就必须实行“全球化”，特别是实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为了重建劳动者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竞争，就必须削减福利国家，乃至一般性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收入分配从一个政治问题重新变成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同时，还必须或者以公开失业的形式（如欧洲），或者以大批从事低工资工作的

劳动力的形式(如美国),重建国内产业后备军。而要在整个世界经济范围内重建产业后备军,就必须摧毁半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使其中相当一部分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半无产阶级。自198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半外围国家再外围化的历史。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宣告了拉丁美洲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终结。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宣告了有七十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终结。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结束了所谓的东亚经济奇迹。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骤,将有可能证明是中国经济奇迹结束的开始。

说到收入分配,有必要澄清在中国知识界的论战中产生出来的几个问题。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论战中制造了两个神话。第一个神话,是说中国目前的贫富悬殊的问题,主要不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而是由于权力干预市场、权力导致腐败造成的。也就是说,是腐败,而不是市场要为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状况负责。腐败自然是要反的,试问当今之世界,哪一种政治力量,从左到右,从自由到保守,从法西斯主义到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从极端民族主义到和平主义、环境保护主义,敢说自己不反腐败,不以反腐败相标榜呢?世界上有多少以腐败下台的政治家,当初不是打着反腐败的旗号上台的呢?眼前就有埃斯特拉达这么一个例子。但是,撇开腐败问题不论,自由派的这个神话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在经验上站不住脚,原因很简单,世界上有的是“基尼系数”与中国相当或者比中国更高的市场经济国家。据《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是40.3,巴西是60.0,智利是56.5,马来西亚是48.5,墨西哥是53.7,新西兰是43.9,尼日利亚是50.6,菲律宾是46.2,俄罗斯是48.7,南非是59.3,泰国是41.4,土耳其是41.5,美国是40.8。中

国的收入分配程度,以“基尼系数”衡量,在世界上也只能算是中等。这并不是为中国现有的贫富差距做辩护,而是说,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一些公认的比中国“规范”得多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既然市场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且不论世界市场在各个民族国家之间造成的不平等),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仅仅是或主要是腐败造成的,而与市场无关或关系很少呢?自由派的这个神话,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腐败,归根结底只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收入再分配有关,而与国民收入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无关。换句话说,腐败或许能解释精英集团中的某些个人为什么收入如此之高、积聚了如此大量的财富,但是,腐败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有上亿的打工者为了极其低廉的工资,在极其恶劣的、没有安全保障的工作条件下,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及忍受种种侮辱和非人的待遇。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第二个神话,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正的标准不应当是结果平等,而应当是机会平等。这种观点认为,只要实现了机会平等,比如给全国所有公民发一张价值相等的私有化证券,那么中国的工农群众就会从此安分守己,再不会因为失业而上街闹事,或者因为对老板不满而破坏机器,或者要求不切实际的高工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迂腐,由此可见一斑。问题从来不在于什么抽象的、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机会平等”或“结果平等”。而且,怎么定义“机会平等”呢?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不也是为了机会平等吗?在一切阶级社会中,所谓的“公正”只能是这样一种“公正”,即“统治者能够照旧统治下去,人民能够照旧生活下去”。具体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所

谓的“公正”无非是指,与稳定的、保持一定速度的资本积累相适应的收入分配结构。而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国家的大规模的干预,甚至不经过相当规模的阶级斗争,仅凭资本主义市场自身的运行,是无法保持这样一种收入分配结构的。

自1980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收入分配结构,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都趋于恶化。这种恶化的直接结果,是世界需求的萎缩,和世界需求与世界供给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世界需求与世界供给之间的矛盾目前直接表现在两个不可持续的趋势上。第一个不可持续的趋势,是美国的持续的并且日益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自1983年以来,美国每年对外都发生经常账户赤字。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有逐年扩大的趋势,目前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是世界需求趋于萎缩的反映。由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相对或绝对贫困化,大众消费趋于萎缩,美国充当着世界市场“最后的消费者”的作用。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勉强弥补着世界供给和世界需求之间的缺口,使世界经济免于崩溃。但是,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必须通过外国资本不断流入美国来平衡,而外国资本流入美国,是因为受到美国急剧膨胀的资产市场的吸引。一旦美国的资产市场泡沫破裂,资产价格暴跌,导致资本外逃,美元必然大幅度贬值。那样,美国便无力继续对外维持经常账户赤字,世界供给大于世界需求的矛盾也就无从得到缓解了。

第二个不可持续的趋势是主要中心地区国家的实际利率普遍高于GDP增长率。据OECD资料,西方七大国平均的实际长期利率(十年期政府债券利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之差)与GDP增长率之比,1881—1913年为0.97,1919—1939年为2.40,1946—1958年为0.36,1959—1970年为0.55,1971—1982年为0.18,1983—1994

年为 1.83。可见,实际利率高于 GDP 增长率的情况只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 1983 年以后才出现过。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在“全球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国中央银行为了防止资本外逃,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吸引资本在本国停留;另一方面,是由于居于霸权地位的中心国家——美国——为了平衡其经常账户赤字,不得不以高利率吸引外国资本,进而迫使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实际利率高于 GDP 增长率,其潜在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意味着债务增长速度超过收入增长速度,从而公私债务占 GDP 的比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其最终结果将是企业、居民部门不堪债务重负,普遍破产,引发全面经济危机。

像以往一样,目前的世界供给和世界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将不得不以“崩溃”和危机的形式得到强制解决。危机的作用,在于打破原有的阶级力量平衡。在危机的情况下,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秩序相联系的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将难以为继。各国政府,包括中心地区国家的政府,将不得不重新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这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为了恢复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必须扭转过去 20 年来收入分配格局恶化的趋势,重新实行对各劳动阶级有利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同时增加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这些都是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社会民主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足以在短期稳定世界经济形势。但是,在长期,所有的中心地区国家和无产阶级化达到相当程度的半外围地区国家都将不得不重新面对与 20 世纪 60 年代同样的困境。非“全球化”和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将会限制乃至消除劳动者在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收入再分配政策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则将使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再度政治化,同时会减少乃至消除劳动者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竞争。其结果,将是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

政治上再度有效地组织起来,通过代议制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干预,从而扩大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而缩小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也就是说,导致利润率下降和资本积累的火焰熄灭!出路何在呢?

在探讨矛盾的解决办法之前,先研究一下,在世界历史的大转折,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在中国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派的论战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即中国是否已经建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我们撇开各种学究式的争论(如单纯凭国家在各种经济指标,比如产出、投资、就业中所占的份额,来判定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不谈,也撇开意识形态的偏见,而关注于中国实际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是过去二十年中世界上资本积累最强劲的国家。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常年保持在35%—40%(基本上是世界第一),GDP年平均增长率达9%(也是世界第一),90年代中后期平均每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约400亿美元(连续多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第二位),自1994年以来常年保持巨额经常账户顺差(在统计上即意味着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可以说,中国是20世纪晚期世界上新兴的半外围强国。

在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方面,中国社会在过去二十年中最重大、最有深远意义的变化,不是什么“市民社会”的形成,更不是什么“中产阶级”的增长,而是中国社会劳动力的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即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常年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为生。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城镇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从1980年的24.8%上升到1998年的29.6%,同期非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31.3%上升到50.2%。中国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

影响。因为,如《共产党宣言》所论证的那样,也是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所证明的,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力和争取占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的的能力是远非其他形式的劳动阶级所能相比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资本积累的社会基础,在城市是掌握国家机器和国有资本的政治精英与国有企业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主义”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联盟;在农村则是“耕者有其田”的小农制度。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可以保持资本积累所必需的政治和经济稳定。政治上,相对“工人贵族化”的、人数相对众多的国有企业工人阶级起着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作用,防止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也防止着在各下层阶级之间结成广泛的反对政治精英的联盟。在经济上,通过允许国有企业工人阶级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和农民的不断无产阶级化(乡镇企业的发展),能够保持大众消费和社会需求稳步增长,从而为资本积累解除了需求方面的“瓶颈”。如果这样一种格局能够保持下去,中国是有可能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框架内完成全社会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并进而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的。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上,一个半外围国家上升为新的中心国家,总是伴随着大片原外围地区上升为新的半外围国家。比如,美国上升为中心国家的过程伴随着拉丁美洲各大国(墨西哥、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上升为半外围国家的过程。日本上升为中心国家伴随着“东亚四小龙”和东南亚各国上升为半外围国家的过程。这是因为,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来说,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半无产阶级和“准封建”的劳动力起着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所有无产阶级的产业后备军的作用,而在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范围内,则是半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直接充当着中心地区无产阶级的产业后备军。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半外围地区无产阶级的存

在,抑制着中心地区无产阶级争取占有剩余价值的的能力,才使中心地区资本的利润率不至于向下运动趋近于零。当然,随着半外围地区无产阶级规模的扩张和组织能力的提高,半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也有能力争取占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不再有效地充当中心地区的产业后备军,这时,中心地区资本的利润率下降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作为半外围国家的兴起,发生在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五百年的扩张史已越过顶点而转入历史性衰落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任何一片广大的地区可以充当中国的“后院”或“殖民地”。换言之,中国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国家的前途作为一种历史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这种历史现实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中国的政治精英自1992年以来受到来自中心地区国家的统治阶级和其自身内部的巨大压力,要它放弃“社会主义”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而代之以自由化—全球化的战略。自由化—全球化战略的实质,是试图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另一方面通过商品、劳务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将中国目前的半外围的地位固定下来。这一战略,在国际上,要求中国的政治精英接受现有的中心地区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在国内,要求中国的政治精英放弃其与国有企业工人阶级自1949年革命以来所形成的“社会主义”一进口替代工业化联盟,转而与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管理精英)结成新的“自由化—全球化”联盟。

自由化—全球化战略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不稳定的。在政治上,城市中产阶级是一个在人数上远远小于国有企业工人阶级的集团,无力防止社会两极分化,也不能在社会的上、下层之间发挥有效的平衡作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在曾经进行过



社会主义革命各个国家中,恐怕是惟——一个革命的合法性在广大下层工农群众中从来没有丧失的国家。在经济上,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商品、劳务和资本市场的开放,意味着收入分配格局的全面恶化。其中,与农业相关的各市场的开放,有可能动摇 1949 年以来确立的“耕者有其田”的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收入分配方面的两极分化意味着狭隘的国内市场 and 日益严重的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这种困难,只有通过世界市场的扩张来克服。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未来二十年的前途不是扩张,而是崩溃、危机。

在短期,只要能够避免自由化—全球化的战略,而采用社会民主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即实行对下层劳动群众有利的收入再分配和加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中国的资本积累就可以开始新的(但是也可能是最后的)一轮大发展,直至中国社会完全无产阶级化。这时,中国也会面临各中心地区国家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即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资本利润率下降和资本积累趋于停滞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为新的无阶级社会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准备物质上的条件。在完成了这个使命之后,资本主义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马克思并且预言,代替资本主义的将是一个为了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的生产的社会。在这个新的社会中,社会将自觉地按照统一的计划在社会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社会劳动,也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在柏林墙倒塌和“历史终结”之际,世界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曾经广泛宣传,说马克思所主张的计划经济已经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地尝试过并且以失败告终。现在看起来,柏林墙的倒塌在世界历史上只占有一个很不显著的,并且是悲剧性的位置。

无论在苏联、东欧,还是在中国,计划经济都从来没有在技术意义上失败过,即出现了技术上无法挽回的崩溃和混乱。直到柏林墙倒塌那一年(1989年),苏联和大部分东欧国家仍然保持着经济正增长,连严格意义上的衰退都谈不上,何来崩溃?在这些国家,计划经济都是根据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集团的政治决定而被“改革”掉的。所谓计划经济的“失败”,只不过是下面这个意义上,即各计划经济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在经济、军事方面的竞争落了下风,因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框架内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但是,彼一时,此一时,在21世纪的上半叶,我们即将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范围内提高竞争力和争取“发展”,而是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性衰落,当着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经准备好了的物质基础上建设新的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如果能够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民主代替其官僚制度,实在是不错的经济制度。苏联经济(作为一个半外围国家)在基本上没有得到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剩余转移的情况下,使其本国人民达到了很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苏联的教育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绝对是世界一流的。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有能力保持宏观经济高度稳定,消灭了经济危机。苏联是世界上惟一个在1928—1990年长达62年的时间里,除了战争期间以外,每一年都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在苏联式计划经济下,没有失业,劳动人民医疗、养老均有保障,没有危险的或危害工人健康的工作场所,工人可以带薪休假。即使是官僚的特权,实际上也受到很大的节制。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昂纳克在德国帝国主义为了政治报复而设置的法庭上,曾经自豪地宣布,在经历了德国“统一”以后的各种倒行逆施以后,德国东部地区的人民

已经明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权利宣布自己为工农国家”。比起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状况，将苏联式计划经济说成是劳动者的天堂也不为过。

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在技术进步方面，落后于处于“黄金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但是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技术进步速度的。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如果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范围内被迫与中心国家进行经济、军事竞赛，是没有理由生存不下去的。只要用政治、经济民主来代替官僚制度，计划经济就可以成为解决后资本主义时代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理想经济制度。由于取消了为交换价值而生产，因而也不再存在无限资本积累的冲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的总量将可以被限制在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技术进步的成果将被用来普遍缩短劳动时间，从而使广大劳动者能够日益从生产必需品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科学、艺术、文化、公共管理等创造性活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

甘 阳

“明报”专辟园地讨论中、港、台的左翼思想学术和运动，很有意义。但讨论大陆左翼思想必须首先了解一个基本前提：大陆曾长期是一个“极左”的社会，中国的改革更是以“反左”为出发点，因此，在大陆“左”是绝对的贬义词，“反左”则具有最高的道德正当性。

正因为如此，所谓大陆出现“新左派”，首先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这些“新左派”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意欲何为？他们想颠覆改革，回到计划经济吗？他们宁要专制不要自由吗？宁要闭关锁国不要对外开放吗？这些都是人们听到“新左派”首先就会想到的问题。

“新左派”这个说法就我所知最早于1994年同时见于北京和香港的报刊。当时之所以称为“新左派”，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二者的区别一般认为是，第一，“老左派”主要是党内保守派，“新左派”则是年轻知识分子；第二，“老左派”用的是传统马列主义语言，“新左派”则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语言。但这当然更使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些年轻又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会成为所谓“新左派”？大约1997年以前，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原因在于部分留学美国的人“食洋不化”，洋面包吃了太多而忘了中国国情。但这种解释很快就不攻自破，因为1997年以后，许多长期留在大陆非常了解国情的人也成了“新左派”。尤其最近两年，据说连一向是自由

知识分子阵地的北京《读书》杂志都成了“新左派”喉舌。这就不能不使人认真思索：“新左派”的“左”是什么意思？“新左派”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基本主张是什么？

笔者一年前在香港大学一个研讨会上曾经提出，所谓中国“新左派”的主流可以称为“中国自由左派”。理由主要是两点：第一，“新左派”是9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自由派分化的结果形成两个阵营：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也可称为“新左派”和新右派；第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倾向实际比较接近当代美国所谓的“自由派”，而自由右派的主要倾向其实更接近美国今日所谓“保守派”（此地用“保守派”不含贬义）。

这里特别提出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作为参照，并不是简单的比附，而是要强调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中国的改革以及知识分子的思考，本身就是以西方为参照系的。9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分化，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他们对当代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意识形态作出了非常不同的判断、选择和取舍。90年代的辩论，并不是传统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辩论，也不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辩论，而是更多涉及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辩论。

遗憾的是，当代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在中国被极大地忽视，以致许多自称“自由派”的人往往意识不到，他们的倾向其实更多属于当代西方保守主义，而他们大力批判的“新左派”恰恰秉承当代西方自由主义。

这里因此需要特别指出，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事实上也正是西方本身发生政治巨变之时，这就是70年代末开始的所谓里根—撒切尔保守主义革命，其结果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以保守主义取代了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大变在美国尤其惊人，不像英国

历来有保守主义传统,美国从前一直以自由主义为正宗,甚至认为美国既没有保守主义传统也没有社会主义传统,而是以自由主义来包容各种思想。但 80 年代以来,保守主义成为美国的正宗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则成为被批判被攻击的弱势意识形态。到 1988 年,美国六十五位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包括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罗(Arrow)和托宾(Tobin),以及加尔布雷思(Galbraith)、墨顿(Merton)和史家小施莱辛格等,不得不在《纽约时报》以整版篇幅发表联合声明为自由主义辩护,强烈批评里根政府把“自由派”和“自由主义”等美国传统的褒义词说成是“脏字眼”(dirty word)。但是自由派领袖们的努力完全无济于事,因为自那以来“自由派”和“自由主义”等字眼(所谓 L-word)在保守派百般嘲弄挖苦下已大为贬值,以致今天在美国政坛已经极少有政治家愿意给自己贴上“自由派”和“自由主义”的标签。这种情况即使在克林顿的民主党执政以后仍然没有能根本改变。

当代西方这一保守主义兴起、自由主义衰微的消长不仅对西方本身影响至巨,而且对中国等改革国家的改革道路有直接的影响,它事实上构成中国自由左派形成的重要背景。确切地说,90 年代初中国自由左派形成的第一个基本看法就是:以里根保守主义革命的经济思想(所谓里根经济学)来设计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例如东欧“振荡疗法”),将导致灾难性的结果;相反,如果更多重视罗斯福以来美国“新政自由主义传统”来理解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将更有助于把握市场转型的问题。中国自由左派是以这一基本问题为起点,逐渐形成自己对当代西方保守主义的怀疑和批判态度,也是从这一问题出发,日益注重研究与保守主义相对立的当代西方自由派学者的主张及其自由主义理论。简言之,中国“新左派”之所以是“自由左派”,即在于他们基本是以当代西方自

由主义思想和理论为自己的主要理论参照,而对当代西方保守主义则持比较保留的态度。从自由左派的立场看,中国新右派事实上主要认同的是里根革命以来的西方保守主义思潮和理论。

自由左派尊重自由右派的这种选择,事实上自由左派并不否认西方保守派和保守主义有其合理价值,只不过自由左派在总体上更倾向当代西方的自由派和自由主义。但近年中国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许多自由右派为了垄断“自由主义”这个符号,不惜把自由主义打造得极端狭隘甚至僵化,从而不但不能正视当代西方自由主义远为宽阔的内涵,甚至根本无视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垒这一基本事实。

例如自由右派人物秦晖最近为了指控中国“新左派”是斯大林主义而与当代西方思潮没有关系,信口断言“西方的自由主义在美国叫保守主义”。这种说法是 nonsense,因为美国今天并非只有保守主义,也并非只有自由主义,而是以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为基本格局。如果美国的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那美国今天的自由主义又是什么?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区别又是什么?罗斯福以来的美国新政自由主义与里根以来的美国保守主义的区别又在哪里?把所有这些都搅成一团糨糊,只能把所有讨论都引入泥塘中。

中国自由左派愿意把中国新右派称为自由右派,因为自由左派并无意垄断“自由主义”,而是更愿意强调自由主义的复杂性,歧义性,含混性(ambiguity),从而更注意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事实上所谓“自由主义”往往被用来指称极不相同甚至相反的主张和倾向。在美国,自由主义在19世纪后期主要指“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laissez-faire liberalism),即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但在罗斯福新政以后,自由主义的含义恰好倒转,亦即恰恰意指对这种“自由放任自由主义”的批判颠覆,从而形成20世纪美国自由主义

主流即“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其核心主张是强调市场必须由国家和社会力量来规范和调节,不能任其“自由放任”。而从7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另一重大发展,则是超越新政自由主义基本限于经济政治领域的局限,深入扩展到以往自由主义比较忽视的文化领域,其核心问题是对“现代性”的重新反省,因为民权运动以来日益突出的种族差异、性别差异、文化差异等问题,深刻暴露出历史形成的“西方现代性”具有以抽象普遍性来抹煞和压迫具体差异性的严重问题,同时,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这种现代性也越来越无法适应“文化杂多时代”(Multicultural-age)。

由此,所谓“差异”问题和“杂多文化”问题开始成为自由主义的中心关切。

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宗师罗尔斯的两本代表作,最为明显地反映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关切:他的《正义论》(1971)被普遍看成是欲为“新政自由主义”提供一个更充分的理论基础,他的《政治的自由主义》(1993)则力图使自由主义能最大限度地包含差异、包含不同的文化传统。这当然不是说,罗尔斯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而是说,他的思考非常反映当代自由主义的关切和论域。

中国自由左派与当代自由主义的关系现在可以明确表述如下:自由左派高度重视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传统,强调市场经济必须受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制约和调节;自由左派高度重视当代自由主义对“差异”问题和“杂多文化”问题的讨论,从而在中国语境中明确提出对“现代性”批判反省的课题。

与此同时,中国自由左派明确拒绝“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近年来在东欧俄国大行其道的所谓“自由主义”,实际是以剥夺大多数人为代价来造成少数人的自由。中国自由左



派在实践上的首要关切,是避免中国的改革走上俄国东欧式的“掠夺性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下面就来看自由左派的具体主张。

中国自由左派的形成到现在事实上已经有将近十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91年初王绍光发表“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为标志,集中提出了“国家”在市场转型中的作用问题。这是自由左派拒绝里根保守主义经济学,着重借鉴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经验和理论来考察中国改革的开端。这一阶段提出的中心问题是破除“市场神话”,批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强调扩大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对于改革的重要性;第二阶段以1997年汪晖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为标志,初步提出了现代性反省的问题。这方面的讨论事实上才刚刚开始,大量问题都只是初步提出,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分梳。不过就所涉及的问题而言,基本从中国语境出发提出了差异问题,杂多文化问题,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处境等问题。

以上两个阶段的问题重心有所不同,第一阶段的问题主要着眼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过程,第二阶段的问题则更多关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两个阶段的问题合起来正对应当代中国的基本主题即“改革”与“开放”。可以说,中国自由左派在90年代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事实上是提出了要在新的理论基础上更深入地重新认识和重新界定“改革”与“开放”的目标和内涵。具体而言,自由左派认为,“改革”的目标并不是要走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更必须避免走向俄国式的寡头暴富资本主义,相反,改革的目标应该以扩大政治和经济民主的方式来达成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

相对均衡机制,以保证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避免贫富差异的无限扩大。自由左派同时认为,“开放”的含义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接受资本的逻辑和仅仅寻求被纳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从位置,相反,“开放”更意味着应该特别注重西方思想界本身近年来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反省,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反省,以及对差异问题、杂多文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从而为思考中国文明的未来敞开更大的理论空间。在自由左派看来,历史不但没有终结,事实上才刚刚开始。

这里有必要指出,所谓“自由左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学术阵营,而是包含着许多观点各异,甚至在思想学术上相互分歧甚大的学者。目前被新右派点名批判攻击最多的自由左派或以四人为主要代表:王绍光、崔之元、汪晖,以及甘阳。

以下即在有限的篇幅内最简略地说明一下他们的部分论点。

### 1. 王绍光

王绍光的早期力作“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1991)是中国自由左派的开山之作。这篇长文引起的激烈辩论曾延续数年之久,直到他与胡鞍钢合作发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1994)以后才逐渐平息。这篇早期文献首先强调了要区分“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指出中国在“政权形式”上的目标必须实现从非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但这一转型过程并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的公共财政能力,因为如果国家财政能力过弱,将无力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财产”(public goods),无力实行必要的收入再分配以缩小贫富差异,也无力在控制失业和通膨等方面稳定宏观经济。这一基本论点今天大概已经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但当时却引发长时期激烈辩论,其原因在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本以“分权

让利”开辟道路,王绍光却提出“分权的底线”问题,亦即底线在于不能导致国家财政能力的崩溃;他同时以大量数据证明“分权让利”事实上已经导致中国国家能力的急剧下降,从而提出应尽快建立现代财政税收制度,以确保国家具有基本的财政能力,这些论点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得到了更具体的论证。王绍光的这些主张明显秉承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传统,亦即强调国家具有市场无法取代的诸多重要功能。他同时也强调,国家能力的有效使用有赖于国家的民主化,亦即以普选制等手段取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 2. 崔之元

崔之元与王绍光的共同点是都致力于破除“市场神话”,强调市场必须受国家和社会力量的调控。但两人的工作重心不同。王绍光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节机制,崔之元则更关注社会底层力量特别是劳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知道,美国新政自由主义乃以国家与劳工组织的紧密合作为基石。崔之元的根本关切实际上是中国改革的长期社会基础问题,亦即最大多数的劳动者是否能在改革中长期得益从而长期支持改革。他因此特别强调以扩大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来保证普通劳动者在宏观和微观经济过程中都有发言权,反对使少数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经济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他的观点一方面有“新政自由主义”的立场,即强调劳工大众的利益应是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他并不满足于美国新政的结果,因为他更强调他所谓“微观经济民主”即企业内部的经济民主,认为“后福特生产方式”提供了让劳动者更大程度地参与企业管理并提高经济效率的可能性。

### 3. 甘阳

甘阳按理与自由右派方面本有颇多共同点,事实上不久前一位自由右派朋友在一篇批评“新左派”的文章中仍然承认,在大陆“第一个公开呼吁自由主义的是甘阳。他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重新诠释五四,颠覆了‘民主与科学’,代之以‘自由与秩序’,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成为90年代全面反省政治激进主义的起点之一。”惜乎近年来我与一些老朋友们似乎已越走越远。分歧主要是在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上。尽管我在早期的“自由的理念”(1989)中首先强调了“自由的优先性”,并曾提出以“自由与秩序”取代“民主与科学”,但在90年代以后,我以为在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不平等不公正日益突出而又缺乏矫正的政治机制情势下,大谈“自由的优先性”而贬低民主与平等,实有为不平等不公正辩护之嫌;而在工人大量下岗失业、上亿民工居无定所的情势下,大谈“多数的暴政”和“暴民政治”的危险等等,更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自由主义还是“新权威主义”?

正是由此出发,我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等文章中强调自由主义必须是“民主的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主义的“自由”不是要伸张“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而是要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尤其是弱者的权利。在“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等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文章中,我因此特别强调以大众民主奠定宪政国家。

可以说,近年的辩论中基本出现一个趋势,即自由左派着重谈民主与平等,自由右派则着重谈自由。应该指出,“自由右派”现在已经与从前的一些“非自由派”学者开始合流,例如以鼓吹“新权威主义”闻名的萧功秦和吴稼祥等,现在都表示与自由右派完全一

致,要联手批判自由左派。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已经完全重新组合。

#### 4. 汪晖

汪晖 1997 年以来的许多论述,可以说相当反映了全球化问题在中国引起的思考。他的问题意识因此与前述三人都有所不同,亦即他关注的主要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是因为如此,汪晖的思考更多触及到自由主义理论最薄弱和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实践基本是民族国家内的宪政安排;越出民族国家的范围,自由主义迄今难有作为。

例如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至今仍是所谓“实力主义”(realism),而不是自由主义。而在有关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上,更是自由主义至今仍在摸索的问题。汪晖把所有这些问题都从中国语境中提了出来,并特别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结构,事实上会在民族国家内的社会结构上复制出来,从而进一步增加不发达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民主化的困难。正是在这里,汪晖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恰恰又回到王绍光 90 年代初提出的问题,即如何“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但这里的“强有力”已经不仅指狭义的国家财政能力,而是首先指国家的正当性基础:惟有立足于大众民主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国家,方可能达成内尊人权、外抗霸权。就此而言,中国自由左派的基本诉求实际仍可归结为上世纪初严复在《宪法大义》提出的“两种自由”:“外对于邻敌,为独立之民群,此全体之自由也;内对于法律,为平等之民庶,此政令之自由也。”

以上所述,挂一漏万。中国自由左派尚远未达到成熟,他们不但在目前中国语境中处于绝对的少数派地位,而且自身在理论上

和表述上都有待完善,更有待自由右派的善意批评。

惜乎近年来“诛心之论”日益盛行,许多人动辄质疑自由左派的个人动机甚至政治背景,正常的思想理论讨论几乎已经不可能。笔者个人因此在这篇文章后将退出所有争论,这里仅对自由左派的朋友提出三点建议:坚持温和稳健的立场,防止过度激进的立场;坚持知识场域的理论工作,避免过多诉诸社会情绪的煽情之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自由左派必须始终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谨防滑向“非自由”左派。

2000年9月28—29日于香港大学

## 革命及相关词语

黄纪苏

暴民的说法,去年“五八”以后特别流行。从大洋彼岸的余英时到他在这边的私淑弟子,望着美国使馆的玻璃茬子无不痛心疾首,咒骂起“义和团”和其他各类痞子。余英时住在人均 GDP 高高在上的地方,自然见不得一点风吹草动。而这边的一些学者,据郝建先生坦白,连冒充乞丐的念头都有过,却乡勇民团似的紧急集合到富人区外围昼夜巡逻,嗅嗅那部书,一股子民族主义——纳粹的前兆!摸摸那出剧,民粹主义的反骨见棱见角!读这些人的名片,是自由主义者;看这些人的神色,像联防队员。

“暴民”这个词我倒是很喜欢,因为它包含了革命的第一层含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论是大泽乡的困兽还是古罗马的困兽,无论是 1789 年的法国痞子,还是 20 世纪初的湖南痞子,他们对压迫的反抗皆属天经地义。这件事再简单、再明了不过,无需学者们跑图书馆,尤其用不着徐友渔审查学历。陈胜的确要当皇帝,斯巴达克的确把奴隶主关进了狮虎山,但这丝毫不证明他们反抗错了。人在压迫面前揭竿而起,意义实在重大。兔子遇见狼只有逃跑,跑不掉只有化作美餐。这是丛林世界通行了亿万年的自然法则。人中的弱者先也是躲闪,也是哀求,也是磕头如倒蒜,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强者的血口獠牙,他于是改变自己,斩木为兵,啸聚山林,做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暴民。弱肉强食的“食物链”砰然断裂,世界见证了真正的进化。

在由畜道向人道过渡的路上，暴民称得上恐怖而必要的初级阶段。

控诉或忏悔革命，有些未必是革命，如今是桩红火的买卖，老老少少都乐此不疲。老的把伤疤印在香币上零售批发，甚至装入锦盒远销欧美，成本早就收回了；小的逼别人忏悔，做无本生意，更是干赚。按照他们对革命的反思或再思，拆地狱让地藏王吃尽了苦，这本身就极不道德；地藏王如花似玉的千金做不成沙龙主持人，反被平民生活做成粗老婆子，毫无风花雪月可言，这简直就是毁灭文化；地狱上下十八层，哪层恶鸟啄目，哪层文火煨心，本来井井有条，革命无论是拆地狱还是从新装修，那一番变动就无视人类对于秩序的基本欲求。这究竟是养心殿的态度还是储秀宫的立场我说不太准，但肯定不是为被压迫者着想。也难怪，这些学者文人忽儿魂游北宋，忽儿梦入南朝，津津乐道的是夏威夷见到的景色，喋喋不休的是土宾根走过的小路，满脑子出将入相、征歌选妓、高等华人的想法。他们的社会存在，除了“不过 2000 元”的固定收入以及帮忙帮腔得到的红包外，还包括一种虚拟的身份。尽管每个人对世界以及自身的感受都不免有些虚拟，但读书人，特别是混成了精英的写书人，他们胡思乱想起来是完全不受出身、国籍、工资条之类约束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被炸了他们反要挺身捍卫美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蹬着自行车到“撞了白撞”的辩论会上替宝马奔驰说话（还记得“文革”中，我们胡同一个资本家孩子用锰钢车向“革干”“革军”子弟换了个红卫兵袖箍，徒步跟在人家后面飞跑的样子）。在这些人眼里，穷人是历史的反面角色（见《书屋》今年 6 期文章），零都算不上。谁要是替底层人民说两句话，他们就气得语无伦次，将扒资产阶级窗户模仿来的一点绅士风度忘得精光。被压迫者有自己的需要层次，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对于他们来说，革命不仅是理想主义，更是现实主义。让杨白劳躺到黄世仁的



绣榻上、黄世仁蹲在杨白劳的寒窑里，固然不是最佳社会模式，但轮流富贵也不失为次优的平等方案。如果黄家大院死不开门，那也只好将里面的雕梁画栋、家藏宋元名画付之一炬。共同贫穷对于富人当然提都不要提，但在穷人眼里，尤其是不打算逆来顺受的穷人眼里，它总比穷者还是穷、富者老是富略胜一筹。美术馆附近有个小花园，二十年前那里的长椅总被谈情说爱的男女没完没了地盘踞。一天晚上有个粗鄙的声音高叫道：“该换班了吧！”。只要社会的长椅坐不下所有人，只要某些男女只顾自己开心而不知挪窝，那么，二十年、二百年、甚至二千年后，我们还会无数次听到这刺耳的叫声。

革命的目标在于造成人人平等。那么问题来了：要是人人并不想平等呢？做人上人的确是司空见惯的日常事实，最为右翼学者所拂拭摩挲，视作社会主义以及一切平等运动早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南墙。他们认为社会不平等是建立在人性即竞争本能的基础之上，历史只能为恶所推动；而追求平等则是沙上筑屋，为开裆裤时候的把戏，过了青春期还在搞，足见智商不如他们，不然就是别有用心。将平等和竞争对立，这实在是一种根深蒂固误会。其实，平等与不平等的人性依据都是竞争的欲求。想要做人上人与不甘做人下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立的统一。这意味着，如果不平等的局面天经地义无休无止，那么平等的努力也只有奉陪到底。恶的人性观与历史观在为帝王将相鸣锣开道的同时，也肯定了革命天然，造反有理。

这样的革命和造反，其正当性在于颠倒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位置，其局限性在于重复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它虽然实现了初步的正义，却有待升级。革命的第二层意义或终极目的，就是要使人类社会跳出以恶易恶的历史循环，建立没有人剥削人压迫

人的大同世界。善的人性观和历史观正是这个层次上所要讨论的话题。在大同世界的脚下，肯定不会是现有的人性基础，如竞争本能之类，肯定需要根本的改造和创造，需要想像力。提起创造，右翼学者自是满脸讥笑，因为他们满兜满篓装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惨痛教训。对于既有的经验，我们无疑应有足够的重视，再不能异想天开。但同时也须明白，与经验的妥协固不可免，对经验的超越也不可少，人类既要发展，就得披荆斩棘。其实，既得利益者又何曾真把经验放在眼里？只要他们开心，妇女的脚可以长到三寸就停住，乳房则可以一路膨胀下去。什么奴隶制、媵妾制，什么主辱臣死、政教合一，他们的制度创新从未停止过，却从来打着规律或必然性的旗号。这疯疯癫癫的国际金融股市若说有什么“必然”的话，那就是英美金融资本家必然会从中获取暴利。历史从来布满十字路口，我们只不过在经验和创造之间选择了某条线路而已。假设大同在北京南苑一带，人类如今走到了八宝山附近，我们凭什么认为顺长安街一头奔西才是惟一之路呢？当然，出前门经大栅栏往南同样也不是惟一之路，尽管马克思这么以为。大同不是拍好的胶片，只等着显影定影。它需要我们选择、决断和争取。迄今数千年的历史，只不过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史前史，人类改造世界改造自身的机会来日方长。连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样的怪事都出了，大同世界，怎么就不可能呢？

指向大同的革命不可能不艰难不曲折不漫长，不可能不让无数的人疑窦丛生，穷途而返。这样的革命，所继承的是反抗压迫的事业，要启动的是消灭压迫工程，这期间的转折与过渡仿佛昆仑造山、黄河改道，令人叹为观止。它是人道的应有之义，是历史的未有之局。如今还不打算告别革命的人，就是再怎么非理性，也懂得大同世界不是跑步所能进入的。不过，大同的目标虽然遥远，大同

的方向却很明确。它说来话长,但核心不过“人道”二字。也就是说,人要像个人,同时也把别人当成人,不要遇事就向豺狼秃鹫看齐。‘人’之所以比飞禽走兽显得更有希望一些,不全在他们脑瓜特别机灵,而在于他们中间居然产生了扶穷济困的伦理思想,居然出现了与智力低的、相貌丑的、身体弱的、肢体残的兄弟姐妹同舟共济的道德行为。人类的文明史可以视作兽性脱去、人道生长的蝉蜕过程,也不知需要几世几劫才能圆满的漫长修炼。但只要是朝着人道的方向,你不妨迟迟似老者,颤颤如小儿,你不妨渐进改良,不妨暴力革命,不妨第 N 条道路。只要是朝着人道的方向,你做过的一点一滴都是善因,走过的千年万年都在善途。这与借口目标遥远需要从长计议,于是飞也似奔回虎狼世界有着 180 度的区别。辨别改革还是倒退的确要看实践:是一锹一铲地挖去旧世界的太行王屋呢?还是培土垒石生怕它不天长地久、植草育林惟恐其不青翠欲滴?

反抗压迫的革命与消灭压迫的革命,二者虽在同一方向,却不在同一历史阶段、同一道德层次上,其运行的动力、实现的条件、采用的方法等等自是全然不同。以往的革命常常失之于急进,总想朝发白帝而暮至江陵,于百年之内完成千秋功业。结果使普通人民颠踬长途短途,无辜生命凋谢风里雨里。社会主义勃然而兴,忽然而谢,教训之一就在于对两个阶段革命的异同缺少把握。旧世界的辩护士也混淆两种革命——当然是为了否定任何革命。他们用太阳城、乌有乡的尺码来丑化大泽乡、巴士底的暴动,用《共产党宣言》前面的一节寒碜后面的一段。他们耍小聪明,先爽快承认大同为最优理想,然后将最优代入“理想 = 1/现实”的公式,得出最劣,写成格言就是:说得最好做得最坏,如希特勒、苏维埃;没有追求最为实惠,如盎克鲁—萨克逊传统的资本主义。殊不知,希特勒

之流干的固然是极坏,可说得再好却未必;英美一张口就是炮舰,而所作所为也没见文明到哪儿去,从非洲贩运黑奴、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都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这些事情,自由主义者下回再来兜圈子时候,最好先复习一下。

有些人倒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他们认定平等耽误了少数人的发迹,民主则助长了多数人的暴政。曾几何时,“平等”“民主”被他们专私到不许别人插嘴的地步,如今先富几步,跟“蚁民”拉开了距离,再瞧二位就别扭了,还是自由比较顺眼。自由是好东西;但依旧有个怎么分配的问题,平等与自由对立的实质,在于有限的自由未能在社会成员中平等地分配。有钱有势有才的人被五花八门的自由烦得直发脾气。而在他们的对过儿,众多底层人民只有光膀子外加耍贫嘴的自由。少数人的自由在中国越来越得到舆论的强调,法律的护持。大额存款实名制的提议一出,有钱人的喉舌和机关报便急得血脉贲张;宝马奔驰要上路开心,“撞了白撞”的法规便在各个城市相继出台。穷凶极恶的“自由”观为革命与反革命省去了认识上的周旋,把二者的关系简化为立场的对抗。

革命的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对“阶级”这个概念认真盘点一次。阶级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经济上的剥削只是这种关系的一种形式。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有着特定时代和地域的典型意义,但并不对一切社会和文化都适用。就社会主义而言,马克思阶级观的一个重大疏漏,是为无产的压迫阶级在理论上开了方便之门。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关系、权力关系等方面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竟可以被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一笔掩过,公仆对人民的掠夺竟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进行。私有化这样的历史大倒退之所以能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是有其深刻社会心理基础的:人民看明白了社会主义不仅要在

实践中制造新阶级,而且还不打算在观念上承认新阶级;自己被剥夺不算,还要被愚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觉得一丝不挂的资本主义要比三点式的社会主义痛快实在。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不妨一谈,不在于它们提供了正确的答案,而在于它们提出了真实的问题。

世纪末的中国自由精英在登报启事和革命脱离关系的同时,为自己做了亲子鉴定。根据鉴定报告,他们竟与顾准、张志新、遇罗克等人血脉相通。他们这样干主观上虽然只是想美化自己,但客观上却丑化了牺牲者。顾张等人,他们的意见或容商量(如顾准的一些思想我就不以为然),但他们的良知和勇敢,他们对正义的本能、天然执著,具有最原始的革命精神。当大厦开始倾斜、山体开始移动,当一个时代、一种制度出现深刻危机的时候,他们出于悲天悯人的情怀,泣血哀哭,奔走于无地,直至飞蛾扑火,道成肉身,这真可谓中国的脊梁。而90年代才浮出水面的自由精英对资本的信仰,纯粹出于势利上的盘算,无非是看明白扫荡天下的已然是美国,主宰中国的势必为富人,于是极力迎合,争相加盟。在中国,资本和国家的关系有些微妙,自由主义者往来其间,冷暖自知。正版资本主义属将来时,而惟亲资本主义或官商勾结则为现在时,精英们内部的一些分歧也由此而起:比如有的主张完全投资期货,有的认为还是先做现货生意。现货派和大官的秘书、甥侄们打得火热,为书记向大亨的顺利转型把英法近代史、印尼、韩国当代政治咨询遍了,弄出不少模型、公式和主义来开导老百姓。期货派挟将来自重,仗着洋人看不起官,认为在一体化的全球,洋人才是师祖,官不过是收编的邪派,要矮着一辈儿,自己虽然更矮,但与师祖最亲,是精神上的嫡系。他们和官不大融洽,虽然官那里的好处他们逐项逐月领取一文不差,但就是不肯打收条,而且时不时还要玩

回反极权蹦极跳,引得中外观众大呼小叫。官没有办法,只好请最头疼的几位到他们最想去的国度做活烈士。面向刑场或劳改农场的老右派和走向美元马克的新右派真不可以同日而语。自然,当年的右派中后来也有不知珍重,越活越像小流氓票贩子的;如今有右翼倾向的也不乏为人刚正疾恶如仇者,我这里只涉及一般群体特征。平心说,新右派的不少主张若就事论事,都值得学术上的认真对待:“自由”绝不是什么坏东西,“专制”更不是什么好东西,市场不可能一无是处,人关不见得死路一条。但眼瞧这伙人在豪门汗流夹背地忙进忙出,眼瞧这伙人“打通了国际线路”——前往牛津清算“文革”,住到耶鲁批判毛泽东——一时那副难拿的样子,我们又怎么能化作中学女生,天真地探讨什么学理,说些价值中立的傻话呢?又怎么能不根据这些人的社会属性和文化人格就其动机和目的做诛心之论呢!

## 风与旗：90 年代的阅读

旷新年

在 90 年代，我们听到一种说法：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然而，我们在 90 年代还听到另一种说法：自由主义的言说。一种名牌思想并且通过学术的包装在 90 年代中国的市场上成为了一种流行时尚。对哈耶克、吴宓、陈寅恪、顾准、王小波的炒作成为了 90 年代的思想庆典。在 90 年代，我们到处能够听到“学术规范”这个词，实际上，90 年代，既没有多少真正的学术，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规范，除非我们对于规范加以 90 年代式的特殊理解：大至“管理热”，小至“学习微笑”；从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到沈阳的 10 万三陪女“持证上岗”。秦晖先生曾经在有关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和盛洪的《“分”与“卖”》的评论中提出了真问题和假问题、真学问与假学问的区别。尽管 90 年代倒腾的是假学问，但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却是真问题。比如“分”与“卖”的问题，尽管经济学家摆弄的是假学问，但包含着的却是一个真问题。正如秦晖先生所说的，“分”与“卖”的问题是“权贵私有化”，还是“民主私有化”的问题。正如 90 年代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是英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一样。我们被迫面对的是真正的问题：是贵族的自由，还是人民民主？是少数人的自由，还是多数人的民主？法国大革命自它一爆发开始就成为—个争议的问题，不仅过去争论不休，而且这种争论还会因为历史没有终结而继续下去。9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天真”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以为突然—劳永逸地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最后答案，

已经轻易地解决了历史之谜。然而,实际上,我们不过是企图以一己的偏见遮断永恒的历史。简单地说,我们不过是以“少数人的自由”来反对“大多数人的民主”。我们把这样一种态度、立场的选择和转变当成了是一种“客观”、“科学”的“历史研究”,并且自以为得到了铁定不移的结论。鲁迅曾经说过一个故事,康有为到西方溜了一圈以后,自以为有一个伟大发现:欧洲之所以经常发生革命,是因为他们的城墙太矮。90年代可以与之媲美的是李泽厚先生的伟大发现:李泽厚先生认为西方之所以比我们进步,是因为西方没有革命。所以李先生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开出了救国救民的药方——“告别革命”。在李先生的“世界历史”里,英国是没有发生过砍掉国王头颅的革命的,美国也是没有发生过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的。

在1998年的年底和1999年的年初发生了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我没有想到这场论争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样一种简单、明快的方式结束。80年代启蒙主义的理想天国最终是以资本主义的无耻掠夺作为兑现,而90年代全球化的知识喜剧以美国轰击中国大使馆而告终结。90年代的喜剧演员将被迫告别历史的舞台,他们或者悄然引退,或者出乖露丑。然而,新的知识必然会成长起来。

191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和“公理战胜强权”的欢呼中,从欧洲传来了巴黎和会的消息,从而爆发了五四运动:一方面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积极认同与执著追求,一方面是对被压迫民族地位的清醒认识和对中国的不平等地位的不断反抗。尽管这种觉醒与反抗被朱学勤先生视为是“民族主义的病灶”,但是构成这个病灶的不幸却是西方现代的思想与知识。马克斯·韦伯说:“‘民族主义’的评价标准会与经济政策的‘民族利己主义’一起被



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吗？照此说来，既然家庭现在已失去了作为一个生产共同体的原始功能而被纳入了民族经济共同体之中，人是否就不应该再为自己及妻小的经济利益而斗争。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只不过斗争现在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而且这些新形式究竟是使斗争更为缓和还是使斗争更为激烈更为尖锐，现在尚言之过早。同样，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一方面，接受先进的西方文明与反对西方的殖民统治并不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反动统治者反对启蒙、反对西方现代文明与出卖民族利益也是并不矛盾的，从满清政府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他们对内镇压人民与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屈服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不意味着他们接受现代文明；反过来，而他们反对现代价值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事实上，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与第一世界的民族主义有着不同的内容：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包含着民主主义的要求。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指出：“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主义的思想与民主主义的思想是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的。在现代中国，正是先有了民族的觉醒，然后才有个人的觉醒；先有了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才有个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因为民族危机，才发生了启蒙运动；正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那里，才最终发现：民族解放与个人解放是不可分离的。80

年代,李泽厚的“救亡与启蒙”只不过是80年代启蒙主义的一个巧妙的表述策略。也就是说,在当时,它不过用“奴隶的语言”表述了80年代新的启蒙要求。可是我们今天却错误地把它当成了中国现代历史的一种真实表述。

在80年代,我们的梦想是“走向世界”,而今天,“世界”正在走向我们。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已经明白无误地到来,我们的身边弥漫着的是国际垄断资本的气息。当美国刚刚开始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我的一位自由主义的朋友说:“美国把我们出卖了!”然而,另一位同样是自由主义的朋友却欢呼,中国再发生“六四”(反革命暴乱? 动乱? 风波?)的话,美国就可以派兵到天安门广场来保护“人权”了。以今天自由主义天真的意识形态的观点看来,孙中山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建立现代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没有得到过任何一个外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支持,这岂不是咄咄怪事!相反,50年代的民主改革廓清了西藏的奴隶制,美国却反对这样一场现代改革,并且介入了西藏的叛乱。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地削弱了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以世界的霸主自居,放弃了它长期奉行的“孤立政策”,开始了全球扩张的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非殖民化历史过程中,美国却逆历史潮流而动,继承了英法等古老的殖民思想,企图维护旧的殖民体系,比如法国在越南的传统殖民统治崩溃以后,美国却积极介入了越南战争。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遭受惨重失败,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要求出兵印度支那,主动介入越南战争。美国利用全世界反动统治者对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敌视,利用冷战的契机,开始将它的势力渗透到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1946年,邱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的铁幕。1949年,美国、加拿大和10个西欧国家签署北大西洋公约,正式挑起了

冷战。其后苏联和东欧国家被迫建立了与之对抗的华约组织，冷战的格局正式形成。1954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西方在冷战中将采取主动。1954年，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建立了以反共为宗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50年代初，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操纵的参议院小组进行所谓“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进行歇斯底里的反共活动。在今天，美国参与颠覆印度尼西亚苏加诺和智利阿连德的民主政权，扶植苏哈托和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以及介入1959年的西藏叛乱等事实已经昭然于世。美国对世界各地的一次次干预从来不是为了人权的目的，而是为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关于科索沃战争，这到底是一场国际恐怖主义战争，还是一场捍卫人权的斗争，这是文明的阳光普照，还是文明的历史耻辱，我想类似的争论都只会是各执一词，而不会得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90年代别有用心的“落后就要挨打”的舆论也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发明，它只不过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另一种表述而已。

我们的视野不断收缩，我们所谓世界，实际上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国。用50年代的说法，就是“一边倒”。而我们对美国的理解又是如此肤浅，如此一厢情愿和理想化。我们的思想日益僵化，我们所谓思想，就是自由主义。亚洲文学产生了鲁迅，这是亚洲的荣誉；可是，在今天的知识分子看来，鲁迅是侏儒，只有西方的大师才是巨人。我们到底有多少判断是建立在自己的真实感觉之上？我们的所谓文学评价有多少是建立在对于文学的理解之上。我们对于鲁迅的贬抑，难道不是因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民族自卑感或者对于西方的媚俗意识？

我们当然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立场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使第二国际堕落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列宁正

是超越于这种民族主义立场之上,主张使俄国在非正义的帝国主义大战中失败,并且将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战争转变成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苏联放弃了东方殖民地的利益。可是,后来苏联背叛了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对于芬兰、波兰等国的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东西方政策,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与其是说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如说是体现了民族主义的利益原则。列宁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同时也给社会主义带来了没有预见到的困难和后果。它使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先进资本主义大国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使它最终不得不被迫适应资本主义基本的组织方式,即民族国家的组织方式。正是受制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苏联逐步地蜕变成成为民族主义——毛泽东所谓的社会帝国主义,并且最终苏联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按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来结束它自己的历史。民族自决即被压迫民族摆脱殖民统治与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是基于同样的原则,毛泽东把它表述为:“民族要独立,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马克思认为,波兰和爱尔兰的独立能够加速俄国和英国国内反动统治的崩溃。因为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本主义对于殖民地的剥削不仅与国内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资本主义通过对于殖民地的剥削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内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从而加固了资产阶级国内的剥削统治。因此殖民地的独立能够有力地削弱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对爱尔兰问题做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是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地主的堡垒。对爱尔兰的剥削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的主要

来源,而且也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英国土地事实上代表着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实际上,这也就回答了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问题。受着双重压迫的殖民地于是成为了革命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事物孤立起来看,而是相反在事物的联系中来观察和思考。我们不能把国际的问题和国内的问题孤立起来看,恰恰相反,国际的问题和国内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必然的联系。正如韩毓海先生所说的,美国袭击中国大使馆的炸弹可能就是从中国的国库中流失的钱制造出来的。苏联的崩溃大大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实力,使它的经济力量损失了两倍,使它的边疆退回到了两个世纪以前的叶卡捷琳娜时代,使它实际上迅速由一个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二等的国家。谁从苏联的崩溃中得到了好处呢?是苏联人民吗?只有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俄罗斯的权贵们从苏联的崩溃中得到了好处,当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急剧下降的同时,权力与金钱却迅速地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上,在俄罗斯迅速结成了权力寡头与金融寡头的联合统治。

我们并不能抽象地谈论人权/主权这些概念,人权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要求,主权只不过是维护人权的必要手段,是被殖民的东方抵抗西方侵略的一种需要。民族国家是现代的一种组织形式,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也就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是对于西方侵略的反应,是作为抵抗西方的入侵而产生的。主权是人权的延伸,人权通过民族国家的主权而得到保障。对于被侵略的东方来说,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1840—1949年的中国现代的惨痛历史的经验使我们知道:没有主权就根本不存在人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巨大牺牲难道还没有使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吗?然而,在另一方面,一个丝毫没有人权

的国家,它根本上就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与人民又有什么关系呢?满清的统治者不是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吗?

我曾经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无知感到羞愧,然而,当我以前在文章中說中国知识分子无知的时候,我对他们无知的程度远远估计得不够。当我说他们无知的时候,我是说,80年代我们在现代化知识的接受上有着明显的缺陷,我们毫无批判性地接受美国60年代抽象的现代化理论,用李慎之先生的说法是“300年文明”。可是,它却完全忽视了“300年文明”是最贪婪无耻的掠夺,是以彻底的野蛮化作为它的底子的。它完全忽视了现代化与殖民主义的历史联系。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文明的“成果”,然而,“文明”的历史过程却被我们忽略了。难道不是每一个有良心的欧洲人都对这种“文明”表示过谴责和义愤吗?在自由主义的历史里,这样一些历史哪里去了呢?西方的历史与东方的历史是根本不同的,西方是历史的主体,东方不过是历史的对象。难道我们要不加任何批判地、主动地去适应这样一种被奴役的历史吗?毛泽东说:“寰球同此凉热”,然而,毛泽东却把世界分成了“三个世界”。这样一种“世界眼光”和今天那些适应并且拥抱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全球化理论”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种是要驯从于这样一种垄断秩序,一种是要反抗这样一种不平等结构,确立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建立一种新的平等、合理的世界秩序。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构造了主体性神话;然而不幸的是,到了90年代,“主体性”却从半空的云彩中掉到了污浊的阴沟里,再也不见“主体”从腐败的经济泡沫中露出半个脸来。随着80年代主体性的神秘的理论泡沫的破灭,90年代到来的是对于权力的绝对依附与对于国际资本的五体投地的崇拜。随着主体性神话的破产,80年代人性、人道主义的喧闹也成为了随风飘逝的呓语。在今天,除了国际垄

断资本的秩序,除了权力与资本的网络,哪里还有“主体”的位置?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人”?

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我们把所有的西方话语都搬了进来,用了一遍。每个人都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有时候,我真想问他们一声:你们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吗?他们滔滔不绝,玩了一圈语言的游戏:从呼唤主体,到取消主体;从呼唤人性,到践踏人性;从呼唤人道主义,到抛弃人道主义。我们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大胆地假设了“经济人”,大胆地假设人性是恶的,他们在“人性恶”这样一个并不牢靠、并非没有疑问的预设上面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宏伟大厦;然而,他们却不想想,“人性”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还没有争论清楚的问题。我们曾经对启蒙理性有一点基本的信心;然而,今天面对那种庄严的说辞,比较一下它们和疯人院疯子的话,和幼儿园孩子的话,你已经难以分清谁比谁更有理性。今天,许多名词被扭曲了、强奸了、出卖了。我们处于一种价值真空的状态。我们还相信什么?我们今天还能够相信什么?我们今天惟一的信仰是钱。然而,钱在今天又是最抽象、最隐蔽,也是最虚幻、最脆弱的一个东西。我们现代的经济不是被名副其实地称为“泡沫经济”吗?在一个什么都不信的社会里,对钱的信心和对泡沫经济的信心又能够维持到哪一天呢?

在今天,知识已经变得极度复杂化了,我们已往的所谓左/右、传统/现代、激进/保守的划分已经失效了。90年代被理解为激进主义的崩溃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凯旋。激进主义被视为是启蒙主义的遗产,是按照理想的设计来推动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则被认为是强调历史的延续性,强调经验、常识、习惯、传统对于生活的支配力量。如果按照90年代对于保守主义的通常的定义,90年代的保守主义也未尝不可以认为

是一种“激进主义”，它同样是在按照美国的教条在塑造我们的社会，它同样把我们一百年的传统，一百年的经验弃之如敝屣。它将我们过去的一百年的历史、一百年的传统、一百年的常识翻了个个：一百年来，我们追求自由、平等、独立和个人解放，反对压迫、剥削、奴役和等级制度；然而，这种常识在今天却被否定和颠倒了过来。90年代，我们在所有的领域都进行了一次“重写”：从经济、政治、历史、思想，到文化、文学。保守主义一方面被他们描述为一种尊重历史的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他们理解成为一种本质：一种对于“多数人的民主”的敌视和对于“少数人的自由”的崇拜。如果说保守主义是一种本质，那么90年代的所谓自由主义确实是名副其实的保守主义。如果保守主义是一种方法和态度，那么我们则不妨把90年代所谓自由主义称为“激进主义”。尽管这看起来好像很矛盾，却是事实，因为它要在一夜之间推翻我们所有的常识、历史和制度。

我的一位朋友说，奴役是人类一种永恒的状态：或者是奴役，或者是被奴役。他说，我们应该发现奴隶的美。我的另一位朋友说，平等是一种虚幻的理想，一种荒唐的幻想，人类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平等，所以我们应该抛弃平等的观念。我从来不认为平等是一种终极的目的，对于我来说，只有自由才是真正的目的。平等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平等只不过是实现自由的一种必要的条件。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自由又只是相对的和有限的。自由总是具体的，总是某些人的自由，总是某种程度的自由。自由的欧洲是以被奴役的、不自由的非洲、亚洲作为对象，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以工人阶级的被奴役、被剥削作为代价。资本主义给予工人以自由，却不过使他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劳动力。资本主义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人，但是，同时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于人的空前奴役。资产



阶级在贪欲的推动下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本身却又成为了自身贪欲的奴隶。资本主义通过分工达到了高度的文明成就,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使人丧失了完整性,反过来变成了分工的奴隶,变成了机器之人。在今天,我们的生存就受制于这样一种知识状态,我们变成了自己知识的奴隶。我们今天的消费主义文明,我们为生产而生产,为消费而消费。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只有惟一的一种理性,就是合理地追求最大利润,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

我们不想奢谈什么绝对自由。我们从来不会像汪丁丁先生那样把自由说得那么玄妙,然后挥手把它推向虚幻的彼岸;我们从来不会像汪丁丁先生那样把自由说得那么美妙——“自由到一无所有都可以”。毫不奇怪今天的自由主义一方面赞美自由,另一方面又毫不犹豫地赞美奴役,因为在自由主义那里自由与奴役是这样一种奇妙的关系,奴役恰恰是自由的基础以及自由的象征。马克思说:“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制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消灭奴隶制,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这样,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创世时起就在各国人民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仅仅在本国把奴隶制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实行它。”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历史的新大陆。既然自由

必须要以奴役作为它必要的补充；那么根据“症候式的分析”，今天对于奴役的赞美和奴役的莅临，也就成为了我们的自由之花绽开的一个最好的证明与标志。

所谓人并不是像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是原子式的个人，因为即使是最简单的群体生活，比如蚂蚁、蜜蜂也绝不是通过个体可以理解的，而必须通过它的群体生活，通过它的社会生活的形式来理解。通过群体的组织结构，这种生活的本质就发生了突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独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 18 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像力的虚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 18 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每一个人他既是独立的个体，同时他又是一个社会的人。他被结构在社会之中。作为一个中国人，即使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教徒，作为一个白华，他也天然地打上了“支那人”的烙印。社会是有历史的，每一个人一诞生，就被置入了，或者说“被抛入”了一定的社会历史结构关系之中。他既是作为个人，但是同时，他更是作为某一民族、某一阶级、某一群体的人在参与历史。人并不是作为纯粹的、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阶级和历史的人在参与历史的。比如是

作为一个美国人，还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发挥余热的官僚，还是作为一个下岗工人；作为一个广东的厂主，还是作为一个青海的农民，他们作为“人”参与历史的条件是绝对不同的。从一开始，他们对于自由的理解就是绝对不同的，而他们所拥有的自由的程度也是绝对不同的。

## 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

韩德强

时光飞逝,共和国转眼到了五十大寿的日子。这五十年可不平常,辛辛苦苦,兢兢业业,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欢欢喜喜,悲悲切切,既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业绩,也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故事。如果摆起一个龙门阵,让平头百姓和学界泰斗把盏对饮,让工人农民和商界巨头同桌共话,让新老右派和新“老左派”唇枪舌剑,我想那场面一定会是热闹非凡的,而其中最吸引人的一个话题,就有可能是讨论五十年的功过得失,特别是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年的关系:究竟是前三十年黑暗得赛过解放前呢?还是前三十年为后二十年打下了基础?

在很多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眼中,甚至在许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眼中,前三十年都常常是一连串荒唐记录的汇总。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或者更多的是人祸),然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二十多年经济停滞,物资紧缺,米、面、油、盐、肉、布料、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再加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文化娱乐被八个样板戏统治,一切再糟糕不过了。相比之下,电视节目里的旧中国反而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虽然有军阀割据,国共交战,却汽车、电话、电报、电灯、自来水和一应衣食品等等都与世界时尚同步,而且绝对不需要凭票供应,只要你有钱,一切货物应有尽有。文人学者出有车,人有鱼,雇得起保姆,住得起洋房,听戏有梅兰芳,听曲有“何日君

再来”，日子过得自在又闲适。这样，在部分媒体的刻意营造下，新中国五十年至少有三十年打了折扣，剩下二十年又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这个五十周年的庆祝就暗淡无光了。的确，人们不难注意到，与1998年庆祝改革开放二十年相比，今年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声势小多了。许多媒体对于宣传二十年十分热心，而且技巧娴熟，对于宣传五十年却感到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只好举些数字、炒些冷饭，回放一些老片子了事。新华社举办的网站上，至今（1999年8月24日）仍然只有讲二十年巨变的专栏，而没有五十年的专栏。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中国的媒体对五十周年大庆提不起精神来时，印度的学者却在隔着喜马拉雅山对中国啧啧称羨。

## 中外对比五十年

1997年8月10日印度独立五十周年之际，《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被派驻中国以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三年，对中印两国对比很有兴趣。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

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从1990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惟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的报纸，更不是亲共的报纸，绝不是亲

毛的报纸,而且又正值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但它却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可见天下还是有公道的。事实上,早在80年代国门初启,人们热衷于进行横比、纵比的时候,就曾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印度作为参照系为新中国的成就辩护过。那时,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出国参观访问,体验了北美、欧洲、日本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后,未免自惭形秽,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篇横比文章,大意无非是感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痛惜中国的贫穷落后,诅咒“文革”耽误了建设时光,懊悔当初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候也有一些“没出过国”的或者出过国却“头脑僵化”的人起而反驳,纵与解放前比,横与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说明前三十年没有白过,也干了许多事情。遗憾的是,这股声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痛惜和懊悔声中总是显得那么孤弱。事实上,到80年代中后期,诅咒“文革”升温为诅咒新中国,由否定三十年进而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懊悔心理则转变为切急地追求“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连同崇美崇洋情结一起迷漫着从摇滚乐到电影电视的每一个文化角落。

1989政治风波以后,一味向发达国家看齐的单向横比态度有所变化。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先生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的书,条分缕析地比较中外各国的发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毫不逊色的,甚至是非常出色的。我手头一时没找到喻先生的书,但却有几份统计资料可供作一个简单对比。为了说明问题,看来得烦请读者有耐心看一看下面这张表:

1965—1985年间部分国家和地区 GNP 年均增长率对照表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美国	1.34	中国	7.49	印度	1.7
英国	1.6	苏联	5.89	巴西	4.3
西德	2.7	匈牙利	7.42	阿根廷	0.2
日本	4.7	保加利亚	7.84	墨西哥	2.7
新加坡	7.6	捷克	5.15	埃及	3.1
中国香港	6.1	波兰	8.67	肯尼亚	1.9
中国台湾		泰国	4.0	加纳	-2.2
南朝鲜	6.6	马来西亚	4.4	尼日利亚	2.2

以上选列了四类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仅次于波兰、保加利亚、新加坡,与“四小龙”相比中国的速度并不逊色,却比小虎们整整高出一头,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80年代中后期以来,舆论曾经一度从羡慕发达国家到赞美“四小龙”。学术圈的一些活跃人物提到“四小龙”就眉飞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起点和中国差不多,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直追美国!三十多年来,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呢?一个长期是小渔村,一个却摩天大楼一栋挨一栋。这是为什么?

提问者显然觉得自己很高明,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人鹦鹉学舌,跟着起哄。其实,这样的问题愚蠢至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反问,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芒普照下,曼哈顿富人区和贫



民区一街之隔,为什么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个却破破烂烂、污水横流?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是财富的汇聚中心,或者用老式的语言,叫吸血中心。就像旧中国的上海一样,外滩的精美欧式建筑、大世界的奇巧热闹是与上海以外的城镇的破败、手工业的衰落、农村的凋敝相联系的,它不过是外国资本吸噬中国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罢了。1949年以后,上海不再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中心,相反,倒是成为全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心,因此,上海本身发展才显得缓慢起来。而香港则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旧上海的角色才得以繁华起来的。本来,在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像风卷残云般地收复香港。中国共产党可以废除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独独要遵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让香港条约呢?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了:考虑到新中国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长期封锁,保留香港作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的通道。正是靠着这样一个新中国外贸独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但其中相当大部分仍然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打工仔作苦力,香港怎能不肥得流油呢?

至于台湾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开反攻大陆,充当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给美国当冷战的打手。膘肥体壮才能当好打手,因此美国给台湾(还有韩国)几乎无限额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台湾当局稳定军心民心,练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国向台湾单方面开放市

场,允许台湾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以增强台湾的自身造血机能。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台湾从大陆掠走的大量黄金。据《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达 875 吨,以今天的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一克黄金 10 美元)粗略计算,合 87.5 亿美元。最近台湾作家李敖评论台独时就坦率地揭了台湾发展的老底:“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 1949 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 92 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 82 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内地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可见,如果把“四小龙”的发展称为“奇迹”,那么中国就简直可以称为“神迹”了。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还少外援(苏联人援了一阵子,又半途撤走,还把钱要回去了),也没有外国财富可供吸噬,全凭勒紧裤腰带干活,却能在建国后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英国一百年的路程,这不是“神迹”是什么?

### 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

在民间的反思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虽然前三十年运动不断,但工农业生产却并非停滞不前,人们不是闲了三十年,而是埋头苦干了三十年。这也有统计数字为证,请看:

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

类别 年份 项目	指标值				年均增长率(%)		
	1949	1952	1978	1995	1947-1978	1952-1978	1978-1995
工农业产值 (指数)	56.5	100	779	3303	9.47	8.21	8.8
钢铁(万吨)	15.8	135	3178	9153	20.1	12.9	6.4
煤炭(亿吨)	0.32	0.66	6.18	12.12	10.7	8.98	4.04
粮食(万担)	2264	2378	6095	8902	3.47	3.69	2.25
棉花(万担)	44.4	130.4	216.7	434.1	5.61	1.97	4.17
肉类(万吨)	338.5	856.3	3692	3.63	8.98		
石油(万吨)	12	44	10405	14764	26.3	23.4	2.07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三十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居然还高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

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只要问一问你身边的退休工人们就可以知道。五六十年代像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并不是少数鹤立鸡群的人物,而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中,由于工作意义感强,工人政治文化素质高,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都是今天的人难以想像的。

既然发展速度这么快,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提高,工资一直不动呢?有人责问。

不错,从1957年开始二十年没涨工资,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大,这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生产停滞,经济不发展。这个道理就像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家庭一样,如果家长决定把挣来的钱都用来盖房子、置家当,饭桌上的油星自然就不会见长,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这二十年里,中国办了两件大事,第一是保家卫国,第二是置办家业。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

中苏边境囤兵百万。南方则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国面临南北夹击的险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把相当大的力量集中到国防建设上。正是由于中国不惜耽误经济建设的进程,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把大量企业从沿海迁往内地,而且以“分散、进山、进洞”的非经济方式建设军工企业,表明了中国敢于迎战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所以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这二十年的经济建设也没耽误多少,置办了不少家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经济发展的起伏较大,但总体态势仍呈较快增长。据柳随年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成绩还真是不少,我这里只能作极为简略的摘引。比如,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较大提高,1975年的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化肥施用量增长3.1倍,用电量增长4.7倍,此外,农业种子改良取得突破性进展,杂交水稻开始推广。工业上,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13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攀钢、贵州铝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工程,汽车工业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火电站,交通上建成了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修建了长距离的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科学技术方面,两弹爆炸、一星上天,人工胰岛素合成,国防科技力量明显增强。总的来说,“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如期完成,“五五”计划开始顺利执行,十年时间总共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工农业总产值由1965年的2235亿元增至1976年的435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在建国十

七年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这十年的努力,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相信,任何一个热爱家园的人,看到自己的家底打得越来越扎实,家里的耐用品越来越多,应该会感到喜悦和自豪的。当然,如果这时候有邻居挑拨离间,向这家的孩子们说,看你们干了那么多活,还是吃不上肉,没有发展,说明你们家的制度不好,你们家长有问题,孩子们也是有可能上当的。特别是其中有些孩子心胸不够宽广,受过家长的责骂或体罚就把仇恨铭刻在心,看不到家里点点滴滴的进步,最容易带头或跟着埋怨、发牢骚,甚至咒骂祖宗十八代。

好吧,有人说,就算前三十年真的有这么快的发展吧,但那时起点低,发展速度自然应该快一些。这就像学生的学习,从0分到60分容易,从80分到90分就难了。

其实不然。如果不存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那么技术和经济的增长应该是正反馈系统。我们都知道技术和知识在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也就是说越发展越快。经济增长也一样。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的。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发生,经历了近三百年时间,这期间英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远不到1%。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870年的一百多年左右的时间里,英美德等国的年增长率也不过是2%左右,此后到一战前夕,年均增长率上升到2%—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70年代初,号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作为整体的年增长率也就是4.4%。可见,所谓起点低发展速度就快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按照这种推论,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就应该是最快的了。从逻辑上说,发展起点越低,资金积累越慢,因而速度越慢。随着发展速度的提高,积累越容易,反过来会加速

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正反馈机制。举个例子。建国初期搞铁路建设时,既没有大型起重机械,又缺少运输卡车,数以百万吨计的土方、石子,全部的枕木、铁轨都得凭人拉肩扛,建成一条铁路谈何容易。特别是中国山地多,地形复杂,像成昆铁路,1085公里路段,却有60%是桥梁和隧道,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今天就省事多了,各种铁路建筑机械一应俱全,爆破、运输、吊装一条龙作业,建铁路跟搭积木似的。

综上所述,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还真是干了很多好事、大事、大好事的。遗憾的是,许多人,甚至经过那个年代的老一辈人,都把这一切忘光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刚刚退休的教数学的老教授聊天,请他谈谈这一辈子的经历和感受。他说,我这一辈子算是糊里糊涂地过来了,年轻时候跟着搞大跃进,然后是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人到中年又卷入“文革”派性斗争,一事无成啊。我又问他,做过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没有呢?他想了半天,没说上来。实际上,这位教授从留校任教到退休,一生教过无数学生,确实是桃李满天下。中国的发展不正是由这样一位位普通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的辛勤工作所推动的吗?但是,这么重要的生活内容居然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被抹去了意义!这是集体性记忆丧失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多年来知识界那股“妖魔化当代中国”思潮的杰作啊!我不知道李希光先生是否同意:是中国先进行了“自我妖魔化”,然后才有美国“妖魔化中国”!

旁观者清。美国有一位叫龚忠武的华人学者,60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发过一通议论:“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部有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

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都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的经济最近二十年来一蹶不振，其转折点就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三元秩序，从而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经济建设好。”

## 后二十年：势能转化为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地变化，各种各样的商品仿佛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而且不断地升级换代，城市变得鲜亮了，农村变得活跃了，超级商厦美轮美奂，集贸市场人声鼎沸，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日常的言论也自由了，过去看电影当过节，现在不出门就能任选频道。即使在最偏远的农村和山区，也摆上了黑白电视机，也多了几件时新衣服，多了几句时髦话。

这一切的确令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感到欢欣和自豪，人们一度放声讴歌改革开放，讴歌这片希望的热土。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人们陶醉在欢呼、欣喜之中，以致常常来不及想一想为什么，很容易就接受了一个解释：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初一看，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细一想，却失之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试想，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武钢、鞍钢、首钢、杭钢，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厂，仅仅一个允许私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间呼唤出一幢幢楼房，铺设起一条条公路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铁路网、航空网，北方市场怎么能一下子出现那

么多南方水果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棉纺厂、丝织厂、化纤厂，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乘凉时，固然应该感谢允许乘凉政策，却不应该忘记谁栽的树。

就以 80 年代初农村的巨变为例吧。毫无疑问，包产到户、个体生产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 1984 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80 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四个重大因素。第一是种子革命。70 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 20%。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棉花、油料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化肥革命。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 1979 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前三十年里，各级政府利用农闲每年大规模地组织社员兴修水利，全国的大小水库七八万座，沟渠畅通，堤坝坚实，极大地增强了防洪抗旱能力，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第四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业如此，工业、交通、能源、教育、科研、国防各个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如果没有三十年建设的积累，在 1949 年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钢没钢，要煤没煤，要油没油，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又如何使商品奇迹般地摆满货架、摆满每个家庭呢？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固然得感谢巧妇，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下提供大米的人呢？

有一次，我和一位当着地方干部的朋友交谈，顺便谈到这些看法。他还我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物理学讲能量守恒，动能势能相互转化。比如骑自行车上山，很费力。到了山顶时，人就精疲力竭了，但这时的势能却最大。然后撒把下山，不用费力，速度就越来越快，这就是势能转化为动能。我看，改革开放以来焕发的活力，就是把前三十年积累的势能转化为动能了。一旦下到山底，走上平路，则势能既被消耗光，而动能又被摩擦阻力损耗，这时大撒把政策就会走不动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比喻意味深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财政实力雄厚。这就是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业的术语就是有良好的信誉。单是吃这个信誉，广借内外债，就可以维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而到了内外债均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时候，再要借债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再如，当时中央集权程度较高，这也是一种高能势态，因为分权容易集权难，从集权到分权，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但是当形势需要重新部分集权时，比如1994年分税制改革，希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就很困难。更如，土地从三级所有到基本上个人所有，这很容易；但如果此后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再要重申土地集体所有，就很困难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的廉洁程度也是个高势能态，从廉洁到腐败容易，这叫从恶如崩，从腐败到廉洁就难上加难，这叫从善如登。正是有这种高势能态的廉洁干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别人致富，自己守着清贫，基本上可以维持勤劳致富的社会秩序；一旦干部腐败起来，和群众抢守致富机会，甚至雁过拔毛，社会公平感就会荡然无存，而改革的形象也就

会遭到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支撑着改革开放的大业。

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文明史相沿不绝,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我们终究会认真地面对历史的。

## “漫长的革命”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韩毓海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中，毛泽东大约是对文艺问题发言最多的一位。与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紧密相关的毛泽东思想中包含如此众多的文艺问题，这无疑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挑战。这既是对政治和历史专业的研究者的挑战，更是对文学研究者的挑战。它几乎天然的使对这时期的文艺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政治和历史。

伟大的中国革命，它的胜利首先是与数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彻底崩溃为标志的。这是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魏晋以前，这样的基础主要是围绕着皇权建立起来的。而在魏晋之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维护这种基础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在明末以来，地方豪绅和地主阶级则成为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主要承载者。这种变迁在李贽的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封建论”中，有深刻的表达。总之，这个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的方式，逐渐经历了一个“下行”和向社会、民间“渗透”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清代以来，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主要是由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的家

长制度承载的。这种地方地主和豪绅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清政府的改良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豪绅力量,在镇压太平军起义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阶级既是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者,也是封建文化体系的传人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曾国藩同时也是晚清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这种改良主义运动既表现了封建国家统治深入到地方的过程,也表现为封建主义的自我瓦解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晚清条件下,是伴随着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自强运动”展开的,即允许地方豪绅有兴办企业和学校的权力,以促使封建国家的税收和调整统治方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者,对地方地主阶级作为封建制度的主要承担者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不可分割的目标。汪晖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曾经描述到:

晚清革命者已经意识到加强地方乡绅/地主制度的力量以及地方分权改革都是晚清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因而这些制度和改革是和皇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的。辛亥革命之后,这一看法逐渐流行。这就是晚清改革的悖论:王朝合法性对地方自治的依赖与地方自治对王朝合法性的瓦解相并存。如果说明末清初的“封建”思想(如顾炎武)是通过确认地主土地所有制来限定君权所有制,那么,清末民初的均田主张却包含着对土地私有制的激烈批判,这种批判的根据之一是对皇权及其社会基础的否定,另一依据则是清代中期以降日渐发展的土地兼并。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是由工人阶级和其农民同盟军完成的对中国资产阶级上述矛盾“悖论”角色的历史扬弃,完成的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力完成的对封建主

义的彻底革命。中国的近代历史表明：对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革命，不能由与地方地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或者就是由地主转化来的中国特殊的资产阶级完成，因为那种联系使这个面目不清的，角色模糊的阶级，对历史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它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注定也是面目不清的。如果说历史或者对历史的“现代理解”就是把历史看作人类有意识的自觉行动的话，那么，始终有意识的，和自觉的要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是中国的农民阶级和由他们转化的城市无产阶级。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不是一种“彻底的革命”，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缺乏对历史和自己行为的自觉的意识。中国资产阶级意识不到现代中国历史，特别是封建主义的历史的真实命运，这一点是由它与封建主义的近代承载者地主阶级的天然联系决定的。

因此，在政治和经济上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也就必然是这种斗争的现代承担者：中国无产阶级申述他自己明确的历史意识和对中国现代历史命运的评价的重要时刻。这种对历史的命运的申述和对革命者自己命运的申述是密切联系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作了经典阐发），无产阶级革命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理解历史命运，并使自己的解放与这种真实的历史统一起来的运动。这种革命不但是政治经济的运动，还表现为一种有自觉的历史意识的阶级的运动，也就是一种有思想和明确意识的阶级的运动，甚至是有明确思想意识纲领指导的现代阶级运动，或者说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运动必然是一种思想文化运动。

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是这样的运动。在土改运动在中国接近高潮和尾声的时刻，毛泽东明确的把这种运动引向了革命者对自己明确的历史意识的申述和宣扬，他准确的选择了电影《武训

传》作为申述革命者自觉的历史意识的靶子和对立面。

电影《武训传》叙述的是晚清以来,山东聊城唐邑县一个叫武训的乞丐,在地方乡绅的支持下,用乞讨得来的钱兴办“义学”的故事。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饶有趣味”的意识形态本文。一方面,在近代历史上,这种乡绅即地方地主是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的主要承载者,这种政治功能特别体现在对晚清农民造反运动的镇压方面;另一方面,晚清的地方自治运动,是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即使乡绅兴办的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企业,也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上的,即无论乡绅建立的企业还是学校,都是以土地地租的经济形式为基础的事实,历史调查表明,武训的确是以乞讨来的钱置办了田产,并以地租的利息来兴办“义学”。

马克思主义不能认同这种叙事是显而易见的。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与地主阶级联合或者歌颂这种联合,看起来与正在进行的土改运动明显的背道而驰,而且更是因为,它与共产党正在进行的推广全民识字率的推进现代化的伟大工作背道而驰。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在广大农村进行“识字班”运动,新中国的废除土地所有制,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与这个伟大运动相反,地方乡绅的所谓“义学”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所有制形式剥夺了底层社会有受教育的经济能力。还有,在现代性的方案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劳动”组织起来的历史框架中,“乞讨”和“乞丐”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甚至是变态的,丧失“理性”的耻辱。

但是,电影《武训传》却受到巨大的欢呼,这种欢呼在土地改革和全民教育体系的推广的决定性历史时刻发生,看起来不免有些奇怪。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很难说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的确非常明显的与土改和新中国的全民教育思想严重矛盾。问题的严重

之处还在于：看起来不但是广大观众和评论家，而且是党本身，对中国历史和自己的历史命运，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没有清醒认识，革命丧失了其历史目标，无产阶级丧失了自己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这一点在这种盲目的一片欢呼声中暴露无遗。毛泽东忧心忡忡的，也是十分惊讶的发现了这一切，这种发现随后马上就变成了怒不可遏，他简明的批评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

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做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介入文艺问题的讨论。毛泽东对文艺的态度,表达的是他从这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阐述,它鲜明的表明:如果现代性的视野把“历史”看作有意识的人的自觉行为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历史观的坚定捍卫者。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的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未必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的意识到“历史”的革命运动还是两回事。

毛泽东随后在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中,再次发现经验主义的历史观在思想界的统治,这种“就事论事”的历史观表达了一种态度,或者说在它“反对一切理论阐述”的立场中表达的正是一种鲜明的理论态度,它把历史研究当成了文物研究,用自然科学的对待自然界的方法对待活的人类历史。由于党的报刊《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完全站在这种经验主义的立场上,所以,毛泽东加强了这样的判断:领导人民以政治革命推翻了反动统治的党,正在领导从



经济上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党,却没有从思想和文化上自觉意识到这种政治和经济革命的真正价值、意义和历史命运。“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的情况是相同的。”毛泽东的这种理解是非常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据马克思的解释,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人、劳动和历史的异化的伟大运动,这个运动不会因为在政治和经济上克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的“革命”而终结,因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是这种人、劳动和历史异化的结果,不是其原因。因此,如果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革命胜利后,不提高自己的觉悟,不把人、劳动和历史改造成自觉的活动,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也难逃异化的厄运而首先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样,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不但不能从异化的历史中解放出来,而且它本身就成为异化的、有局限的历史的产物。因为只要无产阶级把自己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政治和经济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就如同历史上一切革命一样是有局限性的。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完成的政治经济革命,不能“自动”的成为一种被无产阶级自觉意识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革命不一定“天然的”是一种“自觉”的革命,除非它积极的把这种革命上升到“现代人的活动”的高度去理解:人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的产物,是劳动者,而且也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是文化和历史活动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创造者。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或者毛泽东式的这种理解,不但与资产阶级,而且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者非常不同。

毫无疑问,一般的社会主义在坚持“集中化”方面的确不像资本主义那样“欲盖弥彰”,而是相当直率和理直气壮在这方面最为专断傲慢的态度是苏联式的。苏联社会主义集团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包含什么矛盾,斯大林认为这些矛盾和

困境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斯大林改造,他认为由于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所领导的制度“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哲学上完全克服了这些矛盾和困境。”

作为一种回答,“斯大林主义”就是对这些矛盾的全面超越和总体解决。苏联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不但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统治,而且是受到一种哲学、文化和科学保证和指导的政治经济统治,它已经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一网打尽,高度集中的组织起来,它鲜明的表现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集中化的权力网络。这种高度的集中化甚至被它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与此不同,在中国 50 至 70 年代据支配地位的毛泽东思想却这样看(尽管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个整体,特别是在 1956 年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这些矛盾。面临着这些困境这些矛盾,在他发表于 1956 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有较全面的论述。毛泽东认为,这些矛盾既包括现代化社会的普遍后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的集团,“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差别。”也包括普遍的利益分化和不可能消除的人的个性的差别,即所谓“有朝气蓬勃的人”也有“暮气沉沉的人”。这种特殊的思路决定了后来毛泽东思想的进向 1958 年,当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之后,毛泽东便开始进一步思考特定的现代社会的后果“工业化”造成的后果了。他倾向于认为:仿照苏联的“五年计划”的工业化造成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种所谓“三大差别”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如果毛泽东的这种思考一开始还没有影响中国

的社会发展道路的话,那么,日益紧张的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则促使了中国发展道路的转向。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上,赫鲁晓夫给中国带来的“贺礼”是核恐吓和撤退专家。苏联“援助”的丧失不仅仅使中国背上惩罚性的债务,更重要的是,由于资金的短缺,中国依靠“资本密集型”发展大工业的现实可能性几乎失去了,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久被搁置的,由毛泽东提议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实际上是迫不得已才成为发展的惟一可能。

正因为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双重后果,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明显升级的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后果的批判,的确十分类似马克思对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后果的批判。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由于消灭了财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有希望消灭工业化的这些后果。但是,与韦伯和托洛茨基十分相似,毛泽东认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却使一批国家官僚以人民的名义,并不“占有”但“实际上支配”生产资料。这些官僚以他们特殊的政治地位,填充了当年利用特殊的经济地位对社会进行剥削的“统治者”角色。这个利用特殊的政治地位获得经济利益的阶层,和原来的利用剥削的不道德的经济关系获得利益的资产阶级一样,构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毛泽东1956年关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的说法于是逐步升级最终成为以群众运动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当然,指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指出这种“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完全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比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更民主,更进步,而是恰恰相反。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以后第一个发现这一点的人,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但是,与作为学者的韦伯等人不同,毛泽东却是惟一个,当然也

是第一个这样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领袖。这种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不同的进路。

为什么会是这样？在诸多解释中主要的我认为是 50 年代中期的毛泽东“退居二线”的特殊作用。这种“退居二线”使毛泽东能够相对自由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事调查研究，以他所说的“打游击”的游击队方式摆脱具体管理者的角色。与那种毛泽东“离开权力”和“要求重返权力中心的焦虑”的说法不同，毛泽东实际上开始以这样的方式对管理者的权力进行监督，这种监督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民代言人”的批判的方式。有人认为毛泽东“退居二线”是党内“分裂”的开始，但是，这种分裂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权”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解释权”的分离。这种政治“管理权”与“解释权”的分离的确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实验形式。但是，问题出在：整个“解释权”并不是以一种制度的方式，或者说“法典”的方式（像西方世界那样）存在，而是体现在作为“革命导师”的毛泽东思想，最后就是毛泽东本人身上。一个关键的问题总是困扰我们：为什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实验会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甚至群众的内讧？换句话说，为什么那些批判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和组织最终难免变成彼此对立的“派”，而每一“派”都宣称忠于毛主席和代表毛泽东思想？那就是这种围绕着“解释权”的合法性的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其实不可避免，由于这种“解释权”并不是“自主化”的，而是人格化的，它不能，也不是对管理的“制度化”的监督，它甚至根本也不是一种“制度”或一系列“制度”，而是“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或毛泽东本人的巨大威望，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监督”。当然，如果非要反过来说也可以：那就是毛泽东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群众运动”，来扩大他的“个人崇拜”，用这种“个人”对党

的管理者进行监督。

但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是人民中国和党的缔造者，他的许多革命同志与他一样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所以，尽管他看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势必造成一个封闭的，只关心自身特殊利益的官僚阶层，造成了党的“退化变质”，他还是相信这个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在最激进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针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视为“政治革命”，而只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文化革命”。

同样，毛泽东本人，像 18 世纪以来的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一样，既是现代性的目的论者，也并没有彻底怀疑过工业化。这意味着，他没有怀疑过这样的“发展主义”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水平和程度之上。因为 18 世纪的思想，就是建立在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可疑的，孤立的和实证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论证之上的。尽管无论马克思还是毛泽东对工业革命的负面结果均有深刻的认识，今天，由于发达国家对工业化和制造业的转移和放弃，新兴地区（特别是日本）的崛起的事实，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活动完全不等于工业化大生产，而是一个包含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的不同环节的过程。然而，毛泽东毕竟没有生活在这样一个工业化模式被日益放弃的时代。相反，毛泽东全力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这首先是因为在他的时代“工业化”是世界潮流。毫无疑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的人民中国，几乎普及了识字率，极大提高了下层社会和女性的地位和尊严，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平均福利和人均寿命，建造了完善的工业基础和市场交换的人的和物质的条件，为中国的世纪崛起，奠定了举世公认的基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毛泽东认为工业化程度不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惟一标准的看法，今天看来是正确的。这个看法，与马克思关于“商品贸易”与“工业生产”同样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的看法一

样,是对僵化的“工业化”论者的有力批评。

实际上,并非反对现代化,而正是现代化的后果(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工业化的后果),与社会主义理想的矛盾,构成了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深刻的内在于马列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同时,也深刻的内在于18世纪以来整个西方知识体系中,这就是:在马列主义看来:一方面工业化程度和经济水平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惟一尺度,因为这个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是社会平等和社会民主的标准;另一方面,马列主义却认为工业化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前提。这样的知识矛盾在本世纪的50年代末深刻的出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他问道:社会主义的不占有,然而支配生产资料的官僚,与资本主义的“经理”有什么不同?如果他们之间很少不同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如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完全受经济的惟一原则支配,那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在哪里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目的”的追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在于发展生产还是人民民主的追问,是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目的论的追问,这种历史目的论预设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改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合目的的统一”。这种追问也表达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学的特色,毛泽东本人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平民经济学家”,他不是站在资本的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角度去理解生产、消费和就业问题的,而是站在一般平民的立场上理解这些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平民经济学天然地拒绝盲目生产,消费差距,同时,坚决拒绝失业。但是,既要“发展”又必须保证这些目标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

毛泽东力图通过这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回答这些问题:尽管历史唯物主义预先假设了经济因素为基础,毛泽东认为,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时期的确如此,但是,他认为无产阶级一旦开创了不

再由经济支配而相反经济只是社会附属的时代,这种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再适合新的社会,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采取了新的形式。不是经济的决定作用,而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造成的人民的“主人翁意识”,是人民的“觉悟”和“创造性”,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所在。

毛泽东思想经常被要求要对 50 至 70 年代中国的经济停滞、混乱的阶级斗争和个人崇拜负责,但是,正是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在他那里经常就是“农民”,通过艰苦的劳动,为人民中国的生存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劳动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而人民也付出了严重的代价。但是,我们总是忘了问一问:如果人民实际上不再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主人,结果会是怎样?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人民之所以愿意付出代价,正是因为人民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主人。阶级斗争造成的混乱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失误也应该把对当时历史状况的困难考虑在内:一方面是中国工业化的某种看得见的后果,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当时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全局霸权力量(这在 1959 年的戴维营会谈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它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同样的进行核恐吓,内部则是严重的官僚集团的专政。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知识和现实的矛盾的产物。我认为,如果讨论毛泽东思想的失误,首先应该是把这种失误看做是受到这种特定知识和现实局限造成的。

由于这样的局限,毛泽东选择的可能性实际上不大。也许他只能相信,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有能力和信心克服这些矛盾。从 50 年代末开始,毛泽东先是把视野由城市工业化转向农村公社化,然后,在 60 年代中又转向城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基本思路是通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来克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后果,同时探索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式。

毛泽东认为群众运动就是这些矛盾的释放,而这些矛盾的释放反过来有利于强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结构力度和发展进程。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必须探索一条特殊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他甚至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努力把这种态度发展为一种哲学。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回答是改革传统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什么?斯大林主义的回答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就是生产力。毛泽东拒绝这样的回答,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现代化社会的那些普遍的对立性后果,与整个人类活动相伴随的人的经济的、阶级的、文化的和个性的差异和矛盾,像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一样,深深地植根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之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地认为是这些从根本上说永存的“矛盾”。他说:“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正是这句话使他与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开了距离。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1966年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启了两个结局并不美妙的时期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失败实验。首先,这两个实验的开端都与文学有关,但是,显然绝非简单的为了解决文学问题。1956年的“百花运动”首先导源于苏联的“解冻”运动和“非斯大林主义”运动,以及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把二者通过这样的思想联系起来:开放这些矛盾,将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调动地方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造成“民主”和“心情舒畅”的局面对现代化高潮有利无害,相反,倒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优越之所在,因为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最终可以克服这些矛盾。但是,事实上当这些矛盾的释放无法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构想中解决,反倒使人们更深入地陷入



无穷的矛盾和困境中时，他就不得不终止这些实验，甚至不惜以类似斯大林主义的方式使其暂停。在这里，“毛泽东式的悖论循环”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进步，却不能不与特定的发展生产力的方案（在当时的理解就是国家工业化）结合起来并以工业化为前提，或者说工业化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发展主义”），那么，高度工业化与官僚政治，城乡差别，社会分化这种“副产品”之间的联系就同样也是必然的。于是，在这样的“现代化”道路上，在这样的现代性的思路中，完全不能设想，对官僚政治和社会分化的攻击，不会威胁工业化进程。而对工业化的威胁，对发展经济的威胁，也就是对“生产”的威胁，无论在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意义上，这也就是对“社会进步”的威胁。如果说，毛泽东当发现“生产”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立即停止他激进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那么，任何人以维护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来维护社会分化和官僚制度，甚至放弃某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就也是说得通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实验的失败，我们很难判定毛泽东的思路究竟是否成功了。这种思路是：以开放和释放矛盾的方式强化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结构。以开放矛盾的方式加强“集中化”，工业化，以“抓革命”来“促生产”以造反和革命的方式进行统治，不过意味着摸索和设想一种道路以摆脱官僚制度和社会分化的方式，来进行高速工业化。但是，有一点却是毛泽东思想所揭示的现代性社会的一种“描述性”的“真实”：现代社会是一个内在矛盾的社会，但是，其总体趋向却是趋于“集中化”。或者，现代社会是“集中化”的，充满矛盾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要反对的官僚制度和社会不平等，正是高速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恰好不是工业化所能够消除的。

今天看来,仅仅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远远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解释困境。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做“现代化论”的理解十分成问题。因为马克思虽然认为现代工业化是社会进步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这种工业化的后果漠然视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对这个后果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激烈批判之上的。马克思以这样的方式揭示了人类的现代困境(如果不是解决这个困境的话),而声称“那段历史永远终结了”,不过是为了使我们忘记我们依旧处在那个历史的困境中不得其出的现实处境,这个困境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困境。

毛泽东曾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设计蓝图说:“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样一种生动的政治局面。”但是,今天这听起来就是对韦伯所描述的灰色的现代困境状态的乐观的、理想主义的玫瑰色的表述罢了。如今,这种玫瑰色已经消退,看起来,剩下的依然是那种严酷的困境:在新的条件下的社会日益集中化,也制造出新的矛盾形式。

# 毛泽东难题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历史宿命

田力为

在毛泽东领导的以反帝反殖为目标的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正处在“知识殖民化”的进行时态中；当中国必须走平民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西方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才刚刚为中国知识精英所知悉和欣赏；当中国必须走协调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才得到一个机会试图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西方社会那样的金字塔结构；当中国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时，需要创造性的“通”人时，中国知识精英却热中于“会”，无论如何都舍不得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国进步需要思想上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大宗师”，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却热中于“与国际接轨”成为全球化的“匠人”。

从中国革命到中国建设时代，中国知识精英似乎总也不是自觉的弄潮儿和排头兵。更为悲哀的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个人命运似乎总是与民族命运联系不到一起，在中国知识精英努力的方向上，总是见不到民族振兴的未来。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在中国往往成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一股力量，至今仍然如此。

中国人从1840年以后，就一直有一个极端强烈的强国梦，但是又空前地陷入“先生总是打学生”的困惑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困境”，走西方的道路不符合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照顾多数人利益的道路与精英阶层的愿望有距离，中国又无法总是排除

精英阶层的领导,中国精英们又没有摆脱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独自发展的能力。正是处在这个“中国困境”之中,20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过“两正两反”的曲折,大概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密集的社会总体认识的简单反复。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不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而且无法得到足够的自然资源的支持毕竟“只有一个地球”,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西方的道路才被说成是普遍的在中国也可以取得成功的道路。中国主流精英不能或者是根本不愿意走出这个“中国困境”,这大概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的历史宿命。

### 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突出毛病

由于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从精英主义者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多少总是与平民立场有所区别。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中,与平民利益的分化就非常突出,与宗主国的联系也同样密切,作为“殖民地文化”的载体和宗主国的本地代表。英印政府的教育主管麦考利就曾经特别注重培养这样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这批人就血统和肤色而言是印度人,但就爱好、见解、道德和才智而言是英国人”。

也许是由于在毛泽东时代平民主义发展战略中的压抑;由于中华文化对精英主义的排斥;由于中国正处在精英主义化的紧要关头;今天中国的精英主义者是世界上最最真诚的极端精英主义的信奉者。中国主流精英对哈耶克的追捧;对所谓知识经济实质是垄断利润的谀颂;对中国工人农民的长期妖魔化;对民族利益的漠视和对西方后冷战意识形态——现代化和民主——的真诚拥抱。在今天的世界上都是独树一帜的。

## 毛泽东时代知识精英和官员在中国社会的独特地位

毛泽东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完全不同于马列的阶级范畴。在马列那里阶级是特定生产关系下的利益集团,而解放后的中国这些特定利益集体已经不再存在,马列的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毛泽东那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反对精英特权和精英主义者建立优势社会地位的努力,是防患于未然和对精英主义的深刻惕戒。非常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反对精英主义的继续革命理论,是中苏两党认识分歧的一个主要根源,苏联共产党人则与毛泽东相反,认为阶级一经消灭就永远消灭,就已经是全民党和全民国家。永远不会有在精英主义影响下产生复辟的可能,这在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巨变中,得到证明的是毛泽东的远见而不是苏共的教条主义。

而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下的阶级范畴,是一个未来事态的现在表现,本质上是反对精英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阶级斗争天天讲”就是立足于“防腐拒变”,制止精英主义者在社会上建立优势地位和制造阶层分化的努力,进而破坏毛泽东既定的平民主义的发展路线,取消平民革命的成果,破坏社会各个阶层的整合,导致社会矛盾积累和激化和下一次革命的产生,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整合,改出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循环。

毛泽东一直把知识精英和官员阶层,作为将来肯定导致“红色江山变色”的开路人来防范和教育的。毛泽东希冀通过知识精英自身的认识进步和外在的思想斗争手段,达到使精英主义者自觉放弃精英主义思想的目的,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而使中国的平民主义革命遗产能够流传下去,并实现良好的社会阶

层整合,真正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和革命的再次发生。

## 毛泽东难题与其烛照人类未来的理性光辉

毛泽东为了解决中国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相结合的问题,使用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手法,一方面希望精英主义者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另一个方面发动群众运动试图对精英主义进行追究和监督。毛泽东也深知要真正使知识精英自觉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绝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因为中国精英阶层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仅不愿意放弃精英主义思想,而且还热中于在社会上制造阶层分化并以此建立自身的优势地位。所以毛泽东认同需要外在的强制监督措施,需要大民主运动来解放民众的思想,实现对精英主义的追究和帮助反省。而且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反精英主义的效果长期保持,需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实现对社会上精英主义的清算,而“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在于替代改朝换代的残酷战争,以大乱带来大治。

实际上实现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协调,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难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长久的难题。如果能够一劳永逸地实现这个协调目标,什么“历史前进的二律背反”,什么“科学进步导致道德退化”,什么“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的过程都不会发生,“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就有指日可待了。这个问题既是孔子时代——氏族社会面临解体道德自觉开始丧失——人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当今所有国际争端和国内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不复困扰人们。

据笔者所知,毛泽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真诚最坚决地向这个

难题发起冲击的领袖,毛泽东超越一切学者文人和理想主义者,超越一切政客和政治家,是孔孟以降最诚挚的卫道者。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真实践行,今天我们将无法明了孔孟之道对今天的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鞍钢宪法),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发出“五·七指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希望知识精英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和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了解,自己走出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藩篱。这些后来被知识精英称为“民粹主义”(李泽厚)或者被形容成“劳改”的行动,其中的深切用意虽然被中国精英刻意抹杀和歪曲,但是其中的理性光辉已经烛照了中华志士数千年之久,直接来自中国的先秦时代。孟子提到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实际上就在于帮助摆脱自身的欲望束缚,克服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想的主导,达到孔子所说的“反身而诚”的必由之路。正如民间谚语所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毛泽东的真实践行对人类未来道路的启示性意义在于:

1. 破坏社会协调的关键在于精英主义者建立优势地位和社会秩序的努力,反对精英主义是一个长期和不可松懈的任务。

2. 对精英主义者进行改造和监督的主要手段包括两个方面:要求精英经过艰苦劳动锻炼(这一思想来自孔孟)和大民主形式的舆论监督。其他的社会控制手段(如立足于物质利益的管理手段和司法监督手段)对精英主义者是无效的。

3. 实现人与人关系的总体协调,需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配合,在产品战略上需要以最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为指导,注重适度技术应用和普及。即既以人的需要为最终生产目的,也以人的广泛参与(即低技术就业扩大)作为生产的出发点,高档消

费品和人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优先地位。

4. 在解决人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和民生困难时,可以依靠大多数民众的自觉和热忱。国家安全可以过非军备竞赛方式得到加强,这就是国土防御战略与人民战争的配合,无形资源可以替代有形资源。坚定的战略意志和战略决心可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一样是重要的威慑力量对维护和平有利。中国的农业条件改善和国家安全态势的改善都是通过社会动员实现的。



## “文革”所处的世界和历史时刻

——“文革”群众运动发展与结束的原因另探

萧喜东

中国“文化大革命”是 20 世纪最独特也最备受争议的一次群众运动。其中争议最多的一部分，也就是“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猝然而止的情形、原因和后果。众所周知，1968 年夏天，“文革”运动的领导者们为解决广西省严重的武斗问题，发布了《七·三布告》，其严厉的措施也应用到其他省份，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手段，制止了各地的混乱现象，也将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运动告一段落。这一段历史，被后来的一些人解释为毛泽东亲自发动“文革”的群众运动，又出尔反尔亲手结束“文革”的群众运动。进而推断，毛泽东只是利用了“文革”中前后兴起的各种派别，而达到自己打倒政敌的目的。于是得出造反派受骗上当，被蒙蔽被利用等等说法。最后，干脆将“文革”贬低成为从上到下一场无原则的争权夺利的内斗。

这里，首先应该指出，毛泽东是“文革”群众运动的发起者、支持者和同盟者，他发动运动时冲破层层障碍，一次不行，再试一次，直到基层群众的大民主运动全面铺开；毛泽东对参加造反运动的群众的支持是在顶着反对派的强烈抵制，越过党政官僚程序的繁文缛节直接通向基层群众；同样，从群众中爆发出来的参与大民主的巨大积极性，也反过来印证了毛泽东“文革”部署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历史上的所有群众运动中，很少有像“文革”这样与领袖的紧密关系；历史上的所有政治事件，也很少有像“文革”这样具有如

此广泛的群众性。在“文革”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发生了秩序混乱、宗派主义、极端行为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和造反派本身的纪律、素质和思想理论水平等问题有关,也和那些反对与不理解“文革”运动的社会势力的抵抗等因素有重大关系,特别是后者,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毛泽东和其他“文革”运动领导者在“文革”运动各阶段中的进退部署和反对各种极端倾向的前后变化,只能说明运动本身发展规律和各种客观条件对领导者的主观意图的制约,而不能推断出什么所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的”、“背后的”动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整个思想动机,应从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前后的言论中,以及毛泽东晚年所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献中探讨,这应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已经指出的造反派自身问题、保守派抵抗和运动本身发展规律等因素之外,再指出一个在更大范围内影响和制约中国“文革”运动发展的变数,即国际环境的影响,也就是60年代中国所处的世界和历史时刻。要想说明“文革”的最重大的意义,要想理解“文革”作为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又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这一貌似矛盾的论断的深刻性,要想理解为什么“文革”群众运动曾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最高理想冲击而又从激进的高潮回落,就必须理解:新中国在战后东西方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抗争中的特殊地位,进入60年代以来全球反体制运动的高涨,以及全球性的世界革命运动的交错不平衡发展。

## 反帝反殖、反修防修与西方反体制运动： “文革”与世界革命

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已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作了论述,特别是对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阶段的继续革命的问题作了有深刻预见性的展望。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刻,在陕北的共产党领导人对当时西班牙人民反对欧洲法西斯国家干涉内战的斗争,和埃塞俄比亚人民反对法西斯意大利侵略的斗争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以及当时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它们的共时性,也就是同属于一个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革命时代。毛泽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划分了前后两大世界革命时代,即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在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时代,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性质的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世界革命,也即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sup>[1]</sup>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并“在革命的战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同时“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sup>[2]</sup>。在这个整体性的世界革命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特别是由“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到“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阶段如何继

续革命,成为关键问题。

二战结束迎来了这个世界革命的黄金时代。二战后发生的几次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都是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性质的革命战争,包括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等。当然战后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场革命战争,是中国的解放战争,因为它不仅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防线,更因为它所起到的巨大的示范作用和辐射效用:中国革命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陆上处于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以农民问题为主要社会问题的不发达国家,探索出一条反帝反封、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将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广到这些亚非拉地区,就能形成一个以广大的“世界的农村”包围“欧美帝国主义城市”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民战争。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互相支持,将许多条绞索套在帝国主义的脖子上,将它分割开来打败。<sup>[3]</sup>

中国革命这样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经验,也成为60年代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上的分歧的根源之一: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集团愈来愈向美国妥协投降,成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和合作者,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坚持不应放弃武装斗争。新中国的地位和使命规定它要想成功地向社会主义阶段迈进,必须从世界革命的迅猛发展中得到支持,也就必须积极支持世界上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支持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从而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紧密不可分。这里面,反帝反殖与反修防修的关系,有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的内容。在国际上,苏联领导集团追求美苏缓和体制,企图和美国共同控制和扑灭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帮助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以世

界市场和自由主义为内容的新殖民主义得以“和平发展”，或是对民族解放斗争采取利己主义的操纵利用。在国内层面，苏联体制日益脱离群众，依赖专家和精英治国的路线，在追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方面，迅速地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靠拢。如此发展下去的道路，将不再成为对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人民争取独立后建设国家的有吸引力的榜样，而和美国所推销的新殖民主义相差无几，并日益趋同。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又是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在中共“九评”中所着重分析的在修正主义路上走得最远的南斯拉夫，其对外关系上对帝国主义的和解，经济上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接轨”，和国内以“市场化”、“私有化”为内容的南斯拉夫特色“改革开放”并行推进。<sup>[4]</sup>同样，中国60年代初在外交路线上被一些人提出的“三和一少”（对国际帝修反要和，对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援助要少）的右倾主张，与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留地，包产到户）等市场化、单干风的倾向相辅相成。总之，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本主义残余和自发势力的影响，形成一种合力，压迫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革命的初衷，放弃斗争性，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反抗者转变成体系内遵守规则的合作者。

与反帝反殖、反修防修共同构成战后世界矛盾斗争整体的另一条线索，就是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所酝酿的反体制运动。这样的反体制运动，是在战后20多年国际冷战体制内，西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进入60年代开始衰退的背景下高涨起来的。而西方反体制运动，又和世界上非西方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和以中国人民为主的反修斗争紧密地连在一起。首先，从二战结束到60年代，是西方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全盛、并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以劳动工序无限细分、机器技术专用化、劳动过程无限

单调化、工人技能不断降低、大众消费主义为特点的西方福特主义社会生产调控方式即将显露危机，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也暴露出弊病，而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立探索和大胆实验引起了西方进步人士的注意。为闯出一条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缩小城乡、体脑和工农三大差别，毛泽东大力支持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并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工业与农业相结合、文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工农要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等设想。中国人民的实践力图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官僚化、精英化社会形态是最合理、最有效、并是一切非西方国家所必须仿效的制度的神话，为西方知识界反思资本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在西方校园和西方青年学生中，也开始积极反对为统治阶级和精英所服务的教育制度，提出为社区服务、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等呼声。

第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进步运动开始冲破统治阶级所强加的冷战话语，也开始批判苏联和追随苏联的西方共产党放弃革命斗争和革命理想、脱离群众、日益官僚化和精英化的倾向。为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仗义执言并无私帮助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民试图走出一条群众性、参与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赢得了西方进步力量的极大关注和期望。一个有别于“旧左派”的、不听命于苏联指挥棒的西方“新左派”进步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思想文化战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除了经济、政治革命，还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群众意识和文化思想，夺取在思想领域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则在“文革”的纲领中提出：“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

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sup>[5]</sup>中国“文化大革命”“改造人的灵魂、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宣言,在西方的校园和街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

包含有以上几个内容的西方内部的反体制运动,进入60年代开始高涨,在中国“文革”爆发后的一两年内达到高潮。具体引发这一系列运动的触发事件,主要是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侵略战争。美国人民和其他西方国家人民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行动,很快就自觉地发展成为反帝反资的革命运动,并和本国内的反对种族主义、争取民权运动结合,和国际上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斗争结合,形成了一场蔚为壮观的世界革命的大排演。<sup>[6]</sup>由于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美国战争干涉所引起的越南民族解放斗争成为整个60年代世界反体制运动的关注重心,而由于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紧密联系,以及中国与越南之间的重要的地缘战略关系,中国成为世界上民族解放革命的坚强后盾和大后方,也成为西方内部反体制进步力量的同盟军和最雄厚的精神资源。

由上所述,进入世界20世纪60年代,基于一个罕见的历史机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古国脱胎出来的一个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发达核心国家内反体制革命运动的一面战斗旗帜。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反修斗争、西方的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反体制运动,以及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重焦点。正是在当时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在世界进步

人民中间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世界革命的中心，在 20 世纪 60 年代移向东方，移到了亚洲、移到了中国。

## 战争与革命：“文革”所处的世界和历史时刻

如上所述，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同盟军，它自身革命的命运也就和世界革命的其他组成部分的命运休戚与共，成败相系。亦如上所述，在整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内，世界革命的各个组成部分，各具不同的社会性质，在它们相互支援、响应的同时，也存在着紧张和矛盾。不同国家内部的不同社会性质的革命，以及同一革命中具有不同社会性质的不同阶段，既互为依托，又互相制约。总之，作为整个时代特征的世界革命，是一个相互关联、前后衔接、交错不平衡发展的过程。比如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国家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主要表现为对帝国主义及其奴仆的革命战争形式，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则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下对经济基础进行改造，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主要表现为触及灵魂的文斗，和在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但由于国际上战争危险的存在，国内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混杂交错，也会偶尔表现为暴力冲突。毛泽东经过对社会主义的独立思考，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反复斗争、不平衡的、曲折发展的漫长过程。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反体制运动，包括东方的反帝斗争、西方的文化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继续革命，具有并行性和不平衡性发展的特点。<sup>[7]</sup>这种特点的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革命与战争的两种前途交替出现，且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排斥。毛泽东认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



是革命制止战争。”这个简要精辟的论断，不仅揭示了世界范围内战争与革命的两种因果关系，也指出了革命与战争的两种可能的先后顺序，而这两种相反的顺序，则对具体某一国、某一革命有着巨大的决定作用。具体说，中国“文革”的进程和成败是与世界范围内革命和战争的总的形势（包括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继续革命）相联系在一起。在世界范围内、在一定时刻，是革命，还是战争起主导作用，决定着中国“文革”运动的命运。当然，战争能够引起革命，革命能够阻止战争，但革命和战争的先后对中国“文革”运动的日程表有着巨大的决定作用。

现在，不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上革命与战争的情势。和战后任何其他时期相比较，60 年代是最为革命动荡的年代。从亚非拉的广阔大陆，到西方国家的大都市和校园，是一派“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景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首先来看，在帝国主义远东前线地区的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50 年代的战争风云在退却，而充当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远东堡垒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除了台湾社会在蒋家王朝的专制下相对平静外，在当地社会内部都掀起了空前的革命浪潮。日本人民斗争的焦点是声援亚洲其他地区（主要是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反帝斗争，以及反对美国的军事占领，比如著名的三里冢反对建机场斗争等。在一个时期内，由工人、农民、学生和左翼革命者的斗争发展到了大规模群众性街头抗争的对抗性方式，严重地冲击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对战后美日战争机器起到了极大的牵制作用。<sup>[8]</sup>

假如说 60 年代在日本列岛出现了革命制止战争的情态,在中国边境以南,战争的风暴则愈演愈烈。美国 60 年代在东南亚的军事冒险,和它 50 年代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战争行动一样,是为了围堵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巨大的示范作用和辐射效用。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国家,和中国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条件,传统上受中国影响,中国革命波及到这些国家几乎是注定的。而一旦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的模式就会更进一步地传播到亚非拉广大地区,从根本上危及美国的战后世界体系。而一旦扑灭中国周边国家的革命,也就能有效地封锁中国,加大中国革命政权的困难,加强和平演变的内外条件。这就是 60 年代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与革命的情势。美国于 1964 年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次年 3 月在南方投入地面部队,此后不断增加参战部队,在 1969 年最高峰时达 54 万。美国在印度支那镇压当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侵略战争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引起了更彻底的革命,导致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

亚洲其他地区,在那些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相似的农业社会中,革命的力量迅速地发展起来,很多国家的革命者都自觉地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发展成为一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力量,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原因,印尼共产党 1965 年蒙受了类似中共 1927 年“四一二”浩劫的重大损失。在九卅运动失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有 30 多万人遭到杀害。一个正在走向中国革命之路的亚洲大国的革命前途受到空前的挫折。在中国周边的缅甸、泰国和印度,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人民游击战争,其中在缅甸直接受到了“文革”的冲击和影响。在帝国主义所企图控制的咽喉地区的中东,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战争冒

险,特别是1967年6月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美军出兵干涉黎巴嫩等,则起到了唤醒当地人民的革命意识的作用,兴起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并激发了70年代的黎巴嫩内战等。

在西半球独树一帜的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的英雄主义,60年代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广大地区发生影响。从亚非拉的广大地区,到欧洲国家的半边陲地区,如伊拉克、香港、墨西哥、尼日利亚、阿根廷、希腊等,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街头抗争、游击斗争、或反帝、民族主义性质的夺取政权斗争。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60年代也不平静。在波兰、南斯拉夫,出现了学生对抗学校和政府当局的运动。当然,东欧国家中最为举世瞩目的一个事件就是“布拉格之春”运动以及随后苏联的入侵。60年代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内的社会运动,与60年代世界各地反体制运动所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学生青年为主力军,然而在苏联东欧领导集团长期统治下的东欧社会,社会官僚化、政治空洞化,其社会运动也因此缺乏60年代世界上其他地区青年运动所具有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明确倾向。另一方面,“布拉格之春”运动中,上层知识分子精英(包括很多是所谓“自由主义的”共产党人“改革派”)主导了整个运动的走向和话语结构。尽管如此,带有极大群众性的“布拉格之春”运动,一旦脱离上层精英的操纵,一旦由广泛的工农群众接管领导权,在60年代的气氛下,它具有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反修革命的前景。1968年8月20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苏军出兵的借口,即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反社会主义倾向”,一部分是事实,但这恰恰也是苏联路线长期忽视无产阶级政治、忽视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斗争所导致的。一旦出现了问题,又惊慌失措,不敢发动群众,害怕大民主,不敢依靠工农阶级,而采取简单粗暴的镇压和践

踏别国主权的手法。苏军侵略暂时扑灭了动乱,也断送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把“布拉格之春”推向社会主义反修革命的可能,更建立了社会帝国主义干涉他国的恶劣先例:“勃列日涅夫主义”以所谓“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来酝酿针对中国的战争侵略的预谋。

在整个 60 年代的世界动荡中,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最直接威胁的,还是来自体系中心国家内的反体制运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中,都出现了不安的骚动。具有明确革命倾向的社会运动在帝国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中心的都市和校园里此起彼伏。特别是在 1968 年,欧洲出现了自十月革命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最壮阔的革命浪潮和最激动人心的革命前景。在北美,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等“新左派”反体制运动对战后美国社会的稳定繁荣产生了巨大冲击。

1967 年 10 月,大约 20 万人聚集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反战示威。同时,有 3.5 万多名青年冲击美国国防部,与警察发生冲突。1968 年 4 月 4 日,美国主张非暴力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被害身亡,由此将反战、民权和学生运动与体制之间的冲突骤然提高。4 月 30 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占领大学教室楼。一周后,纽约警察攻入五栋建筑,造成 148 人受伤,700 多名学生被捕。5 月 21 日,再次爆发了占领教学楼事件。8 月 28 日,美国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代表大会。反战运动和其他运动的示威抗议者和警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警察用警棍和催泪弹镇压示威者,警察殴打学生的场面通过电视画面传给美国公众。然而,激烈的反体制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统治阶级,尼克松于 1968 年 11 月当选总统后,扩大了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规模。

大约同时,在大西洋对岸的法国,发生了 20 世纪西方发达国

家内第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尝试,并向着胜利作了最为有力的一次冲击,然而力量斗争的平衡在最关键的一刻滑向保守的一方,世界革命在资本主义核心环节打开缺口的努力功亏一篑。从1968年3月22日起,由农泰尔文学院、索邦学院和巴黎大学发源的左翼学生运动,发展到五月中旬,已经成为包含法国社会各界群众的全民性反抗运动,巴黎及整个法国的百万工人大罢工,一些工厂的工人还关押经理,占领和接管工厂,使法国处于经济崩溃和政治失控的边缘。戴高乐于5月30日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以混淆视听、号召保守派反扑等等手段,并调动军队,挽回了危局,“巴黎五月”运动被瓦解,法国人民痛失了一次历史性的宝贵机会,世界革命的一个契机也稍纵即逝。

从全球的角度看,6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中后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即中心、半边陲和边陲地区,都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激变中;各种革命运动所共同具有的青年性,加强了它们之间的共时感和团结感、认同感。另一方面分别发生在西方的“以革命反对战争”为主导的“新左”运动,和东方的“以战争争取革命”为主导的传统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同时并行发展,表现出世界整体革命的不同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2. 中国“文化大革命”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作是“革命中的革命”,<sup>[9]</sup>也处于西方意义下的“反精英新革命”、“文化革命”与东方意义下的“反帝传统革命”的交汇点和重叠部分。因此发生在不发达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成为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内新左运动的最先进的革命旗帜,中国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实践的先锋。

3. 中国除了有先进革命的使命(即“革命中的革命”)之外,还要支援民族解放斗争和面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因此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给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两个内容,即自身社会的继续革命、不断改造,和支持、巩固周边国家的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紧张关系,两个目标之间在长远来讲互相支持,在短期之内,则可能是互相排斥。

“文革”群众运动进入60年代末形势急转直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要从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修、反体制运动的失利和退潮中去寻找。1968年以后,战争引起革命的可能渐渐压过了革命制止战争的前景,特别是由于中国周边的战争可能性骤然加大,帝国主义(包括社会帝国主义)中心先发生革命、从内部自行瓦解的可能性渐渐消失,中国的“文革”运动也因此被迫做出调整。

### 战争与革命的抉择:“文革”群众运动的命运

我们现在再在世界局势的背景下来看中国的“文革”。“文革”所处的60年代与50年代的最重大区别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局势趋于稳定,战争的威胁向南转移到印度支那半岛,而且这一次帝国主义采用了谨慎得多的策略。60年代这一变化,为中国专心解决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空间。可以肯定,假如60年代在朝鲜半岛或台湾海峡出现帝国主义战争挑衅的话,“文革”运动本身的限制就会大很多。即便如此,“文革”中在东南沿海的军队内部,也一直禁止开展“四大”。<sup>[10]</sup>

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上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文革”的关系是复杂曲折的。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通过世界资本主义市

场的不断深化,以及对边缘地区的融合纳入、深化、结构化的过程达到自身的生存和扩张。任何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对这个过程的反制和威胁。特别是在那些社会经济条件和中国相似的国家里,遵循中国革命的人民战争和农村包围城市等战略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更大。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围堵发生在中国周边地区的革命不遗余力的原因。受中国影响,越、老、柬、印尼、缅甸、泰国乃至印度和日本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前景,构成对中国本身的继续革命的巨大支持和推动。另一方面,中国周边的民族解放运动,大多表现为革命战争形式,既给中国本身造成战争压力,也要求中国在必要时给予人力和物力支持。更由于中国革命本身的不平衡性,在境外和社会内部还存在着反动势力,存在着战争和复辟的直接威胁。总之,中国周边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长远意义上支持和推动中国的继续革命,在短期意义上,燃在中国近旁的印度支那战火制约着中国内部大民主的实行,要求国家机器的稳定和强化<sup>[1]</sup>(境外的那些更多地表现为社会革命而不是革命战争的群众运动,如在香港和印尼1967年发生的斗争,才反而会对中国“文革”产生激进化的作用)。整个60年代,美国对印支战争的卷入呈愈来愈深入之势,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极点。美军于1970年春天开始轰炸柬埔寨,1971年指使西贡军侵入老挝,从而把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地处前线的中国广西省,由于有国防和援越等的多种限制,“文革”形势落后于其他省份,直到1968年夺权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发生了群众组织拦截援越抗美物资的严重问题。是在严峻的外部情势下,《七·三公告》制止了国内运动妨碍国际反帝任务的不正常现象,并为全国的群众运动鸣锣收兵。在国内运动进行斗批改的收尾工作的同时,周恩来总理到达战事吃紧的河内声援越南和老挝人民,表示

“中国将不惜做出民族的最大的牺牲”。在短期和局部意义上，战争抑制了革命，革命让位给了战争。

西方反体制运动在资本主义内部制造震荡，并有可能从堡垒内部瓦解资本主义核心部分的前景，为“文革”的大民主提供了极大的活动空间。进入60年代末，西方反体制运动开始落潮，中国“文革”的这个空间也渐渐闭合。毛泽东在准备和部署“文革”的同时，多次发表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言论（见附录），包括1963年和1968年两次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和革命暴动，其中在1968年4月16日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暴动的声明》中明确指出：“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文革”中建立巴黎公社式崭新社会的思潮和群众运动的高潮与西方反体制运动的动荡的高潮于1967年至1968年同时达到波峰。巴黎“五月风暴”未能对体制产生转变性作用；在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等地的群众性的抗争渐渐低落，转变成少数孤立的红军分子的城市游击战争；美国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开始大规模扩大印支战争；在这样的情势下，西方内部的革命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苏联东欧内的仅有的几起群众运动，遭到苏联统治集团的消防式的镇压，没有发生革命制止战争的情况，反而是出现了苏联战争机器制止革命的反常现象。1968年8月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文革”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联领导集团所推销的“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矛头直接对准中国，准备对中国采取帝国主义式的战争侵略。1968年3月以后，苏军在中苏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武装挑衅。苏联统治集团还发出批



诈,声称要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时间,社会帝国主义在北面的战争威胁甚至超过了帝国主义在南面的威胁,中国被迫做出了“大打、早打、打核战”的准备。这也是促使“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迅速复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文革”上是60年代发生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新型革命的组成部分。这场世界革命的斗争场所遍布于广阔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场,及帝国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市与校园。因此,中国“文革”也和世界革命的浪潮同长同消,和世界反帝反殖、反资反修的革命斗争命运与共,而不会有单独的和局部的胜利。“文革”群众运动失利的悖论,群众运动内部派别激烈冲突的悖论,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革命与战争的悖论。

“文革”的群众运动在60年代末迅速复员,而且在一些省份只取得了妥协性的结果,这个原因不仅要从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无政府思想、宗派主义和“右倾回潮反扑”等现象中寻找,更重要的是,也应注意到:在西方国家内,从巴黎的拉丁区到北美的伯克利校园,在第三世界地区,从玻利维亚的山岭到苏门答腊岛的热带丛林,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带,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平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中国的南边和北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战争成了首要的威胁。全球性的革命性转变的机会,在1968年转瞬即逝。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毛泽东指出:“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

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sup>[12]</sup>因此,中国“文化大革命”取得巩固性成果的机会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失去的。由于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都共存于这场世界革命中,也都反映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来,因此,“文化大革命”始终无法以一刀切的手法分清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宗派主义和政治立场的区别,分清意识形态和形式主义的区别。也最终没有能够找到一种完善地协调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从而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

我们或许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文革”斗争中的不同派别之间,中央“文革”和群众派之间,毛泽东和群众之间的在夺权问题、建立公社制的新政权机构等问题上的认识差距,以及他们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不断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到国际形势中革命与战争的两种互相排斥的前景的不断波动,及其所产生的对革命策略的影响。像1967年1月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与被取代,和1967年夏天外交部夺权等事件的变化与转折,应该说都有这个重要因素。可以想像,假如在“文革”群众运动的同时,从苏联内部爆发大规模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从而使苏联东欧国家走上反对修正主义的道路,假如在西欧和北美的反体制运动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根本动摇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心,中国“文革”在群众大民主和巴黎公社民主制度的路上也会走得更远、成果更巩固。

以上的分析能够让我们从一种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文革”中的种种现象。比如说,“文革”中出现了好人斗好人的问题,甚至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暴力的冲突。怎样来解释那些互相斗来斗去的派别,在基本出发点上却是一致的呢?“文革”中同样出现了由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所主导的新的阶级划分。这两个现象无非都是从不同角度宣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确定、不稳定和不平衡的斗争过程。不同群众派别之间的分歧,

常常是反映了他们对局势(包括中国的与世界的)的不同看法,以及对局势的发展前景的不同估计。然而,在“文革”所处的世界和历史时刻,革命形势的发展瞬息万变,特别是世界革命斗争处于扑朔迷离、复杂多样化的互动性阶段,想要得到一个长久眼光的、全面准确的革命策略,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对局势的不同估计以及所作的策略上的细微差别,其影响都是非常重大的,正如战场上的指挥员,在判断上的小小差别,可以造成指挥正确与指挥错误的重大差别,形成严重的后果差别。正因为有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及其后果的严重性,才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同志之间和人民内部上纲上线、甚至严重对抗的倾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占人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正如同中国无法从世界的影响中抽身退出,中国也能够对世界的走向发生很大的影响。“文革”退潮,乃至在80年代初遭到彻底否定,与世界上人民革命斗争低落固然有关,但反过来说,否定“文革”对80年代国际上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右倾保守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交上,中国从为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仗义执言并无私援助的立场,改为所谓“理性”、“现实”的路线,也是造成世界上人民革命正义斗争低落,且各自为战、孤立无援的一部分原因。今天,这个世界大气候的后果又反过来施加在中国身上,造成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以及迫不及待的西化、分化攻势。毛泽东半个多世纪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世界上的革命互相支持的论断,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重大经验教训,在今天显得更加发人深省。

#### 注释

[1] 华勒斯坦在论述法国大革命时,对阶级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表

述了类似的观点。见 I. 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Polity Press, 1991.

[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628—632 页。

[3]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红旗》1967 年第 12 期。

[4]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九评》之三)1963 年 9 月 26 日。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1966 年 8 月 8 日。

[6] I. Wallerstein, “1968: The Great Rehearsal.” in T. Boswell, ed., *Revolution in the World - System*. Greenwood Press, 1989.

[7] G. Arrighi, T. Hopkins and I. Wallerstein, *Antisystemic Movements*. Verso, 1989.

[8] 张承志《日本留言》,《花城》1994 年第 5 期。

[9]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John Fairbank. 199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 - 19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 程超等《浙江“文革”记事》,浙江方志编辑部 1989 年版。

[11] 毛泽东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有关第五十六节“关于共产主义的国家问题”的笔记中写到:“国家的消亡还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这是危险的。”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版),第 224 页。

[12] 毛泽东 1968 年 10 月的一次谈话,见于《红旗》1969 年第 5 期。

## 江山如画宏图展

——从京剧革命看新中国的文化抱负

张广天

在开始正文的讨论以前,我们有必要对“戏曲”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进行一番对照。长期以来,学术界基本是两种观点:一是把戏曲神化,一是把戏曲鬼化。神化说主要讲戏曲万能,国粹之粹,莎士比亚的,布莱希特的,格罗托夫斯基的,应有尽有,而且“早在何时何地、哪出戏中”就已经是“如何如何”了;鬼化说,一方面承认戏曲是戏剧的儿子,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个儿子与众不同。为什么说是“鬼化”?因为自己的儿子跟人不一样,三头六臂,人面狮身,鬼气得很。鬼化说有一个高度,即戏剧的、理论的、美学的、形而上的、科学的高度。它有一把尺子,可以量出戏曲的高矮胖瘦,经常做一些削足适履的补救工作。说来说去,鬼化说就是把戏曲看成异端,但又舍不得扔掉这个私生子,留着哪天遗产纠纷闹起来时,可以用作一张王牌。

然而,不论是神化说,还是鬼化说,都离中国的戏曲事实相去甚远。戏曲的诞生是很难考证的,但戏曲的真正成就却是元以后的事情。中国的文学史很有意思,为什么说唐诗宋词元曲?按鲁迅的说法,诗在唐朝已经做尽了,那为什么还要说唐以后的什么事?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不是本文可以讨论清楚的。但有一点事实是明确无疑的,即宋元以来,不论是文学,还是音乐、舞蹈、美术、表演,甚至体育等诸多门类的最高成就都集中由戏曲体现出来了。尤其近现代的艺术活动,最主要的是戏曲的创作和表演。

可以毫不过分地讲,在近几百年中,如果没有戏曲,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就是一片黑暗。

曾几何时,戏曲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魔洞:它吸引着一切有质量的物质向它靠拢,最后吞噬掉,消化掉,继而变成自己的各个部分。而那些没有被吸引的东西,却在魔洞发射出的光照下陆续烤焦、枯萎。

一个诗的民族,嬗变为戏曲的民族。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里面有更为深刻的原因。这是文牍的、专制的地主阶级的文化,走向生活的、民主的、人民大众的文化的趋向。如果诗在唐朝真的做尽了,那恰恰证明了代表贵族士大夫精神的书面的诗歌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一个以戏曲的面目出现的生动机智的人民诗歌的时代正在逼近。

从另一方面来看,戏曲也并非结果,它更像是一种化装。在衰亡民族无力保护自己文化的时候,它以脸谱和戏装的形式抢救和保护了一切有价值的珍宝,让它们化作形式主义的腔词、台步、念白和锣鼓,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质朴无华地生长着、酝酿着,以避去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浓烟滚滚。等有朝一日,过眼的云烟散尽了,一切都完好无缺、尘埃不染。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出戏,叫做《赵氏孤儿》。

### 拨开迷雾见庐山

假如我们正视着戏曲上述的事实,那么就不难理解诸多京剧革命的问题。正如戏曲不是谁的私生子,也不是什么长辫子小脚,而是近几百年人民艺术的主要方面一样,京剧也不是什么剧种的问题,博物馆珍藏品的问题,却是人民艺术的主要方面的关键部

分。这样看来,我们似乎对批评界聚焦的诗歌、美术、音乐、舞蹈等文化标志都作了否定。很不幸,的确是这样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即戏曲是怎样的,才能说明我们是怎样的,却不是别的什么诗歌、音乐和绘画等等。在我们尚无国力来充分地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的今天,只有戏曲是天然地承上启下的,而别的其他都已经断裂。这就把问题明白地亮出来了:到底是在断裂后的空地上营造一些他样的建筑,还是在承上启下的关系中批判地继承、同时全面地吸收外来的营养?如果我们选了后者,就必然要做戏曲的革命,首当其冲的,也就是京剧的革命。

京剧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改良剧种,而是为了实践一个抱负,一个摆脱了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不良影响的站立起来的民族以自身的能力和活力去建设新文化的宏伟抱负。

因此,样板戏的问题,不能束之高阁。1979年以来,我们之所以敏感,其实是因为江青的原因。江青曾经参与样板戏的创作,这不等于江青就是样板戏。我们要学会从“四人帮”事件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去认识真正属于人民的京剧革命的宝贵遗产。样板戏80年代不谈,可以理解为“伤痕”;90年代不谈,也许就是“疮疤”或者“疮疤”的“痒痒”。但总不能永远不谈,等痛了以后痒痒,痒痒了以后索性麻木,麻木得一无所知、全然忘掉。这绝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结局。

据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层对样板戏有比较公正的看法,多数承认它艺术上有极高的成就,应该把这些与“文化大革命”分开来看。但是,后来有位老作家上书,说电台里一播李铁梅《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高亢唱段,他神经就受不了,就联想到暗无天日的牛棚岁月。不知道是慑于老作家的威望,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此后样板戏真的被打入了冷宫。样板戏的打入冷宫,其实并非

什么一纸政治的手令,或举国上下的“民怨牢骚”等等,的的确确的原因,是某一种意识在文化界的作用。而这种意识冠以自由化、资产阶级、颓废没落等等,都是不实之词,它的核心内容是一股强烈的自然主义生活流的倾向。这种倾向本来与样板戏的艺术方向的差别也就是派别之间的门户之见,没有必要大肆在哲学、美学、文艺理论、艺术各界,乃至教科书的各个角落都塞进对“高大全”、“三突出”的苛刻批判。说实在的,这些批判在从事戏曲工作的艺术家看来,都是一些分寸把握不当的过了头的赞誉之辞。

京剧的皮黄,狭义地讲是两种调式;广义地讲,就是南北民间艺术形式的集大成。二百年前,徽班进京,是对整个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一次自发的大批判、大整理;而六七十年代的样板戏,则是第二次的自觉的实践。这实践有好几代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心血的结晶,里面凝聚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扬弃和再造辉煌的所有最富革命性的思想和行动,绝不只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的私有财产。我们不能因为样板戏身上深重的政治印记,而违心地否定民众的成就。这无疑地就是因噎废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沙家浜芦苇荡中的十八勇士在电闪雷鸣中学习泰山顶上青松的造型;柯湘趁着夜色、带领农民自卫军在《击鼓骂曹》的曲调伴奏下、如天兵神将一般潜入三关镇的故事,都是带有史诗性质的民族神话。而这类民族神话,只有一个深受压迫的民族在解放运动的进程中不断地觉醒、不断地前进才能创造出来。这一丝也不比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独》逊色。如果真有什么集体无意识,我以为,样板戏的艺术正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除了政治印记导致的后怕和惊悸之外,近几年文化学术界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也是使我们如坠迷雾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当今世界,媒体手段已经落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暴力工具,它



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核弹头的威力。帝国主义者在明的战争落下帷幕之后、在各种竞争机制越来越有利于它的存在以后,总是以形形色色的欺诈手段来隐瞒历史、洗涤剥削压迫的罪恶、混淆阶级矛盾和民族差异、扮演和平天使和世界公民。实际上,一场在隐蔽的战线上的暗的战争已经大规模地拉开了。而这种战争,媒体是他们最有效的武器。他们依靠这个武器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洗脑,以期使因为贫穷而丧失发言权的人们在千遍谎言的重复中以善为恶、以黑为白。这个事实,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其他贫困的地方也早已经相当普遍。

因此,庐山的迷雾,不仅有山里的瘴气,也还有山外的阴云。这让我想起毛主席的两句诗:“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 真实的价值

不管迷雾多么婀娜,多么诡谲,庐山还是庐山,巍然不动地屹立着。

京剧革命的出发点是通过对其文化遗产的全面批判整理,以促使新中国文化复兴的高潮的到来。因此,它宏观上的价值在于解放的人民的自信心的确立:一种封资修都不要的无中生有的勇气和自主、自创的能力。按照原来的说法是,古人、洋人、死人,以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局面要彻底结束,展现今人面貌、劳动者现实的艺术要马上登场。

这个观点,如果排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成分,在今天仍然有我们值得深思的地方。

宋以后的中国,基本上是一部衰亡民族的历史。尤其 1840 年

以后,沦为半个殖民地的国家已经满目疮痍。学习西方,如果不本着自强的目的,就是放弃自我,退出历史舞台的做法。这种做法,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不单是民族自杀行为,也是削弱竞争、淡化矛盾的退步,根本上不利于全人类的进步;而复古,肯定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本世纪积极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民众主义,依靠民众的觉悟和解放来挽救民族衰亡的命运,也希望由此来避免发达国家因为阶级矛盾带来的种种灾难深重的危机。

这条路,亚非拉各国,在试验了很多别的途径之后,基本上逐渐都靠拢过来了。它的崭新的方式和潜在的力量让发达国家的统治者坐卧不宁。于是,帝国主义者就纷纷诋毁民族解放运动,制造大同世界的虚假神话,而纳粹和部分保守反动的民族主义又为之提供了口实。实际上,民众解放的民族主义,正是为了通过人民的斗争以首先赢得民族的独立,并随后以独立的姿态共造多民族和睦共处的丰富世界,最后粉碎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政治文化、一种经济结构的霸权主义。霸权者害怕各民族人民的觉醒,而各民族人民中的民族虚无主义,又恰是霸权主义得以存在和蔓延的温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赢得解放以后,必须在文化建设方面首先考虑自信心的缘故。60年代初,对旧戏旧剧、美式电影的反感情绪,已经遍布全国各个阶层,就连上海的小学生都会对花啊、蝴蝶啊一类的颓靡歌曲提出抗议。正是顺应这样的全民要求,文艺革命被推到了社会变革的前台。而之所以选择京剧,这个理由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了。它既是一条捷径,又是一条险径。京剧,可以说是五千年灿烂文明结出的青果,不论甘涩,它毕竟是惟一活得最好的古文化的化石。它的完善体系中贯彻始终的美学观念和价值尺度全然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甚至其后的人文主义标准。这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完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思路在今天是否还

有自我完善、自我突破和自我造就的能力,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

只有给人民一次证明,才能让饱受苦难、目不识丁的人们相信文化正是由他们亲手创造的,也最终可以重新回到他们手中,由他们来掌握、运用和繁荣。那么,除了对京剧这种民族民间最突出典型的例子进行一次革命,还会有什么呢?

## 成功的证明

样板戏的功绩成了一次最有力的自信的证明。它是五四以来惟一从民族自我出发的最高革命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一方面它对外国文化的良好吸收和消化说明了民族文化仍有健康的消化系统,另一方面它从民族神话的再造和直面现实的双重任务和重负下昂首挺立起来,再好不过地证实了中国文化的强大而明智的神经系统坚不可摧。具体起来说,可以归结到以下四个方面:

1. 京剧的程式化模式与布莱希特间隔效果的完美结合:我们可以从后来的一些批判文章的简单化归纳中看出点滴,如正面人物的“高大全”、“红光亮”,反面人物的“短小缺”、“蓝阴暗”;又如“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弱我强”的十六字方针。这些在主题先行和图解概念原则下衍生的技巧手段,无不融会了京剧艺术人物脸谱化、唱念做打程式化及舞台间隔化的精髓。这里面有继承扬弃,也有借鉴发挥。

传统京剧的高度形式主义和简约化风格,为样板戏引进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奠定了基础。形式主义的极端方式化和简约风格的先决判断,使得舞台和生活的距离更进一步地拉开。舞台一旦彻

底摆脱了自然主义和生活流的种种琐碎的累赘束缚,就得以整体地上升到精神的层面。它再也不是普通的叙述和抒情,而是高度浓缩的灵魂世界——人性中最为壮美的险要境界。

那些停留在我们脑海中的独特的悲壮的造型,戏曲开场的一角红色的帷幕,还有斩钉截铁的判明是非的灯光布景。难道不正是由这些构成了我们信仰的明确具体的毫不含混的画面吗?

有一本佛教书上讲,智慧即判断。如果我们不是智慧的人,而是聪明的人;如果我们不想到判断善恶是非,而只沉迷于一般事物不明不白的分析体验中,那么,上述的艺术也许毫无意义。然而,人民尽管是穷困潦倒的、缺乏教育机会的,生活在无数最细碎的事情、最沉重的负担之下的,但却是最最崇高、极富追求的。他们的艺术当然应该直截了当、非此即彼。相反,拖泥带水,喋喋不休,不得要领,烦琐无聊,恰恰属于自作聪明的骑在人民头上的无所作为的剥削者。难怪布莱希特说“辩证的戏剧”,真正联系生活的艺术必是超越生活细节的一种美的法则,一种思想的高瞻远瞩。

为什么怕判断?为什么不肯回答?为什么躲躲藏藏、闪烁其词?有什么不清楚吗?还是故意混淆视听,让原本清楚的糊涂起来?

2. 非主题音乐和瓦格纳主导动机的矛盾统一:样板戏在艺术上最为突出的成就在音乐方面。一般的共识承认,管弦乐队极为自然和谐地被吸引进文武场面,既尊重民族乐器的表达方式,又弥补了气势上的不足和音色上的单调。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在音乐思维上的突破。

京剧的音乐体系称作板腔体系,即板式和调式是基本固定的,但具体的腔调可以根据词的变化和剧情的要求做极为有限的相应调整。一个二黄慢板,唱豪情,唱智慧,唱恩怨,也唱悲愤。这是一

种和主题思维完全相悖的非主题音乐,其魅力在于高度的抽象性、广泛的涵盖性和不朽的恒定性。有人以为,这是原始落后的一曲多用状态,实不知民间艺人正是从专曲专用的成千上万的具体调子中经过反复筛选最后提炼固定下来一种板式的。因此,板式更多地体现了调式、旋律线、律动等原理性的规范,不同于一般的曲调。它厚重,厚重到了透明的程度,好像平行线永不相交的公理一样,无须证实,却放之四海而皆准。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而引进看似截然不同却是有机联系的主导动机法则,也绝非简单地“上升”到了专曲专用的现代歌曲水平。这里面有辩证法。

主导动机还不同于一般的主题音乐,它是瓦格纳用来塑造不同戏剧人物的各种固定音型,即每一个人物有一个专属的动机(请注意!专属人物的动机和专属唱词的曲调是两个极不相同的概念)。样板戏的音乐创作者本着板腔体系板不变腔变的原则,倚重主导动机塑造人物的优势,把变腔手段发展了起来。这样,主导动机就不是什么生硬的东西,而是被纳入到原来的板与腔的矛盾统一中了。例如,《杜鹃山》柯湘在剧终接到上级指示后和《海港》方海珍号召工人们翻仓找散包的两个唱段,都系“苏三离了洪洞县”的西皮流水板,但调子中分别用了人物各自的动机音型,就显得同中有异,曲中有直。而且,音乐在非主题美学原则下也同时起到了有侧重的服务于剧情并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曲多用基础上的专曲专用。

板式的通用性和主导动机的专属性,形成了对比和相互的作用;而前者在格式上的稳定性和后者对应于人物的固定性又在美学气质上体现出异曲同工の妙处。

有些持复古论调的批评家认为,样板戏引进主导动机和主题

先行,破坏了京剧的传统。按照这种说法,我实在不知道京剧的传统是什么了。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吗?是慈禧的封赐带来的“雅化”吗?是皮黄的调子、锣鼓的字谱和龙套、走边吗?是长袖开道、美女如云的地主阶级黄粱梦吗?

我以为,如果阉割了京剧作为民间艺术的革命性,只是到静止状态的一些表面结果,那才是真正的丧失传统。整部京剧的演变史,从头到底就是一部革命史。谭鑫培、程砚秋、周信芳,谁不是革命者?

有些人把传统艺术当作标本封存在博物馆的作法,其实就是要它脱离生存和成长的土壤,快些死去。

3. 以革命人民和人民革命为舞台中心的史诗剧:旧京剧的角色行当,有生旦净末丑,都是老爷、少爷、太太、小姐、将军、大臣之类。毛主席说过,这些没有一个以工农兵为主的。现在样板戏让工农兵登上舞台,唱眼前的现实,不管怎么说,就是一种进步。曾经读过王安忆写去美国晃荡的一篇文章。在纽约的风雪黄昏的街头,她撞见一位分发传单的美国少女。传单上印的是《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剧照。于是,王就问她为什么宣传这些,少女回答说,你们中国工农兵登上了舞台,这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不宣传这个还宣传别的吗?王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样子教训人家,说人家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实。然而,少女还是把传单塞给她,继续在纽约的严寒中走自己的路。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真为王安忆感到丢脸。她的无耻和少女的纯洁形成的鲜明对比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既是要写劳动群众和革命者,那么老生的髯口自然就揭去了;小生不阴不阳的小嗓也不能要了;净角的脸谱也因为不适用于现代生活中的英雄和敌人,便自然瓦解了;普通话的推广,使得中州

韵白的存在毫无基础,显得矫揉造作,因此也就全部改成了京白。这种大刀阔斧的删繁就简,使得精华得以留存、糟粕一概剔除。整体的洗心革面,面目上看去便更为洗练质朴。现象作为障碍被扫除以后,隐藏在戏曲艺术的密林中的各个门类的瑰宝于是就闪出了光芒。就拿行当来说,生旦净末丑面孔上涂抹的脂粉一旦被洗去,那么,塑造人物的理性法则便还原出来,仿佛布莱希特偏重观众理性的史诗剧精神已经呼之欲出。还有许多方面,都印证了脱去伪装之后的汉民族的民间美学思维,与世界各地的人民艺术的方向从根本上存在着默契。

我们似乎看见,脱去行头的诸葛亮,原来是智勇双全的杨子荣;隐藏在各种阴险的脸谱背后的奸臣也可能是鸠山、胡传魁;但击掌的王宝钏、投江的孙尚香已经抖去青衫,变成了强咽深仇、任劳任怨、肩挑重担、品格崇高的党代表。

作为农业文明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符号一经消解,艺术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便得到了全面解放。这个事实向我们昭示了真理:即衰亡民族的文化复兴应该走“礼失求诸野”的道路,而在野艺术的生命力在于觉醒的人民的精 神生活的要求。

写到这里,我想起几年前,为有线台做一个音乐节目,去访问杨春霞老师的事。我带着疑问去找她,希望得到答案或者进一步的疑问。这个问题是当年样板戏被带去非洲演出,黑人群众以他们直观、感悟的节奏性很强的美学心理是怎样看待汉民族的所谓“理法意趣”的。杨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讲了一个故事。那是1974年秋天,《杜鹃山》剧组应布迈丁主席之邀赴阿尔及利亚,参加他们国庆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当时我们带去了同声传译设备,这样当地的观众就能通过他们的语言来听京戏。有一次在奥兰省演出,当演到第三场柯湘教育雷刚时,柯湘说:“同志

们，咱们这里谁给土豪做过事，把手举起来。”于是，农民赤卫队的战士纷纷举起了手。最后，雷刚队长也举起了手。突然，场下的群众也有人高呼：“我也干过”，并举起了手。接着越来越多的观众从座位上站起，争先恐后地举手喊道：“我干过，我干过！”

这个场面感人肺腑，不禁令人想起毛主席的诗：“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受到很大的触动。杨老师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全世界受压迫民族和受压迫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所谓民族文化的界限完全是殖民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阴谋。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离间友好民族，为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以掩盖真正的贫富差别。

革命的人民和人民的革命登上文艺舞台，已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这个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既然哲学的革命从解释世界到了改造世界，戏剧的革命难道不应该这样吗？如果我们从这种关心重大社会题材、强调教育意义，以及改造世界为目的的史诗剧中，看不到力量，看不到丰富的美，那么，我们实际上已经离人民群众很远了。古话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活该那些象牙塔艺术没有观众，他们对市场不景气和票房空虚的唉声叹气，正好比念着自己撰写的悼文走向坟墓。但是，要记住，他们至死都不会放掉手中把持的媒体，哪怕它只是一片聒噪！

4. 从腔词关系到汉藏音乐体系：从传承关系上来说，样板戏的革命不是凭空捏造的空中楼阁，它是有蓝本参照的。在四大名旦出来以前，京剧基本上以老生戏为主。谭鑫培对老生唱腔的改革，使京剧基本建立了板腔音乐体系。而随后的四大名旦又在这个基础上从不同侧面加强了风格化、个性化的改进。其中最突出的要算程砚秋。程砚秋在唱念做打和舞台设计、导演体制等各方



面都进行了改革。他去德国考察,从德国戏剧的成功经验中学习很多有益的东西。然而程砚秋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打破了才子佳人戏的樊笼,以写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为首要。正是基于这样的改变,他更多地关心按字行腔的创作方法,即腔调要服从唱词,不能一味地在板式的框框里填词。自从板腔体系建立以后,按字行腔已经成为戏曲音乐创作的基本手段,但提到法则的高度,是程砚秋完成的。所以,我们只看到程派唱腔的悲抑、哀婉、凄楚、起伏跌宕,还只是表面。在这种情绪和风格的背后,是腔随词变的一条公式。既然程派戏的内容是写受压迫人物的,那么顺应他们的命运,必然在唱腔上就会有悲调的成分。这只是按公式演算的第一道代数题。

样板戏的革命,基本上就是按照程砚秋的路子走的,也是旦角戏为中心,也是按字行腔的大原则。我们可以看到,标准版的京剧样板戏影片,并没有打出歌词字幕,然而却一点也不影响普通群众听懂它。今天甚至用很俚俗的语言写的流行歌曲,要是离开了字幕,也会让听众摸不着头脑。这就是背离按字行腔原则的恶果。

按字行腔的原则,后来由样板戏的主要作曲家于会泳整理,写出了专著《论腔词关系》。腔词关系的核心内容,即强调汉语为声调语言,以长短的变化为主,轻重的变化为辅。因此,平上去入的曲折给腔调的写作已经制定了走向,必须尊重这个规律;另外因为声调的长短占主导地位,均分律动和功能性均分律动就变得不太可能,也即强弱有序的节奏不主要,代之而出现的是散板和节拍变化很大的板。

一个声调的规律,一个板的规律,被揭示出来了,这就不是一件小事。它给研究汉藏语系地区的音乐提供了理论的起点。

统观现有的汉藏语系地方的人民音乐,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

对音乐的决定性作用。这可以使我们的“专业音乐”的教研和创作发生一次反省,即套用德国的和俄罗斯的音乐体系原则是否问题很大?接下来的潜台词已经不言而喻。

从程砚秋到腔词关系到汉藏音乐,一条体系建设的大路已经铺通。而样板戏的革命对此功不可没。

## 深远的影响

样板戏革命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从目前来看,它首先教育和培养了一代人,一代承上启下的复兴民族文化的文艺接班人;其次,在大的文化范畴内,它的确做了一个极好的榜样,让后人看到了这种榜样的力量曾经是怎样力排万难,从衰亡民族的没落文化中依靠民间保存的火种重又蓬勃起来。一条密雨险涩的道路从无路的万水千山中,由无数的先辈们前仆后继、踏血而成。如今,野草和荆棘把它覆盖了。然而关键的时刻,它好比游击队下山的光辉道路,可以起到反败为胜的神奇作用。

认真研究样板戏的发生、发展和发达以及所有的作品细节,有助于我们从最近的前人身上找到经验和血的教训,也有助于我们最为直接地从现实成果中还原隐藏在政治风云和个别形式背后的秘密蓝图。这份蓝图是我们祖孙三代用生命换取的先知先觉的预言,是唤醒民族良心和激发民族活力的金钥匙。鲁迅和毛泽东复兴中华的宏伟计划中,有关文化这部分的最初实践,已由样板戏的革命而完成。我们今天不从这个起点批判继承,再退回到封资修的旧文化泥沼中去踟躇徘徊,必定要吃尽苦头,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引用《海港》方海珍的唱词作为全文的结束:

细读了全会的公报  
激情无限；  
望窗外——  
雨后彩虹飞架蓝天。  
江山如画宏图展，  
怎容妖魔舞翩跹？！  
任凭他诡计多、瞬息万变，  
我这里早已经壁垒森严！

## 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崔之元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还能记得,“鞍钢宪法”的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36年过去了。与这期间的许多事物一样,“鞍钢宪法”也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工业管理学家认识到,“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两参一改三结合”,用今日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teamwork)。日本的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术分工,随时随地解决“无库存生产方式”中出现的问题<sup>[1]</sup>。瑞典的Volvo汽车公司,为了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率优势,于1988年开始,将“装配线”(Assemblyline)改造为“装配岛”(Assemblyisland),使工人不再像从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8至10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sup>[2]</sup>。美国也不甘落后,1995年2月1日国会开始辩论“团队合作法案”。因根据1935年通过的劳工法(WagnerAct),“团队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国现在必须对劳工法提

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团队合作”的效率潜力<sup>[3]</sup>。

在这股“后福特主义”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所推崇的“鞍钢宪法”,以其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Robert-Thomas)明确指出,“毛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sup>[4]</sup>,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sup>[5]</sup>,但一条明显的原因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使“鞍钢宪法”在执行中与原意出入极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中,“鞍钢宪法”能否成为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精神与组织资源之一?

当然,不少人对这个问题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批评我和甘阳的文章中(载《读书》1995年第4期),汪丁丁明确指出,“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谈得上搞“后福特主义”。他的论证之逻辑很简单。用他原话来说:“我这个判断的根据很简单:你要过上富裕的日子吗?那就必须组织社会分工”;依他看来,社会分工带来工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也就是福特主义;而只有到“电讯技术发达”之时,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才“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后福特主义”。

令人一目了然的是,汪丁丁的论证完全系于分工理论。而他所依据的分工理论,则是亚当·斯密首先在其《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中提出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论证出斯密的分工理论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们认为,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两大弊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将“社会分工”化简到“技术分工”。换言之,他没有将“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国富论》开篇头一句话便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sup>[6]</sup>。”这自然是极富洞见的观察。但是,他没有说明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术分工”还是“社会分工”。所谓“技术分工”,指的是将一项生产任务分解为不同的步骤去完成;所谓“社会分工”,指的则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骤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产步骤,也可以安排同一个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骤。无疑,“技术分工”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解,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过程的不同步骤不一定要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装配汽车,既可以有“装配线”,也可以有“装配岛”,而这两种形式下的“社会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同一个工人可以永远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经常调换工种。简言之,对生产过程的步骤分解,与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逻辑上同一的概念。

斯密的错误即在于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实际上,他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在他著名的“扣针工厂”的例子中,斯密谈到“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sup>[7]</sup>显然,他将对生产过程的技术分解直接化约为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这样一来,产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于工人对生产全过程的了解下降,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积极地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发人深省的是,据

斯密本人记载,当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论只是关于生产数量(而非质量)的理论,但斯密对此未加重视,仅以“质量难以定义”为由而一笔带过:“质量的好坏,人言言殊。因此,一切关于质量的说法,我认为均不可靠<sup>[8]</sup>。”

出乎斯密预料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质量”远比数量重要。发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质量型竞争,打破了斯密式的“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关系。“丰田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在于“即时或无库存生产”(Just - in - time, or inventory-less production)。“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质量;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工序的质量,积极互相“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sup>[9]</sup>。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已经成功地实行了“无库存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论——“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性——已被中国实践所突破。据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周小庄的实地调查,宝山钢铁公司各二级厂不允许设置仓库,物资部门在接到紧急用料电话 30 分钟内,生产物资必须送到现场。宝钢还建立了“大工种”和“区域工”。所谓“大工种”,就是除掌握本工种外,还要了解和相当程度上掌握相关工种,如电工要会做钳工的活儿,钳工要会做简单的电工活儿,同时电工、钳工都要会做指挥吊车和一般的焊接活儿。所谓“区域工”,指的是在一定的生产作业区域内,打破岗位界限,进行“团队合作”。更有意思的是,宝钢的基层作业班组长有一项任务——培养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即作业长的职责之一是培养本班组成员获得“作业长资格”,任何工人均可通过考试而成为“潜在作业长”。

宝钢的这些“社会分工”实践,与斯密的工人“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必然能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sup>[10]</sup>”的理想,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从宝钢的实践来看,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以“无库存生产”、“全面质量管理”、“工人自主参与”和“团队合作”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这里的“福特主义”,指的就是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系统运用。虽然斯密在18世纪末就写了《国富论》(1776年),但他的分工理论直到19世纪后期(1870年左右)才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支配地位。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熟练工匠力图保证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对斯密式的僵化分工进行了顽强抵制。英国史学家汤普森曾记述轮胎制造商的儿子,不得不向他父亲工厂的工人学习技术的故事<sup>[11]</sup>,可见熟练工匠对工艺全过程的了解是他们与雇主谈判时的力量所在。但是,1870年以后,大批非熟练移民工人来到美国,给斯密式分工的系统实现提供了两大条件:1.非熟练工人缺乏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无力拒绝雇主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的努力;2.移民生活的艰辛,使社会平均消费偏好(taste)较少注重产品质量,而倾向于接受标准化的大众产品。这两个条件,与源于美国军事工业的“可互换零件”(interchangeable parts)系统相结合,终于使美国成为率先实现斯密式分工体制和大批量生产(mass production)的国家<sup>[12]</sup>,其最具象征性的体现即是亨利福特1913年建立的“T模型”——“福特生产方式”。据统计,在福特的汽车制造厂内,移民工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共有30多种语言,根本谈不上沟通与协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装配线上当“一颗螺丝钉”,一切听从管理者和工程师的安排,正像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描绘的那样。

“大批量生产”本身并无不好,在人们需求稳定且单一的情况



下,它的确能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但问题在于,福特主义的“大批量生产”是一种僵化的“大批量生产”,一旦需求出现多样化、特殊化和不稳定,福特生产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机。有趣的是,后起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就是通过生产四种型号的车而战胜只产一种型号(“T模型”)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寻味的,福特1931年接受为美国政府制造潜水艇的项目,但由于产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厂的不熟练工人只适合生产大批量的大路货,结果整个项目以失败而告终<sup>[13]</sup>。这是“福特生产方式”的第一次严重挫折。“福特生产方式”这种对需求多样化和需求不稳定的不灵敏反应,恰恰反映了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二大弊病。

我们已说,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一大弊病是不区分“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现在,我们又触及它的第二大弊病:缺乏对市场需求稳定性与否的考虑。斯密指出,如果要求制铁锤的工人又会制造铁钉,必然造成浪费,影响效率<sup>[14]</sup>。但他这一论证假定了市场对铁锤的需求是稳定的。一旦需求出现波动,制造铁锤的“规模经济”本身便成了浪费;如果工人能转产铁钉,则尚有“范围经济”(economy of scope)的希望。换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义)只有在市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才可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率;而当需求不稳定时,以技术和工人技能的“灵活性”(flexibility)为核心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便大显身手了。

市场竞争的内在逻辑是导向需求的不稳定性。阿罗(K. Arrow)等人已证明,“规模经济”是和充分竞争的市场不相容的<sup>[15]</sup>。“福特生产方式”既然以“规模经济”为核心,则必然要用一系列政治手段去“稳定需求”。18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企业兼并运动(merger),就是企业通过“前后向关联”(forward and backward integration),来稳定供货和销售渠道的努力。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

管理”和旨在控制汇率波动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也是“稳定需求”的重要措施<sup>[16]</sup>。当然,最彻底的“稳定需求”手段,就是“中央计划”了。在“中央计划”经济中,企业的产品的“市场需求”总是稳定的,因为产品“销路”已被计划所指定。由此观之,列宁最喜欢泰勒和福特的故事,是别有深意的<sup>[17]</sup>。

于是,我们看到,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彻底的逻辑展开,必导致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这自然是斯密所始料不及的。斯密的信奉者汪丁丁先生也莫名其妙奥妙。他对自动化技术的理解,充分显示出他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不自觉的信奉者。我们前面已提到,汪丁丁认为,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但是,我们要问,如果市场需求不稳定,“在高尔夫球场”指挥“无人工厂”的大批量生产,又有什么意义?“后福特主义”认为,自动化技术的真正潜力,不是给福特式的僵化生产体制更加一把油,而是给灵活的分工和生产体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史学家诺伯(David Noble)的研究,数控机床(numerical controlled machinery tools)有两种可能的程序编制法:一种是由熟练工人将自己的操作录制下来,然后根据录制给机器编制程序指令(这是所谓“record and play back”方法,即“录制加重放”)再不断进行调整。另一种方法,是由工程师一开始就给机器编制好统一的程序。1946年,美国通用电力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工程师霍姆斯(Lavell Holmes)发明了“录制加重放”的方法。但是,由于该方法仍然给熟练工人很大的自主性,不利于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彻底控制,结果被美国企业界弃之不用<sup>[18]</sup>,而为德国和日本的数控机床制造业所采用。美国采用让工程师一开始就编制好统一程序的办法,即把自动化技术系于福特生产方式的桎梏之中,其

后果必然是生产的不灵活性,终于在70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由石油危机触发)中自食其果,在汽车和电子行业上被日本和德国打败。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界开始了向“后福特主义”的痛苦转变。美国本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直接向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挑战。他指出,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是一个“逻辑谬误”。他以外科医生为例:手术自然是分步骤进行(“技术分工”),但每个步骤却不见得由不同的人去执行。事实上,熟练的外科医生往往一个人进行多种步骤的手术<sup>[19]</sup>。“后福特主义”的“全面质量管理”、“无库存生产”,恰恰旨在发挥每个劳动者的主动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对劳动者的创造性的压抑。然而,真正使每个劳动者发挥积极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使劳动者能够分享工资之外的利润。这就必然触犯资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资方不情愿,但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诉诸“团队合作”、“全面质量管理”等手段,向劳动者让步。1983年以来,美国已经有27个州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东是企业的惟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股东(stockholder)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负责,而劳动者是“利害相关者”中的主要成员<sup>[20]</sup>。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塞顿(saturn)更为彻底,它的每个团队(team)负责人和各级管理岗位均配备两人,一人由高层管理者选定,另一人由工会选定。这的确有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味道了<sup>[21]</sup>。

将西方目前的“后福特主义”与“鞍钢宪法”联系起来,如前述麻省理工学院托马斯教授所论说,很容易引起我国不少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感。这恐怕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事与愿违

的后果,已使我们不敢设想中国还有什么真正的创新了。但平心细想,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的确有不少“后福特主义”的萌芽。例如,我们已在前面论述,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实现,而我国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sup>[22]</sup>。我国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计划”来保证销路,就面临着不稳定的市场需求,因此,“船小掉头快”成了乡镇企业的重要组织原则。这的确与“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方式”有相通之处。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设置于清华大学的“灵活制造系统”(FMS)国家实验室,已开始与乡镇企业合作,这将为我国乡镇企业的灵活生产方式提供高科技的基础。再考虑到“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宝山钢铁公司实现,我们可以说,“后福特主义”确已成为今日中国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之一。

从根本上说,“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绝不只是“技术分工”的不同类型,而是关于“社会分工”、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综合本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用下图来表示这两个模式的不同:

“技术分工”与 “社会分工”	工人技 能要求	生产组 织原则	生产批量	生产关系
福特主义 一一对应	不熟练	被动服从命令	大批量	经济专制
后福特主义 不一一对应	熟练	无库存生产	可大可小	经济民主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后福特主义”已是切实可行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要求走“福特主义”道路的社会势力也颇有影响。但我认为,在激烈的国

际竞争中,廉价劳动力只能给“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而“后福特主义”的质量型竞争才是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关键。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曾考察一家乡镇企业,该企业原来产品质量相当好,但近年来,由于穷困地区来打工的“外工”大增,他们放松了在质量、技术上下功夫,而只靠廉价劳动力来竞争,结果被另一家设在城里、工资水平更高的合资企业在质量竞争中击败。把这个例子放大到全国,我们不难看出,“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究竟何者更能促进中国工业的长远的动态效率。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引的毛泽东的批语:“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在远东”?这可能是针对苏联的“一长制”的。但我们已经论述,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工厂管理上的“一长制”,只不过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逻辑展开罢了。因此,毛泽东对于“在远东”的强调,实际上表明他向西方福特主义挑战的意志。

西方思想史的晚近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福特主义之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从而排除“经济领域的民主”,是源远流长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基本上已经提出了斯密的分工理论。他认为,每个人按其本性只做一件事,整个社会的生产将会增加<sup>[23]</sup>。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木工做了制鞋的活,危害还不算太大;但如果木工参与了城市(雅典)的护卫和管理(guardian),则天下就大乱了<sup>[24]</sup>。这充分显示出柏拉图的分工理论和他的反民主理论的内在关系<sup>[25]</sup>。从柏拉图到福特,其中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密、马克思、列宁、韦伯、杜克海姆,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均有把“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一一对应的倾向。发人深省的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分工的论述,与斯密并无不同。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甚至写到“进入工厂的人请放弃一切自由”。列

宁欣赏福特更是尽人皆知。这一切,说明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的倾向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若究其本原,我们必须回到希腊思想家对“家庭”(household, oikos)和“政治”(politics, polis)所做的截然区分。由于西方把技术、经济当做“非政治”的“家庭管理”的一部分的深厚传统,“两参一改三结合”之类的“经济民主”思想很难被接受<sup>[26]</sup>,因“经济民主”一词本身意味着“政治”进入经济领域。如果不是70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迫使西方开始向“后福特主义”走,他们还将长久地滞留在“福特主义”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对于“鞍钢宪法”在“远东”出现的强调,象征着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从此,在全球舞台上,人们再也不能像从柏拉图到福特的西方思想家那样,来设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精髓处之所在。无论“鞍钢宪法”在执行中出现过多少失误,其“经济民主”的精神实质仍是中国迎接21世纪的宝贵精神资源。

### 注释

[1] 日本的“丰田生产方式”已取消了“功能等级”(functional hierarchy)与“职称等级”(ranking hierarchy)的对应关系。换言之,职称高的人并不一定在“团队合作”中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见 M. Aoki, *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8, p. 75。

[2] J. Pontusson, “Unions, New Technology, and Job Redesign at Volvo”, in his edited. *Bargaining for Change*, Cornell, 1992.

[3] 见1995年2月1日美国国会议案的原文。

[4] Robert Thomas, *What Machines (an't D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209.

[5] 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南雄教授曾对“鞍钢宪法”在中国上层政治争论

中的作用做过详实研究。见 Peter N. S. Lee,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49—198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 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5 页。

[7] 同上书,第 6 页。

[8] 中译本译文同⑥注,第 236 页。此处译文是笔者根据英文原著重新翻译的,比中译本译文更准确地反映了斯密对“质量”的看法。

[9] 关于“无库存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的内在联系,见 Richard Schonberger, *Japanese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The Free Press, 1982。

[10] 同⑥注,第 8 页。

[11]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 235, vintage Books, 1963。

[12] 19 世纪法国、英国和德国,由于社会、政治条件不同于美国,故未能系统地、充分地实现斯密式分工体制。见 Michael Piore and Charles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Basic Books, 1984, p. 41。

[13] David Hounshell *From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14] 同⑥注,第 8 页。

[15] K. Arrow and F. Hahn,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1971。

[16] 关于“福特主义”和“稳定需求”的内在关系,见 Michael Piore and Charles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同(12)注, pp. 49 - 133。

[17] 关于苏联式计划经济是“福特主义”最彻底的实现的详实研究,见 Mark Beissing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Socialist Discipline, and Soviet Pow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8] David Noble, *Force of Produc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64。

[19] Peter Drucker, *Management*, New York, 1973, P. 199, 以及 Peter Drucker, *Practice of Management*, p. 294, New York, 1954。

[20] 关于美国 27 个州修改公司法的情况,见 Steven Wallman, “The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Corporate Constituency Statutes and Formulation of Director Duties", *Stetson Law Review*, Vol. 21, 1991, pp. 163—92.

[21] Saul Rubinstein et al., "The Saturn Partnership", MIT Sloan School, 1993.

[22]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23] Plato, *Republic*, 370C. 熊彼特在其《经济思想史》中认为柏拉图尚未达到斯密对分工的分析水平。但对柏拉图的深入研究,表明他在各个关键论点上都与斯密一致。见 J. Murphy, *The Moral Economy of Labor*, Yale, 1993, p. 150.

[24] Plato, *Republic*, 421A 和 434A.

[25] 关于柏拉图,甚至苏格拉底的反民主学说,见 I. F. Stone, *The Trial of Socrates*, Anchor Books, 1988.

[26] 关于“经济”这一概念和“家庭”的联系以及“经济”在西方思想中的“非政治化”,最深入的研究当推 William James Booth, *Households: On the Moral Architecture of the Econom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王绍光

现在是“化”的时代，时髦的是“现代化”、“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需要“化”的当然不是西方。它们已经“现代”了、“私有”了、“自由”了、“民主”了。需要“化”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据说，它们想要“现代化”就必须走“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如果它们过去走的是不同路线的话，现在就必须“接轨”，接西方的“轨”。“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国向西方看齐的接轨过程。

在这种背景下谈“本土化”，不说是大逆不道，至少是不合时宜。尤其是谈到政治学的本土化，也许有人会跳起来。政治学是舶来品，在英文里，其本意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既是科学，中国的后知后觉者应该诚惶诚恐地虚心学习才是，那有资格谈什么本土化？更何况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岂有随随便便拿来“本土化”的道理？本文的主旨是为政治学的本土化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证的依据。它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政治学是否可能本土化？政治学应该怎样本土化？这三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有必要没可能，或者有可能没必要，本土化都可以免谈。即使既有必要也有可能，还要明确本土化的重点和界限。盲目的本土化与盲目的生搬硬套一样有害。

## 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政治学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 1880 年。那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学系。<sup>[1]</sup>说起来,中国政治学起步并不晚。如果从 1905 年设立专门学习法律和政事的京师法政学堂算起,中国政治学也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比美国政治学的历史只短二十几年。<sup>[2]</sup>但令中国政治学者尴尬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一直都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学舌。只有在 50—70 年代,欧美中心的政治学才在中国内地遭到否定。但当时的态度是干脆将政治学一笔勾销。这不是本土化,而是虚无化。虚无化完全窒息了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80 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重新开始与西方接轨。几百名学子进入了西方各国(主要是美国)的政治学系,国内学者通过译著和学术交流也对西方政治学耳熟能详,加之两岸三地政治学界日趋频繁的接触,一个中国政治学圈正在形成。但蓬蓬勃勃的表面无法掩饰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甚至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不屑讨论我们提出的问题,更不会运用我们发展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的政治霸权和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我们不是不会说话,而是只会重复别人的话,没有能力与西方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更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语系。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接轨心态。什么叫“接轨心态”呢?这就是一心接对方的轨,而忘了问为什么要接对方的轨?自己这条轨是否一无是处?对方的轨是否是惟一的选择?两条轨接

不接得上？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找到一条更好的路？接轨心态的要害是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批判意识。我们假定西方政治学是先进的、是科学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却忘了想一想这些假定本身有没有问题。愿意向西方学习是好的，但是一味盲目接受西方的理论却可能窒息自己的创造潜力。真正开放的心态应是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即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一切。

也许有人会说，用别人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没有什么不好。西方学者的理论思维能力比我们强，我们就甘当小学生，虚心向人家学习。我们也有强项，至少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是他们无法超越的。用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的素材，我们大概可以与西方的中国研究者打个平手。持这种想法的人忽略了一个可能性，即某些西方理论实际上是有色眼镜，透过它们看中国，只会遮蔽我们的认知力。

30年前，著名经济学家赫叙门曾在《世界政治》期刊发表过一篇题为“寻找理论范式反倒阻碍理解”的论文。<sup>[3]</sup>重读这篇文章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文章的起因是1968年美国出版了两本关于拉丁美洲的书，一本是John Womack的《萨帕塔与墨西哥革命》，<sup>[4]</sup>另一本是James L. Payne的《哥伦比亚的冲突模式》。<sup>[5]</sup>前者是关于墨西哥农民运动领袖萨帕塔的传记故事。作者只是以细腻的笔法对围绕萨帕塔的人和事进行了描述，几乎完全不加评论、解释，也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书由一家商业出版社出版。后者则截然相反。作者依据的是访谈和问卷调查材料，书一开篇便洋洋洒洒列出了34项理论假设，其余各章则旨在检验这些假设是否正确。结果，所有假设都通过了检验。该书作者企图使人相信，只要掌握了他的理论，任何人都可以全面地、充分地了解哥伦比亚的政治制

度。这本书是由享有盛誉的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按照通行的标准,很明显,后一本书比前一本书更符合西方学术八股的范式。但赫叙门认为另一种评判标准更重要,即考察到底哪一本书有利于增进人们对拉丁美洲的了解。依据这个标准,曾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哥伦比亚生活和工作过的赫叙门给了前一本书满分。后一本书在他看来则不够及格的水平,根本还没摸到进入哥伦比亚政治的门。<sup>[6]</sup>虽然 Womack 在书中没有运用什么时髦的理论分析框架,但读完他那引人入胜的故事,人们不仅会搞清墨西哥农民革命的来龙去脉,也会加深对世界上其他地区农民革命的理解。<sup>[7]</sup>而要通过 Payne 的书了解哥伦比亚政治,则无异于南辕北辙,因为那本充满政治学术语的书只会加强人们对哥伦比亚的偏见。赫叙门写那篇文章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表扬 Womack,而是为了批评 Payne 和他所代表的学术套路。赫叙门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超级大国,美国为了控制世界,非常希望能找到认识复杂世界的捷径。建立理论模型的现实政治意义就在这里。因此,第三世界国家成了模型构筑者的游戏场。这些模型构筑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模型,每人都自称找到了解释第三世界政治的钥匙。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即削丰富多彩的世界之足适他们的模型之履。这些理论模型也许看起来很新潮,但它们很可能变成了束缚研究者手脚的紧身衣和遮蔽他们视野的有色镜。可惜的是,第三世界的学者往往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寻找理论范式的游戏。

我在这里引述赫叙门的目的并不是要贬低西方政治学近几十年取得的成就。很多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模型的确对我们认识西方和认识中国的某些方面具有启发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主流政治学仍有很多瑕疵和盲点。由于这些瑕疵和盲点的存在,用西方政治学的视角看中国和世界总觉得很别扭。随便举几个

例子：

用流行的政权分类法，今日的中国往往被叫做“权威主义国家”(authoritarianism)。[8]问题是，这个标签也适用于满清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南京政府时期、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中国一直在变，但分析其政权性质的概念却从不改变。这样的概念能对政治分析有什么帮助吗？恐怕其惟一的实用价值便是宣传价值，以此衬托出西方的制度是多么优越。

自从秦始皇兼并六国以来，中国便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尽管其间经历了无数外患内乱，统一的大格局一直维持到今天。这在西方人是难以理解的。Lucian Pye 出生在山东，一生致力于中国研究，是惟一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中国研究者。他有一句著名的话经常在西方文献中被引用：“中国明明是个文明却假装成为一个民族国家”(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在他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维持统一的局面是件很奇怪的事，似乎只有分裂才顺理成章。他们这样看的依据何在呢？Pye说了两条。第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是民族主义，而中国统一的基础仅仅是文化而已。中国人认同的是相同的文化，而不是他们的民族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又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不是太弱了，而是太强了)；第二，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是高度组织化、制度化，而中国作为一种文明缺乏制度性的内聚力。[9] Pye 这番分析也许在中国人听来似是而非，但西方读者却很容易接受，因为西方近代才出现的民族国家的确是民族主义和制度化的产物。问题是西方的经验只是局部的经验，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能解释中国大一统的传统吗？硬要从局部经验中抽象出“普遍规律”，并将它生搬硬套到其他文明，这是科学的态度吗？[10]

1995年，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一本大

书《信任》。他将世界上所有国家分为两类：高信任度国家和低信任度国家。美国当然是属于前者，而中国则被划入了后者。美国是否是高信任度国家已有人讨论，<sup>[11]</sup>这里按下不表。谈到中国，福山的判断没有任何实证基础，只是想当然而已。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实证研究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相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国家。由 Inglehart 主持的“世界价值研究计划”，1990 年第一次将中国包括在调查对象中，结果发现在被调查的 41 个国家中，中国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比例高达 60%，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列第四。不仅高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也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这个结果使 Inglehart 大惑不解，以为自己的调查方式出了问题。<sup>[12]</sup>1993 年，两位日本学者针对同一问题再次对中国进行了调查。他们的结果虽然比 Inglehart 的要低一些，但仍然高于所有非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sup>[13]</sup>1996 年，Inglehart 进行了新一轮的“世界价值调查”，涵盖 47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包括在内。这次的结果与前两次的结果大同小异，仍有超过 50% 的中国人说，他们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sup>[14]</sup>虽然 Inglehart 仍无法解释中国人如此之高的信任度，但他已不再怀疑自己的数据有问题了。我与合作者在 1998 年做的调查显示，有超过 30% 的中国城市居民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这个比例比前几项调查结果低得多，不知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更准确，还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信任正在急剧下降。<sup>[15]</sup>在 90 年代，美国的社会信任也跌落了许多。<sup>[16]</sup>不管怎么说，有 30% 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这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信任度国家。福山为什么会信口雌黄？Inglehart 为什么对别的实证数据不怀疑，偏偏怀疑中国数据的可靠性？这恐怕都与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偏见有关。用偏见看世界，怎么会不看走眼呢？

说到偏见,一个在西方更流行的偏见是,中国政府已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丧失了其执政的正当性。本来政权在多大程度上享有正当性是个实证问题。照理说,没有实证依据便信口开河是犯了西方学界的大忌。但很多西方学者(当然也包括一些中国人)似乎认为,既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就不可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因此,中共政权没有正当性是不言而喻的,没必要出示证据。但是,留美中国学者史天健、钟阳、陈杰用大量的实证数据证明,这个流行的看法是错误的。<sup>[17]</sup>可悲的是,由于他们的发现与流行的偏见不符,其研究结果在送审过程中常常受到刁难,致使有些结果至今没有公开在英文学术界发表。<sup>[18]</sup>上面举的都是西方看中国的例子,再举一个例子说明西方看世界的盲点。冷战结束后,西方一直高举着两面道义大旗,一面是“人权高于主权”,一面是“经济全球化”。在我看来,高举这两面旗帜的逻辑结果应该是西方撤除对外来移民的重重障碍。首先,既然西方自诩人权的捍卫者,又认定别国人民的人权没有受到尊重,他们应该允许希望到西方享受自由的人用脚进行选择,而不应该以主权为由压制他们最基本的人权——自由迁徙权。其次,西方要求各国撤除妨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种种壁垒,却忘了生产要素不仅包括物品、资本和技术,也包括劳动力。要开放就全面开放,不能只要求对西方有利的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也应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有人也许会说,人口怎么能自由流动呢?仿佛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是天经地义的。实际上,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比商品和资本自由化有更长的历史。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恐怕比对商品和资本流动的限制要少得多。<sup>[19]</sup>既然人口自由流动既有历史先例,又是“人权高于主权”和“经济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西方学界却对此视而不见呢?这个盲点到底是疏忽造成的,还是伪善

造成的？

最后一个例子也与西方看世界的盲点有关。冷战后，西方高举的还有一面旗帜，即“民主”。民主化于是成了政治学中的热门话题。但“民主”往往被化约为多党之间的选举（程序民主），至于人民是否真正能当家作主则显得不重要了。如1994年，美国派出了22000名士兵去海地“恢复民主”，而在随后的选举中，只有5%的合格选民参加了选举。这样的政权在什么意义上是民主？对这一类政权，几乎没看到像样的研究。更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程序性民主化都能带来对人民福祉（well-being）的改善（如菲律宾、东欧一些国家）。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伴随这种“民主化”而来的甚至是无政府状态（苏丹、塞拉利昂、刚果·布、海地）、大规模社会冲突（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印度尼西亚），或人道主义灾乱（卢旺达、前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程序性民主的局限性是什么？照理说，真正关心民主的人不仅应该关心民主的形式，也应关心民主的质量，关心实现优质民主的条件。上述例子提出了一些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如在什么条件下，硬性推进行程序性民主是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制度建设是更紧迫的任务？但在西方这样提问显得“政治上不正确”，因此民主化研究基本上忽略了这些十分关键的问题。<sup>[20]</sup>作为中国学者，面临着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任务，我们却不能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

上面的例子说明，很多问题在西方主流政治学中找不到答案。如果硬要用西方的分析架构解释它们，只会使我们希望了解的现实世界遭到扭曲。当然，中国学者对很多问题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出路何在呢？依我看，出路恐怕在于时刻保持清醒的批评意识，在吸取西方政治学养分的同时，努力清除其盲点，克服其局限性，用



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这个过程便是政治学本土化的过程。

## 政治学是否可能本土化？

政治学应不应该本土化是一回事，政治学能不能本土化是另一回事。上面提到，政治学在欧美的本意是“政治科学”。如果政治学真是一门科学的话，谈本土化就有点滑稽了。有谁听说过本土化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呢？

那么政治学到底是不是科学呢？有相当大一批政治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如目前在美国政治学界红极一时理性选择派学者便认为，他们的理论科学地奠定了人类政治行为的微观基础（即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可以超越特定的文化，用来解释各国，在各个时段里的各种政治行为。<sup>[21]</sup>读理性选择派学者写的论文往往的确有点像读科学论文，因为其间充满了数学公式和推演。不过，尽管理性选择派来势汹汹，仍有很多学者不买它的账。有人评论说，至少到目前为止，理性选择理论还没有达到科学的水准。<sup>[22]</sup>更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理性选择理论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仅没有超越文化，而且它本身就是美国特有文化的产物。<sup>[23]</sup>

实际上，在理性选择理论走红以前，学者们早已在争论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政治学有没有可能变成科学？这个争论恐怕还会继续下去。从本体论(Ontology)的角度看，一个学科要成为科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其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第二，该研究对象遵循某些普遍的的规律；第三，这些规律是永恒的，不会因研究者的行为和研究结果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否

具有这些特征呢？

第一个条件显然是满足的。政治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政治学者凭空臆想出来的。但第二和第三个条件就似乎难以满足了。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各国政治到底是同质还是有所差异？从西方政治抽象出来的所谓“规律”是否同样适用于非西方国家？有些人（主要是西方人，但也包括非西方人）认为，西方文化就是世界的文化，西方民主自由主义代表了全人类普遍的和永恒的价值，非西方国家除了走西方的道路以外就别无选择。在这些人看来，西方的今天就是第三世界的明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一定会逐步趋同，从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上向西方看齐。由此推论，基于考察西方政治得出的“规律”当然适用于所有国家，即使今天不适用，总有一天会适用。这种看法与早年西方传教士对基督教看法同出一辙，仅是一种信仰而已，却偏偏涂上了一层厚厚的学术油彩。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西方至上倾向往往让第三世界不舒服，但他至少是个对自己观点不加什么掩饰的人。话一说白了，有时搞得一些喜欢自欺欺人的西方人也不太自在。他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已经暗示，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各种文明不会趋同。要不怎么会有文明的冲突呢？后来，他的另一篇文章干脆题目就叫做“西方：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sup>[24]</sup>依亨廷顿的看法，相对于其他国家，西方过去是独特的，现在是独特的，永远是独特的。而世界趋同论则是“误导的、自负的、虚假的、危险的”。西方到底独特在哪儿呢？亨廷顿列举了八条：经典文化、基督教传统、欧洲语言、神权与政权的分离、法治、多元主义与公民社会、代议机制、个人主义。这八条分开来看，几乎没有一条是独特的。但八条构成的统一体则仅仅存在于西方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文化和制度绝对是独特的。在这篇文章里，亨廷顿还说了一句大实

话,“文化跟着权力转”(Culture follows power),因此“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必然的逻辑结果”(Imperialism is the necessary, logical consequence of universalism)。亨廷顿把话说的这么明白,如果我们硬要脱离“黄土地”,拥抱“蓝色的海洋文化”就显得自作多情,太不自重了。再进一步说,如果西方就是西方,非西方就是非西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规律当然不可能存在了。

政治规律不仅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恐怕也不能传之百世而无碍。实际上,不要说百世,能适用三世、五世就谢天谢地了,这是因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有一个重大的差别:自然科学研究的规律不会因这些研究发生变化,而政治学者发现的所谓“规律”很可能因为这些发现而不再适用。政治是人的政治。人有思维能力,算计能力和判断能力,能因应外部世界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与物质世界不同,人有目的,有七情六欲,有记忆力,可以从以往的经验中进行学习;他们不仅会被动地作出反应,也会主动作出选择。而他们的反应方式和选择余地都不是给定的。人的这些特质使得政治中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也使得“自变量”和“因变量”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政治学者发现的“规律”半衰期不可能很长。用不了多久,这种“规律”就会失效,因为记忆力,学习能力和创造力可能改变政治参与者的行为模式甚至政治游戏的规则。实际上,政治学本身就会加速使其发现的“规律”失灵,因为对政治参与者而言,学习既包括从自身经历中学习,也包括从政治学者总结的“规律”中学习。<sup>[25]</sup>

如果政治学发现的“规律”既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又不能传之百世而无碍,它怎么可能成为科学呢?

现在,我们退一步,假定政治学可以成为科学,但这也不意味着西方政治学已经成了科学。1990年前后,苏联和东欧的前社会

主义政权突然瓦解了。说突然,是因为西方养了那么多专家,花了那么多经费,结果却没能预测到这样的巨变。其实,过去几十年,政治学又何曾正确地预测过其他的重大变化呢?如果有人声称自己对某个事件做过准确的预测,那可能是因为做什么预测的人都有,瞎猫撞到了死耗子。要证明某人、某学科有预测能力,至少应有个八九不离十的准头。算命先生不也有说准的时候吗?谁会因此就下结论,算命也是科学呢?

谈预测能力恐怕是对政治学要求太高。那就换个较低的标准吧。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立场超然。西方政治学是否符合这个标准呢?让我们来看看美国政治学主要研究的几个领域情况如何。

### 1. 政治理论

在美国大学的政治系里,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完全是以欧美为中心,涉及的基本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那些经典,无非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汀、阿奎那、布丁、洛克、伯克、马克思、尼采之类。有人戏称政治理论就是关于“死去的欧洲白种男人”(Dead, European, White, Male)的学问,的确十分传神。中国大学里讲政治思想史,一定要讲西方政治思想史;而西方大学讲政治思想史,决不会讲中国政治思想史。不光中国的不讲,也不会讲印度或其他文明对人类政治思想的贡献。好像西方是政治理论的惟一产地,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近一二十年来,这种政治理论遭到了来自西方内部的挑战。文化多元主义和女权主义批评主流政治理论忽略了“西方内部的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 within the West),即妇女和少数民族。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知名和不知名理论家关于妇女和少数民族的论述被从故纸堆里挖掘了出来。<sup>[26]</sup>但西方中心的局面没

有改变,只不过从“死去的欧洲白种男人”变化为“死去的欧美人”而已。如果说不包括女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理论就是不完全的政治理论的话,完全忽略其他文明贡献的政治理论当然是更不完全的。

## 2. 国际关系

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和困境”一文中,<sup>[27]</sup>郑世平指出,西方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资源均来自西方自身:

主权理论来自法国的博丹,国际无政府状态说来自英国的霍布斯,国际势力均衡理论来自法国的卢梭,和平和理性主义思想来自于德国的康德,国际冲突理论来自德国的克劳塞维茨,国家中心论来自于德国的黑格尔。

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想主义色彩大大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势力的现实主义,这是美国与苏联争夺霸主地位的现实政治决定的,而绝不是学科内在发展逻辑决定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有人祭起“民主和平论”也同样是顺应了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需要。现实主义假设,只要可能的话,个人和国家就会以强凌弱。这个逻辑用来解释西方过去的殖民主义和当代的帝国主义当然很合适,但有人问过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次率巨型船队出洋却从没有动过殖民的念头呢?看来现实主义的假设并不适用所有民族。但现在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正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按照它的逻辑,一个处于上升态势的国家一定会挑战霸主国家,因此冲突不可避免。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冲突产生的原因可能恰恰相反:正是由于霸主国家对新兴国家处心积虑的打压和无所不用其极的遏制引发了这些冲突。

郑世平文中还有一句话值得在这里引用: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总觉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实际运用的效应是对中国不利的。例如,源于现实主义流派的“中国威胁论”,新自由主义流派的“民主和平论”,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以及难以归类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有的明显与中国为敌,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有的只能推导出种种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害无益的结论。

读了这段话,谁还可以坦然地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科学呢?

### 3. 美国政治

美国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是美国政治,美国政治研究的重点是美国民主。而美国民主制度之所以采取现在这种特定的形态,与美国政治学者在战后重新定义民主不无关系。换句话说,美国政治学不完全是政治的超然观察者,同时也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它是时代的产物,而不是科学发展逻辑的自然产物。

二战前后,意大利、德国和苏联的群众政治使美国学者深感忧虑,生怕群众政治也传染到美国来。不幸的是,当时有舆论调查发现,普通美国民众似乎对自由价值的支持度相当低。面对潜在的威胁,美国政治学的头面人物不约而同地扮演起了“自由卫士”(liberal guardianship)的角色,其做法是重新定义“民主”,消解“人民”,消解“阶级”,为政治参与设限,替政治精英主义辩护。<sup>[28]</sup>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基本假设、实证理论、方法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林肯曾将民主体义为“民治(by the people)、民有(of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但这时,民治被认为是危险的,因为民众常常感情用事,欠缺理性判断能力。于是熊彼特的建议受到普遍欢迎,即将民众参与政治的作用限制在4—5年选一次政府的范围内。<sup>[29]</sup>为了对以往的“乌托邦民主理论”或“大众民

主理论”(populistic democracy)釜底抽薪,政治学开始消解“人民”这个概念。据说社会上根本就不存在“多数”,只有许多“少数”。既然没有构成多数的“人民”,哪有会有什么“民治”呢?但将人民分解成许多“少数”还要避免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沾边,于是民众不是被分解成“阶级”,而是被分解成“利益集团”。民主不是要发现共同的公众利益,而是为“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提供一个舞台。这种经过改造的民主叫做“多头政体”(Polyarchy),<sup>[30]</sup>其主角已经不是人民,而是政治精英。按 David Truman 的话,从实际运作的角度看,“精英就是人民”(The elites are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the people)。<sup>[31]</sup>转了一圈,原来费了那么大劲就是为了替精英政治辩护。

这些政治学者的努力不仅影响了实际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战后美国政治研究有三个重点,即投票行为、公共舆论和公共选择。投票行为成为重点应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与别的西方国家相比,美国的投票率很低。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往往在 50%左右,中期选举(国会议员选举)的投票率则只有 20%—30%。如果大多数人没有表达自己的利益,政治过程由少数人决定,美国有什么资格自称民主的典范呢?但不投票行为(或大多数美国人的政治行为)始终没有变成美国政治学研究的重点。

Theodore Lowi 倒是从美国政治研究的重点中看出了一些奥秘。<sup>[32]</sup>在他看来,投票行为之所以成为重点,是因为它是国家批准的行为,也是政权和政治精英保持其统治正当性所必须的;公共舆论之所以走俏,是因为它与政府官僚机构的思维方式相匹配;公共选择之所以越炒越热,是因为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意识形态卷土重来。总之,它们成为重点都与现实政治有关,而与政治学发

展的内在逻辑无关。由于注意力集中到这些问题上,其它一些可能更重要的问题就被忽略了。Lowi 不无嘲讽地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们比政治学家聪明得多,他们把这些东西当作武器,而我们政治学者却误以为是科学。”<sup>[33]</sup>

#### 4. 比较政治

二战以前,美国政治系基本上没有关于非西方国家政治的课程。那时对非西方的研究被称为“东方学”。如果说以前还有人对方学是什么东西不太明白的话,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及其中译本出版后,人们对它的性质就应该比较清楚了。《东方学》洋洋洒洒 400 页,但其基本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东方学是西方的创造,帝国主义的创造,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工具。<sup>[34]</sup>

现代意义的比较政治直到二战结束才出现。此前的比较政治讲的是比较宪法或比较政府。说是比较,不过是分别介绍几个国家的情况而已。而且,这些国家就局限于西方的那几个主要国家。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现在的比较政治实际上是两张皮,一张是高度抽象的模型构筑性研究(stylized or formal models of analysis),另一张是经验实证性的个案或比较研究(empirical - descriptive analysis)。两张皮之间没什么关联。从事前者的人很少,但似乎学术地位较高。不过,大量的所谓比较政治学者在行的是后者。比较政治中的规范模型(Formal model)主要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构筑的。充满符号公式的规范模型看起来很唬人,其实它也不过是一种讲故事(story - telling)的方式,只是修辞方法不同而已。<sup>[35]</sup>目前,规范模型能讲的全是些最简单、最枯燥的老生常谈(explain the obvious)。它对分析西方政治有多大作用尚存疑问,分析非西方政治



是否用得上它，恐怕要打一个更大的问号。

经验实证性研究又分两类：一类是地区研究，一类是所谓“中阶理论研究”(middle-range theories)。限于篇幅，这里不专门谈后者，因为谈地区研究一定会涉及它们。

说到地区研究，它是地地道道的冷战产物。1945年，在美国几乎找不出一个开设非西方政治课程的政治系，今天，几乎没有一个政治系不开设有关非西方政治的课程。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冷战高峰期。那时美国面临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首要问题，却苦于没有了解非西方国家的实用人才。以人文为重点的东方学至多只能隔靴搔痒，美国政府（特别是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不得不对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奇异人种”(funny people)<sup>[36]</sup>和“古怪人种”(exotic people)<sup>[37]</sup>投入巨资。尤其是1957年苏联连续两次将人造卫星送入太空，使美国举国震惊。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在以后20多年里，依据此法的第六款，美国各大学的地区研究中心收到了来自政府源源不断的资助。美国的各大基金会对政府的做法配合默契，也纷纷设立专项基金赞助地区研究。地区研究的重点很能说明问题。无论是政府资助的项目，还是基金会赞助的项目，重点都不外是苏联/东欧或中国/东亚，都是美国在冷战中的敌手。对其他地区，如拉美、非洲、南亚也有研究，目的是要帮美国确定冷战中的敌友。<sup>[38]</sup>有些由美国政府赞助的地区研究项目甚至直接干预别国的政治，如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一个项目帮助南越吴廷艳政府训练秘密警察，<sup>[39]</sup>另一个流产的项目（即臭名昭著的Operation Camelot）试图通过对“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找出帮助某些美国傀儡政府对付暴乱的诀窍。<sup>[40]</sup>

我说这些，并无意暗示所有从事地区研究的人都是美国政府的帮凶，也无意暗示过去几十年的地区研究一无是处。我想指出

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地区研究与冷战相关，与美国的国家安全相关，这不能不影响其研究的重点和方法，因此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超然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冷战后，这种非超然性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出来。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时失去了其敌人，于是美国政府不想再往地区研究里投冤枉钱，导致对地区研究资助的大幅削减。无独有偶，美国的基金会再一次同时跟进，使各大学的地区研究项目雪上加霜，难以为继。供给能力依然存在，但需求却急剧下降，结果造成了学术界的危机。<sup>[41]</sup>只是这场危机的原因却与学术无关，正如地区研究的兴起原因与学术无关一样。

共产主义制度研究是地区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这里可以看出中阶理论与地区研究的关系。照说共产主义是美国的敌人，对它的研究美国专家应多花点功夫，展示其理论创造性。不过，回头看共产主义研究的记录，似乎有点乏善可陈。Almond 和 Roselle 在 1989 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谈共产主义研究与政治理论的关系，他们用了个词叫“套模型”(model fitting)，十分传神。据他们观察，从 4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共产主义研究领域基本上是各类外来理论的跑马地。极权主义模型(The totalitarian model)、结构功能模型(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政治文化模型(political culture)、发展模型(the development model)、多元模型(pluralist model)、利益集团模型(the interest group model)、合作主义模型(corporatism)、政策网络模型(policy network)、官僚政治模型(bureaucratic politics)、主从关系模型(patron-client relations)纷至沓来，不一而足。反正什么理论在学术界时髦，什么理论就会被用于共产主义研究。奇怪的是，这些理论中没有一种是从研究共产主义制度自身运作规律中产生的。<sup>[42]</sup>外来模型也许对认识共产主义制度不无启发，但套模型就不免套得有点粗糙、有点生硬、有点勉强。就在 Almond 和 Roselle

的文章发表不久,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便顷刻瓦解了。他们提到的那些模型,无论哪一个都不可能预测到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政治是共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如果说共产主义研究基本上是“套模型”,中国政治研究也不例外。50—60年代,极权主义模型风行一时,似乎中国是铁板一块。“文革”开始后,看到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源于美国政治研究的多元模型马上被移植到中国研究。80年代以来,欧洲传来的国家/社会二元关系分析又成了新时髦,好像这种模型便是理解中国的钥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一直处于被动接受外来理论的地位,从来没有独立地从丰富的中国政治中提炼出任何新鲜理论。这种尴尬已让美国的中国研究者难受,自责了几十年。邹说先生70年代曾撰文希望看到中国研究能产生自己的理论。自那时以来,每隔一段时间,便有中国研究者在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时预言,这个时刻即将来临。<sup>[43]</sup>1999年10月,Elizabeth Perry再一次作出了这样的预言:“中国研究有望成熟起来,从一个‘消费领域’(依赖外来概念和理论)转变为一个‘生产领域’(有能力产生出独创的分析框架并有助于启发其他领域学者的研究)。”<sup>[44]</sup>我希望Perry的预言能变成现实,但遗憾的是,现在它还不是现实。

以上对美国政治学各个领域的评价可能过于简单,有点片面。对美国政治学作全面的介绍和不偏不倚的评价本来也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只是想举例说明,美国政治学不是科学,至少现在还不是。为了避免有人批评我对美国政治学的评价过于苛刻,我想引用一位前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看法作挡箭牌。Lowi在美国政治学界摸爬滚打几十年,对美国政治学的科学性倒是悟出了三条心得:(1)美国政治学本身就是个政治现象,是国家的产物;(2)如果

说有政治科学的话,就有不止一种政治科学,每一种都是特定研究对象的特定结果;(3)即使我们诚心追求真理,但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学采取目前的形式,为什么某些领域在政治学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都不是用我们的主观动机便能解释的。他的结论是,每一个政权都希望制造出与自身合拍的那种政治学,美国也不例外。<sup>[45]</sup>很明显,美国政治学既不符合价值中立(value-free)的标准,也不符合客观(objective)的标准,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universalism)。既然作为科学性指标的美国政治学都不是科学,政治学有什么不能本土化的呢?

### 政治学如何本土化?

本土化当然不是要关起对外交流的大门。恰恰相反,本土化是要拓宽交流,使单行线变成双行线。本土化并不拒绝借鉴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反对来者不拒,反对盲目接受,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按鲁迅先生说法,这叫“拿来主义”。本土化不是要将视角局限于中国,把我们自己变成三家村的老冬烘;而是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世界。本土化政治学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治学者对话,力争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学的重建,将中国人看中国和世界的心得与各国政治研究者共享。只有在全球学者参与对话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学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科学(当然,这里“科学”一词的含义仍与自然科学那个“科学”不一样)。简而言之,本土化对我们的要求无非是两条:批判的吸收,创造性的思考。长期以来,在研究政治时,我们中国学者已习惯于扮演概念、理论、方法的消费者、进口者这种角色。就如马克思说的那样,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sup>[46]</sup>本土化迫使我们挑战自我，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理论思考，希望不仅能表述自己，还能有朝一日变成概念、方法和理论的生产者和出口者。

具体说来，我认为政治学的本土化应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选择研究课题时，要辨别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

上面已经说到，西方政治学讨论的热门问题不一定是西方政治中最值得研究的问题，那些没有机会引起讨论的问题也许更重要。即使在西方是真问题，拿到第三世界，或拿到中国来也许就成了假问题。比如说，西方人谈“公民社会”谈得很热闹，“公民社会”真是中国政治中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吗？公民社会里有没有阶级？阶级之间有没有冲突？阶级冲突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些形式的阶级斗争对中国当代政治有什么影响？后面这些问题是不是更需要我们的注意力？又如西方学者爱谈中产阶级对民主的积极作用，于是有人拿着放大镜在中国寻找中产阶级的蛛丝马迹。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在西方民主发展进程中到底是中产阶级贡献大，还是无产阶级贡献大。在中国这个工农占绝大多数人口的社会里，忽略工农在现实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恐怕是个致命的疏忽。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不同，因此其研究重点理应不同，这一点都不奇怪。

怎样选择真问题呢？我发现经济学家邹至庄的一篇文章很有启发性，其标题是“中国经济制度对经济理论的挑战”。<sup>[47]</sup>与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一样，邹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拿中国的现实与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对比。但看到两者之间有重大差异时，邹教授的态度却与不少中国经济学家的态度不同。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有个标准模型，即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描述的那种模型。

如果中国现实与这个模型有差异,一定是中国改革不到位,经济学理论不会有问题。但邹教授认为,中国的现实如与西方理论不同,则表明后者有缺陷。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其实包括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提出了四大挑战:(1)私有产权还是公有产权;(2)西方法治还是东方的半法治;(3)个人福利还是群体福利;(4)多党制还是一党制。我不想在此复述邹教授的论点,只想引用他几句听似出格的话。不站得高一点,没有一点胆识,是说不出,也不敢说出这些话的:

中国乡镇企业的成功经验足以挑战只有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私有企业才有效率的教条。

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并不是太坏,至少它没有阻碍 1978 年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

有些时候,不严格执法也许是有益的。人们常说,中国是人治不是法治。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制度是坏的。

在一个强调群体利益的社会里,政府的领导作用十分重要。它的效果如何应该有更全面的研究。

民有、民享、民治意义上的民主可以在一党制下实现。

我们不必同意邹教授的判断和观点,但我们应该学习他的思维方式:不唯书,不随波逐流,从现实中发现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揭示西方理论背后的种种基本预设(underlying presumptions),思考它们,置疑它们,有所取舍。

西方理论背后的某些基本预设往往未经言明。如果我们对它们不了解,往往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基础之上的理论架构奉为神明。但基本预设未必是不需证明的公理,如果它们本身有问题,看似高深莫测的理论也许只是个花架子。另一种情况是,某些基本预设符合西方社会的实际,由此发展出的理论因而适

用于西方。但这些预设未必符合非西方社会的实际,那些由此引发的理论可能并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无论如何,搞清各种理论背后的基本预设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西方政治学一些理论有个基本的假设:社会以个人为本位。这个假设对西方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上面提到,亨廷顿指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人主义。但是,如果个人主义是西方的特征,其他文明就不是以个人为本位了。也许有人能拿出一万个例子来证明其他文明的人也讲个人利益,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西方人与东方人在价值观上的重大差别,并不表现在某些价值只出现在一种文明而不出现在另一种文明,而是表现在人们对各种价值的排序及其分布上。东方文明重视个人,但更重视社群。这个“更”是与西方文明相比较而言。如果东方社会的特征确实是社群本位,社会和政治运作的逻辑就可能与西方不同。比如说,社群伦理可能促使人们考虑个人行为的社会后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自由。社群本位的社会还会更强调义务、尊重、服从等价值。换句话说,个人本位的社会一定是权利本位,而社群本位的社会很可能是义务本位。在一个社群本位、义务本位的社会里,人们个人政治行为中包含的理性与理性选择理论的预期会一致吗?他们的集体行动会遵循奥尔森讲的那些逻辑吗?<sup>[48]</sup>他们要的民主是美式程序性民主吗?他们对人权要求的排序会与西方人排序一样吗?清醒认识了西方政治学理论背后那些基本预设,这些不成问题的问题就可能变成为问题。

### 第三,梳理政治分析的关键概念及其定义。

我们进行理论思维必须借助各种概念。如何定义这些概念可能直接影响我们的分析框架甚至逻辑结论。例如,“中产阶级”(the middle class)和“资产阶级”(the bourgeoisie)好像指的同一样东

西,但实际上它们的内涵可以有巨大的差别。<sup>[49]</sup>学者用它们中的哪一个?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选择?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这里女权主义政治学家的努力值得我们借鉴。在传统政治学文献中,妇女要么完全被忽略,要么被描述成政治冷淡。<sup>[50]</sup>女权主义学者指出,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传统政治学对“政治”这一关键概念定义太窄有关。传统政治学将“公”、“私”两域决然分开。公域是男人的游戏场,女人则属于私域(家庭)。“政治”被理解成就是指竞选、当官、院外活动、示威一类活动。女权学者认为,公域和私域并不是决然分开的,在所谓私域里也存在政治。于是便有了“私人的事也是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s)这句口号。<sup>[51]</sup>用拓宽后的定义看妇女,谁还能说她们对政治比男人冷淡呢?

在讨论中国政治时,我们常听到一个说法,中国只有经济变革,没有政治变革。这里同样存在对“政治”的定义问题。说没有“政治”变革的意思恐怕是西式政治(多党制、全国竞选、舆论自由)还没有在中国出现。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定义,把“政治”定义为权力关系,中国似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革。过去政府的 zones of indifference(邹谠先生语)很窄,现在宽多了,这算不算政治变革?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不是政治是什么?资产阶级的出现及其权力的扩张,工人相对于管理层权力的下降不是政治是什么?非要研究符合某种特定定义的“政治”其实也是政治。同样需要清理的还包括很多被用的日常政治用语,如“民营企业”、“阶级”、“群众”、“人民”、“民间”、“国家”、“民主”、“法治”、“左”、“右”等。

第四,就研究方法而言,切忌为方法而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是重要的,但方法毕竟是工



具。不能本末倒置,为了运用所谓“最新”、“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而舍弃更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这种情况在国内政治学界好像不严重,这样说显得有点无的放矢。但美国政治学界确有人是依据自己掌握的“最新”方法来寻找可以研究的课题。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既然方法是工具,它便没有绝对最好的,只有最适用的。在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曾有过一个希望采用当今最“尖端技术”的阶段,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只是在有了惨痛教训以后,第三世界国家才认识到“适用技术”的重要性。在研究中国政治时,也许不必,也不可能采取国外最“先进”、最时髦的方法。美国政治学研究广泛运用统计的一个前提是有大量可供使用的数据。过去20年,中国的统计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经济和社会数据,但政治方面的数据要么还没开始收集,要么不对研究者开放。在这种背景下,创造性地运用已有的定性研究方法和发展新定性研究方法,恐怕比一窝蜂地拥抱最新统计方法更重要。

政治学的本土化必须从本土学者开始。虽然我们生于本土,自以为对本土有更深厚的关怀和更切身的了解,西方政治学潜移默化影响之大恐怕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像。如果不意识的反省,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以西方政治学之“是”为是,以西方政治学之“非”为非。什么叫文化霸权?让人在浑然不觉中变成附庸便是文化霸权法力的证据。其实这也不奇怪,萨义德早就指出,东方学者很容易接受西方创造出来的东方学,并以此为荣。他的下一段话虽然说的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但似乎就像是在说我们:

就文化、知识和学术生产而言,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仍然处于劣势。我们在使用强力政治的术语描述这一地区的情况时必须面对现实。没有哪位阿拉伯或伊斯兰学者能够忽视美国和欧洲的学术刊物、研究机构 and 大学所发生的情况;反过来却并不成立。比如,今天的阿拉伯世界没有一份有影响的阿拉伯刊物,正如没有哪家阿拉伯教育机构在阿拉伯研究能够与牛津、哈佛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争高下一样,更不必说其他非东方的主题了。这一切所导致的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是,东方的学生(和东方的教授)仍然想跑到美国并且投到美国东方学家的麾下,然后回来向本地的听众重复被我一直称为东方学教条的那些陈词滥调。这一再生产体制的必然结果是,东方学者因他在美国所受的训练而睥睨其本地同行,因为他学会了如何有效地“操作”东方学的话语;而在他的“老板”——即欧洲或美国的东方学家——眼中,他则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本地信息提供者”。<sup>[52]</sup>

看来,本土化即使对本土学者而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群印度知识分子的努力也许对我们有启发意义。1982年,他们创办了一个名为 *Subaltern Studies* 的刊物,其目的是研究殖民主义如何奴役被殖民者的主观意识,而被殖民者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禁锢。像中国人一样,很多印度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是落后的,西方生活方式是“新”的、“现代”的,“世界性”(cosmopolitan)的,因而是“好”的。这群知识分子认为,当被殖民者不是以本土为参照,而是以西方为参照时,就说明他们的思维方式也被殖民化了。刊物的创办者们希望运用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和福科的权力分析方法来揭示自己的思维方式如何被西方霸权所奴役,以拯救自己被压抑的主体性(colonized or oppressed subjectivities),即所谓 *subaltern*。

这群印度知识分子的经验告诉我们,对自觉不自觉打上西方

烙印的人来说,本土化必须是有意识的努力,是自觉的行为。没有批判性的反思就不可能有本土化。那么批判性的反思应当从哪里开始呢?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的一段话也许为我们暗示了方向:“批判性反思的出发点是认识到你到底是谁,认识到你自己也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在你身上留下无数的痕迹,但你却理不清它的头绪,因此,找出这头绪就成为当务之急。”

### 注释

[1] A. Somit and J. Tananhaus 1982: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Irving Publishers, Inc.

[2] 曹日新:“政治学范畴之探索”,郑宇硕、罗金义编:《政治学新论:西方学理与中华经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Alberto O. Hirschman 1970: “The Search for Paradigms as a Hindrance to Understanding”, *World Politics*, Vol. 22, No. 3, April 1970, pp. 329 - 343.

[4] John Womack 1968: *Zapata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5] James L. Payne 1968: *Patterns of Conflict in Colomb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6] 关于赫叙门的经历,见他的自传体著作: *A Propensity to Self - Subvers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 后来,美国许多政治系都将 Womack 的书列为了解革命的必读书。可惜的是,人们忽略了该书的方法论意义。

[8] 实际上,现在仍有人沿用冷战语言称中国为“极权主义政权”(totalitarianism)。但很少有认真的学者会采纳这说法。

[9] Lucian Pye 1990: “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4, 1990, pp. 56 - 74.

[10] 更有甚者,Edward Friedman 断言中国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分裂成南北两部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读原文,看他的论点、论据有什么问题,看

他是不是用学术包装宣扬其主观愿望。Edward Friedman 1994: "Reconstructing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A Southern Alternative to Mao - Era Anti - Imperialist National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3, No. 1, 1994, pp. 67 - 91.

[11] Aaron Xavier Fellmeth 1996: "Social Capita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rust or Rule of Law",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 14, No. 2, June 1996, pp. 151 - 171.

[12]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173.

[13] Kazufumi Manabe 1995: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in China*. Kwansai Gakuin University Annual Studies.

[14] Ronald Inglehart 1999: "Trust, Well - being and Democracy", In Warren, Mark E., *Democracy and Tru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1.

[15] 王绍光: "信任的基础: 一种政治社会学解释", 未发表文稿,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 2000 年版。

[16] Eric M. Uslaner 2000: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7] Chen Jie, Zhong Yang, and Jan W. Hillard 1997: "The Level and Sources of Popular Support for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Regime", *Communist and Post - Communist Studies*, Vol. 30, No. 1, 1997, pp. 45 - 64.

[18] 与史天健用相同数据的研究结果, 可在中文出版物中找到, 如朱云汉、张佑宗: "华人社会民主与威权体制的文化起源: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比较研究", 见刘兆佳等编: 《华人社会的变貌: 社会指标的分析》,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 1998 年版, 第 257--285 页。

[19] John Torpey 2000: *The Invention of the Passport: Surveillance,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 在这方面, 倒是一位美国记者 Robert D. Kaplan 写了不少文章, 如 "Was Democracy Just a Moment?"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280, No. 6, pp. 55 - 80. 他的很多文章被收入了新书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 of the Post*

- Cold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年。该书在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政治学界似乎还没回应这位记者提出的问题。

[21] Robert H. Bates 1997: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A Useful Controversy?"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30, No. 2, June 1997, pp. 166 - 169. 又见 Robert H. Bates 1998, et al: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2] Donald P. Green and Ian Shapiro 1994: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3] Chalmers Johnson 1997: "Preconception vs. Observation: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Area Studies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30, No. 2, June 1997, pp. 170 - 174.

[2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6, pp. 28 - 46.

[25] Gabriel A. Almond 1977: "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29, No. 4, 1977.

[26] Susan J. Carroll and Linda G. Zerilli 1993: "Feminist Challenges to Political Science", in Ada W. Finifter,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3, pp. 55 - 76; Amy Gutmann, ed.: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7] 郑世平: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和困境", 未刊稿, 1999年

[28] Ira Katznelson 1997: "The Subtl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Emergency: Political Science as Liberal Guardianship", in Andre Schiffrin, ed.: *The Cold War &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pp. 233 - 258.

[29] Joseph A. Schumpeter 195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s.

[30] Robert A. Dahl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

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31] David B. Truman 1971: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2n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转引自 Katznelson, 第 251 页。

[32] Theodore Lowi 1992: "The State in Political Study: How We Become What We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1992, pp. 1 - 7.

[33] Ibid.

[34] 中译本见王宇根译,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 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35] Donald N. McCloskey 1985: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36] William Nelson Fenton 1946: "Integration of Ge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in Army Area Study Curricula",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Bulletin*, XXXII, 1946, p. 706.

[37] Harry Eckstein 1975: "A Critique of Area Studies From a West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Lucian W. Pye,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Rivals or Partn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 203.

[38]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ld War Area Studies*. in Schiffrin, ed. *The Cold War & The University*, pp. 195 - 231.

[39] Robert Scheer 1965: "How the United States Got Involved in Vietnam", Santa Barbar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p. 33 - 38.

[40] I. L. Howoritz 1967, ed.: *The Rise and Fall of Project Camelo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41] Bates: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Johnson: Preconception vs. Observation.

[42] Gabriel A. Almond and Laura Roselle 1989: "Model Fitting in Communism Studies", in Thomas F. Remington, ed., *Politics and the Soviet Syste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43] Harry Harding 1984: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

eration of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Vol. 36, Jan. 1984, pp. 284-307; Elizabeth J. Perry 1994: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 – Society Rel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139, Sept. 1994, pp. 704 – 713.

[44] Elizabeth J. Perry 1999: “Partners at Fifty: American China Studies and the PRC”,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rends in China Watching”, the 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ctober 8 – 9, 1999.

[45] Lowi: *The State in Political Study*, p. 1.

[46]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47] Gregory C. Chow 1997: “Challenge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for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No. 2, May 1997, pp. 321 – 327.

[48] Mancur Olson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9] Immanuel Wallerstein 1996, et al.: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89.

[50] 例如 Angus Cambell et al.: *The American Voter*; Robert Lane: *Political Life*; Fred Greenstein: *Children and Politics*;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Robert Dahl: *Who Governs?* Susan J. Carroll 1989: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The Intersection of Private Lives and Public Roles among Women and Men in Elective and Appointive Office”, *Women and Politics*, Vol. 9, 1989, pp. 51 – 67.

[51] 萨义德:《东方学》,第 416 页。

[52] 关于 Subaltern Studies 的简史,见 Chakrabarty, and also Gyan Prakash 1990: “Writing Post – Colonialist Histories of the Third World: Perspectives from Indian Historiograph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2, 1990, pp. 383 – 408。又见 Gayatri Spivak 1995: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The Post – Colonial Reader*, ed. by B. G. Ashcroft Griffiths and H. Tiffin, New York: Routledge。Antonio Gramsci 1971: *The Prison Notebooks; Selectio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p. 324.





## 下篇

---

-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 ◇一评 90 年代“新左派”：制度创新与国情
- ◇二评 90 年代“新左派”：中国的现代性与批判
- ◇三评 90 年代“新左派”：“新左派”的学风
- ◇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
- ◇中国的“新左派”是“自由左派”吗？
- ◇对“新左派”的印象与分析
- ◇解读“新左派”
- ◇中国部分“新左派”人士选择与恐怖主义站在一起
-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之评论
- ◇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
- ◇“新左派”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 ◇编者说明



##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朱学勤

中国思想界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学术分歧,已经引起海内外关注。到目前为止,双方分歧究竟何在?

第一,对基本国情的判断。“新左派”朋友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入侵,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必须批判这一现实。而自由主义一方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远没有卷进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并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对外开放。

第二,对社会弊病的判断。“新左派”认为,今天的社会弊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已出现过,是“西方病”、“市场病”,中国不能重演。自由主义认为,所谓“西方病”,恐怕源自中国文史教育对世界近现代史的歪曲与丑化,以及五四以来“左”倾思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片面影响,这些负面因素整整一个世纪都没有得到有效清理,90年代以来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受挫,这些因素进一步放大影响;至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弊病,更不能简单比附为外来的“西方病”、“市场病”,而是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甚至压制后者所产生的“中国病”、“权力病”。

说到社会公正,在时间上,自由主义比“新左派”更早提出问题;在认识根源上,他们也挖掘得更深,指出这一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存在,如那时的特权阶层对私有财产的无偿掠夺,对社会公共财富的无偿占有,以及对不同意见的政治高压,都是这一体制在早期就已经产生的不公正,只是被毛泽东平均主义的虚幻意识形态所遮蔽;引进市场机制后,权力机制并没有变,而是借市场机制放大特权,寻找到更大范围的寻租空间,由此造成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腐败,以及社会公正问题的空前尖锐。我们不能把权力机制的账算到市场机制的头上,更不能以理论上的不公正掩盖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

第三,如何解决社会弊病?“新左派”朋友认为,近代历史上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群众性大民主没有错,甚至“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也没有错,应该挖掘其中的“制度创新”,拨转中国进入全球化的错误态势。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从法国革命起源的近代左派政治文化,经过俄国传播到中国,逐渐被发展为登峰造极的“文革”实践,这是一条历史的岔道,在这条岔道上,牺牲最多的恰恰是最初被动员的社会底层民众。改革提出彻底否定“文革”,引进市场机制,是向着世界主流文明艰难回归。只有把改革延伸到政治体制,在制度层面建设种种权力监督机制,宪政治国,才能既解决社会公正,又尽可能避免中国历史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以上诸端,关键在于“新左派”朋友提倡批判市场机制,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的。

1999年5月以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令话语空间对自由主义更为不利,甚至一度变得险恶。我个人希望双方能互相尊重,在争论中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要随政治风向转变而转变,坚持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以维护理论探讨的严肃性。

对国内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新左派”朋友,我认为在说理讨论的同时,对他们的经历局限也应该予以一种同情性理解。“文革”是必须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在否定以后立刻封闭,不许研究,不许反思。现在的情境是,改革表面上以否定“文革”起步,但是每走一步都要遭遇“文革”幽灵的羁绊。今日“新左派”思潮的出现,是对“文革”简单否定的报应,甚至是惩罚。

一些年轻的“新左派”朋友没有真正经历过“文革”却对“文革”产生“怀旧”心理,确实应该纠正;但更应该批评的,是当年否定“文革”却又不许研究的禁令。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打开自己的黑箱,不打算彻底反省在这一黑箱里自身的所作所为,这样的民族一定是不会长进的民族。它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会不断遭到各种“左”倾思潮的冲击,今天有“新左派”,明天更年轻的朋友也许会变成“新新左派”。

这样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即使赢得尊重,也不会超过日本这样的民族,因为它在要求日本道歉的同时,对本民族的内部阴暗却采取了与日本同样的封闭态度。在新世纪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确有可能走进世界前列,但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却可能是令人担心的不可测因素。

## 一评 90 年代“新左派”：制度创新与国情

徐友渔

20 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发生在知识界的大争论。先是出现了“新左派”思潮并引起广泛批评，然后是自由主义思潮正式露面并引发“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对峙。这场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兴趣，2000 年开年不久，已有好几本相关资料汇编陆续出版。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感到不少人对这场争论的起因、过程、实质，以及双方分歧究竟何在，并没有清楚、确切的了解。比如有人认为，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而“新左派”强调社会公正；自由主义者争取言论自由不过是提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要求，而“新左派”提倡经济民主则是代表了工农大众的利益。我认为，这种混乱不确的认识只表明了某种话语策略的成功。我愿在此阐明自己的看法，偏颇和成见在所难免，祈望各方指正。

### “新左派”思潮的出现背景

“新左派”思潮以什么机缘产生？为何它与自由主义的论争成了 90 年代的重要景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 9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思想学术论争格局及社会生活两方面的变化作一说明与比较。

首先是争论场地转移。在 80 年代，党内高层思想路线分歧与

理论界、社会上的观点对立是贯通一气、互相呼应的。而在 90 年代,由于有邓小平“不争论”的指示,党内或官方意识形态对立很少张扬(当然也偶有发生,例如“老左派”的一系列“万言书”与《交锋》等作品的论争),知识界内部的争论显得突出。

其次是争论内容的更替。80 年代主要表现为革新与保守的对立,党内理论界表现为教条的马列主义与政治新思维之争,党外文化界表现为中西文化大讨论。而在 90 年代,交锋的基本阵线是现代与后现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在 90 年代,人们不再满足于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和争论,更关注制度安排,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过程之类的现实问题。一批人文学者从哲学、历史、文学、思想史转入社会学或社会批判。有人说,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有一个从哲学—美学到社会学的转向。

在 80 年代,革新派知识分子中的主导倾向是对五四新文化和启蒙运动的继承与弘扬,与五四时一样,反专制、反封建是主要议题,批判自身传统,了解和借鉴西方学理蔚然成风。而在 90 年代,风向发生逆转。八九年的“六四”风波之后,在批“全盘西化”(甚至具体到对电视系列片《河殇》进行大批判)的指导方针之下,对西方学理的学习和借鉴变成了清理与批判,反专制、反封建的主题变成了反西方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在 80 年代后期传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急剧滋生,以前人们接触的是值得仰慕的西方主流文化,而现在开始流行暴露西方弊病,消解西方价值的非主流观念。

反专制、反封建从中心话题变成了禁忌,有人被迫暂时沉默。而从另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理层面上看,这已经不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学问,而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耐性的问题。痛感的尖锐性与求变的迫切性经不住时间与日常生活的消磨,迟早会松弛下来。文化人求生和求新的本能驱使人转换话语。中国的现实并无根本

变化,需要改变的是立场和视角。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当成另一个中国——与80年代不同的中国,与1989年不同的中国——来对待。这样,美国的问题会成为中国的问题,西方知识分子的思维套路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模式,尤其是,当代西方左派对西方和全球问题的诊断会成为对中国问题的诊断。

在政治问题不得不暂时悬置起来的同时,中国的社会问题凸显了。权力肆无忌惮地将自己兑换为金钱,本土资本的运作寸步难行,除非投靠和寄生于权力,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金钱(资本)作为第二种恶,对许多人而言显得比第一种恶更难于忍受。知识分子开始认真考虑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

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出在哪里,不同的知识分子给出了不同的诊断。

对于被称为(或自称为)自由主义派的人而言,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政治问题。他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法治,以此来制衡权力,规范市场经济。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为:新情况,老问题。

而与之对立的“新左派”基本上认为中国的问题已经转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而这么做的启发和激励因素可以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1999年爆发的民族主义狂热,使敌视西方阵营的“新左派”思潮在气势和舆论上占压倒优势。

### 所谓“制度创新”与国情

“新左派”的致命缺陷是脱离实际,为了得到自己预先设定的结论,为了施展自己刚刚学到的西方最新学理分析,将中国的历史



和现实歪曲、割裂，强行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甘阳和崔之元在 90 年代初指责中国知识界主流迷信西方经验，是“制度拜物教”，认为他们根据西方最新学理和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的制度创新因素如果发扬光大，就可以对西方的现代性作出超越。但把他们的高论和中国的现实相比较，只能使人产生哭笑不得之感。

比如，甘阳认为，中国乡镇企业具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模式意味着，“华夏民族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或许可能创造不以彻底摧毁乡土社会为代价的历史经验。果如此，这不仅对华夏民族‘生活世界’之历史延续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将是对人类文明史的莫大贡献。”“中国乡镇企业所提出的问题，毋宁应该看作：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并正在形成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 alternative。”（见《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载《二十一世纪》1993 年 4 月号，第 5 页。）甘阳以“对乡土中国的大量经验研究”为自我标榜，但中国的现实如何呢？

真正从事过田野调查，把结论建立在实证考察之上的农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乡镇企业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原则，关键是不允许农民改变身份。中国社会半个世纪最基本的事实，最重要的分野就是城乡二元化，全部人口分成了“有城市户口者”和“农民”两个等级，他们在居住、求职、受教育、医疗、福利各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结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决非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和城市化相比，乡镇企业的形式使城乡收入差距无法缩小，使劳动力的转移处于不稳定、低效率状态。千百万农民不顾艰难险阻涌入城市，形成震动各方的民工潮，充分说明把农民束缚在乡土上是多么不合理

和不得已。(参见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载《东方》1994年第1期。)

指出乡镇企业发展的困难和实质并不是想否定其成就,与以前那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比,乡镇企业无疑带给农民一定程度的机会和富裕。我们也知道,立即、彻底取消城市/农村身份差别,是不现实的。但从农民自身的利益和中国农村发展的前途看,取消身份制毕竟是无可回避的必要条件。前不久中央政府在使农村人口取得城市户口方面松动了很小的一步,立即被各方人士欢呼为中国改革户籍制度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可见人们对于什么是文明和进步,心中是有数的。

不顾事实,把数亿中国农民的无奈当成取代西方文明的生发点,在美国校园中畅想自己如何洞见了落实文化中国的历史机遇,真不知叫人说什么好。更有甚者,把与自己对立的一派知识分子说成是津津乐道于“不平等的自由”,是贵族派,标榜自己的“平民”立场,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情吗?(见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读书》1991年1月号第85页。)

崔之元也喜欢谈乡镇企业,他是要说明,大跃进固然不好,失败了,但其中也包含了相当的“合理因素”,乡镇企业就是大跃进的合理因素(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第7页)。但他对下列事实不作解释:为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使乡镇企业办不下去,而只有在彻底否定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做法之后,乡镇企业才有突飞猛进?

崔之元急不择路地为人民公社评功摆好,把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的村民民主自治也归功于人民公社:“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虽然不如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灵活,但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土地的集体所有,为

乡村的民主自治切切实实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其次，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双层经营’，并非简单地分田单干，乡村公共建设、产前产后服务等‘集体层’更趋重要，各家各户在为乡村公共财政交纳费用时，必然同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从而为乡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质利益动机。”（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第 15 页。）

崔之元的以上议论只能使对中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目瞪口呆。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村民和村一级的集体连种什么庄稼、怎么种的权力都没有，村民们失去了自留地、果树、甚至锅碗瓢盆，他们吃饭去公共食堂，行动军事化，常常在半夜打着灯笼搞大会战，上级的命令不论多么荒唐（比如种薯要挖地三尺，插秧株距三寸，砍光树木去大炼钢铁）都得执行，不然会被捆绑、斗争、监禁，这是中国农民最没有自主权的日子。在这段时间，任何违背农作常识和基本生存的命令他们都无法违抗，其结果是饿死 3000 万以上的人。这居然是“为村民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

崔之元想说明的是，公有或集体所有，是民主自治的前提。他的例证是“印度地方选举常被大地主操纵”，多么奇怪的逻辑！其前提是：民主自治的惟一阻碍是金钱势力，其推理是：凡没有金钱作祟的地方，就一定有民主自治。那么，怎么理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呢？

崔之元似乎完全不懂得下列道理：只有当人们的生产资料和财产有保障，他们才可能有自由、民主、自治。

中国目前的乡村民主，说到底是国家“给”的，当然也适应了分田到户的形势。

崔之元企图为中国当前的乡村民主提供一种物质利益驱动机制的解释：村民为公共财政纳税，必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这

完全是一种在西方历史上起作用的机制,比如人们常说的美国公民的“纳税人意识”,又如英国近代中产阶级抗争皇权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这些当然很好,但可惜中国的现实并非如此。名目繁多的税款、集资、摊派,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强征强收,这一切并没有使村民树立“交了钱,我就是主人”的意识。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严禁滥收费乱摊派,而这种命令收效甚微,充分证明崔之元的解释模式之荒唐可笑。

## 二评 90 年代“新左派”：中国的现代性与批判

徐友渔

### 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与汪晖的分歧，同样涉及到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汪晖与崔之元和甘阳在立场、观点方面相当一致，但论说的侧重点不同。他没有专门论说中国旧体制中有多少优秀事物，可以与西方最新冒出苗头的优秀事物媲美，或可以形成超越西方文明的因子。他着力证明，中国进入 90 年代之后，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的职能变了，知识分子的功能、与政府的关系变了，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也应当变。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社会作用是批判，在汪晖看来，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在 90 年代却表现出批判性的丧失，因为他们并不全力以赴地批判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他在发表于《天涯》1997 年第 5 期上的文章“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此文收入另一文集《田野来风》时，其名称是“市场时代的降临与思想的溃败”，把主题表达得更直露了。

我们来看看汪晖是怎么说的：“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资本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语境中，政府和

其他国家机器的行为和权力运作也已经与市场 and 资本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也不能简单地从政治角度来分析。”(见《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第134—135页)“在迅速变迁的历史语境中,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同上,第141—142页)汪晖认为,新启蒙思潮已经遭到了历史性的衰落,因为它把批判的视野局限于国家的内部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而在他看来,应该及时地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剖析市场条件下国家行为的变化,因为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同上书,第146页。)

争论的焦点和问题的实质十分清楚:第一,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变成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第二,由于中国政府的职能与行为发生了转变,因此针对政治专制的批判必须及时地变成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分析?

我曾经指出,对于一个社会的性质和形态作出断言,是不能信口开河的。说中国社会已经是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需要一系列指标和事实来证明的。汪晖在文章中除了“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这句文理不通的话之外,没有提供任何论据来支持他的判断。我引论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治年鉴》关于1997年(汪晖文章发表的那一年)的以下数据:关于投资,国有经济占总投资的52.5%,联营经济占0.5%,外商投资占7.8%,港澳台投资3.8%;关于就业人数,国有经济占总数的15.9%,联营经济占0.1%,外资占0.4%,港澳台占0.4%,农民占从业人数的71%。我还指出,时至今日,宪法条文中只说到对社会主义公

有财产的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尚未在宪法中得到确认。(见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载《开放时代》1999年5月第50—51页)根据以上这些情况,我不知道汪晖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中国社会已经是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汪晖的思想远不止于下列主张:在90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矛头应及时转向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他实际上把90年代的自由主义,80年代的启蒙思潮,甚至近一百年来的启蒙思潮,以及一切反封建、反专制,提倡学习西方,走现代化之路的主张都叫做“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目的论世界观”(见《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第147—148页)。他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可以叫做反现代性立场,虽然他很策略地把自己的看法形容成是不要单纯地、教条地肯定现代性,而是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悖论,一种充满矛盾的结构。

正是这种反现代性立场,给汪晖提供了一个异乎于启蒙派知识分子观察和评判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独特角度,他据此评论中国知识界在80和90年代的思想状况,乃至马克思、毛泽东的学说。在他看来,除了崔之元、甘阳的“制度创新”说,其他所有的主张,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不论是有影响的还是影响甚微的,都有致命的缺陷,因为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认可现代性的预设。(同上,第135—146页。)

问题在于,汪晖从反现代性立场向近代和当代几乎每一种社会思想立场发出质疑、挑战和批判,难道不需要为这种立场作出辩护,难道不需要说明他那同样是得自于西方学理的观点,在阐释中国问题时具有合法性和適切性?但是,汪晖除了引述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奥塔(Jean - Francois Lyotard)、阿明(Samir Amin)和华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的言论外,并未证明他们的论

述与中国历史语境的相关性。

有人认为,中国学者之间的论争进行到底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代理人战争”:各方都竭力援引西方学理资源,将其用于解决中国问题,把自己摆在作为西方某家某派在中国的代言人的位置上,反驳或捍卫西方某个人或某一派的观点。我不否认“代理人战争”有一定的道理和意义,我不知道汪晖是否准备把隐蔽的“代理人战争”变成公开的“代理人战争”(如果要那样做,他就得像崔之元,把自己的学理来源——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交待得一清二楚),我认为打“代理人战争”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很重要,我在下面将通过简短的历史考察与对比分析说明中国的反现代化思潮(包括汪晖的最新主张)是不正确的。

## 现代性与批判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倾向是以现代化为导向。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始于列强侵略,因此对西方的疑虑和对现代性的疑虑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同意汪晖的这种看法:“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同上书,第136页)这种特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是反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倾向。诚如艾恺(Guy S. Alitto)所指出的:“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几乎永远是反现代化思想家们思想中的构成部分。这相当自然,因为不管左派或右派的批评在经济思想的领域常有重叠的地方,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在中国关于社会主义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中所有重要的思想家与政治领袖——包括共产党、国



民党、孙逸仙及其他小党，以及较次要的人物如阎锡山、冯玉祥、胡汉民等等，都没有例外地全部提倡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管其意识形态的倾向如何，中国的人物几乎无人提倡任其自为的资本主义。”（见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0 页。）

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现代性主流话语，即对个人自由、私人财产、市场经济、宪政体制（法治、权力制衡）的肯定，属于资本主义，而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是范围和程度不等地对之持反对态度。而愈是激进、正统的社会主义，反对得愈全面、愈彻底。但事实证明，正是那种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经济的无效率、人民的贫穷、个人迷信、个人专权、法制被践踏、人身安全的丧失，这一系列惨痛经验使中国人重新考虑历来遭到否定的东西的价值，认识到它们的普遍意义。即使是力倡“四个坚持”的邓小平，也主张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中国当代的思想解放，如果剥去 70 年代末倡导它时的意识形态外衣，实质上就是重新认识和认同被搞得臭不可闻的名为“资本主义”，实为人类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崔之元在“制度创新”名义下提倡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方向刚好相反。

我不知道他的口号在美国是否有新意，在中国，却是阎锡山、胡汉民者之流都可以接受的。

汪晖力图表明，和那些只有简单的、整体性思维的人不同，他看到了现代性的异质性。但他强调，具有正面价值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肯定。他说：“现代性的冲突结构恰恰是现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种活力的原因，但是，这种内在活力恰恰来自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冲击本身。”（见《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载《天涯》1999 年第 1 期第 23 页）对此，有一系列问题应作辨析。

第一,汪晖把发生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所有反抗运动都视为反现代运动,这是一种混淆。事实上,许多重要的社会进步运动是争取现代性的运动。现代性在西方社会并未走到尽头,它还是未竟之事业。让我们以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来作分析。请问,当马丁·路德·金作讲演:“我有一个梦”时,他援引的难道不是美国当初的立国理念?他是想真正实现这些理念,还是摧毁这些理念?当总统约翰·肯尼迪、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支援黑人进校,甚至不惜派军队保护黑人进校时,当约翰逊总统终于实现平等权利法案的立法时,你能说这并不是西方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在强行推行自己的价值?难道这帮大人先生是社会主义者,要与黑人联手打倒资本主义?

第二,汪晖承认,现代性的反思和批评是从现代性自身中孕育出来的,但他不愿意进一步承认,在已有和现有的各种结构中,只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才是惟一为批判自身提供条件的结构。马克思可以在资本主义的心脏为资本主义掘墓锻造思想武器,哈维尔(Vaclav Havel)在后极权体制中谈论后极权时代政治却要入狱。我们的“新左派”朋友现在鼓足了劲批判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却从来不提,正是他们的批判对象为他们提供了批判的条件(中国“新左派”的思想资源,也是从西方“新左派”那里得来的)。

第三,难道我们不应该因此想一想,在中国应该争取和创造这样的条件?当然,我们可以同意,当某一天现代性在中国业已充分确立甚至过分成熟时,它的负面作用会暴露出来,需要我们警惕与批判。当然,“新左派”们可以自豪地宣称,他们特别有远见,正在未雨绸缪,但雨天未到你就不打伞,不是太可笑了吗?你总不能说:“人家美国都有好多人在打伞”呀!中国在70年代“文革”期间大

批“资本主义法权”的闹剧，难道不值得人们引以为戒吗？中国的反现代性和社会主义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令人忧虑的恐怕不是失之太弱，而是过分强大。

现代性，不论作为观念还是制度性安排，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批判。观念上、文化上的批判往往是充满活力、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但其基本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如人权、自由、民主、自由经济、法治等等，却经受住了时代变迁和历史发展的考验。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各种思潮（包括反现代化思潮）充分表演的平台。中国 90 年代的“新左派”如果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如果只想重复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那是问题不大的。但他们现在的兴趣是在制度安排方面，他们对于建造这样一个平台的努力发出挑剔与指责，但除了批判与解构，根本拿不出建造另一个更好的平台的可行方案。也许，有人会辩解说，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是批判。谈到批判，令人想起这么一则政治笑话。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争论谁的国家制度好、更民主。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喊打倒里根总统，你们能吗？”苏联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怎么不能，我们当然可以喊打倒里根总统。”

“新左派”宣称中国思想界在市场经济来临时表现出溃败，指责中国知识界不批判资本主义，我想，在北京大骂美帝国主义，在美国的大学讲台上大讲资本主义不民主，这与在莫斯科高喊打倒里根总统有什么区别？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 三评 90 年代“新左派”：“新左派”的学风

徐友渔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既令人瞩目，又令人失望。许多人认为，虽然双方分歧严重，但既然讨论的问题涉及到中国要不要现代化，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就希望争论双方能心平气和，表现出学者风度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讨论深入。

争论的水准和气氛不令人满意，从根本上说与参与者的整体思想学术素养不高有关，这是有待包括本文笔者在内的人今后努力提高的。另外，也与“新左派”的学风有关，我在下面将用事实来说明这一点。当然，这决不能说明我本人或与我观点一致的人就没有学风问题。我希望所有的问题都被指出来，以利于当事人自省，求得提高学术争论水平。

争论中，自由主义者被反复指责为只关心个人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富人的自由，而不关心弱者的权利、不要社会公正，甚至替腐败辩护。例如，甘阳说：“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见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读书》1991年1月号第85页。）俗话说，众口铄金，现在，一些即使是支持或同情自由主义的人，也觉得自由主义有不关注社会公正的缺陷。但是，我从未发现以上指责有文本根据，甘阳的攻击既多又猛，但从未指出究竟是谁，有什么主张，其他“新左派”的抨击也从

无具体引证。相反,我却明确列出了自由主义者强烈主张社会公正的文本根据。(见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载《开放时代》1999年5—6月号第47页。)

这很简单,因为其中一些文章,就是备受“新左派”攻击的朱学勤和我本人写的。

我现在倒想反过来问一下“新左派”朋友们:你们能引证多少文本或事例,说明在你们在把社会公正问题当棍子打自由主义之前,就研究和阐发过这个问题,为社会公正大声疾呼?

在我看来,学风问题是“新左派”的通病。为了免蹈对方“只指控,不举证”的覆辙,让我对本文前面所谈及的三人的学风问题举例加以说明。

## 先说崔之元

崔之元的学风问题是卞悟在与之论争时立刻就觉察到的,现只引证卞悟批评其学风问题之一例:“崔先生在与美国人用英文合写的文章中盛称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与农民结成‘伙伴关系’并百般‘帮忙’,但在以汉语写的批驳我的文章中却又说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弃农民于不顾,即使偶有帮助也是非‘常态’的‘短期结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参见卞悟《“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再问崔之元先生》载《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第134页。)崔之元论点矛盾的两文,分别见《以俄为鉴看中国》(与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合写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第19页),《三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答卞悟》(载《二十一世纪》1996年4月号第133页)。用英文写的,美国人可能读到的文章,就说美国政府好,而中文文章就说美国政府不好,论者质疑崔

之元的写作动机,那是自然的。退一步讲,在同一场论战中,也不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呀。

崔之元论及中国现代化方向这么重大的问题,缺乏应有的严肃认真态度。文章胡征乱引,借以吓人,极尽东拉西扯之能事,论据与论点无关甚至矛盾,逻辑混乱,曲解事实之处俯拾皆是。你要与他认真真理吗?你就得像分身乏术的救火队员,四外奔忙,累得筋疲力尽。现仅从引起广泛争议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举几个例子。

崔之元引证新进化论,力图说明曾经被证明为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往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复活,因此“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并非是最最终的。他过硬的证据是,在实验室里通过基因重组技术,造出了长牙齿的鸡。他以此说明,中国的大跃进、农业学大寨,也不能简单否定,其中含有合理因素,应该继承发扬。

但是,仅这么一个论证,就犯了一系列的低级错误。第一,他把“遗传信息”等同于“合理因素”,这是荒唐的。希特勒的遗传信息在今日欧洲新纳粹那里显现,这决不能证明法西斯主义的合理性;第二,他谈的是自然选择,怎么能用实验室的基因合成技术作例证?这只人工鸡既非在自然界长成,更没有证明它在适应自然竞争条件方面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这根本就是文不对题的论证;第三,他担心别人这么反驳:他说的是自然科学,怎么能用于社会呢?他的回应是:达尔文的理论(自然科学)都受马尔萨斯与亚当·斯密(社会科学)的影响,因此,新进化论这种自然科学成果也可应用于人类社会,难道崔之元真的这么不懂形式逻辑吗?第四,他引证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一书,想证明“‘大寨经验’中的合理因素——抓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陈永贵创造的‘深刨法’——仍是中国今日发展农业的有力促进因素。”(见崔之

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第6—7页)如果一般地讲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农业有好处,那么中国人用不着学大寨,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对川西平原农业的好处延续了几千年,问题是大寨那种劳民伤财,不计成本地建设,那种“西水东调”的蠢事,是不是合理因素?“文革”后,中国人对此已有结论,吴思的书也有说明(见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310,316页),崔之元以这本书为论据,但并不具体说明引证的页数,为我所用地解释书中的材料,是聪明,还是不诚实?

崔之元为祸害中国的极左路线招魂,讲得最离谱的话是:“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见崔之元:《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载《亚洲周刊》1996年5月26日,第47页。)毛泽东的原话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根据“文革”的经验,这是要每七八年就大乱中国一次,停产关校,使法制荡然无存,打倒自己的政敌,使知识分子受尽凌辱和摧残,这有什么“合理因素”可言?

崔之元把毛的话压缩成一句,其中只有两个内涵,一是内容,即“文革”,一是时间,即“七八年一次”。“文革”指无法无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至于“七八年一次”,毫无新意,中国、西方的选举,或四五年,或七八年,用不着听毛的话才办。所以,崔之元的所谓合理因素,就只能是大搞阶级斗争、横扫牛鬼蛇神了,这当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要从这里推衍发展出直接民主,真要有崔之元那样的“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才行!这么可怕的主张,这么莫明奇妙的联想,难道值得对之进行认真的学术探讨?

## 再说甘阳

甘阳一直没有停止过训诫、辱骂中国知识分子，他的攻击既包括立场、观点，也包括智力水准与道德。请看他是怎么说的：“确切地说，自由主义或‘英美自由主义’在今日中国基本已成为反对民主的一种变相说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大众参与越低，个人就越有保障；积极自由越小，消极自由就越大。”（见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第5页。）

他认为，中国版本的自由主义是：“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见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读书》1991年1月号，第85页）对于这么严重的指控，以及其他一系列类似指控，甘阳提供了什么样的文本依据呢，没有，一点也没有。正是根据以上虚构的罪名，甘阳对整个中国知识界作出了如下宣判：“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同上）面对这种刻毒的攻击和侮辱，难道可以通过学术讨论来辩解吗？

甘阳似乎对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宣泄不尽的怨毒心理，请听他的以下叫骂：“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里还有随着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者，作出种种丑态，唱起一种新的‘凡是歌’，歌词大意无非是：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作的就要紧跟。他们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像他们一样，努力作一个好奴才！”（见甘阳《自由主义与轰炸》载《明报》1995年5月17日）。至



于到底是什么人,说了些什么话,活该担当如此可怕的罪名,甘阳照例是一字不提的。如此恶狠狠的辱骂,人们难于相信这是一个学者之所为。

甘阳的另一拿手好戏是文过饰非,把功劳归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不,推给整个中国知识界,把他一个人犯的错误说成是中国知识界的错误,摇身一变,声色俱厉地教训中国知识界。他曾唱过一场批判中国 90 年代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独角戏,在这方面有充分表演。

大家知道,从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起,中国知识界开始认真地清理分梳政治哲学中的英国式经验主义传统和法国式理性主义传统,撇开以前的意识形态偏见,重新认识伯克(Edmund Barke)、卢梭、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这种重新认识在学理上和实际上都有重大意义,它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深化和成熟的标志。

在这场重新认识、深化认识的过程中,有两种倾向。一是分寸得宜,矫正以前的意识形态偏见,摆脱“革命至上”、“民主万能”的束缚,但又不彻底否定革命与民主,与以前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主流,朱学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可视为代表。

另一倾向则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从伯克和“自由”这个概念中发现了另一种万应良药,一味推崇英国模式和伯克,把中国近现代的全部不幸和罪恶都归之于法国革命和五四运动。这是支流,其代表几乎只有甘阳一人。甘阳在几年之后彻底改变立场,大批 90 年代的保守主义(即他所谓的“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大谈“所谓‘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或‘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对立等等”,参见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载《二十一世纪》1997 年 2 月号第 6 页),进而把“反民主的、贵族的自由主义”的骂名以及前面所引的种种罪名倾到中国知

识界的头上,标榜自己所谓“民主的、平民的自由主义”立场。

甘阳有一个躲避不了的任务:解释、评价自己几年前的言论。如果他认真清理,坦率地作自我批判,那当然是好事。但他很聪明地使了一个小伎俩,一方面淡淡地提了一句,说自己在“许多方面事实上已开 90 年代保守主义先声”,另一方面把以前的观点和作用总结为:“在中国大陆首先引入柏林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等观念,在知识界曾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又在大陆思想界集中提出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张力问题,以图概括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不同,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分野等等”。(同上)

这么说有什么错呢?但实际上,甘阳说的是,五四个性解放所向往的是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这种“全盘社会改造”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感”,导致了“从思想改造的‘洗澡’到反右的‘戴帽’到‘文革’的‘牛棚’以至今日之‘倒挂’”。(见甘阳《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载《读书》1989 年第 5 期,第 12—17 页。)他还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通常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由法国革命奠定,而是以英美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为主要基础的……我们不能不深思:如果继续被法国革命和共产革命的传统领着走,能否走向自由民主?”(见甘阳《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载《二十一世纪》1991 年 2 月号,第 8 页。)如果要对那一时期的保守倾向进行清理,我不知道还有谁发过如此偏颇的言论。

甘阳的错误有三重,第一,不老实,作出自我反思的姿态,隐瞒极端和错误的言论;第二,夸大自己的影响,他说了一些错话,自以为中国知识界也跟着错了,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第三,歪曲了 90 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其实,只要甘阳改弦更张,值得痛骂

的人就基本没有了,动辄就说“中国知识界”如何如何,纯属无的放矢。

## 最后说一说汪晖

汪晖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引起了注意和评论。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支持和批评的意见都有,我的“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对汪文作了认真讨论和正面批评,我一直期待汪晖的回应。但我们等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汪晖仅在他的《死火重温》一书的“序”中扫荡了所有的不同意见。这篇只有几千字的小文还概论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主要争论,除掉大量的感情渲染和自矜之词,他用在严肃讨论上的笔墨实在是太少了。

汪晖说:“文章成为‘事件’,却没有真正的论敌。因为他们并不把它当作文章来对待,而是看作某种象征。”(见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5 页,下同。)

这话颇令人吃惊,我无疑是汪晖的论敌,我认为汪晖是个学者,写了一篇值得注意、应该批评的文章,如此而已。“事件”和“象征”是什么意思?政治家或精神领袖的宣言,明星的表演?我不知道谁会这么认为。

在我与汪晖商榷的文章中,我提出汪文的缺陷是其立论与中国的国情与现实不符,我举出了一系列事实和数字来证明我的看法。汪晖对此避而不答,而写出了下面一段妙文:“谈论自由的人如此容不得异见,号称学者的人如此深文周纳,这么多名人硕儒习惯于道听途说——一切一切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倘若要谈论‘国情’和‘现实’,则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国情与现实之一。”我现在

仍然要说,我用事实和数字反驳你汪晖的下列论点:中国已经变成了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你能否作出反批评?

汪晖没有把一个字花在正面回答批评意见上,却花了大量笔墨描述其成文经过,剖白作文时的心态,和成文后自我感觉到的遭遇。他说,1993年一位外国学者冒着寒风,不怕路途之遥,寻了半天,终于找到他,约他写稿,他终于感动了,把文章写出来,登在那个进步知识分子的旗帜的刊物上。后来,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刚从国外归来,就跑到他家谈了一整天,他由此知道文章引起了兴趣。再后来,他当了《读书》的主编,总是感到有人递过猜忌的目光。他心中不满,但怕一说出话来就要伤人,于是避到香港。再后来,文章在国内不止一家刊物,在国外也不止一种外文发表。汪晖感慨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应和明枪暗箭:“在许多名人的口耳相传之间,这篇文章迅速地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头衔,再配之以若干流言,最后由闻人加以总结,俨然成为‘历史’。论战的方式不像是讨论,而像是冷战:南北呼应,内外有别。”

如果说我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反对这篇文章最力,那我敢于承认,但我不觉得文章会在思想学术界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在90年代,怎么会呢?况且我们又不是王朔或余秋雨。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学术探讨和学术争鸣纯然是一种公共事务,具有某种程度的客观性——我指的是一切以文本为准,写作的心理过程与文章观点对错无关。你要捍卫自己的正确性么,就得回答、驳倒批评意见。你不能大谈自己写作时动机的高洁和心情的壮怀激烈来证明文章的高明;不能直接间接地说文章出手前自己端了多大的架子,禁不住编者的恳求和读着翘首以待才勉强应允发表,来说明文章的价值;更不能营造这样一种气氛:自己像鲁迅一样地经受飞短流长,在黑暗中与恶势力抗争,来证明文章经得起考验——学术争论

中不能用哀兵必胜的策略。

总之，重要的是观点和论证，而不是剖自心迹。成文过程中精神状态的高尚并不能证明论敌就是小人。

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已经开始之后，被视为“新左派”的李陀发出了并不及时的号召：“让争论浮出海面”。不知是否为了呼应这个题目，朱学勤在 1998 年底的文章中说：“1998 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汪晖在这篇序中将朱戏称为“上海名人”，然后是声情并茂的道德檄文：“伟大的一九九八！滔滔洪水没有唤起英雄对于灾难的思考，倒是激发起了争先恐后浮出水面的激情，这位先生好水性啊！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一个比喻，为什么朋友用得，论敌就用不得？一个比喻，何至于与 1998 年大洪灾联在一起，在道义上置论敌于死地？手法高明吗？我不知道，我只想起“技穷”二字。

我不想再评论论敌了，我只发出正式邀请：回应我在“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和本文第三、四节中的批评，让我们在学术观点上交锋吧，你意下如何，汪晖君？

最后我想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所引起的关注，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学术上的收获，对于理解和解决实质问题所取得的进展。中国知识界不能满足于自己有良好的问题意识，各派都不能把主要心思用在“克敌制胜”方面。更虚心的态度，更勤奋的学习与研究，方能孕育无愧于时代的思想成果。

## 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

王思睿

### 左派阵营的三个分支

在最近围绕“长江读书奖”(或“长江《读书》奖”)的争论中,被称为或自视为或倾向于左派的人士中,出现了一种微妙但大有内涵的分歧。汪晖在《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中指出:“我本人从不赞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概括知识界的分歧和论争,也反对一切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崔之元撰文完全同意汪晖的看法。他们的支持者中有人表示,划分左中右,拉帮结派,完全是一种“文革”式的做法。但同样对汪晖表示支持的常仁,“作为一名在《强国论坛》靠爱好挑刺而出名的常客”,在给汪晖的一封公开信中却提出了异议:“以本人懒读西方理论大作的毛病,和在地球两面都曾‘苦力干活’的背景,想当据说以贩卖西方高深左派理论为能事的‘新左派’,也不够格。但拜读了你和崔之元有关《读书》与‘新左派’问题的文字声明,心里却憋闷得慌。被‘新右派’们扣一顶‘新左派’的帽子,有什么了不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担心以‘右’为荣的当朝大官们,一听‘左’字心里就不舒服?不舒服就不舒服好了,要保持中国读书人在民众眼里的那点传统的‘崇高’和骨气,哪能只顾达官贵人们的心理感受,而不能合着底层百

姓的利益,理直气壮地宣告一声:在目前右派横行的世界上,当个左派很光荣呢?”“我想,我要是能像你和崔之元先生那样,被人口口声声称之为‘新左派’,一定会欢腾雀跃,高兴自豪都来不及,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担心:点明各类喋喋不休争论所包含的不同利益归属和左右界线,就会有损建设性的讨论、阻碍人类思想的进步发展呢?”<sup>[1]</sup>

同属汪晖的支持者,有人以“文革”式的做法为大逆不道;有人却认为“文革”不是一种原罪,左和右的划线也并不违背“政治正确性”。汪晖和崔之元在“长江奖”的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但他们对“文革”的看法很可能不尽相同。常仁以左派为荣,对汪晖和崔之元式的“以贩卖西方高深左派理论为能事的‘新左派’”则不无嘲讽之意。由此看来,“新左派”并非当今中国左派的惟一代表,左派阵营内部还是派中有派。

反对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划分左中右,是基于“不争论”的主张。“不争论”的主张看似公允,实际上却是在拉偏架,有着强烈的倾向性。毛泽东讲过许多错话,但他说世界上只要有人群,便会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却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一句话。

十个手指还不一般齐,有的人激进,有的人保守,有的人喜好冒险,有的人偏爱稳定,这种分野是永远存在的。有分歧就会有争论,不争论只是一个假象,是统治权力对于思想自由的征服。不争论只能限制住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对于控制事态进程者、操纵舆论工具者和既得利益者,则丝毫没有影响。常仁站在传统左派的立场上,坚持基于利益归属的左右分界,对于汪晖刻意抹煞左右界线表示不理解,是十分自然的。尽管都信奉左派理论,但只能在互联网上发言的常仁与身为《读书》主编的汪晖,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却很可能大相径庭。

笔者以为,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毛泽东关于左中右的说法是正确的,但他对右派“引蛇出洞”、“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做法却是错误的。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分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应当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角逐,通过争取民意的支持来一决胜负。

今日中国的左派阵营包括三个主要的分支:老左,即斯大林主义;中左,即毛主义;新左,即新马克思主义。前者的根深蒂固地扎在各级官僚机构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者的根广泛存在于底层百姓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在中国学术理论界扎下新根,“小荷才露尖尖角”,但风云际会,很快便独领风骚,“一枝红杏出墙来”。

## 老左:斯大林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斯大林主义算不上是资格最老的左派,在它前面有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考茨基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巴枯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普鲁东主义、圣西门主义等;但在中国来说,斯大林主义差不多就是最老的左派意识形态了。许多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在中国一直不被视为左派,例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在 1957 年戴上政治帽子的有思想的“右派”中,信奉自由民主主义者实属凤毛麟角,多数人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铁托主义者,这些人在其他国家都属于“响当当”的左派。中共从诞生之日起,几乎没有



受到列宁主义的哺育，一直是喝着斯大林主义的乳汁长大的。

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点：公有制、计划经济、单位社会、一党专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生死斗争。斯大林逝世后，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毛主义、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邓小平理论的冲击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斯大林主义体制已经崩溃，中国的“斯大林模式”也只剩下一个躯壳，内瓢差不多已被掏空。在斯大林巨幅画像还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之日，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却早已在政治上失势了。80年代人所共知的“左王”、“左将”，有的已归道山，对其不恭之词仍不时见于报端；有的作为政治反对派，尚在坚持“最后的斗争”，但只能在自己把持的几个边缘性刊物和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无力左右政局的演变。曾经有人预言斯大林主义必将后继无人，现在事实证明，这个一厢情愿的预言落空了。新一代斯大林主义者已经崭露头角，其典型代表房宁出道以来，便一直是斯大林主义的阐释者。何新在80年代并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但进入90年代以后，他文章中的斯大林主义气味变得越来越浓。他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异数，其人从非斯大林主义向斯大林主义转变的独特经历，令人不可思议。

对于斯大林主义者来说，经济全球化、新经济和知识经济、与国际惯例接轨、入“关”入“世”、产权明晰化和“改制”这些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主流话语，都是离经叛道的罪证。但是，他们批判社会现实的火力却不像当年的“九评”那样猛烈，毕竟有着太多的投鼠忌器和藕断丝连。中国斯大林主义者批判赫鲁晓夫可以肆无忌惮，批判中国改革“总设计师”却不得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斯大林主义在今日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是老革命、老干部以及各级党政军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离退休人员。他们与权钱交易的受益者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联系，如果“反修反

帝”、“灭资兴无”搞得太激烈了，他们在朝里做官和拿着美国绿卡当“外资企业”老板的子弟便会劝阻。在越南、古巴和朝鲜先后转向邓小平式经济改革的客观情势下，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政治诉求缺乏理论与实践的依据，对国有资产向社会强势集团流失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也缺乏足够的力度，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退休人员命运的关注与呼吁，他们对盗窃和抢劫国有企业者的警惕与谴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 中左：毛泽东主义

中左，不是指中间派中的左派或者左派中的中间派，而是指中等资历的左派，中年人中的左派，“中国特色”的左派。毛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一种衍生物和变型，从资历上说自然比老左要浅，同时又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产物。“走资派”不会是毛主义的信奉者，曾经真诚信奉过毛主义，乃至迄今痴心不改者，大多是当年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现在的年龄约在40岁至60岁之间，大体上还可以算是中年人。

在70年代，毛主义的官方阐释者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教义继承人是王洪文；但纯正的毛主义者是在民间而不在庙堂之上。许多最真诚、最富创造性的毛主义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镇压甚至被枪毙。毛泽东逝世后，复出的官员最担心的便是王洪文式的毛主义者利用年龄优势20年后卷土重来，于是便在政权机关和舆论阵地中开展了犁庭扫穴式的清理“三种人”运动。到80年代初，权力机关中的前造反派几乎完全被高干子弟所取代；随后许多著名造反派头头纷纷出走，散居在欧美大洋洲各地。

在整个80年代,掌权者和知识分子大多认为“文革”已经寿终正寝,不可能再从棺材中爬出来。但人们再一次跌破眼镜。90年代,“毛泽东热”持续高涨:“文革”结束20年后,对“文革”的呼唤在互联网上甚至主流媒体上真的卷土重来了。不仅中年人下岗后重新缅怀“文革”岁月,连青年人也对之产生了兴趣和崇拜。清华有位博士生在给《切·格瓦拉》创作者张广天的信中说: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看不惯很多不公平的事。看不惯当官的欺侮穷人,搞不懂为什么父母拼命干活而收入却远远低于那些什么也不干的人,更对贪官污吏恨之人骨。高考报志愿时我报清华,那时我想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回到家乡当个市长,好好治一治这些贪官。上了大学以后,感觉眼界一下子开阔多了,竟有些不知所措……对于国家,劳动人民我却关心的少了,感觉是渐渐地被这个环境同化了,整天想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感伤(无病呻吟),这就是一年以前的状态。《切·格瓦拉》则给了这一切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我告别了过去的的生活,走上了“革命”的第一步,也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回归。<sup>[2]</sup>

他的信在网上发表后,点击率非常高。这说明毛主席、格瓦拉主义等左派思潮,在现在的中年人和青年人中,确实很有市场。

本文之所以采用毛主义而不采用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是因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给毛泽东思想下了一个权威的定义,把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创造全部剔除,本文权且将这些剔除部分称为毛主义。毛主义区别于斯大林主义的地方主要在于:认为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或称党内资产阶级),他们与工农大众处于阶级对立的状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需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方法是“文革”式的自下而上的群众

运动；认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是比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追求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制、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平等社会。

尽管张春桥、姚文元长期把持舆论阵地，尽管一些造反派担任过革委会委员、党委甚至副主任的职务，但他们始终没有掌握过真正的权力，革委会的实权一直在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军队干部和老干部手里。因此，毛主义在“文革”时期便很难有机会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实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上海人民公社、北京人民公社等，是被毛泽东本人否决了的。其他的一些新制度，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贫下中农保送上大学，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学校、科研院所、文艺单位等），则因为与城市化、知识化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但正因为没有历史包袱要背，不需要去维护什么现存的制度，使得今日的毛主义者批判锋芒更加犀利，更加无所顾忌。

中左不同于老左，他们不仅盯着那些个体户、私人资本家、暴发户，更把揭露和抨击的矛头对准血统高贵、在官场和钱场都玩得转、“以权抢钱、以钱买权”的社会强势群体。用李宪源（他的私人通信和文章有许多刊载在“常仁网站”，或许常仁即是他的网上笔名）的话来说：“正因为存在特定政治权力的控制，以及存在这种权力与资本的广泛勾结，才使工人被老板锁在车间内让大火活活烧死的惨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屡屡发生！”中左不同于新左，他们深知中国腐败横行无忌，贫富急剧分化的主要根子不是抽象的市场，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因此，他们主张发动一场“经济‘文革’”。

中左清楚地知道，为了制约权力、遏制腐败，不能寄希望于“明君”、“清官”，不能仰仗克格勃手段；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采取民主监督的方法。李宪源说：“本人虽然以揭露‘西方民主’维护财团

利益本质为己任,但这并不意味一种能够不断化解其社会尖锐利益冲突的政治操作方式,就毫无借鉴价值。剔除那些贩卖狗皮膏药者天花乱坠的瞎吹嘘,西方制度值得一学的或许有两点:一是统治阶级内部必须相互制约,决不允许出现可以摆脱和超越批评监督的任何权力中心。二是必须给制度运作的利益受损害者,以合法表达不满和抗议的渠道与空间,以确保由此造成的社会紧张,能够得到正常的释放缓解。统治者并能根据有这类反抗声音所提供的警示信号,及时评估和调整统治方针,以防治社会矛盾在高压状态下以虚假稳定的方式,最终发展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危险境地。”<sup>[3]</sup>因此,即使他们否定资产阶级“多党制”,也仍然孜孜追求一种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直接选举的权利。

毛主义的长处在于阶级分析一针见血的尖锐性与彻底性,其短处则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绝对化与泛化。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是多向度的,有多方面的需要与追求。马克思的历史贡献是揭示了吃饭穿衣是人们第一位的需要,但是如果把利益关系当成人们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便成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而且,阶级关系也并不能涵盖全部的利益关系,因为相同的阶级也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阶级也有相同的利益。网上一位“一向以左派自居”的作者小鹏指出,左派常有一种偷懒以教条代替思考的所谓思维定势。左派最大的思维定势,要算胡乱套用阶级分析了。“许多左派先生,包括本坛名客常仁先生,经常拿美国多年不涨工资来说事,为之感到愤愤不平。如果他们因此要与美国工人一道,阻碍资本流动,美其名曰‘为彼此的权利和福利而斗争’,那么,恕俺直言,这不是神经错乱,就是屁股坐歪了地方。因为,资本流动受阻,损失的是缺乏资本的穷国的就业机会,放慢的是全球工资均等化

的过程,伤害的往往是穷国的剩余劳动力。这是经济规律。左派尽可以将空话与高调唱得震天价响,尽可以痛骂资本家制造穷国富国工人的利益矛盾,尽可以‘蔑视资本主义’,尽可以嘲笑经济法则。只不过,在中国农村还有上亿剩余劳动力之时,在中国的工资还没有涨到失去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力之前,咱们的打工仔打工妹,可没闲心陪你们玩这奢侈游戏。”“所以,每当我听到富国的左派们,高喊‘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抗拒全球化’,而中国的左派们不假思索地与之呼应时,就忍不住想,你们想要维护谁的利益?是有汽车洋房的美国工人,还是挣钱供弟妹们上学的中国打工仔打工妹?”<sup>[4]</sup>尽管毛主义者有不少理论上的弱点,但他们敢于正视现实的态度和支持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使他们具有一种道德上的感染力。中左目前在网上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主动出击态势,使老左、新左相形见绌,也是对中派和右派思想家、政治家的严肃挑战。在国内学术界知名人士中,迄今还没有出现毛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但正如李宪源所说,在底层民众中间,始终存在和活跃着无数被统治精英和思想精英所忽视的毛主义的“草根领袖”。真正配得上民粹主义这项桂冠的,不是老左和新左,惟有中左。

## 新左:新马克思主义

新左的主体是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左派的范围已经大大超出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例如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便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但在中国来说,“新左派”基本上还没有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大框框,其理论来源主要是“新马”或曰“西马”,包括葛兰西、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阿明的依附论、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等。

新左与老左、中左相比,属于小字辈,到90年代中期才成为中国学术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角色。“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多数在45岁以下,是没有亲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本来,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已传入中国,它之所以没能成为现在45岁到55岁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理论首选,是基于以下原因:“臭老九”、“插队知青”、“可教育好子女”对于“文革”经历的集体记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不断激进化,在四五运动后出现拐点,“探索的一代”从毛主义到列宁主义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然后直接追溯到启蒙思想、自由民主主义,邓—胡—赵体制的改革开放政策令中青年知识分子激起更多的设计欲望而非批判意识,东亚四小龙崛起对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突破,等等;这就为下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保留了一个有待采掘的理论宝藏。“新左派”虽然常常把“后殖民”、“反西方中心论”挂在嘴上,但他们的实际作为却是学术理论界“全盘西化”的完成者。如果缺少了在西方学界占据重要地位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那自然谈不上什么“全盘西化”,只能说是“半盘西化”或者“八成西化”。新左在理论上拾缺补遗的贡献自有其价值,但他们阅世不深,常常目空一切。

由于“新马”、“西马”理论上的遗传基因,新左与老左、中左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任何要维护的特定制度、特定阶级与特定利益,因此可以把理论上的批判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挥洒自如。“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将自身的奋斗与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统统受到质疑,只有彻底的解构才痛快。但正因为新马克思主义始终拿不出一个可以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全球化的实施方案和政治纲领,它在西方只能停留在大学讲堂而上不了总统大选和议会立法的议事日程。

而中国的新左在批判性上先就打了一个大折扣,因为它不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集团和社会弱势群体,而是指向刚刚浮出水面的在政治上极其脆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人们常常说“破旧立新”,能破还要能立,会解构还要会建构。即使承认新左在制度批判上很潇洒很“酷”,一涉及制度创新他们便表现出幼稚可笑的一面。崔之元把“鞍钢宪法”说成是制度创新的典范,是后福特生产方式的一个源头;但高华撰文指出,这纯属和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鞍钢宪法”的实质是党委领导和突出政治。崔之元、汪晖也喜欢谈论乡镇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制度创新,但真正从事过田野调查,把结论建立在实证考察之上的学者秦晖、温铁军、张晓山等指出,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原则的关键是不允许农民改变“二等公民”的身份。中国乡镇企业在 80 年代的大发展,是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结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既非合理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最近由“新望”发表在“思想的境界”网站的《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一文指出,自 1998 年以来,江苏的学术理论界和地方当政领导均已认识到:苏南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是“政府吸取能力过强,民间经济活力被压抑,‘口号动员型’经济带来了损失和浪费”;“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债太多、官员太多,从而造成了普通百姓家底不实,相对贫困”;苏南模式单一的“干部主体社会结构”不利于市场化、民主化、现代化进程;苏南城市形态初级化、产业结构低级化、经济布局割据化、干部考核数字化等弊端与其社会结构不合理有关。集体经济产权“人人所有,人人没有”的非排他性使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成本总是以平均数的形式由全体成员均摊,因而可能造成对资源的滥用,“名义所有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去关



心公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同时集体财产的代理人受命于上级安排,而非所有者委托,这种非所有者的委托人(上级)当然较之应该的委托人(村民)缺少监督的激励,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监督困难,监督成本高,代理人有可能瞒上欺下,多吃多占,追求在职消费,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上下级的“串谋”行为。从而最终导致集体财产的社区干部“灰色私有”。这些道理业已成为共识。目前,苏南各地正在着手准备“二次改制”,“改制”的对象正是崔之元所推崇的股份合作制,因为股份合作制不受《公司法》保护。

朱学勤指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学术分歧首先是在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上。新左派朋友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入侵,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必须批判这一现实。而自由主义一方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远没有卷进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对外开放。<sup>[5]</sup> 笔者在《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兼评汪晖的现代性批判》(发表时副标题与部分内容被编辑删去,可见当时批评汪晖是有阻力的)<sup>[6]</sup> 中亦指出:早在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统治的地位”论断的影响,严灵峰和任曙等“动力派”便提出了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不外就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一个单位”。因此,中国“大可以做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在

世界范围内,托洛茨基派的理论和运动一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如此;但是在中国,托派始终受到冷落,原因就在于它的论断远离中国现实,而且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症结——解决“耕者有其田”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要求。时隔七十年,汪晖的“批判思想”用新的话语重复“动力派”的旧观点,是否就合乎时宜了呢?苏东国家、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也已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制?尽管中国与上述二者有相当多的同一性,但不是同一性而是差异性突显了“中国问题”的独特魅力。中国要不要继续推进金融自由化?全国人大常委会会不会批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会不会同意扩大国际法庭的管辖权?这些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不是融入全球体制的既成事实。不能排除以“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名义重新关闭国门或者缩小开放度的可能。“动力派”和“批判思想”都说了太多的“已经”,恐怕还是应当把完成时态改成未来时态方为稳妥。至于现在时态的陈述,“无处不在的资本活动”恐怕也还不是无处不在的权力活动的敌手。“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回答下列建设性的问题: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如何建构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理想的世界秩序是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还是世界联盟或世界政府,如何开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动,知识社会的全球信息秩序应当遵循哪些规则……把中国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大盘子中去“重新思考”,恐怕也不会对眼下的中国现实问题有多少帮助。

真正的中国问题是大量有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例如混合经济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直接选举问题,报刊民营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台湾统一问题,等等。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

问题甚少建树,主要原因并不是在引进批判学派等西方时髦理论方面努力不够,而是自身调查研究的功力不够,以及学术以外的障碍远未排除。

尽管新左一副“全面批判”、“彻底解构”的姿态,但在 21 世纪中国是否要由“共同体”走向“社会”(滕尼斯意义上的),由城乡分立走向城乡一体,由竹幕(半封闭半开放)走向全球化,由传统信仰幻灭走向新的伦理整合,由集权专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等一系列关键性时代课题上,却常常不由自主地与政治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走到了一起。难怪对现实持不妥协批判立场的中左会对他们感到失望。

### 牵线人与游走者

在老左、中左和新左之间,有一些自觉不自觉的理论牵线人与游走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原本不同的思想与政治流派形成了一条连绵的战线。同时也使对手和观战者产生了浑然一体的错觉,忽略了左派之间的差异,至少是忽视了中左的存在及其政治潜力。

“新马”、“西马”对斯大林主义及其体制素无好感,在他们看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会导致“人的异化”,塑造的全是“单向度的人”。但当汪晖说到:“限制私有权的思想与限制国有权的思想均产生于具体的历史关系、特别是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我们无法根据一个最佳的理性选择对它们进行筛选和评判。”<sup>[7]</sup>他便在新左与老左之间牵了一条红线。暧昧态度后面隐藏着真实立场:不评判就是对“以国有企业为国民经济主体”这一既成事实的默许。

崔之元的理论立足点是新马克思主义,但他常常客串中左的角色,对毛主义投以青睐。

他说:“‘文化大革命’最终以悲剧告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的‘文革’理论中不包含对正统马列的重大超越,更不意味着‘大民主’——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大民主’是毛的未尽事业,是他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李慎之和何家栋已经指出,这是对毛泽东“大民主”观的一种误读与篡改。<sup>[8]</sup>毛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说得很清楚:“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毛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一观点,他在“文革”中搞“大民主”与在“反右”中搞“大民主”一样,都是针对敌人的——后者是对“右派”,前者是对“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敌我意识、两类矛盾与法治社会是互不相容的,如果中国要走向法制社会,就必须彻底告别毛主义的“大民主”即“群众专政”与“全面专政”

1968年前后,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曾把毛主义引为同道,直接标榜毛主义的政党组织也在欧美大洋洲和日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0年后毛去邓来,“文革”的真实情况不能继续遮掩下去了,西方的“毛主义热”便迅速降温。再过十年,在“六四”与柏林墙倒塌的鲜明对比下,让新马克思主义与毛主义联姻就更像是天方夜谭。崔之元笔下的毛主义与人们曾经信奉和实践过的毛主义根本是两回事,如果他不能完成整合新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的理论创新工程,也不能如中左要求的那样彻底地“毛化”,相信他最终会回到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不再在中左与新左之间游走。

正像马克思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本人也不是毛主义

者。他是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居间牵线人。毛泽东在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就其实质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内地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他失败了。在他生前,四五运动的斗争锋芒就指向他晚年生命赖以寄托的“文革”;他的尸骨未寒,他“放心”的接班人便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携手埋葬了毛主义。王力雄在《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中很好地描述了毛泽东作为毛主义者的一面,却令人遗憾地忽略了他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面。事实上,毛泽东很难对他一生的两大业绩以及两大主义做出决断,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从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可以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出,即使“文革”期间,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旧政府”与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新文革”之间搞折中、搞平衡:当后者要把前者彻底打倒,使得斯大林模式完全无法运转时,便在1967年2月、8月以及1972年和1975年支持“旧政府”一把;当前者的气焰压过后者,有可能否定毛主义的乌托邦设想时,便屡屡发动“反二月逆流”、“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给“新文革”打气、鼓劲,扶植他们“继续革命”。

由于老左和中左出于同一位宗师,他们在许多观点上很容易一拍即合;但是,只要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不能合二而一,只要“走资派”与“造反派”不能捐弃前嫌,他们在政治上真正携手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

## 非神圣同盟

李宪源在跟余世存商榷的文章中说：“对使其威风扫地的“文革”冲击深怀怨恨之心的那些中国权力精英，与对“文革”冲击同样抱有深仇大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精英，具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同盟关系。”<sup>[9]</sup>如果“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精英”指的是由政府“包下来”、“养起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例如沈雁冰、雷洁琼，或许还有一二分道理，但其实他们或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是知识界“老左派”，并非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精英”；如果指的是朱学勤、徐友渔这些人，就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了。朱学勤、徐友渔、秦晖这一辈插队知青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曾在社会底层长期生活过，他们确实受到过“文革冲击”，但与因“威风扫地”而对“文革冲击深怀怨恨之心”的权力精英不同，他们受到的冲击主要是思想上的冲击，经历的痛苦主要是理想幻灭的痛苦。中国权力精英与思想精英在经过四五运动前后的一段短暂的蜜月后，到理论务虚会和西单民主墙时期便已分道扬镳。如果二者之间现在确实还存在“一种天然的政治同盟关系”，为什么前者屡屡封杀后者的言论，甚至打碎他们的饭碗（如最近对秦晖、刘军宁、何清涟等人），却听任左派言论在各种大陆网站上与民族主义言论相互呼应呢？

现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是另一种政治同盟关系，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与左派共同反对自由主义的同盟关系。中国“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王小东近来就与崔之元、汪晖称兄道弟，在涉及《读书》争论的通信中谈论“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在思想和政治光谱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通常被归入右派，与左派处于对立的位置。例如在 20 年代的中国，中共与“联俄联共”的国民

党左派的主要理论对手便是以“醒狮派”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当然,在世界现代史上也出现过左派和右派携手夹击中派——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先例。在魏玛德国,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德国共产党和希特勒的纳粹党都把执政的中派政党作为主要政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想要在理论上调和社会主义左派与民族主义右派,著名者如《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在《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主义》一书中,他批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地地道道的德国式的范畴,而是带有明显的英国唯物主义色彩的范畴。从比较政治学角度,斯宾格勒把德国式的政治观念与英国式的政治观念对照起来,认为前者偏向共同体,主张社会主义,后者则着重于个体的独立,拥护个体主义。所谓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议会多党制等概念不过是英国的一套把戏,根本就不适用于德国。在斯宾格勒看来,德国需要的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于是,在斯宾格勒那里,社会主义不仅与普鲁士精神是息息相通的,而且与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个体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等也是完全可以共约的。

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历史更加值得借鉴。日本军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的源头,一是军部,一是民间的草根法西斯主义者。军部的军国主义者又分为统治派与皇道派,后者受北一辉等草根法西斯主义者的影响甚深。北一辉等在其著述中杂糅左右两方面的思想,称“革新阵营”的“主要目标”是“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限制私有财产,统制劳动”,推翻“财阀政权”,实现“维新政权”。他们“反对外来思想”,反对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鼓吹“复古”,“彻底贯彻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族主义”,即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纯正日本主义”的“国民主义”。王小东素以“持中国的、平民的立场”而自豪,他的思路历程颇有点像北一辉,甚至在

细节上都像,譬如到远古文化基因中去挖掘“侠客精神”。王小东曾写道:“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与格瓦拉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我为什么还是为其所动呢?也许我的思想中也有百分之三十的格瓦拉?也许,在当今的中国,要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百分之三十的格瓦拉是必不可少的。”<sup>[10]</sup>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左派尤其是中左也认为在自己的言论文章中流露出百分之三十的王小东大有好处,先戴上一顶“反美”的桂冠,披挂一身“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铠甲,再把自己想说的话娓娓道来。

中国左派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的同盟是非神圣同盟,也就是说,同盟破裂是命中注定的,不过是或早或迟而已。因为从本质上说,前者是世界主义者、阶级至上主义者;而后者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文化中心主义者,牛头不对马嘴,硬拴在一起终究是不可能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重视社会稳定、朝野同心、举国一致、团结对外、争取生存空间,反对阶级斗争、社会冲突、底层革命、犯上作乱、在自家锅里抢食。他们的理想是“建立在国民全体的意愿之上的全体政治”,是“强国家”,即使反对豪门也是出于贫富两极分化会削弱国家凝聚力的担心,他们绝对不会同意自下而上地搞什么“经济文革”和“大民主”。如果毛主义逐渐占据上风,中左成为左派阵营的掌门人,将会加速非神圣同盟的破裂。

## 左中右全光谱

在本文结束前,顺便对今日中国思想与政治的全光谱作一个简要评述。与世界各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左派、中派和右派。

左派的三个主要分支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以梁从诫、杨东平、



郑也夫为代表的生态主义也已经“浮出水面”。在反对发展主义、消费主义方面,生态主义与右派乃至中派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坚持自由主义和多样性方面,他们则与其他左派分道扬镳。旨在承认、尊重和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女性、少数民族、残疾人、同性恋者等)的人道主义(王小东称为“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已经出现零散的表达,但还没有形成政治气候。

关于中国的右派,笔者在《今日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载1999年第3期《北京文学》)与《通俗文本中的思想角逐——评〈解释中国〉》(载1998年第5期《战略与管理》)中作过评述。右派包括新保守主义、新秩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新秩序主义的鼓吹者王山明确表示:“我反对民众权利,反对普遍的民主权利,我认为中国社会不具备条件。”“我认为中国走到今天,最需要的是秩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礼便是秩序,就是用权力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保证不同的阶层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这是社会秩序的基本架构。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官员的腐败在一定限度内与保持官员队伍的稳定是有一定关系的,是一种共生的现象,……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水至清则无鱼,如果干部队伍没有优秀人才,国家被一些庸才或中久之才管理,我想也不是好现象。”“通过改革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这是民族大义。为了民族大义,一些阶层必须承受牺牲。在民族大义面前,理想迹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现实中却具有十足的破坏性,因为它们代表着社会底层对利益分配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社会品质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惟一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sup>[11]</sup>。显然,在今日中国真正如鱼得水的正是某些不得志的中左和老左所谓的

“新右派”。左派的批判锋芒本来应当指向王山这样的右派思想家,但不知是出于何种心理,他们偏偏选择了中派作为攻击的目标,这多少有些30年代斯大林把中派视为最危险政敌的遗风。而真正对右派展开批判的几乎都是中派。

中派主要包括自由民主主义(有时也简称为自由主义,但并非不要民主)和社会民主主义。近两年来,在李慎之、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等人的努力下,自由民主主义开始在大陆的主流媒体上正式露面;公开揭橥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士仅见于海外中文网站,但其信奉者在国内亦大有人在,只是还没有亮出旗帜。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等阶层构成社会的主体,因此中派在思想和政治领域都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自由民主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轮流上台执政,左派和右派则人少势弱,处于边缘地位。像原来的意大利共产党,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变成一个事实上的中派政党,才有机会上台执政。而带有右派民族主义色彩的奥地利自由党入阁联合执政后,便受到欧盟各国的集体抵制和制裁。但是当今中国情况则不同,中派及其社会基础都十分脆弱,在面对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强大压力时,中派内部的左右两翼并不愿意相互攻击,给共同的对手以可乘之机。

秦晖在《我的“第三条道路”》<sup>[12]</sup>中说:与自由秩序早已建立的西方相比,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情境”实与自由秩序建立前的沙俄更为近似。在那种情境中,自由的缺乏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太多,社会民主的缺乏也不是因为自由太多。因此那时的社会民主派向往自由竞争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式道路”而仇视具有俾斯麦式社会保障制度的专制国家即“普鲁士道路”;而自由主义反对派宁可积极自由的角度赞赏马克思,也要反对托利党式的(而非伯克式的)保守主义。类似地,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

不是自由主义太多了或是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因此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寡头主义,从社会民主立场出发批判民粹主义,都是极为必要的。那么有人会问:你到底持自由主义立场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立场?我的回答是: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这两个立场的价值重合面是很大的,只是随着自由秩序的建立,两者的价值重合面才日益缩小而价值对立日益凸显。因此在中国目前的“问题”背景下,我坚持的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肯定的那些价值,而反对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否定的价值。至于那些为自由主义所肯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否定的东西(如“纯粹市场经济”),以及那些为自由主义所否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肯定的东西(如“过分强大的”工会),则我们中国现在都还没有。等到有了再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也还不迟。要之,我们要走的绝不是反自由也反社会民主的道路,也不是以自由反社会民主或以社会民主反自由的道路,甚至不是“介于自由与社会民主之间的”道路,而只能是重合了自由与社会民主二者之基本价值的道路。

在我们这里,在为上述基本价值而奋斗的过程中实际上只有两种立场,即人道的或反人道的立场,哈耶克与马克思反对希特勒与斯大林的立场。因此在“主义”问题上,我只能持自由—社会民主的基本价值立场。这一立场如在西方可能会显得十分“中庸”:它似乎不左不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亦左亦右,但在中国它却是一种“激进的中庸”——在经济上,它既不利于大家长保卫或复兴宗法大家庭(如某些“左派”所赞成的),也不利于大家长独占家产而把子弟们踢出家门(如某些“右派”所赞成的)。在政治上,它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而愿意拥护那种可以反对的政府,因此它既受到那种专门拥护“只准拥护的政府”的“保守主义者”的攻击,也

受到那种专门反对“可以反对的政府”的“激进主义者”的攻击；而后两种人关于“激进还是保守”的争论在它看来却显得十分滑稽。秦晖的这些论说很好地表达了今日中国之宗派立场。

只要左派和右派继续在中国舞台上唱主角，只要中派在中国政坛上还没有什么分量，就表明中国还没有真正和世界接轨。而一旦 21 世纪中国选择了回归世界文明主流，现在的左派和右派便会边缘化，中派阵营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分歧将会突显出来。到了那个时候，自然也会出现布莱尔式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在眼下，中国最缺少的还是秦晖式的“第三条道路”（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则是“共同的底线”）<sup>[13]</sup>，即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融于一炉的“自由—社会民主”。

### 注释

[1] 常仁：《请作出面向“多数人”的辩白与回答——给汪晖的一封公开信》，载“新呐喊”网站。

[2] 《清华大学教师徐彦辉与张广天的通信（2000年6月6日）》，《黑板报文艺周刊》总第25期，载“黑板报”网站。

[3] 常仁：《防治强国论坛成为糊弄人的地方》，载“新呐喊”网站。

[4] 小鹏：《左派的思维定势——从乔姆斯基的一段话谈起》，载“强国论坛”网站。

[5] 朱学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载香港《亚洲周刊》2000年1月23日第4期。

[6] 王思睿：《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

[7] 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载海口《天涯》1998年第6期，第151页。

[8] 参见何家栋：《后现代派如何挪用现代性话语——评“经济民主”和

“文化民主”，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

：[9] 李宪源：《怨妇、情夫、“皮条客”及阿斗流氓——就对汪晖、王小东的批评跟余世存商榷》，载“新呐喊”网站。

[10] 王小东：《关于理想主义的几点断想》，《黑板报文艺周刊》总第21期，载“黑板报”网站。

[11] 引文均见刘智峰主编：《解释中国——〈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批判》，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王思睿、何家栋：《通俗文本中的思想角逐——评》。

[12] 载海口《天涯》2000年第2期。

[13] 秦晖：《“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读吉登斯著，兼论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问题》，载“世纪中国”网站。

## 中国的“新左派”是“自由左派”吗？

任 贻

源 起

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已经持续数年。最近“新左派”阵营的两位主要人物甘阳和王绍光先生，分别著文为“新左派”定位，认为它是“自由左派”，而论战的对方是“自由右派”。这一界定引人注目，引发了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的“新左派”是否是甘阳、王绍光所定义的“自由左派”？这可以根据发表的文论来评价。其次，如果中国“新左派”中一些人并不属于“自由左派”，他们是否会归向“自由左派”阵营？他们的意向令人感兴趣，但无须在此猜测。能否成为“自由左派”，则应该说有客观的标准。今后论战的方向有可能受到这种定位的影响：如果双方都是“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其左、右两翼，则虽然仍有很多重大课题需要辩论，但应该有基本的共同点。通过对“定位”问题的清理，如果中国的“自由左派”、“自由右派”能够对分歧与共同点达到某种共识，在有分歧的领域继续辩论，在有共同点的领域共同作战，那将是这场论战的一个正面成果。

为了下文讨论中概念的明晰，先把所涉及的派别的涵义及代表人物说明如下。

1. 甘阳、王绍光所定义的“自由左派”：甘阳“特别提出美国的

‘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作为参照”，把“自由左派”定义为“20世纪美国自由主义主流即‘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并提到其代表人物“包括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罗(Arrow)和托宾(Tobin)”。这是一个清楚完备的定义，时空人物的参照俱全。可以指出，这个思潮从30年代罗斯福新政奠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基础，到70年代里根“保守主义革命”开始“纠偏”，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也许说“占霸权地位的话语”更容易得到“新左派”人士的认同)。现在或许“霸权地位”不再，但仍然势力强大而且富有活力。

王绍光给出与甘阳互补的一个定义：“中国的‘自由派’实际上属于右派”即“自由右派”，或者说“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这就确定了按照美国参照系定义的“自由右派”。他对“自由左派”的定义——“站在自由右派对面的是自由左派”——却说不通，因为“站在自由右派对面的”可以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格瓦拉主义等等。

综上，甘、王两位定义的“自由左派”是“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自由右派”是“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不熟悉 Liberalism 和 Libertarianism 这一对英文概念的读者，请参看笔者另文中的详细分析。

2. 过去论战中的自由主义论者：站在论战前沿的有李慎之、朱学勤、秦晖、何清涟、徐友渔、刘军宁等人，从刊登论战资料最全的“思想的境界”网站看，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文章蔚为大观，作者包括前辈作家何家栋，以及秋风、毛寿龙、袁伟时、任剑涛、任不寐、吉永生等一批论者。客观地说，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被称作“经济自由主义”有张曙光、张维迎、盛洪、樊钢等人，在论战中的地位有点特殊。“新左派”批判的观点常常涉及经济自由主义，但他

们点名并“交火”的是朱学勤、秦晖、徐友渔、刘军宁、何清涟等人。另一方面，上述自由主义者，例如秦晖、何清涟，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早有直接批评，何清涟和张曙光等曾有激烈的论战。笔者认为“经济自由主义”论者中一些人的观点如“腐败有理”、“腐败有利”实际上不符合自由主义学理，此文不详论。但应该把“经济自由主义”与上述自由主义明确划分，以避免过去论战中因“旗号”不明而导致的混乱。

3. 过去论战中的“新左派”：在大陆的代表人物有汪晖、韩毓海、旷新年、韩德强等，在大陆以外有甘阳、崔之元、王绍光等。以上流派成员的界定容有偏颇遗缺之处。把流派“旗号”与成员并列，主要目的是避免因不同论者对“主义”概念的不同理解和用法（例如“自由主义”是指 Liberalism 还是 Libertarianism？左、右、保守，参照基准是什么？）而产生误解混乱。定义既明，下面的篇幅主要用来评论“新左派”的文论，然后再对论战的进一步发展略作讨论。

## 本 论

中国确实存在“新左派”，它是 9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新”是相对于如邓力群、胡乔木而言，“左”是来自他们的共同倾向，即对私有化、市场机制、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法治体系、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质疑、批判乃至否定，对改革前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肯定乃至赞扬，以及他们的左翼思想资源。现在来考察他们的文论，评论其“左”的性质，并判断他们与“新政自由主义”的关系。

张广天，引起争议的剧本《切·格瓦拉》的作者之一，在“纪念毛主席逝世 24 周年”的文章中这样自我定位：“在没有毛主席的二十



四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解放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极大的挫折。“我是毛主席、周总理培养的红小兵，是未来革命的接班人。”“在没有毛主席的二十四年里，毛泽东思想在艰难中发展和丰富起来，毛泽东的形象在现实的教训面前变得血肉丰满。”“毛泽东的名字就是中国的代名词。中国，因为有了毛泽东才叫中国！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是否可以毫无疑问地判断：高喊这样的口号的“红小兵”，是“左”派，不是“新政自由主义者”？

韩德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时，著文为改革前三十年评功摆好，并用统计资料证明中国经济社会在那三十年的伟大成绩。第一张表是“1965—1985年间部分国家和地区 GNP 年平均增长率对照表”，其中中国 7.49%，日本 4.7%，新加坡 7.6%，香港 6.1%，台湾省缺，韩国 6.6%，其结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 60、70 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与‘四小龙’相比并不逊色”，“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第二张表是“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其中钢铁增长率 1952—1978 年间 12.9%，1978—1995 年间 6.4%，其结论：“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三十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还高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

统计分析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国际比较尤其困难。作者引用的数据多半出自 1985、1988 年出版的两本国内书籍，而在那以后中国统计在资料提供和专业分析两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中国直到 80 年代晚期才试行并最终采用了 GNP 统计指标体系（所谓 SNA 体系），在此之前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采用据说是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的物质生产平衡体系(所谓 MPS 体系)。因此第一张表中的中国数据不是 GNP。经查《中国统计年鉴》,7.49%的增长率应是“国民收入”。当时的国民收入指标只包括“物质生产部门”,不包括服务产业。因此就有这样的情况: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发展重工业(以及其他物质生产部门)时,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可以很高,但第三产业的停滞甚至下降不反映在国民收入中。与此对照,非社会主义国家的 GNP 和国民收入包括所有第一、二、三产业。其次,这一表用 1965—1985 年间的增长率来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但这个期间包括改革后的 1978—1985 年,因而不能支持作者三十年和二十年的比较。实际上,如果把 1965—1985 期间以 1977 年为界,划成改革前、后的两段,则前一段(七七年比六五年)的增长率为 6.7,后一段(八五年比七七年)的增长率为 8.6,正好与作者想说明的相反。第二表的产品实物量统计也有指标定义的问题,因为统计局按照“统计报表制度”获取数据,而生产单位报产量的条例依据是“加工完毕、验收入库”。因此就有这样的情况:产品堆积仓库,没有人要,但产量、产值却直线上升。当产品按计划运到商业部门的仓库堆积时,则有“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一说。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严重经济危机时很少发生,即使发生,也有“库存”统计与“产出”统计并存,可供调整。另一因素是政治干预。该表中钢铁在 1952—1978 年间增长 12.9%,包括了大跃进年代。经查《中国统计年鉴》,该表所列是“钢”产量,不包括“铁”,大跃进前后的钢产量是:1957 年 535 万吨,1958 年 800 万吨,1959 年 1387 万吨。据计委官员回忆,当时的钢铁产量(产出量,不仅仅是计划指标)都是李富春、薄一波等与周恩来反复磋商,由周拟定,报毛泽东批准的。那些钢铁产量包括明知完全不能使用的“土法

炼钢”产品。近年产量虚报或许不如大跃进年代严重,但重要统计数字必经党委讨论通过才能上报,依然如故。(这涉及“国家能力”的一个侧面,与下文王绍光的观点有关。)最后,钢铁之类产量的增长率可以是工业化过程的一个指标,但并不是判断改革前后经济成就的恰当依据。当今世界,钢铁产量的增长率越高越好吗?是否应该看一看关系人民生活的产品、关系发展前途的新兴产业呢?这里重要的问题其实是:韩德强的观点,与“新政自由主义”学者的观点,是否相容?信手举一例:“新政自由主义”阵营的重要思想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专家、资深研究员哈定(Harry Harding)在那一时期的著作,在评论“改革的必要性”时列举的数据是:1965—1973年间(改革前年代)的增长率,中国7.4,日本9.8,新加坡13.0,香港7.9,台湾10.3,韩国10.0。注意日本的增长率,韩德强列出4.7,哈定列出9.8,超过一倍。

韩毓海对“现代社会”有这样的判断:“现代社会的总体趋势却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随着市场的垄断,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他们参与市场竞争和公共事务的能力深刻地受到其所具有的物质和文化资源的限制。”“马克思说,不是契约里规定的平等,也不是法律条文规定的平等,而是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了我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和根本不可能平等。”“一切肯动脑子,肯思考的人,理解现实都只能从马克思所说的现实出发,从而毫不费力地明白一个起码的常识:在这样的‘市场’胜利的地方,站起来的从来就不是‘民主’,而是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受社会公意制约,可以独立为社会立法的,具有‘自组织性’和控制社会能力的所谓‘市民社会’。”

这是以马克思理论为依据对“现代社会的总体趋势”的严厉判决。而且,“新政自由主义”学者,如果不“从马克思所说的现实出

发”，就会被排除于“一切肯动脑子，肯思考的人”之外了。托宾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大师，同时是以财政手段干预经济的实践者，曾任肯尼迪政府的经济顾问。在与弗利德曼学派辩论时，托宾曾满怀信心地认为已经懂得如何通过“现代国家”来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和其他社会目标。以托宾为代表的“新政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不可能同意“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随着市场的垄断（笔者按：市场究竟是否是‘垄断’的，需要实在的分析证明），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这种观点。

旷新年是这样批判自由主义的：“在自由主义那里自由与奴役是这样一种奇妙的关系，奴役恰恰是自由的基础以及自由的象征。马克思说：‘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制的国家。……消灭奴隶制，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历史的新大陆。既然自由必须要以奴役作为它必要的补充，那么根据‘症候式的分析’，今天对于奴役的赞美和奴役的莅临，也就成为了我们的自由之花绽开的一个最好的证明与标志。”“今天的自由主义一方面赞美自由，另一方面又毫不犹豫地赞美奴役。”几乎毫无疑问，任何“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者”不会对自由主义做出这样的批判。甚至可以认为马克思本人都不会首肯这样的批判。马克思生前就看到了美国“直接奴隶制”的废除，他对林肯领导的废奴斗争给予高度评价，曾代表第一国际起草了给这位“劳工阶级的忠诚的儿子”的贺信，说“这个事件是未来时代的标志”。作为严肃思想家的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奴隶制被消灭，“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

旷新年对毛泽东的遗产有这样的评价：“毛泽东有力地扭转了人类的历史，扭转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告诉人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他还详尽地列举、赞扬了毛泽东的多方面遗产，例如：“‘思想改造’是毛泽东的一种创造，他企图通过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思想改造运动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没有为他的家族留下任何遗产，……但是他却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财产。这一财产就是人的自由与尊严，也就是现代个人自由和民族解放的双重目的。”

这种话语使笔者惊讶并痛心，因为笔者当年是一个知青。首先说明，“上山下乡”要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除了六六届高三学生以外，连中学学业都没有完成的“老三届”中学生。与笔者在同一公社插队的就有只读了初一、年仅十三四岁的孩子。其次，他们被送去改造（他们别无选择！），本身就违反“人的自由与尊严”。按“新政自由主义”价值标准，政府无权对人民进行“思想改造”。再次，毛泽东除了在主编《湘江评论》那一时期，全部文章中恐怕难以找到任何促进“现代个人自由”的论述。他在建国以后的实践，不是以促进“现代个人自由”为目标，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创新是“继续革命”的对象不断扩大。不仅资产阶级、地主、富农是斗争对象，知识分子饱受摧残，初一的孩子成了改造对象，就连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包括贫下中农也不能幸免。笔者认识不少持“新政自由主义”观点的美国人，交谈时如果涉及插队，哪怕只少许涉及笔者经历的“黑暗面”，他们就会激愤起来，同情起来，典型的反映是：“I am lucky that I didn't have this kind of experience（我很幸运，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没有经历这样

的事的人都是幸运的。希望所有的中国人,今后也不再经历这样的“改造”。

汪晖的文论主要涉及现代性、特别是全球化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曾就“分歧究竟在哪里?”这样说明对自由主义的看法:“‘新自由主义’,其特点是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场主义拜物教阉割平等的价值,以抽象的竞争和效率为幌子,在一个社会内部和全球范围内创造贫富的巨大差别、在自由贸易的名号下实行对落后地区的掠夺性开发和贸易,却否认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本身正是政治性安排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这一主义代表了通过权力瓜分国有资产、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权力与跨国的或国内的资本联手霸占市场资源的利益群体”。这里的“新自由主义”应理解为从古以来的自由主义,因为作者所论涵盖了殖民主义、奴隶贸易等时期。“自由左派”阿罗、托宾的经济学,现在仍然在大力阐发竞争、效率、自由贸易等等基本观念。汪晖表述了对“现代性”的实践过程所达到的成果的看法:“现代性”批判理论要“研究它(笔者注:现代性)的一些进步作用如何掩盖了现代世界的历史关系和压迫形式”,“所谓全球化的历史,也是把各个区域、社会和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的、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从历史的视野来看,……全球化的垄断结构”。

这里对“全球化的垄断结构”,既没有加以定义,也没有提供统计证据,因而无法具体讨论。但很清楚,这种看法不是来自阿罗(Arrow)和托宾(Tobin)所代表的经济学派,因为他明确说明其思想资源是西方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思潮”或“批判性运动”。

汪晖的近作则进入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其思想资源可以通过所依据的文献看出。全文共引文献47处,其中马克思16处,列宁1处,卢卡契2处,黑格尔5处,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作

者 Angus Walker)6处,此外左翼论者沃勒斯坦4处,博兰尼2处,布洛克1处,布罗代尔1处。如果文献目录不能充分表明作者的观点,那么作者的代表性话语应该可以清楚地做到这一点:“卡尔·博兰尼和布罗代尔……自觉地与各种各样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规范式的叙述方式划清界限,从而清楚地揭示出历史中的‘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如何依赖国家、权力和垄断。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这一论断正是从这一历史研究中产生的结论。”“有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形式主义描述无法解释经济体的实际运作,从而按照这一站不住的描述(笔者按:原文如此)建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极为危险的。”

这里所说的“形式主义描述”正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阿罗是证明竞争市场均衡的存在性和最优性的微观经济学大师,他的理论框架是公理化数学,他的工具是“不动点定理”。托宾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大师,他的一大成就正是宏观经济模型。自称“本人不是经济学家”的人对经济学做这样的判决,使人想到文化革命中马列哲学专家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这一论断”与阿罗和托宾的经济学完全不相容。“马克思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版本。”“在十九世纪,这一自由放任主义(笔者按:指亚当·斯密的理论)对于国家干预的批判转化为关于世界市场和历史进步的普遍叙述,从而以市场扩张这一抽象概念替换了殖民主义等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当代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市场、市民社会和自身自发秩序(笔者按:原文如此)作为现代性的社会想像的更为基本的框架,醉心于世俗时间的观念,目的正是为了根除这种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传统。”

这里清楚地表明作者的思想资源是“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当然,那是与“新政自由主义”不同的流派。

王绍光 1991 年发表“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被甘阳称为“中国自由左派的开山之作”，其最突出的观点是“转型过程并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的公共财政能力……这些主张明显秉承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传统，亦即强调国家具有市场无法取代的诸多重要功能”。但它被很多自由主义论者解读为“国家主义”的代表作，原因如下：首先，1989 年在天安门广场展示的“国家能力”引起的震惊在当时还很强烈。其次，1991 年中国政府还控制经济中占“霸权”地位的国营企业、所有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掌握投资、价格/工资确定、对外经贸等基本经济活动，其“政府能力”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而改革所必需的是缩小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第三，“财政汲取能力”决不是“国家能力”的惟一指标，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指标。一个权威主义政权的财政收入与 GNP 的比例可能与一个民主政权相似，但前者可以控制所有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甚至造成学术性网站由于站主“个人原因”而关闭，可以禁止独立工会、农会、知识分子沙龙，甚至可以确定和尚尼姑“挂靠”的行政级别，等等。自由主义者争取的，是消除政府这样的“能力”，这与“财政汲取能力”是两个范围的事。与上述论者不同，王绍光明确表明自己是“自由左派”，但就在这篇文章中有不少观点很难认为符合“新政自由主义”学者的立场。举例如下。

“自由放任主义者的天敌是政府，他们的理想是‘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如果政府必须存在的话，其规模与权限越小越好，至多只应扮演个守夜人的角色。而伴随积极权利而来的必然是福利国家；伴随福利国家而来的必然是政府规模和权限的扩大。因此，要实现‘让国家缩水’(shrinking the state)的目标，必须把积极权利批倒批臭。在中国，福利国家连雏形还没见到影，但这儿的自



由放任主义者也鸚鵡学舌，说什么积极权利‘易于滑向专制暴政。’”

这段论述无视历史而且歪曲了自由主义的观点，“伴随积极权利而来的”并不“必然是福利国家”，而可以是专制政府，“自由放任主义者”例如哈耶克批判的政府首先是德国法西斯政府，而不是福利国家。在中国，福利国家确实“连雏形还没见到影”，但是有过“积极权利”在“文革”中实施的“大民主”即“大专政”的惨痛经验，这不仅仅是“易于滑向”的问题。直到今天，如王绍光所承认，中国仍然是“权威主义”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也就是说，人民的无论是“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都远没有落实，政府的权力压过了人民的权利。中国的问题不是“让国家缩水”就损害“福利国家”，中国自由主义要求“限制政府”是为了实现公民权利和民主。

“很明显，对有产阶级而言，私有产权至关重要；对知识精英而言，信仰与言论自由至关重要。如果政府将资源优先用于保护这些权利，那么用于保护穷人福利权利(welfare rights)的资源就会相应减少。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的，对穷人而言，财产权和很多政治权利只是‘形式上的权利’，他们根本无法享用。……保护穷人的福利权利实质上是为他们容忍剥削，安分守己提供一种补偿，仅此而已。”

私有产权对最穷的人也是重要的，这是自由主义者包括“新政自由主义”者早已明确的道理。产权无关贫富，要点是“自由处置”。中国农民在公社制度下的财产权几乎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按公社条例应有的自留地、自养鸡猪，甚至住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也屡屡遭到侵犯。“承包”改变了那种产权关系，使农民能自主经营，产生了巨大成果，是一实例。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形式上的权利”的观点，与“新政自由主义”者确实不同，但马克思对于

自由出卖劳动力的产权形式比人身依附的前资本主义产权形式是一种进步的阐述,是一理论例子。“保护穷人的福利权利实质上是为他们容忍剥削”这一观点所隐含的经济学结论——在美国社会穷人是剥削造成的——与阿罗和托宾的经济学不相容。

“一个丧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可以是最大和最可靠的人权组织。”

对此可以问:具有强大治理能力的法西斯政府是否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苏联1968年为了扼杀“布拉格之春”改革入侵捷克之后,中国共产党曾经把苏联称作“社会法西斯”,那时苏联政府不仅在国内有强大“治理能力”,对别的国家包括中国也可以耀武扬威,那种政府对“公民权利”的威胁是否只是“次大”的?

“自由放任主义的出发点是作为个体的人,它主张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作为个体的人本身。(王绍光原注: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280页。)……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社会里……如果他们真是‘作为个体的人’,要权利有什么用?只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才需要权利。……更重要的是,权利不是个人财产,权利的成本也不是由个人负担。自由放任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抵赖保护私有产权和其他‘消极权利’的成本,试图将这些成本转嫁给社会上其他人。……公共财政与国家行为是任何权利存在的必要前提。所谓‘个人’权利不过是自由放任主义者自欺欺人的梦呓而已。”

这段话令人惊讶,它既曲解自由放任主义,又违反“新政自由主义”。第一,“个人”权利是对“个人”定义的权利,即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权利可以对其他单位定义,比如注册公司享有公司的权利,或者对个人的特定资格定义,比如失业者享有领取救济金的权利。第二,“个人”权利是对“社会里的人”而言的,这是“自由放任主

义”的基础观念，中国自由主义者包括徐友渔不知阐述过多少遍。第三，对“个人”权利的来源有不同理论，美国宪法取“天赋人权”说，哈耶克论证权利来源于通过经验的文明进化而形成的“法治”，但这些都影响“个人权利”的涵义。王绍光所采观点，其实更近于“自由放任主义者”哈耶克。第四，“个人”权利是“公共物品”，需要法治来维系，因而是有成本的，这也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基本观点，哈耶克的大作数卷可证。第五，“自由左派”罗尔斯在《正义论》所讨论的，正是“个人”的权利，森在“实质自由”中包括了这些“个人”权利，所用英文是“personal liberties, including some basic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个人自由权,包括某些基本政治和公民权利)”。批判“自由放任主义”，连“个人权利”都否定骂倒，是否实在有悖“新政自由主义”？从1991年到现在，王绍光的观点始终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上述一篇短文中这么多漏洞，一个重要原因是时空转换的谬误。他以美国为参照系批中国自由主义者，反复强调的是，多征点税、多增点财政收入，就多点福利国家、“福利”权利。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吗？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实现“消极权利”(包括“财产权”和“言论自由”)需要成本，就推出保障“消极权利”会损害“福利权利”，再进而否定“个人”权利，这样的推理和结论，在美国本土也与“新政自由主义”根本不容。罗尔斯论证“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优先性”要求，是否也是“梦呓”？

崔之元提出“鞍钢宪法”是“后福特生产方式”的“制度创新”，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有利于农民的民主参与。这里涉及的主要不是理论，而是“鞍钢宪法”、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的实践的经验问题，对此已有文章提供了详尽的史实和分析，无需重复。甘阳也承认，崔之元“并不满足‘新政自由主义’的结果，因为他更强调他所谓‘微观经济民主’即企业内部的经济民主”，换句话说，崔之元是

更激进的,这里就不再多加评论。

甘阳宣布他“将退出所有争论”,笔者不愿置甘阳于被评论而无法回应的地位,因此不在此评论他的文论。但笔者还是想问一个与论战观点无关、但与论战实践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适用于王绍光):秦晖先生在若干文章中一再说明,他主张“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为什么仍然称秦晖为“自由右派”?按甘阳文中标准划分“自由左派”、“自由右派”,一个站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交集的人,怎么会是“自由右派”?

## 辍语

“新左派”要成为“新政自由主义”或者如甘阳所称“自由左派”,并不是换一个“旗号”就可以完成的事。“新政自由主义”阵营很大,内部流派众多。但这一阵营还是有共同的基本观念,或可列出要点如下。

1. 肯定私有制的市场机制,在此基础上主张积极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否认政府为解决“市场失败”的惟一的或充分的手段(与“市场失败”对应的有“政府失败”),主张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都发挥作用。

2. 以罗尔斯为代表,肯定程序性法治自由权。以森为代表,主张以“实质自由”(或“能力自由”)把自由的目标扩展到超越“法权自由”领域。坚持以个人自由、公平为核心的法治。

3. 坚持民主,反对侵犯个人自由的专制/集权/权威主义政权,反对以阶级或其他集团为基础的“民主”。

4. 坚持“机会平等”,否认社会承担“后果平等”的责任,反对集中计划。

“新左派”人士是否认同这些原则，从而成为“自由左派”呢？如果是这样，自由主义阵营应该欢迎他们。笔者的观察是，几年来的论战涉及的问题并不只是学理或观点。对于下述现象，笔者百思不解。“新左派”在批判“自由右派”或“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些观点时，确实触及到中国现实中一些严重问题，例如上引汪晖提到的现象：“通过权力瓜分国有资产、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权力与跨国的或国内的资本联手霸占市场资源”。问题是：谁是这句话的主语？汪晖说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主义代表的利益群体”。“新左派”反复点名的是“朱学勤、徐友渔们”，是“自由右派”秦晖，等等。通观这些学者的文论，找不到任何鼓吹、赞扬、导致上述现象的话语，相反，看到的是对上述现象的批判。不仅如此，他们还饱受“权力”的压制。提倡“腐败有利”观点的人有名有姓，手握“权力”、身居“垄断”地位的势力趾高气扬地站在那里，为什么“新左派”就不找他们？与此相连，对“新左派”还有一个问题：这场论战是学者之间的交流辩论，还是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批判？美国的“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交往的一个故事可以提供参照。“自由右派”弗里德曼在50、60年代备受“自由左派”的火力压制，哈佛大学教授加尔布雷斯是“自由派”中的“自由派”，批判“自由右派”不遗余力。1992年弗里德曼到“自由右派”的“斯密私有企业研究中心”发表演说，主持人在开场白中赞扬弗里德曼而把加尔布雷斯贬了一通。弗里德曼上台张口就说：“我不希望你给在座的好人留下一个印象，加尔布雷斯一无是处”，然后说了这段逸事。60年代初弗里德曼要访问印度，事先问当时任美国驻印大使的加尔布雷斯，是否可以在印度见一面。加尔布雷斯马上回信请弗里德曼到大使官邸赴宴。席间加尔布雷斯说，“我不同意你的思想，但比起我能想到的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这些思想在印度所能造

成的损害都要小一点。”当时印度既有传统的严重官僚主义,又有从苏联学到的计划经济管理办法。中国的“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能否同桌共宴,承认有共同点,体认对手的观点中的正面因素(哪怕是用加尔布雷斯的弯弯绕方式表达),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可以是针锋相对的学术辩论呢?

## 对“新左派”的印象与分析

陈 明

我一直认为有着十年“文革”记忆等感受的我们这一代学人中,不可能会有什么“左派”主张出现,即使某些文章看去似与所谓“左”氏系统有染,料必也不过只是别种名号的主义与其思想偶然的部分交叉而已。直到今年在书店翻到一本叫《视界》的杂志时,才悚然意识到,自己真是错了。于是找书上网,以补课的心情重新审读。但实话实说,获得的印象与先前信手翻阅时并无太多不同,依然是西化的理论资源,浪漫的文化视角,“派性”的言说方式。

有论者在评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时指出,“无论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都借用了西方的话语体系,西方话语体系的烙印比比皆是。”与论者对此充分肯定有所不同,我认为如果说自由主义者们浑身西方烙印情有可原,“新左派”浑身西方烙印就有些难以理解了。自由主义者是要以西方的方式解决中国社会中的问题,而“新左派”则是要以“反”西方的理论叙说,在全球化的洪水滔滔与现代性的无远弗届中指点一条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使现代性由单数 modernity 变成复数的 modernities。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汪晖这样追问:“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

这展现了作者的理论抱负和现实祈愿,应该也是“新左派”思想结构中最具魅力和潜力的部分。如果他们也像 19 世纪 60 年代

的俄国民粹派一样,有实践其理想所需的社会调查分析、政治文化战略、以及“到民间去”的热情与勇气,由于中国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和“国情”,我相信此种努力能够获得的资源支持比当时俄国社会所提供的会多出许多,因此,其对西方中心主义方法论和目的论历史观的反对,不仅可使其获得跟那批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相媲美的理论名声,同时,东方式现代化还有可能成就出令中华民族额首称幸的历史功业。

但“新左派”们是学院派和“杂志人”。他们更感兴趣的似乎是思想的传播而不是思想的深化。在近乎文化生产的流程中,与其责怪他们在采购异域学术原材料时缺少必要的审慎和警觉,不如自我解嘲:本土社会问题之被纳入他们的分析架构作为一次不期而遇的邂逅,却被预期为一场美丽的约会。因为从他们对中国现实和历史的粗暴判读可以分析出其理论的起点即不是中国的本土经验,而是西方学院高头讲章里的逻辑前提。“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并未妨碍下述结论:中国社会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也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汪对症下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阶级、财产权等问题并未消失”)则又让人读到了其“复数现代性”之标准答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性理论。”往下的文字不仅让人产生“龙种”与“跳蚤”的反差,还有对几十年形成确立起的理性和常识的挑战,令人直欲无言。还好,从自由主义者、新权威主义者以及“中间派”等人对此均持异议看,理性和常识并不曾被颠覆。

我愿意稍加讨论的是汪晖“‘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的命题。首先,它具有某种历史事实



的基础，“中体西用”作为启蒙与救亡之外的社会文化发展战略，从曾国藩、张之洞、冯友兰、陈寅恪可谓一以贯之。其次，把它称做“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大可推敲；因为这种表述理论上显得相当的“依附”，更重要的则是与中国近代史的实际经验游离疏远。什么叫“反”？民族的发展乃是一正面的建设，是对自我生命的肯定和追求。理论倘不先立乎其大者，而汲汲于话语的趋奇骛新，再升级换代也只能是灰溜溜的缺少绿意。

非常可惜，这种转换在“新左派”处是应该期待却又难以期待的。论者发现其“除了引述福柯、利奥塔、阿明和华伦斯坦等人的言论外，并未证明他们的论述与中国历史语境的相关性”。这是因为其问题原本就是从西方语境中抽绎而出，并硬性地嵌入中国社会中来的。如果说其与主张按西方模式解决中国问题的自由主义间的争论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异的话，“新左派”似乎更像是那位退百步者。也许我们不应对此太过指责，因为其原本就不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只是想在中国建立××主义或××学派的支部或分部。

问题既来自西方，浪漫的文化视角自是不二之选。这是一种以进为退的策略或姿态，因为它既可紧握避重就轻的批判选择权，又能高唱从乌托邦立论的花腔。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发达富裕的资本主义为批判对象而建立起来的，其理论从“本能结构”开始，沿“审美之维”扩展。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完善自我更新之内在机制和潜能的理论体现，这种西方左派话语实际上是“正言若反”，即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性补充。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延续，它的启发性固不可忽视，但如果直接就搬运到中国来操练，效果只能是跟“后学”在中国的折腾一样，弄得假作真时真亦假，在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似是而非中，准橘成枳。

汪晖写道：“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新启蒙主义的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对内，它没有及时地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形成过程中国家/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从而不能深入剖析市场条件下国家行为的变化；对外，它未能深刻理解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言下之意十分显豁：他是以超越“新启蒙主义”的批判域限来为当代知识分子重塑辉煌的，即把对专制的批判转向对市场的批判，对“国内”的批判转向对“国际”的批判。毫无疑问，专制/市场、“国际”/“国内”需要面对的问题所在多多，其间的主次、轻重和缓急虽可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给出不同排序，但它们之间并不能互相掩盖与替代却是事实和常识。吉登斯指出左派和右派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用资本主义概念去解释太多的东西。在中国，由于出发点不同，右派赠给了 capitalism 过多的荣光，左派则强加了过多恶谥。但这里，我必须指出，“新左派”的四两拨千斤不仅难免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讨巧之讥，现实影响也更加糟糕；我认为这是致命的。

以进为退，实在有哗众取宠之嫌。因为调子虽然越高，问题离得却越来越远；批评如此深化，终将沦为批评的退却和逃亡。我们无法否认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由西方主导，游戏规则也难称绝对的公平正义，就像国际法首先是出自海上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协商一样，多少向强势力量倾斜。所以，对“世界上三个最富家族财产超过 48 个穷国财产之和”忿忿然表示抗议和谴责虽不能说有什么不对（我非常崇敬这群朋友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同情），但动辄就提天下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什么的，多少像作秀。如果我们无法像上帝一样打烂世界重新设计，那么除了与狼共舞别无

选择。“真正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何况相对于全能国家，市场系统对人性要契合、亲近许多。《视界》一篇对轿车文明进行批判的文章认为，以“私人轿车”的道义性对抗“公家轿车”的特权，“淡化了私人与私人之间的不平等。”文章说，“事实上，将私人同公家摆平之前，私人与私人之间的不平已经更为突出。”在他眼中私人与私人之间的不平等，罪过在“市场”。殊不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损有余以补不足之人之道，只有在社会产品足够丰富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施。市场诚然难说完美，但毕竟人类还没在它之外找到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平台。而对其脆弱规则的侵犯，首先应该就是从来自坐“公家轿车”的“市长”如马向东者之流（哪有不落实为“私人”的公家？）。同一文章还“警策”国内购车族：你们消费汽车，实际上却是被国外汽车厂商所消费。真不知这究竟是在写文章呢还是在被文章写！文化批判的避重就轻，以进为退，这应该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例证。

在讨论全球化时，我认为从国家利益出发是一个远比文化批判要好的选择，具体切实。对致力于民族复兴的我们来说，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历史进程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虽然前路如何走不能完全相信某些自由主义者的言之凿凿，但不能回到穷过渡、十年“文革”则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当读到汪晖指责改革开放对“毛泽东理想主义的现代化方式”的放弃，使中国的现代化不再具有前此的“反现代性倾向”时，我已不知道“新左派”与“老左派”的区别究竟何在。

“派性”的言说方式首先是指“新左派”是踩着敲打自由主义的鼓点登台。其次指“新左派”在学界有着相对最为明显的群体特征：思想相对集中于十数人；发表刊物相对固定；观点互相征引发明；甚至知识背景（文学）也相对一致。对于大半个世纪都已没有

学派出现的中国来说，“派性”是应该鼓励的；所以这第二点并无太多可议之处。值得一议的是其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从 80 年代知识界的努力与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吻合（双方具有共识实在不是一件应予嘲讽的事）这一前提出发，汪文虚构了主流话语与政府行为在 90 年代的共谋关系后笔锋一转：“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的现代过程本身的危机……苍白无力。”他们“保护私有产权”的主张，“很容易变成保护特权阶层的化公为私和垄断财富，”体现着“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是罪恶，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甘阳语）。相反，“新左派”则“试图借助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理论提出问题”。

对这些文字的反驳澄清首先是自由主义者们的的事。我关心的是这些文字现实中的意义生成：一是对自由主义者们所关注问题之真实性的消解；二是对自由主义者们工作所具道德诚信度的质疑。如果这种指控真是基于“严肃”的义理，有着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基础，那么“新左派”与“老左派”本质上的相通就被坐实；如果不是，那么秘密就只能存在于话语权力的争夺或曰文化市场的谋划中。（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愿望良好而在认知上出现失误——从其文采斐然、气势逼人看，似难成立。）根据其以破为立的切入招式，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前述两种情况中的后一种，可能比较最接近实际。

有人说：“1989 年以来，尤其在 1992 年之后，知识界长期处于所谓失语的状态。”这种失语，可能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主义主流话语（我实在不知道今日的“新左派”当时有谁自外于这一主流）的低潮。整个知识界面临的尴尬是，言说的空间有限；可

言说的问题也不多；再就是本土的文化资源在遭到几乎是全盘的否定后，被重新审视。众所周知，知识界是靠向社会提供知识和理念获取其生存的条件与尊严的。失语的恐慌迫切需要具备道德勇气和理论创造力的智者勇者去克服超越。但风云际会，阳错阴差，打破沉寂的却是“新左派”洋泾浜式的念、唱、做、打。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人，思想的灵感之源几乎全在西方。西方的主流是自由主义，既然它已“无地彷徨”，寻找的眼光当然只能在非主流的学院派知识体系如法兰克福学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法学之类上面锁定了。于是，从逻辑理念而不是经验感觉出发就在成为“新左派”的叙述策略的同时，成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对90年代，80年代乃至晚清、五四直至十年“文革”诸历史文本的重构亦随之次第展开。因为，这样削足适履是使其文化批判理顺章成的内在要求。由下意识的寻找到自觉不自觉的建构，由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中国似乎是一切规则的例外），加上文化产业化的现实，“新左派”的思想在传媒的推动和催化下，渐渐变得像模像样了。不妙的是，其思想主张的“非中国性”甚至可称“反中国性”（而不是什么“反西方性”），必然随着其论证的展开而渐渐显露出来。如果不是发生有一场颇具炒作意味的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论热战，我怀疑它是否会拥有今日的万千风情。有人认为这场争论“表明中国的改革面临方向性抉择”，实属放大镜下的宏大叙事。在技术官僚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知识分子位置在政治和市场的双重边缘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聊缘于无奈，但挑起一场口水仗的注意力收获不会大，人文性损失却不在小。

思想是需要尊严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能也。”问题也许部分地存在于这里：知识界自身是否确已深思熟虑出更好的补充性、替代性方案可以贡献给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说实话，我

真不知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又有多少个时代制高点是由人文学者所掌握着。“新左派”自是以批判理论相标榜；自由主义也同样自矜地声称“批判本身即目的”。批判固然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建设难道不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建设，就要有可操作性。90年代学界的兴趣已多从形上思辨转向了经济、政治、法律诸“社会科学”，这是一种积极的动向或态势。惟其向现实贴近，责任伦理的意识更有加强之必要。否则，竞躁以为进，矜异以为高，满足于在戏台后边的相互喝彩或聒噪，终只如春鸟秋虫，自鸣复自止。

本文是把“新左派”作为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面相来评析和期待的。一位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要》起草的西方左派承认，“我们已经很难清晰地描绘出世界和社会的变化，社会民主党本身也发现自己正处在这种两难困境之中”。托尼·布莱尔在谈到同样的问题时说，“‘老左派’抵制这一变迁，新右派则任其发展。而我们应该驾驭这一变迁使其达致社会的团结与繁荣。”与欧洲相比，中国的面目应是更难定义。解释的焦虑有如梦魇，因为任何地方也没有现成的理论可照搬套用。对知识界来说，这是挑战和机会，更是义务和责任。偶然也好，必然也罢，“新左派”给出了自己的解读，虽很不尽如人意，但我们至少应该感激它率先做出了从整体上对问题进行把握的尝试。对照布莱尔的描述与选择，我们的学界是否也应有所反思和自觉，使自己的努力有机有效地融入到中国式现代性的建构之中去？

## 解读“新左派”

任剑涛

扫描时下中国思想界,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形成的思想格局——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三足鼎立,已经演变为二元对垒:对阵的一方,是做派上显得十足的道义凛然的“新左派”。<sup>[1]</sup>另一方,则是依据时代要求与学理回应而呢喃言语的自由主义。对阵态势则明摆着:“新左派”对自由主义采取的是攻势,它依赖西方学术化左派集聚的学理资源,仰仗文化多元主义的学术主张和“全球化”时代潮流凸显的民族性问题意识,将过去激进左派的主张做温和的处理,对自由主义加以严厉的指责。似乎时下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弊害均由自由主义导致。自由主义者处于明显的守势。他们对来自“新左派”的指责进行抗辩,对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加以勾画,对自由主义的可信度与有效性提供说明。从三足鼎立到二元对垒,其间的演变有做解析的必要:各自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判断,与我们所处当下时代的演变有紧密的关联。

### “新左派”概观

“新左派”的理论陈述,不是一个具有理论一致性的、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它是一个以某些立论的相对接近而形成的松散的、无明确理论纲领的姿态与主张的代称。但是,“新左派”之间具有明确的理论呼应关系。因此,把它视为一个可以统合起来解读

的社会思潮,是具有合理性的。<sup>[2]</sup>循此思路看“新左派”的姿态与主张,可以从“拒斥”与“回归”两个维度概观。“拒斥”,大致围绕几个方面展开:其一,拒斥自由主义的言述。其二,拒斥市场经济的理论。其三,拒斥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

这在王彬彬那里列出的理由主要是,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往往正是自由主义者会拥护专制,称颂独裁,甚至自身便变成专制和独裁者的工具与帮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自由主义者”做出这种行动来。

比如,二战中意大利有号称自由主义者向墨索里尼表忠心。而在中国胡适就是一个典型,周作人就是一个明证。同时,自由主义之成为自由主义,是因为它以法治、秩序和渐进来抵抗革命。并且,以对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偏好“急切地呼唤一个有强有力的人物,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重新赋予社会以秩序,使各阶层的人能各安其位,使社会生活有法可依,从而也使自由主义的‘游戏’能重新开场。”

而在韩毓海那里,拒斥自由主义的原因则是因为自由主义“以经济活动不得干涉的名义,捍卫并造成的是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着经济活动的最大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实——更多地站在当时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公意和人民民主一边”。因此,自由主义要对它导致的市场垄断、民主失落、限制人民、少数专制、权力腐败、资本支配负责。进一步,必须对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一切现代政治制度加以清算。

对自由主义的拒斥,在汪晖处说的明显要婉转一些。当然,汪晖的姿态是明确的。他自称是批判“庸俗自由主义”,但在实际上,他努力证明自由主义对现代政经制度的批判性论证,不如后现代



主义来得恰当。因此,试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学”为理论资源,对自由主义进行解构。另一方面,他以对中国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的分析,认定自由主义的启蒙话语是一种在对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的信仰基础上,预设的抽象的个人或主体性观念以及普遍主义的立场。因此,再一方面,自由主义对现代性(表现为对资本的批判与拒斥)和全球性(表现为对中国问题的正视)的反思都是缺乏力度的。故尔,超越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学”为理论依托,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应当是当代中国的首要任务。

将“新左派”坚决拒斥自由主义及其相关言路的基本理由再做归纳,可以简单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论证缺陷;二是在实践上与其理论预期的疏离。

“回归”,所围绕的基本主张有:其一,回归高调民主。其二,回归政治主导。其三,回归人文激情。在这三个方面,国内的“新左派”只是含糊其辞地声称,要以普遍的民主和人民更广泛的公共政治参与,来解决自由主义无能对付的问题:

诸如基于自由的民主无法解决的人民民主问题,市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式无法解决的正义的政治制度问题,交易的体制化时代无法解决的人的情感适意与诗性想像问题。他们或者期望以民主代替自由,以政治主导代替经济优先,以诗化的创新代替务实的制度建设。或者干脆对自己的方案缄默不语,却搬出西式的“组合思想”(如贝尔)、海外华人学者中的“新左派”言论(如崔之元),来对付我们对“新左派”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期待。但是,透过他们这种“理性的狡计”可以看出,他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亲合立场,对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眷念,对直接民主、政治中心、激情跃动的肯定,对单纯理想主义诗意浪漫的顾盼,与对走向务实的当代中国社会

变局的不满。

归纳起来，“新左派”吁请“回归”的基本依据，是民主、参与的轴心意义与时代中所谓的“全面的社会民主”<sup>[3]</sup>的决定性作用。从对“新左派”的文献的理解上可见，“新左派”之所以谓“新”“左派”，自然是有满足这一称号“新”与“左”的双重理由：

一重理由从其“新”上得到满足——首先，“新”在它和“老左派”的差异。“新左派”既告别了与国家权力直接结合的激进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义、僵硬的计划经济与集权政治体制，又告别了传统左派（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单纯从意识形态视角论述问题的理论。其次，“新”在左倾立场的更新。它以伸张人民主权与普遍民主的姿态，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权权力垄断及文化霸权的姿态出现。其在前一方面，以同情弱者的姿态出现。在后一方面，以批判主流的方式立论。再次，“新”在“左”倾方法的调整。它以反意识形态的非本质主义姿态出现，借助于西方“后学”的解构武器，将近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钩联起来，加以抨击。而且以单纯的理论辨析的姿态出现，以对民族、国家，乃至世界全面负责的面目立论。

另一重理由从其“左”上得到满足。“新左派”之“左”，“左”就“左”在——其一，激烈地痛斥资本主义。他们将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少数经济政治精英操纵社会资源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指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sup>[4]</sup>或则就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再与自由主义合一而论，将全面民主与社会主义式的“制度创新”（诸如“鞍钢宪法”、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等）挂起钩来。于是，现代社会的一切不完美都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导致的。而完美的（即所谓“全面的民主”）社会就只期望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来造就了。

其二,为“社会主义”呼唤。遮遮掩掩地为“社会主义”辩护,从而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张再伸张,是“新左派”令人瞩目的一点。但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版本既未指出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也未明确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经济—政治运行形式,而只是简单地以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来定义自己的社会主义,至于这种民主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政治制度安排怎样?在他们抵制的保护个人权利与实行法治之外,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的落实,则缄口不言。他们在高明地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形态的“合法性危机”的前提下,为一种自己不予明言的、必定优越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主张的“隐形”社会主义辩护。

其三,对既有成就(无论是理论的,抑或是实践的)加以否定,这种否定的理由就是这些成就的“不完美”(如汪晖对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否定、对90年代各种思想主张“一网打尽”式的全面指责)。总之,“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将自身的奋斗与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统统出了问题,只有彻底的解构才足以为他们自己倾心赞赏的一个完美的世界鸣锣开道。<sup>[5]</sup>难以掩饰的激进性,与无法抹去的空想性,从“新左派”言述上,可以看出历史上任何“左派”共有的特征。

## 西方根柢

客观地讲,自由主义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其一,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科学,国家——社会、个人——公共、计划——市场这些理念,无不直接与自由主义有关。

其二,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亦主要来源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总结和辩护。对于个人财产权利的肯定,对于依据规则进行自由交换的市场制度,对于基于保护这种个人权利基础上形成的法治体系,即限制权力和凸显权利的制度取向,都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力图捍卫的。其三,现代的社会生活格局,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或是资本主义式的“全球化”的,也都与现代社会大众的选择与自由主义的吁请和作用相关。离开了自由主义与实际生活的互动,就难于理解现代生活了。正是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是,一旦一种思想体系成为主流,它就得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这些批判,自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思想登上历史舞台那一刻起,就在西方被左、右两派人士共同宣布为敌人。然而,近现代西方思想史表明,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这类批判构成了资本主义良性发展、构成了自由主义言述趋于健全的思想动力。

于是,当作为现代化主流发展模式的、西方的“典范性”的现代模式,以不可遏止之力向非西方社会扩展时,非西方社会人士就会将反抗西方的依托,直接搭挂到西方社会内部的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所谓非主流思想体系上面。因此,几乎所有非西方社会对自由主义的抵抗,没有例外地在寻求这种支持。

当代中国“新左派”的主要思想资源,也来自西方这些抵抗自由主义的新“老左派”们的思想观念。将“新左派”的陈述放到现代世界史历程中看,便有了似曾相识之感。

从东西方社会的现代运动关联性上看,当代中国“新左派”试图接棒的西方左派思想,有着新老两个鼻祖。老鼻祖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从葛兰西、卢卡奇那里出发,着力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霸权进行反抗的同

时,对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进行了系统批判。对现代极权主义,不论是资本主义式的,抑或是社会主义式的,法兰克福学派都进行了具有理论力度的批判。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极权主义的抑制,却发生了一个容易为人所忽略的语境横移问题:他们在德国这样的非自由社会里观察畸形的资本主义久了,却到美国这样的具有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里,不予区分地把美国的情况当作德国的情况加以批判,以至于将资本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不适宜地混淆在一起加以抨击。<sup>[6]</sup>而当代中国“新左派”在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言述时,却对之不予考虑,又再次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进行不择地点、不论条件的横移。<sup>[7]</sup>当代中国“新左派”的新鼻祖则是在时下西方时髦的、非难自由主义主流思想的各种学说。这里面包括:以阿明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全球化与依附理论。阿明以研究现代化理论知名。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作为先发展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资源与权力分配的中心地位,而后起现代国家则只能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成为西方国家的压迫、剥削对象。这便造成了“中心”与“边缘”的两极化。于是,阿明将资本主义式的“经由市场的全球化”判定为“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吁求一个基于普遍—特殊的辩证法,政治民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效率(市场)与平等、博爱的价值辩证法,通达新的“全球社会主义的目标”。以“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立论的詹明信,成为“新左派”的主要思想依托的原因是由于,其一,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各种话语中间的广泛解释空间的欣赏,马克思主义“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及。”<sup>[8]</sup>其二,他确认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对于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可替代性。<sup>[9]</sup>并且认为后者对于解决“人类生活业已被急剧压缩为

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sup>[10]</sup>除了这种理论姿态以外,詹明信强调其思想源头时,一者对于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仍然是来自德法的”,而“英美思想……对我来说多多少少是一种障碍”<sup>[11]</sup>加以了明确。二者对于自己以审美姿态解读资本主义的立场直言不讳,<sup>[12]</sup>并且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论作为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哲学背景。(即资本主义从现实主义、到民族主义、再到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线形衰变观)<sup>[13]</sup>以“东方主义”知名的萨伊德,成为“新左派”的理论资源,则主要是因为他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对东方(尤其是伊斯兰)文化价值的重新确认。这对于“新左派”处理全球化与民族性问题提供了思路。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挑战的麦肯太尔、桑德尔等,对于“新左派”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批判,将所谓自由主义的“孤立个体”解构了。而他们以对于自由主义的实施后果的批判,将所谓自由主义导致的虚假社群、分配不公进行了校正,从而对于“新左派”急于突出的国家、民族、阶级等问题提供了思想的兴奋点。以福柯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以其对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解构,让“新左派”大感兴趣,他们乐于引用福柯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对现代话语由怀疑而拒斥的立场。比如福柯所说的,“科学作为对真理的约束、契约和对真理生产的仪式的程序,千百年来已经横贯全部的欧洲社会,如今已经被普及为所有文明的普适法则。这种‘真理的意愿’的历史是什么,它的后果如何?它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交织在一起”,就直接成为“新左派”批判现代性和抵制自由主义的武器。<sup>[14]</sup>其他一些西方的“新左派”思想——诸如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等等,则各自在其论述的问题上成为“新左派”的谈资。新进化论以其对进化的长程观,启发了“新左派”对于八九十年代斯大林与毛泽东式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即是自由主义)“较量”结果的重新衡量思路。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福特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民主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关联性的论证,启发了“新左派”对所谓保障了人民经济民主的“鞍钢宪法”加以肯定的思路,对改革开放的权宜举措——乡镇企业的功能的高度赞扬。而批判法学的“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绝对财产权已经解体”的判断与对“工人阶级”推动西方民主的当代作用的肯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的期望,则鼓舞“新左派”对股份合作制、乡民自治这类“制度创新”的高度赞赏。<sup>[15]</sup>

中式“新左派”的西方思想鼻祖,提供给他们以思想的直接支持。但是中式“新左派”在以这些思想观念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撑条件时,却未能明确意识到西方思想鼻祖谈论同样问题的背景:二战前后的西方左派是针对西方社会爆发的危机立论的,这是现代政经活动方式遭遇反自由的极权民主时,西方发生的独特实践引发的左派思想。而后现代时期的左派思想,同样是基于西方“后现代”经历的独特性立论的。假如说这些思想在西方的思想氛围里具有其正当性的话,那么横移到“前现代”的当代中国,就丧失了原有论述的地域依托,就成为悬空之论。

如此,对当代中国“新左派”基于西方左派之论立论,就可以提出两个质疑:其一,当他们把西方左派之论作为正当性无可怀疑的依据,来分析当代中国问题时,他们对于西方左派之论有没有进行思想审查?显然,他们未做这一工作。因为,他们居然未能发现西方思想鼻祖思想预设的内在矛盾:一则西方左派在思想方法上取反本质主义的姿态。但是,他们却是以反对线性进步的本质主义来建立线性衰变的本质主义。资本主义越来越不济,是他们凸显

社会主义正当性的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的长程合理性,他们却不愿意予以考虑,以至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式普遍民主的热切期望,对资本主义式的精英控制、民主缺席的深切痛恨,遮蔽了他们在两种体系之间适当权衡的眼光。二则中国的“新左派”指责自由主义的民主无法承担对于人民民主的保障任务时,援引西方左派对现代自由主义建构的自由民主机制的全面解构,来指责自由主义的论说。但是,却未能注意到当西方左派在解构理性、责任等现代性假设之后,因为没有提出可行的社会救治方案来作为替代,因而,就同时解构了任何方式的对人类与未来的承诺。中国“新左派”对之的引证也就缺乏了现实性品格。其二,中国“新左派”在以西方左派言述为依据指责现实社会的自由主义发展趋向时,忽略了西方左派在指责现实的不完美时自陈的“乌托邦”性质。<sup>[16]</sup>

这种乌托邦思想对于西方社会文化语境来讲,有其必要性。它始终以其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对现实进行指责,成为现实社会趋于完善的精神动力。但是当中国的信徒们将之转换为当下要求,来对一个艰难地向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社会推进的思想与实践现实横加指责时,就既丧失了西方左派的乌托邦思想性,又丧失了健全引导社会的现实正当性。

## 中国关怀

毫不武断地说,“新左派”的问题意识与问题表述完全是从西方来的,但是问题的指向却是中国。他们力求表达的是对于现实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切关怀。我们有必要肯定其善良动机。其中,尤其值得认同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性”认知的适当强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的关注。



就在同时,则不能不指出他们在表达自己的中国关怀时所存在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把具体感放错了地方的谬误。这种谬误是指,一个东西因其特性而成为自己,当我们把它放到与其特性疏离的地方,就好像觉得放置的地方本来就有此特性似的。<sup>[17]</sup>从这个方面说,“新左派”将西方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社会的批判横移到中国来的时候,其中国关怀不可避免地存在三重错位:

第一,中国关怀的理论认知的错位——这是指,当中国“新左派”在横移西方左派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时,没有对理论移借的审慎性予以重视。他们对于西方鼻祖理论的横移,事实上经过了三重过滤而不自知,还以为西方左派理论具有另类普适性。这三重过滤是:首先一重,是生活于西方社会的理论家对西方实际问题的理论过滤;这种过滤,已经使得西方鼻祖的理论建构存在误区。如法兰克福学派就将德国的经验与外悬于美国工业社会的个人处境,作为指责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背景依据,使得他们的某些论断失之确当。<sup>[18]</sup>而生活于西方社会的非西方国家人士,也是以自己文化传统的特殊性立论的。如果对他们进行理论建构时的特殊境遇不加留意,那么,就会对其特殊的结论不当加以普遍推导。其次,由于中国国内“新左派”在摄取西方左派的理论营养时,客观上受到地域与关注点的限制,因此,不能不借助于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中国学人或急切去西方求取时髦理论真经的中国访问学者的过滤。这就难以避免前者在过滤西方左派话语时可能只是一种理论策略选择,因而无法将西方思想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国内“新左派”的问题。也就难以避免后者在西方阅读左派文献囫圇吞枣,以致于未对西方思想所处的文化语境加以审慎分辨,造成急迫的“拿来主义”心态下的“新”便数应用的急促举措。再次,“新左派”多是以

现实的批评者自居的,因此,一切现成的东西都是陈旧的东西,他们以“前沿”理论家的学术角色定位,因而,他们对西方最新的理论言述便容易加以信从。殊不知这中间也经过了他们无意的过滤,过滤掉了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留下了那些他们以为足以用来指责某些东西的对抗性内容。由于中国“新左派”在利用西方左派的理论时对这三重过滤未予慎重的对待,这样,西方理论的原初指向与理论结构,完全被他们打散,在用来解释中国问题时,便显得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但是,这就必然造成一种双失的解释后果:一则失于对西方时髦理论的粗拙套用,以至于究竟想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什么具体问题,弄不明白。二则失于对中国问题的时代性内涵与跨时代性内涵、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全球性的把握。于是,不得不诉诸感性直观的总体把握,以拙劣的煽情来处理本应严肃、细致地加以分析、研究的问题。<sup>[19]</sup>

第二,中国关怀的历史维度的错位——这是指,中国“新左派”以西方左派的理论作为表达自己中国关怀的支持理论时,由于相应对于中国的问题本身的关注要服从对西方理论的应用需要,因此,他们对许多中国历史事实的尊重程度就降低了。在这方面,有三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判断缺乏“大历史”的视角,流于对当代史的“现场欢呼”,即以对现成的东西的认同,来判断历史的东西的正当性。比如在现代中国政党政治评价问题上,“新左派”就持有一种不尊重历史的立场。如王彬彬对于胡适 1948 年呼吁国共两党谈判是“威胁利诱”的判断,以及对于执政党领袖关于以往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理智判断加以否定的说辞,都是表现。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敏感性,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历史问题,换算为另外两个易于讨论而又亟须辨析的抽象问题:一是“娜拉有理由出走”,革命自有革命的充分历

史依据。二是更为紧要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以后，究竟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执政状态，回报参与革命的人民大众？如果真正尊重人民的权利并代表人民利益的话，执政者就应当对于后者加以极度的关注，而不是继续以“穷过渡”的方式来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声称为人民大众代言的“新左派”却恰恰与执政党的正确取向悖反，呼吁执政党要以无节制的革命来保证一种不断的“创新”，这与“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几无区别。

其二，“新左派”对现代中国史上存在过的评论政治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未予尊重。远在40年代末，政治学家储安平就对时局发表了精辟的评论。断定一个执政党对于社会的尊重程度不够的话，那么，人民的民主就会从一个“多与少”的状态变而为“有与无”的状态。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邓小平指出的执政党领袖对于党内民主的忽视、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忽视，造成了我们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结局。为此，邓小平强调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立，意味着“原创”；健全，意味着“配套”。这都理智地肯定了在意形态上争论社会主义的意义限度。

其三，“新左派”对于当代中国历史问题的分析，完全建立在一个历史阶段的“成王败寇”的逻辑基础上。他们为了批判自由主义，而以一些完全不能代表自由主义理论的人物浅薄地宣称的“历史的终结”，拿来作为批判整个自由主义理论的依据，却又悖谬地容许自己在面对中国历史时，持一种结局式的历史论断立场。

第三，中国关怀的现实判断的错位——这是指，当代中国“新左派”在面对自己论说问题的时局时，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的判断，是与现实中国问题完全错位的。“新左派”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思想逻辑是，由于当代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资本

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就应当将问题放置到全球化体系中加以论断,而不应当就中国论中国。为此,他们对于当代中国怎么成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避而不谈,对于这一经济形式是否能够成功配套的问题也不予关心,相应对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政治制度、法治需求予以回避,对于这一现代政治经济运作形式要求的思想以及其历史经验加以简单的否定。从而,对当下中国思想界针对问题症结所做的理论努力,加以蔑视性的评价。事实上,当代中国是否像“新左派”论断的那样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体系之中,本身就是问题。同时,中国的发展问题如果还被“新左派”认为是必须的话,那么,十分应当首先尊重中国的“发展是硬道理”。就是从“新左派”口口声声所谈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路讲,也十分应当承认从经济问题谈起的思想逻辑,再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讨论所谓“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相反。假如不把谈论问题的起点在经济问题上“坐实”,也许,“新左派”就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人民民主问题,因为,一个对于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问题都不予关注的人士,还凭什么以人民的名义高谈阔论。或许,“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处理欠发达的中国发展问题,确实有一个中国人忽视自己的紧要问题而专事务虚的后果。这里,可以说,以“穷过渡”为光荣的心理潜影,在“新左派”的论述中恍然瞅到。

面对“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中国社会朝向规范化发展的运动,面对中国积一百五十余年的教训才确认的经济优先发展思路,“新左派”在这一过程始发时就完全从相反思路言述问题,似乎对于中国问题不分主次先后的“一锅煮”解决思路,难于成立。而从其言述的负面结构看,则可以说,这种思路为我们所熟悉,“中国可以说不”已经有粗鄙的表述,而“新左派”所言不过是精致的“中国可以

说不”的版本而已。

## 观念支撑

从“新左派”的理论走势看,它有一个累积理论“强势”的过程:从几年前的人文忧患式缕述,到近期的理论直陈,再到当下拿自由主义作理论对手加以攻讦为前提来强化立论,获得广泛的喝彩。“新左派”也就从主张上扩大解释面,从学科上跨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界限,从言述方式上抛弃恳切的学理自诉而意欲占据话语霸权。分析起来,“新左派”的诉求之所以获得这种理论认同,除了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提供的一些两可解释的疑难素材这些表面东西之外,还有叙述其理论意欲的支撑观念的内在原因。这些支撑观念大致有:

第一,“乌托邦”的先知渴求。乌托邦的构成大致有三:一方面,它在一个不完满的社会政治事务出现之初,就以其高度敏锐的直觉,看出这一事物的不完满之处,并给予指出。另一方面,它对于现存事物采取一种完全的非难姿态,而将自己的满怀热情,要么投向过去,要么投向未来,因此,它具有典型的不妥协的批判姿态。其三,它构想的未来是一个完美的未来,一切过去的现存的问题,都可以一并加以解决。从这些乌托邦的特征上讲,它具有强烈的“先知”性质。对于中国的“新左派”来讲,他们的所有论述,都可以说是建立在做一个乌托邦先知的内在心理渴求上。它完全具有乌托邦的表面特征:在中国,市场经济甫出,问题也只露出苗头,“新左派”便开始了诊断;而对于市场经济及其社会后果,他们则表现出不论东西方情形的同样反感,直接将期望转移到“未来”的完美社会上面;而且,他们一再向人们证明,只有以他们设计的方案,才

足以解决现存的所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这些方面“新左派”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当代中国“新左派”的先知渴求,表现得似乎比西方同类急促得多。这就使得他们的言述越过了乌托邦的合理范围:由于他们期望自己的批判兑现为一种政策导向,因此,就使得乌托邦的理想指向滑落到本来无法务实的层面上,以至于使其乌托邦走向了反面——理想变成完全的空想,批判变成了随意的指责,“先知”也便畸变为对西方鼻祖类似言述的机械重复。

第二,文化研究的方法紊乱。当代中国“新左派”是以文化研究的名义,来分析所谓被自由主义者搞得简单化的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完全从思想创新的角度切入,完全从意欲要求的所谓制度创新视角审视。因此,他们的精神文化期望,胜过了所有现实问题的可行性分析。于是,他们在分析问题,将当下中国复杂交错的问题安排在西方左派的论述框架内加以处理。这样,便难以避免文化研究的空间凌越与时序紊乱。空间凌越,是指“新左派”将西方左派思想不加分析地应用到当代中国来,西方特定地域产生的社会文化问题就好像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问题一样。由于“新左派”未能“贴近粗糙的地面运行”,就只有凌空起舞了。时序紊乱,是指“新左派”不看当代中国的大走势,而将发展中的问题(哪怕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严重问题)读为发展本身之错,再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视同,一味指责一番。

第三,逻辑思维的缺席。由于“新左派”分析问题的思维推进展服从于他们的分析“先见”。而他们的分析“先见”又是拒斥现实选择的,同时他们将现实选择视为是自由主义运思的结果,因此,他们就将自己对于现实的愤怒完全转向自由主义。这种多次的转向,使得“新左派”保持其逻辑一致性的难度加大了。在此,他们对于本应区分的自由主义的一些界限就掉以轻心了。这些界限包括

认可自由主义者身份的两种情形：即号称的自由主义者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亦未能区分真正自由主义者的三重界限：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人、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思想家。前者是所有知识人都表现出来的阶层特性。居中一点则体现出信守自由主义理论原则的人士的独特性，即一种既不同于保守主义者、又不同于激进主义者的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基础上关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公共性的特性。后者则是了解自由主义与评价自由主义理论的依据，因为只有他们对自由的系统理论阐释，才足以判断自由主义的正当性与缺失点何在。如果混淆这些界限，对自由主义作出的评论，就难以保证其确当性。

第四，价值要求的绝对优先性与经验事实的错位。由于“新左派”将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发生原因与自由主义关联起来考虑，因此，他们以对自由主义价值的拒斥先导，将当代中国所有的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先撇开这种评价不说，“新左派”对当代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指认，具有的深切忧患意识，值得认同、肯定，甚至赞扬。但是，当他们将这些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就是错置因果关系了。导致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因，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思路，不如说是某些国家政策决策者的失误。“新左派”不敢将问题导因的真相勇敢加以揭示，而将在中国从来都处于孱弱状态，而且对于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无甚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祭出，似乎以杀自由主义来平息民众对近二十年社会变迁郁积的不满。但是，这确实是以向强势力缴械而向弱者示威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其实，在这种论述中，“新左派”虚构的 80 年代自由主义倾向的启蒙派在 90 年代成为体制内人物，因此自由主义已经体制化的判断，是不成立的。倒不如说是 80 年代有启蒙倾向的学人而在 90 年代欲做国策派的那部分人士，成为了体制内的人物。

他们,正是90年代日益“左”倾的、民族主义化的、与资深“左”倾人士携手、共鸣的人士,他们,正是自由主义的一些“隐性杀手”不便出场情况下的“显性杀手”。

## 常识问题

从近现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左派”立论的基点一向是人文激情。所依据的学理基础,大多是人文学术。在形而上学的问题思索上,这种思路也许是可以引致思想创获境地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人文学术对于解释价值领域的问题、说明私人领域的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却对于解释社会问题表现出自己的苍白。人文学术除了为现代社会科学分析研究提供人文意识和道义情结之外,它就必须将自己的解释界限划分出来,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留给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家来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问题的现代社会科学的解释,来得更为紧要。

人文学术对于解释社会问题的限度,是由人文学科的构成状态决定的。人文学科以文学、总体历史与一般哲学等具体学科构成。不论几个学科具体的研究内容是什么,要期望研究富有创获,主要依靠研究者本人对研究对象的个人化切入。个人的出身、所受的教育、知识的趣味、人生的经历、社会的际遇、内在的体验,诸如此类方面的不同,研究的样态就不同,研究的创获意义大小就具有悬殊的差异。人文学科的学科规范在这个角度说就是较弱的。人文学者完全可以以抒情达意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个人偏好、个人体验、个人趣味。但是,社会科学就不同了。它研究的对象是作为公共问题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它对于个人的背景要求是不强烈的。相反,它要求研究者严格约束自己的个人判断,以公认的价格



值准则为基础,来对社会问题加以平静的分析。适当的统计是必须的,规范的分析是重要的,务实的理路是必须确认的,其于健全而非完美的取向是应当认同的。这些现代社会科学特性,恰恰与人文学科的学科特性有着重大的不同。

“新左派”在学科的意识上以自己期望做通人的自我冀望,<sup>[20]</sup>在未对专业问题做专业分析的情况下,就打通学科界限,将问题胶着在一起,以价值“先见”统率情感议论,以自己过剩的文人激情、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无知与曲解,来谈论一个必须借助于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与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才能解释的复杂问题。于是,在常识还没有缕清的情况下,就对跨学科的前沿问题发表议论。议论当然显得是十分博学的,引证也十分宏富,但是风声水起之余,问题依然还是问题。他们既未将问题的源流分析清楚,也未提供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实在思路。除了对现实中些微他们认为值得赞赏的事情(比如未可定论的乡镇企业、村民自治)打几个感叹号以外,他们就撂下摊子,以自己履行了批判责任了事。<sup>[21]</sup>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回到常识层面上来讨论问题。这类常识,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常识。二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常识。从前者来讲,三个方面有必要提出来讨论。其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类型分析与要素比较的辩证处理。“新左派”以对自由主义的二元思维的批判立论。<sup>[22]</sup>确实,在未经审查地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分析现代社会问题上,一些社会科学家表现得夸张的僵固。但是,以汪晖所指责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哈耶克来说,这种指责是不成立的。哈耶克对韦伯方法论是重视的。他的市场—计划、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架构,正是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方法。像韦伯、哈耶克等人,并未否认资本主义的一些要素曾经出现在东方社会的事实。<sup>[23]</sup>但是,完全无法推

翻的经验事实是，“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运作类型，只产生于西方社会。这是任何雄辩都完全无法颠覆的历史结论。在此历史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划分开来。因此，二元分析思路并不像论者所说的只是一个“理性的滥用”。同时，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确实分化出市场—市场社会与计划—计划社会两种社会类型，分化出国家与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的对应性社会政治格局。<sup>[24]</sup>这不是分析者的虚设。当然，这种格局并不见得就是完美的。它在建构与批判的共同敲击下，走向健全。就此而言，对“二元思维”的批判具有必要性，但是要将其限制在一个适当的合理性限度内。这个限度就是，类型分析始终只能在相互对应的分析范式中进行，它带有不可避免的二元性。假如以另一种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要素分析——来指责类型分析，就不适当了。

“要素分析”是一种“发生学”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强调从具体因素的异同可比性着眼，来具体分析问题、解释问题。它对分析对象的处理更细致、更合乎历史的具体情形。但是，它不是解释性的，它不对宏观判断提出要求。法国年鉴史学派所取的思维进路应当说是后者。

两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均有其确当性，但亦均有其确当性限度。以类型学观点看发生学立场，会以为它流于琐碎；从发生学视角看类型学思路，会觉得它遗漏太多。将两种方法结合，最能说明历史真相。韦伯、哈耶克均如此探索。而“新左派”却以对类型学分析的拒绝，单纯从发生学角度来衡量类型分析的弱势，是不太公平的。

其二，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客观性的必要性问题。“新左派”的价值先设性立场是比较清楚的。他们正是由此来指责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与道德资源的有限性的。<sup>[25]</sup>但是社会科学分析

问题时强调价值中立与客观性立场。“新左派”会认定自由主义取这一方法论立场,是要逃避价值判断,逃避对工具技术手段正当与否的断定。其实,现代社会科学强调的价值中立,既区别于“价值祛除”,它在弄清楚事实及其因果关联之后,才予以价值确认;它又区别于“价值先设”,主张在研究铺展开之际,研究者不要持一种以自己的研究来印证个人价值趣味的态度。<sup>[26]</sup>在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所取的审慎方法论立场比之于“新左派”以自己的研究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偏好,适当一些。

其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划界、分层,与理论概观、科技整合的关系问题。细分问题进行研究,以至于流于琐碎化,而难以提供宏观解释,是西方一个时期科学研究的通病。80年代后期,随着“大理论”的回归,<sup>[27]</sup>分析的视野与综合的视野重叠起来,对社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区分以及各自内部的学科界限,被人们质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为方法时尚。<sup>[28]</sup>但是,各种学科的研究主体——学问家,能否既做专家,又做通人,在专家与通人之间合成一种理想的研究者呢?对此恐怕不能轻率。我们宁愿取一种先专业后通达的审慎态度。

## 自由根基

转回头说,“新左派”的立论基点还是对自由主义的直接攻击。因此,一切对“新左派”的分析,还必须落实到对自由主义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有效性的说明上来。这就要求我们在最低限度上回应两个问题:一是自由的祈求与自由主义对之的阐释,对一个期望现代化并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意义何在?二是对于一个期望思想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思想界来说,又具有何种意义?假如这些问题完

全无法予以令人基本信服的回答,那么,“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指责,就完全可以予以无条件的认同。假如可以予以适宜的回答,那么,“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全面质疑,其本身就应当加以再质疑。

这种回答,并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有”或“没有”就能够解决的。它首先要求清理两个理论问题,然后才能进入意义论证的阶段。其一,需要清理笼罩在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迷雾。由于在西方现代社会,自由主义早就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假自由与自由主义之名,发表所谓自由主义意见,将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模糊化了。为此,需要将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边界加以划分:一、自由与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是不同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不同的。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与政治经济权利层面的自由是不同的。三、自由是凸显权利而限制权力的,是以制度化的安排来保障公民安适,它与容忍不公、打压公民的所谓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四、从经济角度讲,自由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一种有利于社会总的财富积累的活动方式,它对财产权的强调并不偏向资本的占有者,而是从对于公民财产权的普适性肯定,它在财富的分配上,注重公平性。从政治角度讲,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在威权政府与无政府之间寻求一种政府与社会健全互动的合理政府形态的制度努力。它在社会的介入机会上,注重平等性。<sup>[29]</sup>由于自由主义对诸自由的关联性加以高度的强调,因此,抽取任何一个方面的自由主张来非议自由主义,就是不公平的。由于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不同,也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家内部不同的思想人物对自由的关注点不同,因此,单单以其中某一个思想家来批判整个自由主义,也是不公平的。

其二,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理性批判之必要性加以确认。自由

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它接受任何思想家对之的建构,也接受任何思想家对之的批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既在社会进程中证实自己,也在社会进程中通过部分的证伪来完善自己;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与社会心理导向,它从来就没有也无法固定僵化为某一模式,它是开放和不断发展的。自由主义在西方原生语境中,就因应来自外部的批判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调整,以便更适宜社会的需要。

但是,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正当切入点则是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以一种随意的指责来进行所谓的批判,是没有意义的。以一种先设的否定来抨击自由主义,也是没有意义的。

假如批判甚至解构自由主义言述,是有利于现代社会朝向更为健全的方向发展,那对自由主义将不会是一种悲剧命运。假如以建设性的态度指出自由主义的缺失,那对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健全、心智的成长,将不无益处。

在清理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方才可以回答自由主义对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意义问题。这些意义,需要分析和验证。鉴于本文的关注点,只能在此直接指出这种意义在几个方面的投射:其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财富积累有效的方式,它对于贫穷的中国来讲,可以推进我们采取有效的经济建设方式,以便治理贫穷。其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政治生活健全化的方式,它对于长期陷于专制极权的中国人来讲,可以促进我们进入一种适当的政治生活状态。其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宽容理解的思想方式,推动科学技术与学术思想的繁荣,它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思想控制与科学孱弱的中国来讲,可以导引我们朝向一个民族精神解放的方向发展。前两者,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对于期望现代化及现代化中的中国的意义;后者,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对于一个期望理论创

新与制度创新的思想界的意义——因为，没有自由的思想氛围，就没有思想学术的繁荣，也就没有创新的思想空间，当然，所谓的创新就会流于永远的期望。

由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言述，在原生的西方社会是处于一个开放的思想创造过程中的，而通过文化传通接触到自由主义的中国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创造性发展，就更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于是，自由主义要证明自己对于中国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得以凸显，就依赖于自由主义理论自我健康成长。自由主义的健康成长，是具有条件性的。这些条件主要有两类：一是对它的理论基点与自我调整的健全把握能否满足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要求自由主义达到理论的自洽性，即避免理论的可能内在矛盾。二是它的社会基点与生长氛围的宽松性有否保障的问题。在这方面，要求自由主义达到理论的外部健全保障条件，使得自由主义有一个良性的发挥作用的条件。前者，使得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误会降低到最低限度；后者，使得人们可以体会到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的“好处”，不致于将社会的一切不完美之处归咎于自由主义。<sup>[30]</sup>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并非因此就获得认可。事实上，现代中国历史上抵抗自由主义的顽强性一直有目共睹。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道义认同，一直受到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挤压，<sup>[31]</sup>抵抗自由主义的理论与社会基础比自由主义获得的认同要深厚广泛得多。从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受到来自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与各种各样的政客们的共同打击，就此而言，可以说现当代中国形成了自由主义之外抵制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现实社会政治力量所组成的抵抗同盟。

自由主义的这种处境，完全不像“新左派”认定的自由主义成为主流，因此要以向主流宣战的边缘姿态来批判它、瓦解它。这对

于同情自由主义与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来讲,坚韧地为自由主义说明和辩护的任务,仍然十分沉重。

### 注释

[1] 本文对“新左派”的分析,主要以刊登在《天涯》杂志上的数篇文章的解读为基础。这几篇文章是,1997年第二期王彬彬《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1997年第5期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8年第5期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以及在本文即将完成时看到却无法及时做出应答的、1998年第6期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旁及《读书》杂志、《二十一世纪》等书报杂志上近年刊登的一些“新左派”文章。主要有崔之元、张旭东等人的文章。

[2] 例如韩毓海在文章中寻求理论支持时对汪晖的援引。而汪晖在寻求理论同道时对崔之元的援引。

[3] 汪晖:《我们不得不带着枷锁跳舞》,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8年9月11日第2版。此文系该报记者柯凯军采访汪晖的访谈录。

[4]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该文为汪晖《天涯》1997年一文所特别看重。

[5] 汪晖1998年第6期《天涯》文。

[6] 参见徐友渔:《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天涯》1997年第4期。

[7] 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于王彬彬的文章中。

[8]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页。

[9] 同上书,第32页。

[10] 同上书,第32—33页。

[11] 同上书,第6页。

[12] 同上书,第7页。

[13]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7 页。

[14] 参见汪晖 1998 年第 6 期《天涯》文结束部分。

[15] 参见崔之元 1994 年 8 月《二十一世纪》文。

[16] 参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明信与张旭东的对话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

[17] 原为怀特海(A. N. Whitehead)语。转引自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9 页。

[18] 参见徐友渔 1997 年第五期《天涯》文,文中对《辩证的想像——法兰克福学派史》作者马丁·杰对法兰克福学派失误进行分析的一段话。见该期第 140 页。

[19] 这一点在韩毓海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20] 见韩毓海:《从“红玫瑰”到“红旗”》序言“关于我们这一代人”,远东出版社 1998 年版。

[21] 这一点在韩毓海 1998 年第五期《天涯》上的那篇文章表现得最为突出。

[22] 汪晖 1998 年第 6 期《天涯》的那篇文章,就主要以二元思维批判自由主义。

[23]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三联书店 1987 年版。以及哈耶克《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第二章,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

[24] 这一点可以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对西方法律兴起过程的分析。权力的二元(政权与教权)分割与制衡,曾经是西方社会“依法治理”兴起的重要条件。因此,并不是只有自由主义思想家才如此运思。

[25] 参见朱学勤:《被遗忘的与被批评的》,书中对 1996 年 6 月美国“得夏书屋”聚会中崔之元发言的记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26] 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引论》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27] 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结语,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28] 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第二章。

[29] 参见三联书店出版《公共论丛》四辑中那些对自由主义理论边界进行分析的文章。由于本文的篇幅限制,难以对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

[30] 参见任剑涛:《论自由主义的成长——汉语语境中的言说》,刊于即将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一辑。该文对自由主义的言述自身的自治性与成长的外部保障条件,有比较细致的梳理,可以补本文粗疏论断之不足。

[31] 徐友渔:《“后主义”与启蒙》,《天涯》1998年第6期。

任剑涛,学者,居广州。著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伦理政治研究》、《自由与传统》等。

## 中国部分“新左派”人士选择 与恐怖主义站在一起

笑 蜀

纽约世贸惨剧发生后,国际舆论同声谴责,中国政府也严词抨击恐怖主义暴行。而在中国民间,却是截然相反的景观。无论网上还是现实中,到处充斥叫好之声。部分“新左派”人士趁机煽风点火,企图利用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推进“反美大业”;同时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改变其“不当头、不抗旗、不称霸”的低调外交政策。为此公开充当恐怖主义辩护士,公开鼓吹恐怖主义。

### 羞羞答答的恐怖主义辩护士

制造世贸惨剧是恐怖主义暴行。以牺牲遍及六十七国的数千无辜平民为主要手段,只能说明恐怖分子不单把屠刀指向美国和美国人,说明恐怖分子已完全泯灭人性。这不是一部分人跟另一部分人的战争,而是人与兽的战争。

袭击世贸大厦的这个本质特征,本来无可争辩,却遭到部分漠视生命尊严的“新左派”人士的强烈质疑。他们坚信,人不过是工具,服务于所谓“历史使命”的工具。乌托邦的价值、“革命”的价值、整体的价值高于一切。只要目的“崇高”,手段可以不计,牺牲多少人、牺牲什么人都在所不惜。世贸惨剧固然造成数千平民死亡,但在部分“新左派”人士看来,那不过是必要的代价——只要是為了打击资本主义金元帝国。既然不承认人的价值,不承认生命

尊严,当然要拒绝从人性、人道角度考察世贸惨剧。他们提出了考察世贸惨案的全新角度——意识形态角度、阶级分析角度。从人性的角度、人道的角度考察,恐怖主义只能是人类公敌,罪无可赦。但如果从意识形态、阶级分析角度考察,恐怖主义的定义就不免众说纷纭,对恐怖主义的理解就可以存在相对性,恐怖主义概念就可以模糊化、多边化;为恐怖主义辩护乃至鼓吹恐怖主义就有了广大的回旋空间。“乐民”的宣言书:《我认为“恐怖主义”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观点》堪作这方面的代表作。“乐民”把恐怖主义概念的所谓“相对性”发挥到极致——

对于奴隶主来说,地主阶级革命就是“恐怖主义”;对于封建主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恐怖主义”;对于资本家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恐怖主义”;而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任何被剥削阶级的解放运动(奴隶叛乱、农民起义、工人运动)都是“恐怖主义”。对于殖民者来说,民族解放是“恐怖主义”;对于买办者来说,国家独立是“恐怖主义”;对于侵略者来说,反抗是“恐怖主义”;对于叛国者来说,爱国是“恐怖主义”。也就是说,对于八国联军来说,义和团是“恐怖主义”;对于蒋介石来说,工农革命是“恐怖主义”;对于法西斯来说,抵抗运动是“恐怖主义”;对于贝当来说,“自由法兰西”是“恐怖主义”。而在一切进步的事物中,最让落后势力感到恐怖的还是共产主义。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一切落后势力的“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的概念既如此模糊,“恐怖组织”的概念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疆界——

如果进行恐怖活动的组织叫“恐怖组织”的话,那么在东京地铁站投放沙林毒气的奥姆真理教为什么不叫“恐怖组织”?在马其顿杀人越货的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为什么不叫“恐怖组织”?

在巴拿马绑票国防军司令诺列加的美军陆战队为什么不叫“恐怖组织”？

相反，为什么秘鲁共产党武装“光辉道路”被称为“恐怖组织”，它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意大利共产党武装“红色旅”被称为“恐怖组织”，它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尼泊尔的毛派共产党武装也被称为“恐怖组织”，它又到底干了什么？

如果说这些武装力量让现政府感到恐怖的话，那么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让资本主义感到恐怖的！如果说这也要叫“恐怖组织”的话，那么中国、古巴、朝鲜、越南、阿尔及尼亚是不是要称为“恐怖主义”之国？

如果说奥姆真理教、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和美军陆战队都算不上“恐怖组织”的话，那么卡洛斯帮、爱尔兰共和军和本·拉丹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就是说，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对恐怖主义、恐怖组织有不同定义。正如作者坦承的：“什么是恐怖主义和什么是恐怖组织，只是一个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讨论的问题。”按照阶级分析法，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阶级营垒中。这种情况注定了人类不可能就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是恐怖组织达成共识；注定了“恐怖主义”要沦为强势者迫害异己的帽子、棍子，注定了所谓“反恐怖主义”要被政治化、游戏化——“搞恐怖的人自己在恐怖；什么让他恐怖就被称为‘恐怖主义’；谁让他恐怖就被称为‘恐怖组织’。”作者谦虚地称他只是费解，而“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但其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乐民”的质疑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的概念确实有一定相对性。譬如，两大敌对政治集团之间的暗杀活动算不算恐怖主义？这个问题就有探讨的余地。但“恐怖主

义”和“恐怖组织”概念的相对性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概念的相对性不等于“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概念可以漫无边际。“乐民”玩弄的主要花招,就是把“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概念的相对性绝对化,使得“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概念漫无边际,实际上是取消“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概念。其实,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诸如中国、俄国、古巴、美国——早就达成共识:无论宣称什么样的“信念”和“英雄气概”,只要以杀害无辜平民为主要手段,就是对人类的攻击,就是“恐怖主义”,从事此种暴行的组织就是“恐怖组织”!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底线伦理,这是“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概念的最后疆界!这是确定的,明晰的,绝不存在所谓“相对性”,绝不容许任何挑战!制造世贸惨剧的凶手不仅以杀害无辜平民为主要手段,而且是以大规模杀害无辜平民为主要手段,惨绝人寰,无论什么样的逻辑都不足以为之辩护。正如网友“南琛”所云:“你丫劫持飞机裹胁无辜平民撞击和平建筑,就是疯子,就是刑事犯,别和我说什么民族主义,任何主义都不能成为这个借口,共产主义也不行。”如果连这样的暴行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样的暴行不能容忍?人类秩序还能维持吗?人类还能共存吗?!

### 献给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的深情的颂歌

如此说“乐民”的辩护羞羞答答,至少承认恐怖主义不光彩,因此竭力反对将世贸惨剧与恐怖主义挂钩,竭力否认世贸惨剧制造者是恐怖分子。那么另外一些年轻气盛的“新左派”就坦率得多。他们毫不掩饰世贸惨剧的恐怖主义性质。但他们同时断言:恐怖主义不能一概否定。不能一般地、笼统地反对恐怖主义,而必须看

是什么样的恐怖主义,是哪个阶级的恐怖主义。如果是资产阶级的恐怖主义,帝国主义的恐怖主义,当然要坚决反对;但如果是无产阶级的恐怖主义,被压迫民族的恐怖主义,那么不仅不应当反对,而且应当大力支持才对。制造世贸惨剧就是被压迫民族的恐怖主义;因此是理直气壮的恐怖主义,是替天行道的恐怖主义,是正义的恐怖主义!所以必须充分肯定。一位叫“宋襄公罢了”的网民宣称:“恐怖主义也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反对强盗式的,专对老百姓的恐怖主义,却赞同专对帝国主义的‘恐怖主义’!”另一位叫“九月九”的网友也主张:“要分清正义的恐怖和非正义的恐怖,没有为恐怖而恐怖的主义。”“恐怖总是有原因和目的的,正义的恐怖是对非正义恐怖的反抗和斗争。我们坚决反对美帝的非正义的恐怖!”

“乐民”用阶级分析法将“恐怖主义”、“恐怖组织”概念模糊化,虚无化;以此让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逃避人类良知的拷问,其目的还仅仅是为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开脱。他的少壮派战友则走的更远:用阶级分析法将“恐怖主义”、“恐怖组织”概念二元化,以此不仅为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开脱,而且赋予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以正当性、神圣性,给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戴上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光环。美化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因此在“新左派”中成了时髦,互联网上响起一片献给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的深情的颂歌。

最早的赞歌是中国网民创作的《劫机者的遗书》。文章把制造世贸惨剧的恐怖分子想像为舍生取义的复仇天使——“为了避免更多的人流血,必须让喜欢血腥的人亲自品尝一下血腥的滋味。于是,我选择了和杀人者的标志一同走向毁灭。”北大网民“鄱阳湖”创作的《无畏者无敌——悼念“9·11”劫机英雄》,对恐怖分子的粉饰更是无以复加——

“9·11”劫机英雄们,也许你们现在还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吧;也许你们早已到达天堂,在天堂的某个庙宇里静静的安息吧。是啊,这一趟你们太辛苦了,是应该好好地休息了。

我并不曾与你们谋过面,不知道你们的姓名,不知道你们的国籍,不知道你们的信仰,更不知道你们的音容笑貌。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就是,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真正英雄!

我为你们祈祷!

在当今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强盗有着威力无比的武器,有着最强大的颠倒是非的舆论宣传工具,更有着无数泯灭人性、没有良知的帮凶。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良知和人性都是为强盗所预设的;对于弱者的苦难和悲惨,这些强盗和他们的帮凶是想不起“人性”和“良知”这两个词的,因为这时他们的人性和良知都被狗给吃了;而一旦他们自己的人受到一点应有的惩戒,他们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自己描述为上帝的孩子,好像伸张正义者就是上帝的弃儿。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婊子也知道给自己立个牌坊,强盗也想到要为自己的罪恶行径编制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所以,他们为自己的侵略罪行制造了许多动听的谎言,他们总喜欢说“人权高于主权”,“自由和民主是世界大同之道,自己就是世界自由和民主的先师”,等等,等等。于是,他们动不动就以这些东西为口号,对那些坚持民族正义的国家和人民进行猛烈的轰炸和无情的灭杀。所以,伊拉克那些瘦得皮包骨头的孕妇和孩子、那些因疾病而急需药物以减轻痛苦的病人,在这些强盗和那些所谓学者的帮凶眼里,简直就是一群行尸走肉,不值得半点的同情和怜悯。所以,斯拉夫民

族在遭受强盗 78 天的狂轰乱炸之后，不得不屈服于强盗的淫威，这个民族的败类甚至还将自己的英雄送进恶狼的嘴里。

现在，在上帝发怒之前，你们出手了。你们秉持上帝的意旨，手执公平、公正的利剑，义无反顾地刺向了强盗的胸膛……

“鄱阳湖”笔下的恐怖分子如此完美，较之当局推出的抗日英雄李向阳、解放战争英雄董存瑞、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形象毫不逊色。事实上，很多“新左派”人士的确把制造世贸惨剧的恐怖分子比做荆轲、李向阳、董存瑞、黄继光，以致素来稳重平和的老科学家陶世龙终于忍无可忍而严词痛斥——

荆轲刺秦王，此法并不可取，但他也不曾去杀秦国的老百姓，也不劫持人质，仅针对秦王，即俗语说的冤有头，债有主，一人作事一人当；黄继光是在正面的战场上，舍身为国自是英雄。恐怖分子专挑上班往来人多的时刻，劫持载有许多平民包括两岁幼儿的客机去撞击有世界各国人员在此的世贸大楼，造成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量死亡，是与人类为敌，与文明为敌，这些人竟用荆轲、黄继光来比拟，何等的荒谬与无知！

部分“新左派”人士自命为底层劳苦人民的代表，被压迫民族的代表，自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有着不可抑制的道德优越感，当然不可能承认他们的“荒谬与无知”，而要继续向世人展示他们的“荒谬与无知”。

### “用革命的恐怖主义抗击反革命的恐怖主义”

对恐怖主义的认同，发展到顶点，必然是公开鼓吹恐怖主义。部分“新左派”人士至此与恐怖主义合流。

张贴在自称“中华第一坛”的人民日报强国论坛的署名文章



——《暴民的反抗》，开篇即称：“暴民所以为暴民，是因为他们不甘心于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不甘心自己的劳动被掠夺，血肉被分剝。他们起来反抗这样的掠夺和分剝。”他们的成长和壮大“是上帝的逻辑，是人民的逻辑，是正义的逻辑。”在作者眼里，撞击纽约世贸大厦就是这种“暴民的反抗”：“革命的过程是逐渐地发展、演化和壮大的。在这反抗的初期，斗争还仅仅处于较低级的阶段。表现为痛恨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工具。在过去的劳资纷争中表现在破坏工厂和机器，在目前表现在破坏国际间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工具以及他们的‘机器’——世界贸易大厦和美国国防部。”而一旦这种简单的处于低等水平的反抗有了先进的理论作为他们的武器，“革命就会发展，就会进步，成为从根本上撼动和推翻国际间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最终决定力量。”那么谁来给那种“简单的处于低等水平的反抗”提供“先进的理论”呢？当然非“新左派”莫属。这是部分“新左派”人士为世贸惨剧叫好的又一重要因素——他们本来一直寂寞独行，世贸惨剧则突然向他们展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基础，他们掌握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的理论”似乎终于有了沃土。“新左派”理论从此可以与恐怖主义实践相结合，掀起“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他们如何能不欣喜若狂？在这部分“新左派”人士看来，世贸惨剧不仅是“暴民的反抗”的里程碑，更是他们与恐怖分子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的里程碑。世贸惨剧因此非但不是什么惨剧，反而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其意义简直不亚于俄国十月革命——

“世界贸易大厦倒掉了，他倒的好。所有关心底层劳动人民苦难的人都为此欢呼。因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一个顺民们成为暴民的开始，一个革命时代的开始，一个人类实现新跨越的开始。他绝不是某些人口中的什么‘恐怖主义’，他更是一个标志，一个新纪

元的标志。”

倾情颂扬恐怖主义、呼唤恐怖主义,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出自“中国民间马克思主义自由左派”、网民“真由美”之手。此篇典范之作的标题即为:《用革命的恐怖主义抗击反革命的恐怖主义》。“真由美”称:“当前,借着打击美帝的‘9·11’恐怖袭击,在资产阶级政客和买办走狗的鼓噪下,掀起了一个所谓‘反对恐怖主义’的浪潮,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我们无产阶级的态度。”他的“无产阶级的态度”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反对恐怖主义”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口号。其实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从根本上就是恐怖主义的,就是非人性的;一切资产阶级、封建专制独裁统治阶级都用无比的恐怖主义手段捍卫腐朽的统治。不能面对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恐怖主义束手就擒,接受这样的恐怖主义罪恶统治。只能也必须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恐怖主义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恐怖主义。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要消灭一切恐怖主义,实现一个没有恐怖主义的共产主义新世界;而要消灭一切恐怖主义,就不能放弃革命的恐怖权。作者最后激情充沛地号召与民族恐怖主义、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携手,建立“恐怖主义统一战线”——

“某些民族恐怖主义、宗教极端恐怖主义的力量,虽然并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恐怖主义都可能成为动摇整个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资源,因此,充分地利用恐怖主义的力量,从各条战线向着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动全面的进攻,彻底埋葬这个已经腐朽的旧世界,将是全球化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新任务。”

可见,中国部分“新左派”人士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理论流派。他们急于行动,急于实践,以至不惜饮鸩止渴,而与恐怖主义合流。走到这一步,他们与意大利的红色旅,与日本的赤军,与秘鲁的“光

辉道路”等极左恐怖组织,已经毫无二致了。漠视生命,暴力崇拜,不择手段,部分“新左派”人士的这些病症,在对恐怖主义的狂热呼唤中暴露无遗。

### 中国部分“新左派”人士的单相思

但是,究其实,部分“新左派”人士纯粹自作多情。他们构想的那样一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基础”并不存在。即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来观察,他们所崇拜的拉登,也不过是垄断资本家。他们所同情的塔利班,也不过是宗族封建主。他们根本就不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代表,根本就不是进步、正义的力量。恰恰相反,他们是另一种强权,而且是一种更野蛮、更反动的强权。正是这个更野蛮、更反动的强权,几乎完全剥夺阿富汗妇女的人权,一个六岁的小女孩遭到鞭打,仅仅因为她在公共场合携带着心爱的课本;一对堂兄妹,她们都还是孩子,因为在商店交谈被双双活埋。阿富汗妇女还不能听音乐、不能看电视、不能从事户外工作、不能用化妆品、不能穿紧身装、外出必须戴上长长的曳地面纱,稍有犯规就遭酷刑杀害。正是这个更野蛮、更反动的强权,向阿富汗东北部发动猛烈袭击之后,以当地平民与阿富汗联合拯救阵线合作为由进行大屠杀,整个村庄整个村庄地杀光,杀人还剥人的头皮。正是这个更野蛮、更反动的强权,炸毁巴米扬大佛,强迫印度教徒佩带标志。正是这个更野蛮、更反动的强权,让阿富汗早在1999年就取代缅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产国。这个更野蛮、更反动的强权,在国际社会同样多行不义,它支持车臣独立以分裂俄国,支持疆独以分裂中国,支持菲律宾叛乱武装谋杀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甚至要谋杀罗马教皇。这个最野蛮、最反动的强

权,事实上在与人类为敌,与文明为敌,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全世界唾弃:自建政以来,只有三个蕞尔小国与其建交;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其拒之门外;甚至世界回教大会也根本不承认其合法性。

塔里班统治的残暴,世所罕见,使得阿富汗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中国人民网记者实地报告:美丽富饶、生机盎然的赫尔曼德河谷已不再现,所到之处是干枯的牧场、没有水的河流、奄奄一息的村庄。由于生活所迫,人们远走他乡。以至阿富汗邻国不能不面临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难民潮。到底多少人流离失所?没有任何人能给出准确数字,但是据估计,这一数字不低于1000万。即便侥幸抵达国外难民营,也未必逃脱了苦难的阴影。据伊朗电台报道,巴基斯坦一座难民营从一开始就成了死亡难民营,几乎每天有10人死亡,到目前为止已有大约8万名阿富汗难民在上述难民营死亡。

这就是塔利班真相。塔利班彻头彻尾地复活了中世纪宗教统治,并要把中世纪宗教统治扩张到全世界。为此向现代文明开战,向全人类开战!服务于这种当今最野蛮、最反动的强权的宗教极端恐怖主义,居然被部分“新左派”人士美化为底层劳苦人民的代表,居然被部分“新左派”人士美化为被压迫民族的代表,居然被部分“新左派”人士视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基础。这难道不是对“新左派”理论的莫大嘲讽吗?这不仅意味着部分“新左派”人士品格的堕落——在人与兽、野蛮与文明的战争中,居然选择与兽、与野蛮站在一边;同时也是他们难成气候的一个风向标——因为难成气候,见到稻草就幻想成救生艇。

这一点,个别“新左派”代表人物自己也有察觉。张广天就承认,世贸惨剧发生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和部分“新左派”人士用望穿秋水的双眼期待战争爆发,期待美帝国主义重陷不义战争的泥

潭深渊,期待阿拉伯人民在圣战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期待超限战的特殊性迎来人民战争的再度辉煌,期待最后的罗马帝国由此崩溃。”但这种“圣战”幻想注定要落空——“弱小不畏强权并最终战胜强权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无视民生、草菅人命的宗族集团从来不可能赢得国家战争的胜利。……一个生活在中世纪黑暗中的国家,即使圣战的旗帜一时鼓动了人民,却最终不能鼓动没有地位、没有牛奶的战斗。这样的战争是一场悲剧,一场宗族集团主导的地主、资本家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少数人利益的争夺战。战争的成败都与劳动阶级无关:兴,百姓苦;亡,亦百姓苦。”张广天忠告:“把希望寄托在阿拉伯圣战出现奇迹的人士应该清醒了。肉弹和恐怖活动是战胜不了美帝国主义的,只有解放的人民武装起来,积极开展全民革命的战争才是埋葬剥削和压迫的汪洋大海。”

但是,那些正在走向极端的“新左派”狂人听得进自己的战友的这个语重心长的劝告吗?恐怖主义没能挽救车臣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同样救不了“新左派”。正义、人道的政治运动不需要借助恐怖主义,因为正义、人道本身就是力量;只有背离正义、人道的政治运动,丧尽人心、穷途末路的政治运动,才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沦为恐怖主义乃至是宗教极端恐怖主义的帮凶。一旦真的走到这一步,他们就成了人类公敌,自己取消了自己。

其实,“新左派”思潮并非完全与正义、人道背道而驰,他们呼吁社会公正,至少这一点值得赞许。“新左派”没必要自我作践,而与恐怖主义沆瀣一气。为此,“新左派”必须清理门户,与自己队伍中的恐怖主义狂人做坚决的斗争。

##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之评论

毛寿龙

自1978年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中国以生产和传播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中间,经历了若干次思想争论。某些争论与官方密切相关,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个典型,有关人道主义的讨论,也是有官方背景的。某些争论,则没有什么官方的背景,其所运用的术语的选择、所探讨问题的确定,都有其民间性,与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大不相同。这种民间性的思想争论或者讨论,比较著名的是1988年末到1989年初的新权威主义的争论。进入90年代之后,则有政府与市场的讨论,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讨论。到20世纪末,则出现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笔者自己是以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以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为逻辑,着眼于建设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稳定的制度平台,关注公共事务的治道变革问题。因为是这样定位,所以大体来说,笔者比较熟悉自由主义的文献,而不太熟悉“新左派”的文献。本文将以网络上能够看到的文献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理解,着眼于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角度,对这一争论做一个评价。

我的第一个评论是,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努力,还是“新左派”的努力,在话语体系上、在术语的使用上,都带有民间学术语言的性质,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于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因为知识的进步,有赖于语言和术语的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使知识生产和传播具有多样性,才能真正

反映复杂多样的现实,并据此积累丰富多样的知识,以适应于丰富多样的实践问题解决的需要。这一努力本身尚处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力之下,但无论如何,它都体现了中国学者力图发展民间学术语言体系的努力。

我的第二个评论是,无论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都借用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即使有些自由主义者比较注重中国古典文献和思想的自由主义资源,有些“新左派”学者的观点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西方话语体系的烙印还是比比皆是的。有人指责这是一个缺点,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种指责有其正确之处,但是也是不公平的。在笔者看来,这一思想争论在全球化时代借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实际上是难免的,而且这一努力本身就是中国化的第一步。因为如果中国学者能够发明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应该说早就发明了,正是因为我们尚不具备开发具有中国特色思想学术语言的能力,所以才需要借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更何况,从文化渊源上来说,西方思想学术话语体系,到底是否是纯粹“西方的”,还是某个国家的,也需要进一步考证。笔者曾经先后访问英国和美国,发现英国学者写作的英文书籍与美国学者写作的英文书籍,虽然同是英文,但其所用的话语体系也并非没有差别。美国学者与英国学者的重大差别在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都是本国的问题,同样是一本政治学导论,英国人写的是英国人的问题,而美国人写的则是美国人的问题。即使同样是美国人,许多人可能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是社群主义者,但是他们并不如此自称,有些人喜欢联邦主义者,或者另有自己的学术用语。1996年新出版的《政治学手册》,既概括了美国政治学界的基本术语,也概括了美国政治学界方法、理论、价值以及研究框架的差异。在全球化时代里,中国学者所运用的话语体

系与国际接轨,并在此基础上具有自己的特色,走出自己的路子,是必然的趋势。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者或者“新左派”,或多或少都会有所贡献。

我的第三个评论是,如果说在80年代,中国思想学术界还有一个所谓“整体的界”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已经逐渐分化瓦解,再也难以轻易地进行概括了。现在有谁能够用一篇文章来概括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走向?应该说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全面了解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走向,因为在90年代,各个学科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有大量的新著、大量的论文,还有许多没有出版的但不见得没有价值的学位论文和专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就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要完全把握其基本发展的资料,也非常困难,更何况讨论整个思想学术界的情况了。思想学术发展的学科化,每一个人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研究问题、分析框架的专业化,是90年代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重要趋势。这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进步,虽然还没有发达到像美国那样的地步。尽管还有许多学者在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不同学科的学者也在试图进行相互交流,就共同的问题进行对话,但是进一步的分化发展,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都是在这一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努力,试图摆脱学科化、专业化发展的影响,试图就基本的价值、基本的问题,给出基本的立场、观点,甚至是基本的政策方案。这种努力是可贵的,有利于在分化发展的基础上使大家关心重要的问题,努力进行新的沟通、新的综合。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的努力,依然是有价值的。

我的第四个评论是,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都有重视思想轻学术的倾向。学术的确需要思想,如果没有思想,只是力图搞科学研究,未必一定能够有价值,但是否定学术,只是重视思想,



重视人文关怀,往往导致各种各样的悖论。比如“新左派”主张公平,但是由于不重视学术问题,只是提倡公平,其结果很可能倾向于用损害公平的方法来实现公平。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主张自由是最基本的价值,但是由于不重视学术问题,不重视技术研究,其结果也会是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最后所要实现自由的手段选择往往导致损害自由的结果。想要公平却损害了公平,想要自由却实现不了自由,这是只重视思想价值而轻实证性学术研究所必然导致的悖论。根据中山大学袁伟时的总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资本主义与中国;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要什么样的现代性。根据袁伟时的看法,即使在这些问题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其相互之间的争论都缺乏相互了解。自由主义者不太明白“新左派”到底是什么思想,“新左派”也往往只是了解自由主义者的部分观点,在缺乏相互了解、相互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争论,即使进行思想争论,而不是学术争论,也往往使得争论本身不像个争论,而像是在打口水仗,难以真正组织像样的争论。这一分析的政策建议是,要使思想争论有学术研究的基础,使思想争论本身也奠基于严格认真、全面深入的资料把握基础上,而不仅仅是口水仗。

我的第五个评论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的确引起了各个方面的注意。但是,它是否就是当今中国思想学术领域最为重要的争论呢?恐怕也不见得。它有一定的名气,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一争论是当代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主流”,它或许只是因为在当前中国思想学术领域缺少争论才显得比较显目。据有关资料,中山大学学者袁伟时最近正在编选这一争论的资料,他的看法是,这一争论并没有涉及中国最大的问题,他们都是学者,与官方谈不上有关系,与国际政治势力也扯不上关系,充其量是“茶杯中

的风暴”，口水仗而已。袁伟时的定位是正确的。当然，中国思想学术发展是否存在主流，本身就值得考察；一个思想争论是否必须处于核心的地位才能对学术思想的发展才有所贡献，也不一定。或许正是这种既引人瞩目但又处于边缘地位的情景，才使得这一争论能够比较轻易地保持思想学术争论的性质。恰恰是这一争论本身就是茶杯中的风暴、口水的仗，才使得其能够对于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有所贡献吧。

我的最后一个评论是，在中国，除了较少数的时期之外，思想学术争论一直是稀缺的。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的争论时隐时现，往往难以摆脱政治的影响，从而难以真正有贡献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一争论虽然处于边缘地位，但也难以完全摆脱现有政治格局的影响。不过，无论如何，它的确给缺乏争论的中国多了一些争论的实践。为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尝试着开辟了一篇开放的公共领域(res publica)。当然，这一争论也并非净是优点。就如袁伟时所认为的，这一争论本身也暴露了一些学者的缺点，参与争论的一些学者，相互之间不查对方的文献，缺乏文献基础；提出观点或者指责对方，往往不举证或者断章取义，败坏学风；有的文章甚至破口大骂。袁伟时目睹此类现象，“心里很不好受”，他认为，“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缺陷，而是一种风气。大约从我这一代50年代人上大学的人开始，直至现在的有些青年学者，既没有传承传统士阶层的修养，又没有受到足够的现代学者风范的训练，于是问题迭出。”他建议，“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起来，自觉抵制和纠正这类不正之风。”

争论是稀缺的，所以争论是可贵的；但是真正可贵的争论，应该不仅仅在于它本身的争论性质，还应该在于它是讲求质量的，有利于发展的。在新的世纪里，希望见到更多的、更为坦诚的、更为

开放的、更讲究规则的、更高质量的思想或者学术的争论。只有有了更多的思想或者学术争论,有关思想或者学术研究的开放的制度平台才能够逐渐得以演进,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发展,才能有开放、自由、稳定的制度平台。

(2000年6月24日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感谢李梅阅读文稿,修改文句,使本文变得更为可读)

## 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与当代中国“问题”

秦 晖

近年来，“主义”之争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我认为，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和它们在西方语境中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讨论之前有必要把这些概念梳理一下。

在改革以前我国施行的是一种类似于斯大林模式的体制，而在西方有它的左派思潮，“新左派”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的。在欧美的话语系统中，他们讲的“老左派”指的是共产党和社会党，但是西方大部分国家中共共产党的势力都不如社会党，因此“老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社会党。比如说在美国，“老左派”指的是以哈灵顿为代表的社会党人，就是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共和人民党。这样哈灵顿就被认为是美国“老左派”的代表。所谓“新左派”就是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不同的另外一种（在美国带有一种雅皮士式的）左派。在欧洲话语中“新左派”指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倾向，包括现在的布莱尔、吉登斯等标榜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道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既不要福利国家，也不要自由放任。他们讲的“老左派”是以社会党国际为代表，在西欧、北欧执政的社会党的理念为代表的那种思潮。

与此同时存在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在欧陆叫自由主义，在美

国叫保守主义。美国主流学术话语中的保守主义是和欧洲话语中的保守主义不同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就是欧洲的“自由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是个人自由,而欧陆的“保守主义”在美国被称为“托利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正是美国革命革掉的那些东西:贵族传统等等。),目前这几年在欧美话语中流行的“新左派”也就是90年代社会党国际中流行的“社会自由主义”(布莱尔提出“新工党”理念,就是自由主义化的工党理念)。与此不同,中国90年代以海外华人学者崔之元等倡导的所谓“新左派”立场实际上是在中国原有的斯大林体制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取一个折中。这表现在他们一方面在中国非常强调在改革以前的体制中吸取资源,比如说,认为“人民公社”是经济民主的典范,“文革”是政治民主的典范,等等。当然他们也讲了一些西方社会民主的内容,如伊索普模式(雇员持股计划)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过去正统的理论有所不同。另外他们吸收的思想资源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来自社会民主主义,而是来自西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与社会民主思潮有很大的不同。许多中国人都误认为“西马”和社民党差不多,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非常大。“西马”就其产生的思想理路来说,它发源于已经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传统决裂后的第三国际内部的一支异端,以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为代表,虽然与第三国际正统有异,但与社会民主传统却没有因此接近。葛兰西等人当初与俄国人的分歧主要是形而上的,即反对唯物主义,更强调文化自觉、阶级意识等类似“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显而易见,这里潜藏着一些比俄国人更“左”的苗头,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对中国毛泽东式的主观浪漫主义感兴趣,并不完全是对我国现实的隔膜,也有形而上的根源。这在欧美自由社会中作为一种批判的声音自有其价值,但这些资源再被传

入中国后,它和斯大林体制之间的距离要近于它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距离。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在斯大林体制和“西马”之间,而不是在斯大林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当然更不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这就是中国话语中的“新左派”。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点:中国的“新左”和西方的“新左”有很大的不同。

就中国的情形看,这两种“新左派”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显然和中国“新左”不同,与他们在种种事实上有不同的判断,对他们承继的两种资源也持否定的看法。另一方面,我们与西方的“新左”也有明显的不同点:西方的“新左”取一种既不同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他们完全不同,中国现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福利国家太多,因此我们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福利国家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福利国家。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不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其基本的价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有明显的价值重合。

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价值重合面,它们共同对付反自由主义反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而自由主义赞同而社会民主派反对的价值与社会民主派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这两部分都很小。这里讲的价值重合面主要就是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价值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而并不是什么两个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最近《天涯》杂志发表了 my 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韩文版序,这篇文章原题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但编辑部没有改动

文章内容,却未经我同意把题目改为“我的第三条道路”。两个主义重合的那些基本价值决不等于两个主义之外或“之间”的“第三”立场。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重合部分,在缩小,而两者价值歧异,观点对立的部分,在扩大,同时作为两个“主义”之共同敌人的(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分离,这时才可以说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比自由主义“左”而比社会民主“右”的那种立场才有了发展余地。而我们现在的立场用语言表述就是,我们赞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基本价值,而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反对的那些价值。在中国的环境中,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存在着主要的重叠之处。我们就是站在这些重叠之处的人。我认为这也是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基本价值。而我们反对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赞成的那些东西,即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

至于自由主义赞同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价值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我们认为对目前中国人来说还是假问题。比如说,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争论的一个重要点就是关于工会权利问题。在西方话语中,最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之一来自工会(这里指的当然是民间工会,而不是官办工会),但实际上正如我们以前在东欧看到的:在一种与哈耶克所处环境完全不同的条件下,真正的工会力量的强大并不是对个人的威胁,恰恰相反,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促进。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工会和自由个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反过来讲,自由主义支持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东西,如美国那种充分竞争的规范化自由市场,在今日中国也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自由竞争不限制就会危害“平等”,而在我们这里危害平等的根本是另

外的东西。

这里要指出,强调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底线的优先地位,这与所谓历史决定论并无关系。如今有个有趣现象:一些“新左派”对马克思的反感似乎比他们所说的“右派”还大,他们在津津乐道于“文革”、大跃进的同时,张口闭口批判马克思的“西方中心论”;在津津乐道于“后学”“前沿”的同时,一提到马克思就是“科学主义”谬误、“历史决定论”与“机械进化论”的过错。有时他们甚至宁可从“保守主义”那里借用非理性、民族性等武器,而批评“右派”没有和马克思划清界限!

葛兰西以来的“西马”主流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无论其他方面如何对立,在批判马克思(尤其是晚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性主义倾向方面却存在着有趣的一致性。“西马”以浪漫主义、哈耶克以经验主义来抵制理性主义的僭妄,这或许反映“后现代”西方对启蒙理性的过分扩张之反感已成为超越左、右的潮流。对此我们应当怎样看,这是一个问题。然而中国“新左派”的反马克思却没有这种后现代背景,他们的反感只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论为肯定资本主义优于中世纪提供了理由。

然而事实上,19世纪的人们,包括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之敌视中世纪而向往公民社会,不仅是出于唯理主义,更是出于人道主义。这与“历史规律论”是否成立,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简而言之,“交换”比“抢劫”要好,这是人道的常识,它完全不必以证明从“抢劫”发展到“交换”是“必然的客观规律”为前提。“交换”也许并不高尚,它不是“慈善”,然而一个抢劫横行的世道是决不会有兴旺的慈善事业的,因而禁止抢劫就成了交换者与慈善家的共同底线。这与他们相信不相信历史决定论毫无关系。没有底线伦理,高尚道德就不可能站得住脚,如果说这也叫决定论



的话,那它也是一种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决定论,而不是什么“历史决定论”。因此,真正的慈善家(不论他是“新”的还是“老”的)必然比交换者更激烈地反对抢劫;而如果一个“慈善家”竟然认为“抢劫”比“交换”更可取,“交换”比“抢劫”更可恶,他当然会被怀疑为伪善,甚至被怀疑为劫匪的同谋。这与“否定的否定”无关,更不是可以“反对历史决定论”来辩解的。

总之,在中国目前存在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坚持的价值和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用诺齐克的话说:自由竞争的自由度是不应该受限制的,也就是说,我们假定“获取的正义”——一个人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此后又坚持“转移的正义”:它后来的每次交易也都是自由公正的,既没有强制也没有欺诈,则这个人的财富就是积累到富可敌国的地步,也无可非议,但是这个过程只要有一个环节出毛病,诺齐克认为就可非议了。他坚持“正义”是个完整链条,只要有一个环节不正义(比方说最初的资本是抢来的),那么即使以后的交易都是正当清白的,都是自由交易,其结果也是非正义的,是不可接受的。他提出要以“矫正的正义”对此进行匡正。诺齐克这个观点,受到很多批评,其中既有来自自由主义以外的,也有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的,比如罗尔斯就不同意他的这种看法。罗尔斯认为,即使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以后的积累也是光明正大以正当行为获取的,但是积累太多了,国家还是要以二次分配来调节的。

这种争论我认为并不是中国当前所需要关心的问题,因为中

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最初财产来源清白而以正当手段积累发展到相当的水平需要限制的问题,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不少财产的最初来源就不清白,以后财产的积累也不是按照自由竞争的公正方式建立起来的,这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坚持诺齐克式的立场。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在目前的中国还可以算作一个假问题。中国现在的贫富分化或社会矛盾并不是完全公正致富的人与比较穷的那部分人的矛盾。在中国现实中大量存在着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能赞成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不是说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赞成的,我们就要表示异议,当然不是如此。中国是有些完全特殊的東西。比如,在婚姻与性方面,西方保守主义是坚决反对堕胎的,左派则是坚持堕胎自由,但反对强制堕胎。而中国存在的并不是有无堕胎自由的问题,而恰恰正是如何看待强制堕胎的问题。这个事例显然超越了西方左右派之争的范围。在另一方面,西方的左派在大力争取“同性恋”自由,而西方的右派是反对同性恋自由的。但即使右派,也只是反对同性恋自由,决不会反对异性恋自由,左派就更不用说了。然而在中国不是同性恋自由的问题,就是异性恋自由也还有重重阻碍。大家知道,不久前引起争议的“新婚姻法”修订稿就有很强烈的呼声,要求在“新婚姻法”中加入“配偶权”的概念,就是类似于“通奸罪”这样的概念,等等。这又是超越了西方的左右派之争的范围。“激进”得连西方的左派也害怕的强制堕胎,“保守”得连西方右派也害怕的通奸罪,足以表明中国的特殊性。不是说我们要一概反对特殊,如我是坚决反对设立“通奸罪”的,但对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在我国当前人口危机已经亮起红灯的情况下,就得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抵制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能容忍的东西。例如,西方左派主张“福利国家”,西方右派是反对的,左派主张扩大工会权利,右派是反对的。可是我们现在的福利保障水平之低不是权利大小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在这方面,不光是社会党的价值观不能接受,就是保守党的价值观也无法容忍。最近我国的一些学者到英国去访问,他们与保守党人士座谈。英国保守党人士对中国下岗工人的政策提出很大的批评。他们回来以后感慨地说,且不说工党怎么看我们的政策,就连保守党也觉得无法容忍。再比如农民问题,农民是我国国民的主体,他们的社会保障之少不仅超过社会党人的想像,而且超过保守党人的想像;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就业自由之少不仅超过自由派的想像,而且超过社会民主派的想像,在这种问题面前西方式的现代左右派之争还有什么意思?

另一方面,我们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已严重突破诺齐克原则的底线,他们实际上认为“抢来本钱做买卖”也是无可厚非的。某些学者还把它上升为理论,成为一种直接与诺齐克正义相对立的观点,叫“交易先于权利”,它的实际涵义是对于现在产权不明晰的资产是可以供有权人来任意交易的,也就是说把诺齐克的“获取的正义”给否定了。在诺齐克那里“权利先于交易”,获取正义优先于转让的正义。首先要解决了产权的公正设定然后才能谈得上自由交易。而如果产权是公共的,我作为一个掌权者,作为公共资产的看守者,我就任意拿这笔资产做交易,这从常识来说是不正当的,但却被很多人认为是正当的,这已经超出了诺齐克正义所许可。这是因为中国自由主义话语中一些问题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交易成本”理论在中国目前的使用问题。

反过来,中国的一些“新左派”却明确提出对“最初资本来源清

楚,其后的交易也自由公正”的致富者也要实行限制与打击。别人不同意,他就质问你是否愿意堕落到诺齐克那样的地步!这真叫人啼笑皆非,难道他不知道在今日的中国,诺齐克的正义标准已经是高不可攀的了吗?

对于这样的人,你用诺齐克式的理论去批评他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会说,我本来就讨厌诺齐克。反过来,对那些支持“抢来本钱做买卖”的人你用福利国家理论(更不用说用马克思的理论)去批评他,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会说我本来就讨厌福利国家。所以对第一种人你必须使用社会民主理论去批评他,而对第二种人你必须用自由主义(而且是古典自由主义)批评他。这样的批评模式或许在西方人看来有些奇怪,但却正是“中国问题意识”所要求的。

我们完全可以提出一种既不同于中国式的“新左派”也不同于西方式“新左派”的立场。也就是我们不仅要做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原则的互补,而且还可以做到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互补。这是因为,不论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它们最初都是作为西方国家在走出中世纪时,在争取个性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早期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而且它们在一个大方向上——反对共同体的束缚方面这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在走出中世纪时在相当程度上他们的价值是重合的,重叠部分以外的部分较少,随着社会越来越向市民社会过渡,自由秩序的建立也就越来越成为现实,这两者的距离也就越拉越开,他们之间共同重叠之处就逐渐变小。到自由秩序完全建立以后,就产生了一种话语上的两极化;也就是否定自由秩序和肯定自由秩序已经成为一种逻辑上的紧张关系。最典型的就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

义之间的冲突。哈耶克思想的主题是“自由秩序”虽有毛病,但它是人类可以建立的最好的秩序。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不要想入非非,不要做这些那些,否则我们就会失去“自由秩序”。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自由秩序”有很大的弊病,我们要解决它。

现在的问题是,在西方经历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衰落以后,现在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在趋同。相反,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话语倒弄得水火不容,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以至于发展到中国的“新左派”批判的矛头不仅仅一般地指向自由主义,甚至也指向社会民主主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中国“新左派”从1997年开始大量使用从西方引进的“社群主义”观点不是批评诺齐克,而是批判罗尔斯。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中国这些所谓“左派”对罗尔斯比对诺齐克更不能容忍。

相反,中国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批判对象,不是罗尔斯,不是社民党,而是诺齐克,亦即他们批得最厉害的是自由主义中最古典的部分,人为地把张力拉得更大。因此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制造了许多伪话语。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在产权制度改革这个问题上,现在中国出现了两种很奇怪的声音:一种声音是很多“新左派”学者主张实行所谓“民主治厂”,就是要限制产权明晰化的倾向,具体提出的模式是“鞍钢宪法”。他们认为鞍钢宪法中“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后福特主义”。有人说“丰田公司”“沃尔沃公司”实行的就是中国的“鞍钢宪法”。这些人主张在产权已经明晰化的资产中,在私人物品领域中实行公共选择、公共参与。

实际上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应该说“民主化”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在发达国家,在民主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比较发达的国家,所有者在企业经营中征求非所有者或叫“利益有关者”的意见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最终决定权,作为市场经济本身的原则,应该是所有者或者所有者委托的人来负责。道理很简单,对财产负有责任的人才能对财产行使权力。这是个权、责、利相统一的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对财产不负责任的人干预、决定财产的经营能取得好效果的例证,这不仅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如此。我们“文革”中“鞍钢宪法”式的企业状况就比苏联一长制下“马钢宪法”式企业状况要糟得多。

但是与这种对私人领域实行公共选择的要求并存,我国又存在着很多对公共物品领域实行有权者“自由交易”的呼声。有些人不是主张在企业经营中实行“一长制”,而是主张在产权改革过程中,也就是在把公共资产变成个人所有的过程中,也要实行“一长制”,即把“一长制”原则从经营管理泛化到产权明晰化过程中。这是任何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等于说,现在掌握在手中的公共资产,我想给谁就给谁。这个原则一旦成立,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现在的确在中国产权改革中存在这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产权改革中应该实行“一长制”,应该由一个绝对权威想给谁就给谁。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交易成本”最低。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产权早已明晰的那些资产,应该是大家说了算,本来就是私人所有的那部分财产,要由一些不相干的人去插一脚。以“鞍钢宪法”为旗号主张“民主治厂”的人,以及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旗号主张在产权变革中实行“一长制”的人,目前在中国大有人在。但是恰恰就是主张产权制度改革要民主,管理改革要集中的这种呼声在

中国是最弱的,即主张在私人物品领域自由交易,在公共物品领域民主选择的观点最不成气候。其实,一方面在企业经营中尊重所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产权明晰化的过程中要实行公共决策、公共选择。这道理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原来的财产是公共的,现在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应该是公共事务,而不是个人决策。已经明晰了,你就既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委托代理,你可以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但决定权还在所有者个人。但如今这两个常识都受到强烈的挑战,这是中国目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打着“经济自由主义”旗号否定诺齐克正义的寡头,另一方面是打着“左派”旗号对罗尔斯原则的否定,一方面对产权改革中的民主有很大的阻力,另一方面也有对正常市场秩序中的所有者权利的忽视。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产权改革就不能正常进行,另外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营。

我常用马克思的观点反驳“新左派”,用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反驳权贵资本主义者。有人认为这如何能统一?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统一。我举一个历史上的案例。1905年以前的俄国,它的经济,尤其是农业实行农村公社制度,实行土地公有,劳动组合,在政治上实行专制。这时的俄国思想界出现了四种思潮,一种是持当局立场的正统专制主义,即乌瓦洛夫称之为俄国民族性的三原则: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种是下层的代表反近代的民粹派,他们认为俄国土生土长的村社是好得了不得的东西,沙皇政府的一切弊端就在于他们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瘟疫,本来沙皇政

府只发扬民族传统时,就是好沙皇,不幸的是他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的歪门邪道(这就像中国一些人认为我们的政府需要批评之处,在于他们引进了西方的殖民话语)。俄国思想界的另外两种思潮是以从民粹派中决裂出来的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思潮和以米留科夫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1905年以前,俄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形成了一种反对民粹派和专制主义的联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00年前后这两派人合作编的许多书,如《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等等。参与者包括司徒鲁威,约诺夫,列宁,普列汉诺夫,他们明确讲,这是双方的“文字联盟”。这个“文字联盟”就是针对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的。

这时俄国社民党人的话语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上和自由派没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在经济上社民党1886年纲领没有对土地私有制提出任何批评,它只提出一项要求,要求给予俄国农民退出公社的自由,在他们与民粹派进行论战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名言:俄国人现在已分裂成两个阶级,这就是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普列汉诺夫认为当时俄国的矛盾,是共同体与自由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政治方面,从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一直有批判西方自由的强烈传统,其理由是这种“抽象权利”不能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而穷人没有钱就很难行使权力。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名言说:言论自由有什么用,贫穷的人上不起学,不能看报纸,言论自由就和他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西方人所宣扬的,无非是有一个用金碗吃饭的自由,但穷人无钱买金碗,因此这个自由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可以用一个银卢布甚至更贱的价格来出卖的、没有价值的权利。”对这种言论,包括列宁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列宁曾大骂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思想”。普列汉诺



夫更明确地讲：“‘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当今俄国人民最需要的”，而俄国式的所谓“村社平等”才真正是骗人的东西。

那么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何处呢？如果完全一样，就构不成两个不同的派别。区别在于：第一，社会民主派在体制演变过程中，更多的强调下层的利益。比如大家都主张要瓦解公社，实行自由农民和自由地产制度。但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把权贵们化公为私的那部分土地无偿追回——即“收回割地”。自由主义者比较缓和，他们认为应采取赎买的方式，但是这个赎买和“收回割地”也差不多，首先不是自由讲价，而是由国家定价；其次赎金不是由农民付，而是由国家付，国家用很低的价格从地主那里把割地（不是传统的私有土地，而是1861年改革后权贵霸占的公社土地）拿过来，然后无偿地分给农民。亦即在“公平分家然后自由竞争”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区别，但在实现这一点的手段上，后者更为激进。第二，在自由秩序实现以后，自由主义认为就算尽善尽美了，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做到这一点后，他们还要搞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后话。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这一时期，也就是俄国自由主义和社民主义形成联盟的时期，俄国的历史发展应当说是正常的。这个发展和旧制度的冲突到了最尖锐的时期就出现了1905年革命。1905年“事件”按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他们领导的革命，现在历史资料证明，当时基本上是以自由派为主体的立宪运动。它的主导力量是杜马中的自由派，用当时列宁的话说，俄国出现了“最革命”的杜马和“最反动”的政府之间的冲突。这时杜马是由立宪民主党领导的，它在经济上要搞自由小农经济，政治上要搞宪政民主。在这一点上俄国社民党和

自由派差别不大,只不过社民党更强硬些。1905年“革命”被沙皇镇压下去了。在镇压过程中把沙皇政府中的开明派——维特踢了出去,换上了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上台以后,把社民党和自由派都一耙打下去,当初人们认为,俄国会出现全面大倒退时期,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斯托雷平时代在政治上是专制的反动时期,在经济上却发起了“最激进”、“最勇敢”、“毫不妥协”的改革。他用政府权力,用充分满足权贵的办法来对农村公社进行了大规模的解散。实际上就是家长(联合“长子”)独霸家财,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去,用这种办法来瓦解大家庭。结果就使俄国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时走向没落:一方面许多自由主义者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发展为对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不公正做法的认同。最典型的就是《路标》文集的出版,该文集对1905年以前的自由主义进行了反省,认为此前的自由主义太激进,老是过激的要求自由,实际上最可怕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决不敢幻想与人民结合,我们应该感谢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遭疯狂人民的迫害。”文集作者之一格尔申宗这样说,在这个基础上自由主义已经从原来的立场退到了寡头权贵的立场上。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民党人到1905年以后,由于斯托雷平不公正改革激起的反改革思潮,形成了民粹主义的大复兴。在“回到村社去”的下层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发生了最重要的分化;一部分社民党“超民粹主义化”。最典型的代表是列宁,列宁基本上把1905年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来了个大颠倒。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村社民主是最虚伪的,西方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后来他又讲西方民主一钱不值,是“清谈馆”,而民粹派的那一套公社主张才是“民主革命的最高形式”;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俄国最大的灾难是

农村公社,1908年却不断地强调对公社的破坏是俄国最大的灾难。十月革命的“土地纲领”是拿社会革命党的,而当时他们对社会革命党的批评,说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俄国社民党的这一派走到了比社会革命党还要社会革命党的地步。

这样一来,就使俄国出现了“反公正的伪竞争刺激起了反竞争的伪公正”的现象,由权贵资本主义刺激出了“人民专制”。这场“人民专制”带来的后果到了90年代以后,俄国又一次面临着从“人民专制”返回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这里我们感觉到中国目前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是虚假的。但是,真正的矛盾是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应和“寡头主义”划清界限,二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应该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

我的一个提法是:“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针对寡头主义的辩护者,我们要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公”的原则;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提出“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的原则;针对寡头主义,我们提出的是“产权制度改革”要民主的原则;对于民粹主义我们提出的是“管理改革”要集中的原则。

寡头主义反对乌托邦却不反对强制(化公为私的强制),而我们强调旧体制的弊病不在于乌托邦,而在于强制。因此告别旧体制不是告别乌托邦,而是告别强制。反之,民粹主义反对市场,但也不反对强制(化私为公的强制),而我们认为现在的弊病,并不在于市场,仍然在于强制,因此现在不是要限制市场,而是要告别强制。在如今的改革中为市场辩护和在评价过去的体制时为乌托邦辩护,都有一个中心观点,就是反对强制,也就是维护自由。

反对强制的自由,是关于自由的低调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理解不限于这个低调,但仍是以这个低调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承认自由不仅仅是反对滥用强制,但首先是反对滥用强制。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性的化公为私,反对“权贵私有化”,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化私为公,反驳“人民公社就是经济民主”的说法。

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不公正的伪竞争;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正;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坚持起点平等,过程公正,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对“结果平等,主人恩赐的公正”持坚决反对态度;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以“交易优先”为由,否定诺齐克正义原则,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以“社群主义”来否定罗尔斯正义的做法说。总之,第一,我们反对原始积累、用强权进行的积累;第二,我们要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中竞争,应当指出:由于中国现实中存在的这些真问题,因此,不管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还是自由理论,都面临着挑战,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先例的过程。第一,中国并不是在传统私有制国家的基础上,而是在公共资产为主的基础上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对政府的要求和传统私有制国家不同。传统私有制下国家搞市场经济,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说,对政府的要求就是一个有限政府。所谓有限政府就是不要多管闲事的政府,大量的事情由市场解决,政府只限于维护市场,只限于当竞争场上的守夜者,至于这个政府是不是民选的,这与市场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认为民选政府就是有限的政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民选政府也可能什么都管,世袭政府也可能无为而治。这两种情况我们在历史上都见到过。对传统

私有制基础上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只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建立市场竞争机制的规则,再无须解决其他问题。

中国则不同,由于她是在公共资产高存量基础上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除了要建立市场竞争的秩序外,更重要的是面临产权或交易权初始配置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这样的国家面临着“卖方缺位”的问题,就是说以公共名义持有的资产要进行一场交易,而这场交易不是由所有者来进行交易,因为所有者是公众,并不是有权的人,有权的人只是公共资产的“看守者”。严格地说,他们没有交易资格,因为他们不是所有者,但是由于技术的原因,所有者——公众不能直接参与交易,这样就产生了代理交易的需要。在这样的改革中,人们就不能仅仅要求政府是个少管闲事的政府,而且还要求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严格的委托代理交易机制。第一,做这种交易,政府要取得公众的授权。第二,政府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只有在这两个条件下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才是公正的改革,否则就容易沦为看守者监守自盗。这种公众选择代理,监督交易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政治民主制。在这种条件下,自由主义立场与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就更易于取得一致。在传统私有制国家,自由主义也许比较强调市场竞争的自由,而对政治民主的兴趣相对较小。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那里要强调起点平等就有个“劫富济贫”的问题。传统私有制国家,在漫长的积累过程中,起点已经不平等,要从头开始就要搞革命,人为地恢复一个“平等的起点”,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社民党的“平等理念”,这一点自由主义就不会答应。

然而在“看守者交易”的条件下就不同了,前计划经济国家,私人产权是从无到有产生的,并不存在着一个以“劫富济贫”来实现“起点平等”这样的前提,它只需要防止“抢来本钱做买卖”就可以

做到起点平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天然地更易于承认竞争自由、个人权利。反过来讲,在这种条件下没有选择代理,监督交易就不可能有诺齐克正义,这样,自由主义者就天然地更易于承认民主与起点平等原则。总之,这样的条件下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应当比传统私有制国家更易取得一致。而它们与民粹主义、寡头主义的斗争才是转轨过程中最大的真问题。

## “新左派”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萧功秦

从80年代到世纪之交的20年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两次思想分化,第一次是80年代末的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思想论战,第二次是90年代末以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思想论战。正是在这一思想分化的基础上,在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在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治选择与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重要国际与国内问题上,形成自由派、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三种不同的价值与思想倾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分层化日益明显,随着经济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平日益严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新左派”思潮日趋活跃。“新左派”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提出公平、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诉求,然而他们把当代中国的现实的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的问题来予以评说与认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抱有相当积极的肯定,对当今中国融入市场经济与全球化主流的总趋势提出质疑与挑战。

一种新思潮的出现,往往深刻反映了社会面临的困境。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一思潮的研究,来认识这个社会面临的矛盾、问题与困境。本文在分析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背景上,来阐述“新左派”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以后的两篇文章里,我将进一步考察“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主要学理资源、理论依据,“新左派”内部的温和与激进派,他们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何在,“新左派”思想的思想缺

陷,最后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可能的影响,作出若干预测。

作为一个思想研究者,我力求尽可能客观地考察他们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及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对他们的追求公平的道德正义感抱有尽可能的同情理解,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对他们的思想谬误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思考。最后,本文将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分化与中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几种可能作若干预估。

### “新左派”产生的背景与基本思想理念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贫富分化,权钱交易与腐败等社会不公问题逐渐突显出来。这些问题已经引起知识分子普遍的关注。怎么看待这种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不公平与两极分化?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消极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中国存在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企业重组与股份化中的“过程不公平”,将由于资源的市场化的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治选择。一切现存的问题与矛盾都有其不得已的原因。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程度不一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只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只要改革与开放方向不动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完善,在加强权威控制的效率的同时,通过健全与完善法制建设,现实中的这种种不合理现象经过社会共同的努力会逐渐克服。他们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任何对这种稳定的破坏,都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主张的人中有新权威主义者、现体制的既得利益教者与自由派右翼。某种意义



上,这一观点往往被“新左派”认为是代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

第二种是自由派中间派的观点,他们对权力腐败,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也是相当强烈的,然而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造成的,而是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期间,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而造成的,或者甚至干脆说就是权力介入了市场所造成的,是政府的“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而造成的,所有这一切新问题的根子,还是源于权力过于集中的旧体制,他们认为,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极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

如果把第一种与第二种观点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肯定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权威的效率来解决,后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民主制衡的方式来解决。

第三种是“新左派”,“新左派”把这一切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认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来的现象。大体而言,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1. 中国现在出现的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既然资本主义是祸害的根源,那么,就可以把西方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用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他们认为,“资本”是对“人性与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与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就意味着“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1994年时就有一位从美国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博士讲过这样一个相当鲜明的观点:“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这一观点虽然过于简单

与极端,但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新左派”的价值趋向。

2. 他们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新左派”人士对公平分配的强调,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走向对左翼的平均主义的肯定。“新左派”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认为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与“私有制”相的联系必然产物,要从根本上防止人的异化,就应该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民主管理。

3. 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用他们的话来说,“毛泽东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孤独的充满了众叛亲离的悲剧色彩的探索,终于在这世纪之交,引起了一大批后来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不等于左派的路线与思想理论的失败。他们还认为中国要走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位“新左派”人士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表达如下惊世骇俗的观点:“‘文革’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道路、沿着‘文革’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并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可以大体上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

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由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矛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与思想资源对这些矛盾的从不同角度予以解释,而每种解释系统均各有其政治与社会力量作为基础,这就使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三主义,即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左翼平等主义的一种类型),彼此之间的论战与思想冲突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 21 世纪前期的思想文化运动,将与这三大主义的互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 “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

“新左派”知识分子从学术背景上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批评作为学术背景的,他们更多的是以西方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为理论资源。第二类是以左派经济学为学术背景的,他们主要以西方左派的“依附性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文革”经济思想作为立论基础。第三类是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东方主义为理论资源。当然,此类民族主义者与前两类人在观念上未必完全一致,但在中国与西方关系紧张时,他们倾向于从左的方面来加强自己反西方的立场,因而也可以把他们纳入“新左派”的一种类型。

从总体上看,他们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大多在大学与研究所工作,不少人在国内或国外取得博士学位,许多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留过学。到了 90 年代末,“新左派”在国内一

些重要人文学术阵地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发言场所,并在一些重点大学校园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生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一般而言,他们并没有在现体制条件下参与政治的直接兴趣与动向。他们只是作为是思想界日渐活跃的学者,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的参与者在学术思想界活动。

## 温和与激进:“新左派”的两种类型

从“新左派”人士的思想状态与观念上看,可以发现由于学理资源不同,由于价值取向上的侧重点的不同,由于心态上或经历上的区别,存在着温和派与激进派两种不同的类型。区别两种不同类型“新左派”,对于研究他们未来的政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 1. 温和型“新左派”:后现代主义型

就此类人的理论资源与关注的核心价值而言,就其用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来解读中国问题而言,人们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型”的“新左派”。此类“新左派”认为,由于国际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同样体现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因此,他们力图用西方新左翼思想运动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来对中国现实进行批判反思。他们是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从市场经济的过度膨胀产生的消极后果的角度,来表达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社会的诉求的。

他们认为,既然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潮流,那么这就同样需要在中国形成一种制约过度市场化的历史潮流,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膨胀。他们从发生于美国西雅图的有五百多组

织参加示威运动中,从示威抗争者提出的“世界不是商品”的口号中深受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左翼珍贵传统的再现”:在他们看来,这种左翼传统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弱势者的团结、国际主义、反权威、反专断、反剥削,反对人类世界的异化与商品化。他们从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对消费社会展开的批判中获得精神支持,呼吁“拒绝将人等同于单纯的消费者”。

他们认为,左翼思潮在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时代,有其独特的意义。他们反对“全球化是人类的宿命”,反对“贸易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他们认为,“自由贸易逻辑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一道日益扩大的鸿沟。富者不断积累财富是以无产者的边缘化、赤贫化为代价的;富国的经济扩张是以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债台高筑为代价的”。

他们不断提醒人们,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对资本主义的控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个性的解放,在于完成他自己。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梦想,他认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新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从引用的上文中,可以大体上看出这一类“新左派”的基本特点,即他们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从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角度,来伸张自己的左派主张的,他们倾向于把中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问题,看作是发达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体现。

此类“新左派”强调的第二个方面,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经济生

活,以防止自由放任主义对弱势民众与团体的侵害。他们对自由竞争抱有极大的疑虑,强调市场经济必须受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制约和调节;他们认为这种近年来在东欧俄国大行其道的所谓“自由主义”,实际是以剥夺大多数人为代价来造成少数人的自由。他们把俄国经济改革中的失范与无序化现象一概概括为“掠夺性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就此类人强调国家通过干预社会来实现更为公平的分配而言,他们也可以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型”的“新左派”。

由于此类“新左派”人士把中国当下的问题视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问题相似,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从西方引进的最时兴的新左翼思想理论的概念。如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劳动场所人性化。要求文化主权、尊重本土文化、反对文化商品化、反对西方流行的“现代性”,“后福特主义”等等。他们反对过度资本主义化对人性压迫,反对人的异化,反对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接受一个同质化 由金融和政治寡头主导的世界”。这一观点与立场是他们反复强调的基本主题。

从学术风格方面也可以看出温和左派的一些特点,与下面我们将分析的激进左派相比,他们的文风相对而言多少有些“贵族化”,他们的文章用词艰深,一般民众很难理解,也对他们的高论不感兴趣。他们似乎也对民众是否理解他们的思想同样不感兴趣,他们虽然也不断在自己论文中强调大众民主,但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把他们的理论付之社会实践,从来不曾对社会民众进行思想与理念上的号召动员。温和型“新左派”绝大多数是大学与研究所的学院派。

应该指出的是,此类温和“新左派”中的一些思想观念有其合理性 with 积极作用。因为,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的

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问题确实也越来越多的体现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他们敏感地意识到中国问题不能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来理解,如果他们的左翼理想主义不是走得离现实太远的话,他们对于防止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向,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示警与纠偏作用。

另一方面,他们致命的缺陷是学院派的书生气与十足的左翼的拿来主义,实际上他们生活于“西方译语世界”中难以自拔,一位自由派人士机智地讽刺此类“新左派”以“后现代主义”来规范正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的方向,无异于“要瘦子减肥”以及“给婴孩发避孕药”。另一方面,此类温和“新左派”中对“文革”中的平均主义,对计划经济体制,对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均怀有一种文化浪漫主义的审美心态而产生的误读。

## 2. 激进型“新左派”:民粹主义型

与温和派相比,这种“新左派”在当下中国更具有消极性与危险性。他们过分地夸大了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过程中某种由于脱序与失范而出现的消极现象,并把此类消极面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表现”,由于这种悲观估计,他们在情感上思想上对现实有一种更强烈的疏离感,并形成一种更具情绪化的激进的“左”的社会批判意识。在他们看来,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中国民众已经成为“被资本家奴役的奴隶”。他们主观上似乎要表达为下层阶级讲话的道义责任感。然而这种责任意识却是建立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

大体上看,我们可以把此类“新左派”的特点概括为以下这几个方面。

1. 强烈的“底层意识”，反知识分子倾向与民粹主义倾向。从他们的经历来看，他们中不少人或者出身于社会底层，或者在西方留学时，在自由竞争的巨大压力下深受挫折，从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憎恶感。他们在国内与国外多少有过被主流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经历，底层的生活经历与挫折感使他们产生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精英阶层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怀疑乃至憎恶情绪，当他们看到某种社会不公现象时，就会把个人遭遇到的挫折与他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平联系起来，并自认为是“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产生一种“为民请命”的使命感。

这种“底层意识”使他们对知识分子精英有一种本能的强烈的不信任。因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主流肯定中国市场经济的走向的合理性，他们就由此认定，知识精英与当权者与有产者已经“同流合污”。成为奴役社会大众的“帮闲”文人。

这里可以以一位激进“新左派”人士为例子。他出身于贫困家庭，从小受到种种不平待遇，后来在大学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偏僻地区任教，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使他内心始终有一种强烈的边缘人的反社会的冲动。他的底层意识，使他有强烈的反知识分子情绪。他在其与自由派论战的文章中居然说，“中国没有自由主义，只有法西斯主义”，要自由派把“化公为私”与贪污的公款吐出来云云，洋洋万言，几乎通篇是对论战对象的人身攻击与蔑视。

当然，底层的边缘人未必都会成为“新左派”，以下就是一位同样出身底层，然而却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青年学者对这位“新左派”人士的批评：“我的出身也是农民，我的家人至今都在农村，我知道改革以前的农民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而且是缺乏代言人的，但是他们的命运绝对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他们的命运也绝对不是回归到旧体制的计划经济可以改善的，他们的命运在改革开



放以前更惨。记忆中的集体经济时代,生产‘队长’的权力至高无上,主宰队里所有人的工分(收入)以及政治地位,他说给谁多少工分就是多少工分,他说应当批斗谁就批斗谁,他说谁不能出门要饭就不能出门要饭(要饭必须经过他的手开证明)。农民在这样的状态之中,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毫无尊严和自卫的能力……每每想到在那样的处境中我的家人,我的祖父和祖母所受到的极左思潮统治下的农村生活的非人的待遇,我就会流泪。这就是“新左派”们所渴望的平等?农民所需要的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一套,而是自由,真正打破了等级制度的自由。城里人再也没有权力驱赶他们,他们拥有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迁徙,在他们自己的国度,在大地上自由地走动的权力,这比什么都重要。”

由此可见,“底层情结”可以把一部分人引向自由派,也可以另一部分人引向激进的“新左派”,后一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因为,激进“新左派”认定,自由主义不能解决中国的底层社会的严重问题。只有左翼的平均主义才能使下层民众得到自由。在他们看来,在“充斥着土豪劣绅式的农村干部与地痞流氓的社会”里,温和的自由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因而左派的民粹主义理论,最能充分表达“冲决网罗”式的激情。这种心态与思想早在20世纪之初受民粹主义思想影响的激进青年知识分子中就普遍存在过。海外一些新移民中的“新左派”也是如此。他们移民西方后始终处于社会边缘,有一位这样的人士说过,他的新左翼思想是与西方资本家对他的剥削所给予他的个人刺激有关。正因为如此,一位“新左派”激进人士就有了如下极端主义思想:

“我们所面对的一大批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人,他们实质上是要实行野蛮的、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奴隶制,要实行法西斯主义。因此,与其说我反对自由主义,与其说我反对资本主义,还不如说

我反对奴隶制,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权威主义化和法西斯主义化。让我们守住 1789 年的阵地,让我们守住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阵地,在这个阵地前写着:自由!平等!博爱!我们不能从这些历史进步的阵地上永远后退。”

他们对知识分子主流表现出极度蔑视的同时,却把民众视为天生纯洁的,优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民众是天生具有革命精神的。这种激进“新左派”接受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民粹主义革命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这种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北京今年上演的《切·格瓦拉》这部充满“新左派”思想的话剧中得到充分表现。剧中我们看到以“脚”自居的伐木工人,愤怒的斥责和嘲弄以“脑”自居的劳心者的理论,在剧作者笔下,那些自以为是在为民族争取奇迹般的发展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眼里这些都不过是特权阶级的帮闲,或者简直就是新式的压迫者本身。

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却没有丝毫批判反思的精神。他们已经对真实的“文革”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从被他们诗化的“文革”实践上寄托他们的文化浪漫主义。这一点可以从《切·格瓦拉》的某导演以“一个红小兵”的身分所写的“在毛泽东灵前”的文章中明显地看出来。

2. 强烈的反西方的情绪。他们中相当一些人有过在西方留学的经历,在西方所受到的挫折,使他们比那些进入中产阶级的成功留学生阶级更深地品尝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极面,这种体验使他们在情绪上无法接受中国将成为西方式的社会的现实前景。《切·格瓦拉》剧作者本人曾在美国留过学,他个人对美国的体会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你坐在美国餐店里一连十八个小时洗盘子时,望着堆得高高的盘子时感受到的美国,与在餐厅柔美低沉的音乐声中感受到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这种切身的体验投射到

中国现实中,形成一种左派信念。虽然温和派左派中一些人也有反西方的情绪,但远不如后者表现得如此强烈而深切。

3. 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由于他们自认为真理在握,于是就有了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他们从道德上把一切事物分为“非正即邪”的两极。由于他们自认为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凡是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只能被理解为“道德上的邪恶”,对于“邪恶势力”,为了人民的利益就要进行坚决斗争,这种独断论思维方式,使他们在心态上极不宽容,表现得特别咄咄逼人。清华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甚至用毛泽东批判帝国主义者“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命题来攻击自由派。

实际上这绝不是单纯的个人学风问题,它反映出激进左派特有的“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的通病。当年的一位五四青年在法国留学时,称中国必须有一场针对把那些拥有十万二十万小资产的小资产阶级的俄式革命,哪怕反对也势在必行,在思想方法上均与此种正邪两极分类法有关。波尔布特式的革命激情与他们所鼓吹的格瓦拉精神,与他们的激进左派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此类人有相当强烈的革命情结。一则渊于左派文化在潜意识中的积淀,在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尤其是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平”的社会贫富分化的情况下,传统的劫富济贫的平等主义激活了左派政治文化中的这种传统因素。对他们思想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暴民政治革命发生的思想机制,就此而论,他们可以说是左翼革命思想的活化石。

4. 类雅各宾党的民众动员冲动与暴力崇尚。由于激进“新左派”具有上述底层意识,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倾向,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以及以西方为邪恶敌人的目标意识,从逻辑

上自然就会导致此类人对于动员民众来实现“公平社会”有强烈兴趣。可以说,此类“新左派”人士底子里有一种暴民政治的革命倾向,一种底层革命意识,一种诉之于民众动员的内心冲动。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早年共产革命的种种语汇与符号。

这一点与那些认同“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的温和派不同,前述温和“新左派”一般而言都在西方大学校园里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具有“贵族化”、“精英化”与书斋式的学院主义倾向。而民粹主义“新左派”大多出身于底层的经历与他们在西方的挫折感,则使他们具有自下而上地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政治动员的冲动。民众的情绪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他们甚至相信中国的大众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如果说温和“新左派”在艰深的理论世界中乐此不倦,那么,激进左派的文风则相当通俗,他们更愿意采取通俗的文学形式,来宣传他们的主张。他们也从大众的情绪反应中来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他们找到格瓦拉这个历史人物作为他们的偶像也就绝不是偶然的。

### 从话剧《切·格瓦拉》看“新左派”的社会影响

2000年四五月,北京小剧场上演了话剧《切·格瓦拉》,这一话剧上演获得极大轰动。据称,《切》剧一共上演了三十七场,平均上座率达百分之一百二十,共接待了一万多人次的观众,有时过道都坐满了人,迟到观众站着看的情况并不少见,演出达到了媒体所说的“火爆”程度。据称,十几个大学生甚至专程从沈阳赴北京来看话剧,有的观众泪流满面。连看两遍者大有人在,不少人看了五六场。有的连看十二次。全场情绪激昂。它的上演标志着“新左派”思潮第一次走上文学艺术的舞台,走向了民间。观众主体是北京

大学生,离休老干部与“老左派”人士。演员则是有报酬的,但主创人员则完全是义务,以表示要身体力行左派无私奉献的精神。

该剧上演后,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左派”之间就这场话剧引起论战。剧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曾在美国某大学读过社会学。另外一个重要合作者,该剧的导演是一个流浪全国达一年之久的民间音乐人,民间生活的经历使他此后成为“新左派”。

众所周知,古巴革命中的格瓦拉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左翼革命符号意义的历史人物,古巴革命胜利后,他出任银行行长,他制定了废除货币政策、要求人民必须义务劳动,要以此方式来发展经济,他还主张把“懒散”的工人送到遥远的集中营作为惩罚。从政治逻辑而言,如果格瓦拉的左派政策得以进一步推行,人们有理由认定他会成为类似于波尔布特式的人物。实际上,波尔布特后来在高棉实施的供给制、废除货币、消灭城市与商店、推行“不吃闲饭运动”等等,与格瓦拉思想与价值观如出一辙。后来,格瓦拉的左翼革命政策与革命后卡斯特罗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发生矛盾冲突,格瓦拉本人也自认为不能在古巴继续施展他的左派理想与抱负,于是他再次投入于丛林革命,从古巴回到玻利维亚进行游击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生命。

笔者与一些朋友曾在北京与话剧《切·格瓦拉》的剧作者进行过深入讨论,笔者指出,有人认为,格瓦拉是来不及犯错误的波尔布特。如果格瓦拉死得晚,他就是波尔布特,如果波尔布特死得早,他就是格瓦拉。对此你怎样看?这位剧作者认为,他看重的是格瓦拉的符号意义,在他看来,格瓦拉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力量,对于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格瓦拉的精神是一种新的价值,一种消毒剂。

笔者问,为什么选择格瓦拉作为表达作者政治理想的主角?

剧作者说,格瓦拉的第三次出走,即从古巴回到南美丛林打游击的这次出走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他还说格瓦拉身上有一种与命定的规律相抗争的道德力量。一般人认为,一切主义都在必然性与规律面前俯首,因为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格瓦拉看来,如果规律不符合人性,它也要受到抗拒。人在这种抗争中显示出真正的伟大。作者说,“我们反对一切非人道的社会,不管它是不是符合规律与必然性。正义高于规律。”

话剧《切·格瓦拉》的魅力何在?一方面,它体现了左派在抗拒市场经济的世俗化潮流方面的浪漫理想主义精神。该剧通过格瓦拉所体现的正义、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左派原则,来突显中国选择全球化与市场化与世俗化的历史道路是错误的。剧中正面人物以讽刺的口吻来抨击WTO,“致富的头班车”、“旧世界的移民申请表”。这种“新左派”的价值观,在市场经济世俗化与全球化的潮流中具有反潮流的意义。很多人能够认同格瓦拉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和生活原则。作者引用他的一位青年观众所说的话:“这个戏反映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让我看到不平等、压迫永远也无法阻挡正义的声音出现……这是一种启示,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这一点可以解释“新左派”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所在。

然而,不知作者是否意识到,该剧具有一种具有反叛现存秩序的民粹主义倾向。该剧最核心的内容是,把世界划分为两类人,富人与穷人,富人是道德败坏、堕落、邪恶的,穷人是善良、纯洁、道德高尚的。穷人革富人命就是天然合理正义的。这一主题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穷人革富人命的思想,另一方面,这出话剧站在“穷人”一边反对“富人”,并为“穷人反对富人”的暴力革命的合理性与革命正当性进行鼓动与辩护。这出话剧对革命暴力的赞颂,实际上具有以革命方式来实现平等的政治倾向。

有评论者指出,该剧同时还宣传了穷人反对富人的确实是恐怖的、血腥的,然而却是神圣的。该剧的逻辑是一种很简单的正邪两叉分类的逻辑:“同意的请过来,反对的请拔枪。”剧中的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动辄就要诉诸武力,不惜以肉体生命相搏,他们根本就不屑于听听反对者的意见。只要是反抗压迫和掠夺,在他们看来可以不计后果,不论成败。对一切不革命者应予以打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切·格瓦拉》可以看作是民粹主义“新左派”,即激进“新左派”在革命符号下在社会上登堂入室的表现。它所体现的“以暴易暴”的情绪与价值倾向,及这种价值倾向在生活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十分值得研究者重视。

### 对“新左派”思想的评论

大体上可以说,“新左派”无疑是有其正面功能的,从思想多元化的角度来看,“新左派”作为一种批判力量,如果不是走得太远,他们对市场竞争造成的无序化与两极分化,可能起到一种制衡作用,并显示出某些合理性。“新左派”在强调社会公平的理念与价值方面,在研究如何发掘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原有的思想资源与政治遗产的合理性方面,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即使在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历史中,正是主张社会主义运动的左派力量,通过斗争,促使资本主义得以在接受挑战过程中立法以保护民众利益。

然而,当下中国“新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年龄都很轻。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左的专制政治没有切身体验,因而对左的东西中内含的专制基因不会有深切的警惕。相反,他们对市场化过程中的失范,两极化,腐败之类由于发展综合征现象,则有更深切的感受。由于他们把所有这些转型过程中的消极现象,简单地附

会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他们也就把反资本主义的西方左派理论顺理成章地拿来批判中国的市场经济化过程。其结论是反对改革,反对开放,反对中国走全球化道路,反对中国与世界接轨。就其反对中国二十年来经历整个民族痛定思痛的反省以后形成的历史潮流而言,“新左派”实际上是一种最保守的理论。正如一位自由派学者所指出的,“我们可以打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天冷大家都容易感冒,你是不出门呢,你还是说把身体锻炼好?为了防止感冒是应该去改造天呢还是改造人自己?答案事实上是非常明确的。”

## “新左派”的思想谬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 1. 错置具体感的谬误

正如一位学者一针见血指出的,“新左派”所采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种西方的理论或观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然后针对中国内地的现实,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对策。大体而言,理论资源取自西方的成品,讨论的问题直接出于对中国现实(特别是政治现实)的关切,这是“新左派”思潮文字的特色。“新左派”用后现代主义来解释中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后现代主义是针对发达西方国家晚期资本主义过度膨胀而提出来的。用“把外国环境中因特殊背景与问题而发展出来的东西,当作解释中国问题的权威,而不知道西方观念与口号所代表的内容的全部复杂性,以及它在西方特殊背景下对应的东西。把外国的一些观念从它们的历史来源中切断,断章取义地变成解决我们中国问题的口号。”这在思想方法上就是犯了“错置具体感”的谬误。



西方的左派学者对西方社会的批判,当然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如果不顾时空的差异,一股脑地将西方左派学者对西方社会的诊断移用到中国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自由派在批评“新左派”时,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问题究竟是过分“现代化”了、过分“资本主义”了,还是根本没有实现有序的市场经济、而处于被权力所支配的“伪市场经济”下?“新左派”显然把两者混为一谈了。西方“新左派”在已经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其纠偏的贡献,因为他们是对主流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中国现代性尚没有实现,“新左派”的“反现代性”实际上则起到为旧制度复活助威的作用。

由于这种错置具体感,导致找错了对象,“新左派”把账算到自由派身上也是不公正的。因为自由派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反对这种由于权钱交易而形成的社会不公正的。自由派主张的私有财产神圣,指的是合法所得。换言之,目前的分配不公,与其说是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不如说是发展过程中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这样一些可以被称之为“后发展综合征”的一种表现。用反资本主义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来批判中国目前的改革中的脱序现象,实际上是找错了靶子。

## 2. 文化浪漫主义的谬误

什么叫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就是主体把审美的愿望投射到一个他并不真正理解的外部对象上去,通过对该对象的诗化的理解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心理上满足内心未遂的愿望。更具体地说,“新左派”把一种与现实中的弊端相反的价值,例如与现实中的不公正相反的“均富”、“公平分配”这样的价值,不自觉地投射、附丽到“文革”或格瓦拉式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对象上去。通过这种审美的愿望投射,来宣泄对现实弊病的不满,并寄托自己在现实中未

遂的理想,由此而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审美的升华”。“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制度、鞍钢宪法、群众大批判与群众专制,于是都成为这些并没有亲自参加过“文革”的“新左派”寄托、宣泄他们对当下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的审美对象。当处于一种文化的困境之中时,人们特别容易把另一种在形态与价值上相反的文化在想像中予以浪漫的美化,以为那就是美好的天堂。“新左派”要把中国引到市场经济以前的中国去,并对“文革”予以美化,正是出于对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分化不满心态,而产生的对公平社会的愿望投射。这正是典型的“中世纪的浪漫主义”。

“新左派”的危险在于,他们以审美的浪漫体验来解读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审美感,而在于他们要以这种浪漫化的社会主义理念来重建社会公正的方案的基础。

如果把“新左派”的文章作为思想史资料却弥足珍贵,因为他们实际上重演了一段喜剧式的 20 世纪初期的左派观念发生史。他们把左派最突出的弱点,即把某种公平理念抽象化、浪漫化并予以反历史的美化方面,以漫画的方式发展到极端与荒谬的地步。

### 3. 完美主义谬误

这里的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指的是那种除了至善至美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能使之感到满意的人们。不完美是经验世界的事物的常态,也是一切现实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新左派”心目中的完美事物,其实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被他们认为是更为真实、更为本质的“第一原理”,这种“第一原理”则源于他们的头脑中的道德理想。当他们以这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东西作为参照点,来观照现实、评价实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要以某种先验的、理性设计的社会工程蓝图来重建一个新世界。

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应该认识到,公平是人类可以渐进地实现的理想,是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渐逼近的目标,但决不可能根据一种“公平”的道德观演绎出的“第一原理”来构建一个全新社会。因为“第一原理”与人类经验无关,只与人们的道德理想有关,如果以此虚幻的原则来重建社会,社会就变成怪物,例如,根据人们设计出来的计划经济模式,颇为符合克服“社会不公”的意愿,但由于“理性”的局限性,人们没有考虑到计划经济却导致另一种不公正,即以集体名义进行的专制独裁与权力者私欲对社会造成的更大的不公,设计计划经济社会的人们也没有考虑到,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由于抑制竞争,从而对社会活力的扼杀。这些已经是中国历史教训中最重要的部分。

更具体地说,一个现实主义者会意识到,市场经济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都是不完美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会导致贫富分化。这种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支付的代价,人们可以在其发展中,通过法制建设,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尽可能地避免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的祸害,而左派的完美主义者则相信,有一种人为设计的“完美”的平均主义社会模式可以取代“不完美”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抛弃了人类的集体经验,以理想主义来代替现实了。

“新左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方向,是不切实际的。“左”的激进主义已经被百年的历史证明是一种失败,中国人决不会选择回到左的道路上去。“新左派”不会在国人中,在知识分子中找到多少知音。他们自以为是在为中国普通老百姓请命,但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因噎废食地认为,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腐败、下岗失业,而应该拒绝改革开放,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时代去。他们只是对竞争过程中缺乏法制与无序化表示

了不满,如果要像某些“新左派”那样,为了公正而根本拒绝走市场化的道路,那无疑是南辕北辙。

## “新左派”的未来政治影响

如果说8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心,社会的自主空间相对较大,各种讨论会,讲座与沙龙活动层出不穷,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也吸引了社会各界与校园学生的普遍关注,知识分子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他们居于社会中心的地位,那么,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基本上从这种政治中心的地位退处于学术化的边缘地带。基本上可以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争论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如80年代中期了。从当下的“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思想交锋情况来看,他们之间的论战主要局限于互联网,以及部分发行量并不大的知识分子期刊与书本之中,“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甚至面对面的交流与辩论也很少出现。社会上对此场争论知之者并不多。知识分子论战者们的听众远不如80年代中期。而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生活已经相当地分化,人们忙于经营自己的事。关心思想理论的人较少。无论“新左派”还是自由派,他们与普通民众并没有经常联系与沟通的渠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互动没有长远的影响。大体而言,我们可以预料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可能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种前景:与社会多元化相对应的思想多元化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自由派、“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这三种

思潮在当下中国均具有长期合法存在的条件,这首先是因为,这三种思潮各自所强调的价值,均与社会主流强调的价值之间存在着部分一致性与重合性。例如,首先,自由派强调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要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强调法制与国际接轨等等。这是与社会主流相一致的;其次,“新左派”自发地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公平价值的重视与肯定,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的强调,对公有制理想的追求,则是与政治主旋律相一致的;第三,就新保守主义而言,这一思潮流派对秩序与权威在转型过程中的意义的重视与肯定,对政治西化的批评,同样也是与执政的政治精英有一致之处。以上三种思潮都部分地与社会主流价值与主旋律思想具有共识。因而它们在当下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存在的空间。

另一方面,这三种思潮各自又与社会主流价值存在着矛盾。例如,自由派对西方价值的认同,与当下的权威政治模式存在着相当的张力。“新左派”对改革开放以前的旧体制的平均主义的认同,则与邓小平开创的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矛盾。同样,新保守主义使用的权威主义话语,与中国革命意识形态话语无疑同样构成矛盾。

这种三大思潮与权威政府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使政府将受到来自“新左派”思潮与自由派思潮两个不同方向的压力与挑战:自由派以政治改革与建立法制社会为诉求,而“新左派”则以经济平等为诉求。这无疑将丰富中国政治发展变化的色彩。三大思潮与社会主流价值之间的共识点的存在,又使它们在现行体制下可以长期合法存在,如果这三者之间能够彼此宽容,形成良性互动,未尝不对中国的思想界的发展与进步起到积极的平衡作用。

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更重要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内地经济

改革导致的社会分层化已经出现,然而,单纯的社会多元化并不足以成为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而90年代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与社会多元化相结合,则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更具体地说,这种对应关系体现在,新保守主义与自由派的右翼,对秩序与稳定价值的强调,客观上更能体现主张改革开放的务实派政治精英与大型企业集团的利益。自由派对民间产权、自由竞争、人权与法制的强调,在客观上更符合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新左派”如果抛弃过于浪漫的底层情结与暴力革命崇拜,他们对公平、平等与弱势群体利益的强调,则在客观上更符合下层民众的利益,并为他们所认同。

这样,三种思潮各有其在上社会对应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当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争取自己利益与发言权时,他们就有了表达自己利益与价值的思想理论资源,在公平竞争的政治游戏规则下,运用这些不同的思想主张,各自在法制基础上争取自身利益与权利。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主建设就有了社会条件与思想条件的两方面的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宽容与理解的条件下互动,对于中国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 第二种前景:左派与边缘人结合的可能性

从理论上推断,中国还是存在第二种可能性,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重大的危机与断裂,并引发社会矛盾总爆发,这将会形成这样一种可能,即激进类型的“新左派”以其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社会矛盾,并把中国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再次像20世纪初期那样,要求建立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来解决社会

总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利者、与部分充满挫折感的下层民众来说,由于经济上的失落与利益分配上的弱势地位,他们最易接受的是“新左派”的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在这个过程中,“新左派”中的那些温和派即“后现代主义”派,由于与底层利益没有关联,将会逐渐失去其社会影响力,“新左派”中的民粹主义派,如果人数上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那么,由于其“底层情结”,则会更容易取得变为绝望阶层的下层民众的青睐。民粹主义“新左派”会如同波尔布特一样,在中国宣扬一场反对“邪恶富人”的革命。力求在中国土地上去重新建立一个理想的平均主义的“公平世界”。虽然 20 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乌托邦实验只能导致对整个民族的一场巨大悲剧。但正如黑格尔所说,“历史的记忆是灰色的,人们永远不会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 20 世纪的周期性循环又将开始。

然而,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少,原因是,首先,没有 20 世纪初的种种条件。21 世纪是一世俗化的世纪。“新左派”很难在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中形成气候。在现行条件下,国家政权有足够能力来抑制事态的恶性发展。中国社会出现现代化断裂的概率并不大。

### “新左派”与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

在现代历史上,有两种人起着重要作用,一种是中产阶级,另一种是知识分子观念人。如果说,中产阶级缺乏道德激情,然而却务实而稳健,那么,与中产阶级相比,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却恰恰相反,他们充满强烈的道德激情与正义感,然而却往往不切实际,容易产生全盘改造现实的“乌托邦情结”,20 世纪的中国历史

上,他们对中国的历史选择确实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里指的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不完全是一个与“劳心者”的内涵相当的职业概念。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这样一种人,这些人受过高深的人文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同时又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敏感相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以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己任的道德使命。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确认的信仰、价值与理念,来献身于社会改造与改良的行动,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为理念而献身的行动倾向性,往往又会导致他们以某种自己认为合理的、全面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社会工程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并会出乎他们意料地给整个民族带来无穷的苦难,其结果就会印证严复曾在20世纪之初对新进青年所作的预言:“大凡吾人所受之苦痛,出于恶人者浅,成于好人者深。”

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国与美国,观念型知识分子并不很多,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社会压力集团来伸张自己的利益。

然而,在欧洲大陆国家、俄国与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观念型知识分子,他们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情结”仍然有着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世俗化过程,又使那些崇尚务实与稳健,但缺乏道德激情与社会批判精神的中产阶级不断强大起来。

中国在现阶段的进步,实在需要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与务实



的中产阶级这两种人的相互补充与支持。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在保持他的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个专业人员那样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如果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能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多一点社会关怀,中国就可能一方面避免以观念人的激进的乌托邦来主宰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会以渐进、稳健、务实、妥协与宽容的精神来选择我们民族的前途,这样的社会无疑是更有希望的。

原  
书  
缺  
页